主　编:侯惠勤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方克立　田心铭　吕世荣　李崇富　周　宏
侯惠勤　赵智奎　姜迎春　宣云凤　夏伟东
黄明理

编选人员:
侯惠勤　姜迎春　张志丹　苗泉竹　王金玉
王秋梅　刘祥林　程广安　张甲秀　董　德
宣云凤　夏瑜杰　吴爱武　牛　菲　赵文荟
钟　君

摘 编 说 明

1. 本摘编为专题性的摘编，共摘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763条，分别引自335篇著作。一、二级标题均为编者根据经典作家的意识形态基本观点所加，而正文所选段落的提要则一般从原文中直接选出，并以黑体字标示；有些选摘段落的原文是间接地表达该专题意思的，为便于读者阅读，编者在原文提要中根据原文精神加入了关键性词语，并以圆括号（ ）形式标出。

2. 为确保译文的权威性并便于读者查阅原文，本摘编依据的原则是，首先摘引已出的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其次摘引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上述新版空缺的原著，则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和《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

3. 本摘编所摘的经典作家论述的排列顺序，不是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人物排序，而是编者根据各段论述所表达的思想，按其逻辑关联排序。本专题摘编共分为8个部分33个专题。

4. 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一般只在相关专题中摘录一次，极少数论述表达了作者关于意识形态的多维度的观点，可能会在不同的专题中都收录，但在摘录篇幅及前后文的连接

上有所区别。

5. 在《列宁全集》中,1918 年 2 月 14 日以前俄国通用俄历,这以后改用公历。两种历法所标日期,在 1900 年 2 月以前相差 12 天,而从 1900 年 3 月起相差 13 天。编者所加的日期,沿用《列宁全集》的做法,公历和俄历并用时,俄历在前,公历在后。

目　录

一、意识形态概述 …… (1)

(一)德意志意识形态或虚假意识 …… (1)
(二)狭义意识形态或现代国家意识形态 …… (21)
(三)一般意识形态或社会意识形式 …… (39)
(四)意识形态的社会认识根源 …… (62)

二、统治阶级和统治思想 …… (97)

(一)劳动支配与思想支配 …… (97)
(二)统治思想与阶级利益 …… (112)
(三)思想统治的策略 …… (163)
(四)意识形态阶层(阶级) …… (186)
(五)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价值剖析 …… (199)
(六)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价值观基础 …… (239)

三、意识形态虚假性与拜物教 …… (288)

(一)意识形态虚假性的基本含义 …… (288)
(二)判别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方法论原则 …… (297)
(三)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根源 …… (311)

(四)拜物教批判 …… (340)

四、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与无产阶级领导权…… (372)

(一)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解放运动…… (372)
(二)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阶级意识 …… (414)
(三)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领导权 …… (453)
(四)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宣传教育 …… (498)
(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必须旗帜鲜明 …… (527)

五、意识形态与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 (543)

(一)工业、大机器和资本的统治 …… (543)
(二)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的应用…… (554)
(三)无产阶级是现代大生产的主人 …… (564)

六、意识形态与宗教…… (577)

(一)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力量的宗教 …… (577)
(二)现代国家与宗教 …… (587)
(三)无产阶级国家与宗教 …… (601)

七、意识形态与社会理想…… (612)

(一)理想与社会现实 …… (612)
(二)理想不是美化现实的词句…… (618)
(三)开辟通向未来的道路 …… (623)

八、意识形态的类型…… (629)

(一)自由主义 …… (629)
(二)改良主义 …… (641)
(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 …… (647)

（四）各种类型的机会主义 …… （699）
（五）无政府主义及其他意识形态 …… （718）

编后语 …… （733）

一、意识形态概述

(一)德意志意识形态或虚假意识

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行动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

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行动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因为这是思维过程,所以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他从纯粹的思维中——不是从他自己的思维中,就是从他的先辈的思维中得出的。他和纯粹的思维材料打交道,他直率地认为这种材料是由思维产生的,而不去研究任何其他的、比较疏远的、不从属于思维的根源。而且这在他看来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他看来,任何人的行动既然都是通过思维进行的,最终似乎都是以思维为基础的了。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梅林》(1893 年 7 月 14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9 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94—95 页。

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像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①，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das Bewuß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ß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① 手稿中删去以下这句话："而且人们是受他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他们的物质交往和这种交往在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中的进一步发展所制约的"。——编者注

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

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因此，这种历史观只能在历史上看到政治历史事件，看到宗教的和一般理论的斗争，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例如，某一时代想象自己是由纯粹“政治的”或“宗教的”动因所决定的——尽管“宗教”和“政治”只是时代的现实动因的形式——，那么它的历史编纂学家就会接受这个意见。这些特定的人关于自己的真正实践的“想象”、“观念”变成一种支配和决定这些人的实践的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和积极的力量。印度人和埃及人借以实现分工的粗陋形式在这些民族的国家和宗教中产生了等级制度，所以历史学家便认为似乎等级制度是产生这种粗陋的社会形式的力量。法国人和英国人至少抱着一种毕竟是同现实最接近的政治幻想，而德国人却在“纯粹精神”的领域中兜圈子，把宗教幻想推崇为历史的动力。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整个这种德国历史编纂学的最终的、达到自己“最纯粹的表现”的成果。对于德国历史编纂学来说，问题完全不在于现实的利益，甚至

不在于政治的利益，而在于纯粹的思想。这种历史哲学后来在圣布鲁诺看来也一定是一连串的“思想”，其中一个吞噬一个，最终消失于“自我意识”中。圣麦克斯·施蒂纳更加彻底，他对全部现实的历史一窍不通，他认为历史进程必定只是“骑士”、强盗和怪影的历史，他当然只有借助于“不信神”才能摆脱这种历史的幻觉而得救。① 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宗教的观点：它把宗教的人假设为全部历史起点的原人，它在自己的想象中用宗教的幻想生产代替生活资料和生活本身的现实生产。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3—94页。

这是物质生产中，现实社会生活过程中与意识形态领域内表现于宗教中的那种关系完全同样的关系，即把主体颠倒为客体以及反过来的情形。

因此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就是物对人的统治，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因为变成统治工人的手段（但只是作为资本本身统治的手段）的商品，实际上只是生产过程的结果，是生产过程的产物。这是物质生产中，现实社会生活过程（因为它就是生产过程）中与意识形态领域内表现于宗教中的那种关系完全同样的关系，即把主体颠倒为客

① 马克思加了边注：“所谓客观的历史编纂学正是脱离活动来考察历史关系。反动的性质”。——编者注

体以及反过来的情形。**从历史上看**，这种颠倒是靠牺牲多数来强制地创造财富本身，即创造无限的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必经之点，只有这种无限的社会劳动生产力才能构成自由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这种对立的形式是必须经过的，正像人起初必须以宗教的形式把自己的精神力量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来与自己相对立完全一样。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册　资本的生产过程》（1863年7月—1864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8—49页。

由于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即一开始就撇开现实条件，所以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过程了。

哲学家们在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到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他们把我们所阐述的整个发展过程看作是“人”的发展过程，从而把“人”强加于迄今每一历史阶段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他描述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历史过程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实质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把后来阶段的普通个人强加于先前阶段的个人并且以后来的意识强加于先前的个人。由于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即一开始就撇开现实条件，所以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过程了。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页。

因为资产阶级已经是一个阶级，不再是一个等级了，所以它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而不再是在一个地域内组织起来，并且必须使自己通常的利益具有一种普遍的形式。

因为资产阶级已经是一个阶级，不再是一个等级了，所以它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而不再是在一个地域内组织起来，并且必须使自己通常的利益具有一种普遍的形式。由于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Gemeinwesen]，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目前国家的独立性只有在这样的国家里才存在：在那里，等级还没有完全发展成为阶级，在那里，比较先进的国家中已被消灭的等级还起着某种作用，并且那里存在某种混合体，因此在这样的国家里居民的任何一部分也不可能对居民的其他部分进行统治。德国的情况就正是这样。现代国家的最完善的例子就是北美。法国、英国和美国的一些近代作家都一致认为，国家只是为了私有制才存在的，可见，这种思想也渗入日常的意识了。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132页。

资产者的假仁假义的虚伪的意识形态用歪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的利益……

资产者的假仁假义的虚伪的意识形态用歪曲的形式把自

己的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的利益，这位具有移山信念的乡下佬雅各却认为这种歪曲形式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的世俗的基础。为什么这种意识形态的欺骗在我们的圣者那里正是获得了这种形式，我们在谈到“政治自由主义”时将会知道。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1845 年秋—大约 1846 年 5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195 页。

我们认为这种思辨是基督教德意志原则的最完备的表现，这种原则的最终目的就是要通过变“批判”本身为某种超经验的力量的办法使自己得以确立。

在德国，对**真正的人道主义**说来，没有比**唯灵论**即思辨唯心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它用“**自我意识**”即“**精神**”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并且同福音传播者一道教诲说：“精神创造众生，肉体则软弱无能。”显而易见，这种超脱肉体的精神只是在自己的想象中才具有精神力量。**鲍威尔**的批判中为我们所驳斥的东西，正是以**漫画的形式**再现出来的**思辨**。我们认为这种思辨是**基督教德意志**原则的最完备的表现，这种原则的最终目的就是要通过变“**批判**”本身为某种超经验的力量的办法使自己得以确立。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 年 9 月—1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7 页。

对谢林的抨击就是间接地对我们全部政治的抨击，特别

是对普鲁士政治的抨击。谢林的哲学就是哲学掩盖下的普鲁士政治。

就是说,在比埃尔·勒鲁等人眼里,谢林一直是一个讲究理性的现实主义,而不是超验的唯心主义,讲究有血有肉的思想,而不是抽象的思想,讲究世界哲学,而不是行帮哲学的人!谢林向法国的浪漫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说:"我把哲学和神学结合起来了",向法国唯物主义者说:"我把肉体和观念结合起来了",向法国的怀疑论者说:"我把独断主义摧毁了"。一句话,"我……谢林!"谢林不仅善于把哲学和神学结合起来,而且善于把哲学和外交结合起来。他把哲学变成一般的外交学,变成了应付一切场合的外交手腕。因此,对谢林的抨击就是间接地对我们全部政治的抨击,特别是对普鲁士政治的抨击。谢林的哲学就是哲学掩盖下的普鲁士政治。

因此,如果您马上给创刊号写一篇评论谢林的文章,那就是对我们所创办的事业,尤其是对真理,做出了一个很大的贡献。您正是最适合做这件事情的人,因为您是**谢林的直接对立面**。谢林的**真诚的青春思想**——我们也应该承认我们对手好的一面,不过他要实现这一思想,已经除了想象以外没有任何能力,除了虚荣以外没有任何力量,除了鸦片以外没有任何刺激剂,除了容易激动的女性感受力以外没有任何感觉器官了,谢林的这种真诚的青春思想,在他那里只是一场异想天开的青春梦,而在您那里却成了真理、现实、男子汉的郑重。因此谢林是您的**预期的模拟像**,而这种模拟像一旦面对现实就会变得模糊不清。因此,我认为您是自然和历史的陛下所召来的、谢林的必然的和天然的对手。您同他的斗争是哲学的

想象同哲学的斗争。

马克思:《马克思致路·费尔巴哈》(1843年10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8—69页。

在一定民族的各种关系的范围内,这也可能不是因为现在该民族范围内出现了矛盾,而是因为在该民族意识和其他民族的实践之间,亦即在某一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普遍意识之间出现了矛盾……

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①] 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但是,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不过,在一定民族的各种关系的范围内,这也可能不是因为现在该民族范围内出现了矛盾,而是因为在该民族意识和其他民族的实践之间,亦即在某一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普遍意识[②]之间出现了矛盾(就像目前德国的情形那样)——既然这个矛盾似乎只表现为民族意识范围内的矛盾,那么在这个民族看来,斗争也就限于这种民族废物,因为这个民族就是废物本

① 马克思加了边注:"与此相适应的玄想家的、僧侣的最初形式"。——编者注

② 马克思加了边注:"宗教。具有真正的意识形态的德国人"。——编者注

身。但是，意识本身究竟采取什么形式，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我们从这一大堆赘述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上述三个因素即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因为分工不仅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①、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而要使这三个因素彼此不发生矛盾，则只有再消灭分工。此外，不言而喻，“怪影”、“枷锁”、“最高存在物”、“概念”、“疑虑”显然只是孤立的个人的一种唯心的、思辨的、精神的表现，只是他的观念，即关于真正经验的束缚和界限的观念；生活的生产方式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交往形式就在这些束缚和界限的范围内运动着。②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1845 年秋—大约 1846 年 5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2—83 页。

……他（施蒂纳）真正相信意识形态的各种抽象思想统治着现代世界，他深信他在其反对“宾词”、反对概念的斗争中攻击的已不是幻想，而是统治世界的现实力量。

虽然费尔巴哈过分强调了反对这种幻想的斗争的意义。

① 手稿中删去以下这句话：“活动和思维，即没有思想的活动和没有活动的思想”。——编者注

② 手稿中删去以下这句话：“这种现存的经济界限的唯心主义表现，不是纯粹理论上的，而且在实际的意识中也存在着，就是说，使自己自由存在的并且同现存的方式相矛盾的意识，不是仅仅构成宗教和哲学，而且也构成国家”。——编者注

而在“施蒂纳”那里，连这种意识也“全部完了”，他真正相信意识形态的各种抽象思想统治着现代世界，他深信他在其反对“宾词”、反对概念的斗争中攻击的已不是幻想，而是统治世界的现实力量。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头脚倒置的手法，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无限的轻信，竟把资产阶级的一切虚伪的幻想、一切伪善的保证信以为真。但是，“蛹”怎么能构成“虚饰物”的“真正核心”，这种美妙的比拟是多么蹩脚，这可以从“施蒂纳”本人的“蛹”，即他的“圣书”中看得最清楚，其中既没有“真正的”也没有非“真正的”“核心”，甚至像在该书第491页上提到的一点东西，也未必能配称“虚饰物”。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63页。

黑格尔把这些个人的共同意志变为绝对意志，而乡下佬雅各则 bona fide〔真心诚意地〕把这种对意识形态的观念化看作是正确的国家观……

在每一个国家中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知道国家对他们有什么样的意义，也就是说在国家里并通过国家**他们自己**具有什么意义，桑乔由此得出结论：国家是凌驾于这些人之上的权力。在这里的问题仍旧是从自己的头脑中挤出来的国家的固定观念的问题。乡下佬雅各还始终在梦想，国家仅仅是一个观念，并相信这一国家观念的独立权力。他是真正的“国家狂信者，对国家着迷的人，是政治家”。黑格尔把那些还是

从个人——尽管仅是从这些个人的**意志**——出发的政治思想家的国家观念理想化了；黑格尔把这些个人的共同意志变为绝对意志，而乡下佬雅各则 bona fide〔真心诚意地〕把这种对意识形态的观念化看作是正确的国家观，并且在这种信念下，声称**绝对**就是**绝对**的，用这样的方法来评论这种国家观。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1845 年秋—大约 1846 年 5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402 页。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论原来是用以迁就现存世界的。

实际上，生产和消费往往处于互相矛盾之中。然而，据说只要能正确地**解释**这种矛盾，只要能**理解**生产和消费的真正的**本质**，就足以确立二者的统一和消除任何矛盾。这个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论原来是用以迁就现存世界的；生产和消费的统一，用现代社会的许多例子来证明，是存在于**自身**的。格律恩先生首先证明，在生产和消费之间一般地存在着一种关系。他谈论的是：如果没有生产大礼服和面包，他就不可能穿大礼服或者吃面包，而且，在现代社会中有生产大礼服、鞋子、面包的人，而另外一些人则是这些物品的消费者。格律恩先生认为这个观点是新的。他用一种经典式的、美文学式的、意识形态的语言把这个观点表达出来。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1845 年秋—大约 1846 年 5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610—611 页。

迄今存在过的联合体，不论是自然地形成的，或者是人为地造成的，实质上都是为经济目的服务的，但是这些目的被意识形态的附带物掩饰和遮盖了。

迄今存在过的联合体，不论是自然地形成的，或者是人为地造成的，实质上都是为经济目的服务的，但是这些目的被意识形态的附带物掩饰和遮盖了。古代的巴力斯、中世纪的城市或行会、封建的土地贵族联盟——这一切都有意识形态的附带目的，这些附带目的，它们是奉为神圣的，而在城市望族的血族团体和行会中，则来源于氏族社会的回忆、传统和象征，同古代的巴力斯的情况差不多。只有资本主义商业社会才是完全清醒的和务实的，然而是庸俗的。

未来的联合体将把后者的清醒同古代联合体对共同的社会福利的关心结合起来，并且这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恩格斯：《论未来的联合体》（1884 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447 页。

布鲁诺完全不是反对费尔巴哈用以承认感性的那种极端有限的方法。费尔巴哈的失败的尝试，作为一种想跳出意识形态的尝试，在他看来乃是一种罪恶。

这位圣者反对费尔巴哈的感性的怒气冲冲的论战，表明他现在是如何清心寡欲，涤除尘念。布鲁诺完全不是反对费尔巴哈用以承认感性的那种极端有限的方法。费尔巴哈的失败的尝试，作为一种想跳出意识形态的尝试，在他看来乃是一种罪恶。当然！感性——色欲、肉欲和傲慢——在主的面前

乃是令人惊心与作呕之事！难道你们不知道肉欲的思念就是死亡，而精神的思念就是生命与和平吗；因为肉欲的思念是对批判的敌视，而一切肉欲的东西都是从尘世产生的；难道你们不知道书上所写的：肉欲的事情是人所共知的，这就是通奸、奸淫、污秽、淫乱、偶像崇拜、迷惑、敌视、争吵、嫉妒、愤怒、纠纷、不睦、成群结党、仇恨、谋杀、酗酒、饕餮等等。我已经预告过你们，现在还预告你们：干这类事情的人是不能继承批判的王国的；但他们会感到痛苦，因为他们走了该隐的道路，由于贪图享乐，他们陷入了巴兰的错误并且像可拉那样作乱而亡。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98页。

由于这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当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俘虏，因而看不清楚现实的关系。

这些“社会主义者”——或者像他们自称的那样，“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外国的共产主义文献并不是一定的现实运动的表现和产物，而纯粹是些理论的著作，这些著作完全像他们所设想的德国哲学体系的产生一样，是从“纯粹的思想”中产生的。他们并没有考虑到，即使这些著作是在宣传某些体系，它们仍然是以实际的需要为基础，是以一定国家里的一定阶级的生活条件的总和为基础的。他们把这一派中的某些著作家的幻想信以为真，似乎这些著作家所谈的是“最合理的”社会制度，而不是一定阶级和一定时代的需要。

由于这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当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俘虏，因而看不清楚现实的关系。他们对“不科学的”法国人和英国人所采取的行动，就是首先激起德国读者们对这些外国人的皮相之见或“粗俗的”经验主义表示应有的轻视，歌颂“德国科学”，而且还硬说它负有使命要向世界揭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真理**，揭示绝对的、“**真正**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1845 年秋—大约 1846 年 5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535 页。

他们（社会主义者）企图用德国的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意识形态，来阐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的思想，而这些思想对他们来说却是完全不可解释的……

他们赋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那个“**真理**”究竟是什么呢？他们企图用德国的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意识形态，来阐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的思想，而这些思想对他们来说却是完全不可解释的，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对这些思想的纯粹文献上的联系甚至一无所知，另一方面是由于上面已经提到过的他们对这类文献的错误了解。本来这些共产主义体系以及批判性和论战性的共产主义著作不过是现实运动的表现，而他们却把这些体系和著作同现实运动分裂开来，然后，又非常任意地把它们同德国哲学联系起来。他们把一定的、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各生活领域的意识同这些领域本身割裂开来，并且用真正的、绝对的意识即德国哲学的意识的尺度

来衡量这个意识。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36页。

……其他那些不能摆脱意识形态的羁绊的人,将终生宣传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

由于德国现在事实上存在着的各种关系,所以不可避免地形成了这个中间派别,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想把共产主义和流行观念调和起来的企图。同时,以下的情况也是不可避免的:许多曾以哲学为出发点的德国共产主义者,正是通过这样的转变过程走向了并且继续走向共产主义,而其他那些不能摆脱意识形态的羁绊的人,将终生宣传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因此,我们不可能知道,"真正的社会主义"代表人物中那些不久前写了我们在下面所批判的文章的人,究竟是停留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观点上,还是已经前进了。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37页。

杜林先生就绝望地陷入使他成为"模仿者"黑格尔的模仿者的面目出现的那种意识形态里。

这里不言而喻,归根到底也是自然界产物的人脑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

但是,杜林先生不允许自己这样简单地对待问题。他不仅以人类的名义来思维——这本身已经是件相当了不起的事情,——而且以一切天体上的有意识的和能思维的生物的名义来思维。

……

因此,为了使人们不致怀疑其他某个天体上二乘二等于五,杜林先生就不能把思维称作人的思维,因而只好使思维脱离唯一的真实的基础,即脱离人和自然界,而在我们看来思维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于是杜林先生就绝望地陷入使他以"模仿者"黑格尔的模仿者的面目出现的那种意识形态里。附带说一下,我们还要更加频繁地在其他天体上欢迎杜林先生。

不言而喻,在这样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建立任何唯物主义学说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 年 9 月—1878 年 6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75 页。

……他(路·勃朗)已经被意识形态"这种妖术束缚住"。

你看见了路·勃朗的《革命史》吗?这是一个大杂烩,既有正确的猜想也有极端荒诞不经的议论。我只在萨塞勒看了第一卷的一半。它给人一种古怪的印象。它刚刚以其新颖独特的观点令人惊异,马上又以其荒唐透顶的议论使人莫名其妙。但是路·勃朗的嗅觉很灵敏,不管他怎样胡说,推测都很正确。但是他已不能再前进一步,他已经被意识形态"这种

妖术束缚住”。

恩格斯:《恩格斯致马克思》(1847 年 3 月 9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62 页。

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个人的全部精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它尽可能地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在它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

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个人的全部精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它尽可能地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在它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质的最后一点假象。它把自然形成的性质一概消灭掉,只要在劳动的范围内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它并且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它建立了现代的大工业城市——它们的出现如雨后春笋——来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凡是它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1845 年秋—大约 1846 年 5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14 页。

这种(黑格尔)意识形态上的颠倒是应该消除的。

在自然界和历史中所显露出来的辩证的发展,即经过一切迂回曲折和暂时退步而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运动的因果联系,在黑格尔那里,只是概念的自己运动的翻版,而这种概念的自己运动是从来就有的(不知在什么地方),但无论如何是不依任何能思维的人脑为转移的。这种意识形态上的颠倒是应该消除的。我们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作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作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实现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 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43 页。

我们的生活需要的不是玄想和空洞的假设,而是我们要能够过没有迷乱的生活。正如自然哲学的任务一般是研究最主要的事物的原因一样,认识天象时的幸福感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不要认为,对天象的认识,无论就整体而言或就个别部分而言,除了和研究其余的自然科学一样能够获得心灵的宁静和坚定的信心之外,还能达到别的目的。我们的生活需要的

不是玄想和空洞的假设，而是我们能够过没有迷乱的生活。正如自然哲学的任务一般是研究最主要的事物的原因一样，认识天象时的幸福感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关于星辰的升起和降落、星辰的位置和亏蚀的理论本身，并不包含有关幸福的特殊根据；不过，恐惧却支配着那些看见这些现象但不认识它们的性质及其主要原因的人。直到今天，关于天象的理论据说对其他科学所拥有的**优越地位**才被否定了，这一理论才被置于和其他科学同等的地位。

但是，关于天象的理论不仅同伦理学的方法，而且同其余的物理学问题的方法**也有着特殊的区别**，例如存在着不可分的元素等等，这里只有一个唯一的解释与现象相符合，而天象却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它们的产生不能归结于一个简单的原因，它们有一个以上的、同现象相符合的本质范畴。因为对自然哲学的研究不应依据空洞的公理和规律。人们常常反复说，对天象的解释不应是简单的、绝对的，而应是多种多样的。这适用于日月的升起和降落，月亮的盈亏，月中人的映象，昼夜长短的变化，以及其他天象。

这一切到底应如何解释呢？

任何解释都可以接受。只是神话必须加以排除。但是，只有当人们通过追寻现象，从现象出发进而推断出不可见的东西时，神话才会被排除。必须紧紧抓住现象，抓住感性知觉。因此，必须应用类比。这样就可以对天象以及其他经常发生并使其他人特别感到震惊的事物的根据作出说明，从而消除恐惧，使自己从恐惧中解放出来。

这大量的解释、众多的可能性不仅要使意识平静下来，消

除引起恐惧的原因，而且同时还要否定天体本身中的统一性，即与自身同一的和绝对的规律。各个天体可以时而这样时而那样地运行。这种没有规律的可能性就是它们的现实性的特性。在天体中一切都不是固定的、不变的。**解释的多样性同时就会取消客体的统一性。**

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1840年下半年—1841年3月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58页。

（二）狭义意识形态或现代国家意识形态

……犹太人（如同基督徒一样）在政治上已经获得了完全的解放。但是犹太人和基督徒还远远没有获得人类意义上的解放。可见，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是有差别的。所以，必须对政治解放的实质，也就是对发达的现代国家的实质进行研究。

现在，我们就来谈谈**犹太人问题**的政治方面。

在某些国家里，**犹太人**（如同基督徒一样）**在政治上**已经获得了完全的**解放**。但是犹太人和基督徒还远远没有获得**人类**意义上的解放。可见，**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是有**差别**的。所以，必须对**政治**解放的实质，也就是对发达的现代国家的实质进行研究。可是，对那些还不能**在政治上**解放犹太人的国家，也应该根据和完备的政治国家的对比予以估价，而且应该把它们看作不发达的国家。

这就是研究犹太人的“政治解放”这一问题所依据的观点，而在《德法年鉴》中也就是根据这一观点来研究这个问题的。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 年 9 月—1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42 页。

当国家摆脱了国教并且让宗教在市民社会范围内存在时，国家就从宗教下解放出来了，同样，当单个的人已经不再把宗教当作公事而当作自己的私事来对待时，他在政治上也就从宗教下解放出来了。

自由！承认自由人性！特权！多么动听的字眼。为了进行辩护何不使用这些字眼来规避某些问题！

自由？这里指的是**政治**自由。已经向鲍威尔先生指出，当犹太人要求自由而又不想放弃自己的宗教的时候，他正是在“**从事政治**”，而不是提出任何与**政治**自由相抵触的条件。已经向鲍威尔先生指出，把人**划分**为非宗教的**公民**和宗教的**个人**，这同政治解放毫不矛盾。已经向他指出，当国家摆脱了**国教**并且让宗教在市民社会范围内存在时，国家就从宗教下解放出来了，同样，当单个的人已经不再把宗教当作**公事**而当作自己的**私事**来对待时，他**在政治上**也就从宗教下解放出来了。最后，已经指出，法国**革命**对**宗教**的**恐怖**态度远没有驳倒这种看法，相反地，却证实了这种看法。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 年 9 月—1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43 页。

……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即仅仅通过私人利益和无意识的自然的必要性这一纽带同别人发生关系的独立的人……

在《德法年鉴》中已经向鲍威尔先生证明：这种“自由的人性”和对它的“承认”不过是承认**利己的市民个人**，承认构成这种个人的生活内容，即构成**现代**市民生活内容的那些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的**不可抑制**的运动；因此，**人权**并没有使人摆脱宗教，而只是使人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人权并没有使人摆脱财产，而是使人有**占有财产的自由**；人权并没有使人放弃追求财富的龌龊行为，而只是使人有**经营的自由**。

已经向他指出，**现代国家承认人权**同**古代国家承认奴隶制**是一个意思。就是说，正如古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奴隶制一样，**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即仅仅通过私人利益和**无意识**的自然的必要性这一纽带同别人发生关系的独立的人，即自己营业的**奴隶**，自己以及别人的**私欲**的奴隶。现代国家就是通过**普遍人权**承认了自己的这种自然基础。而它并没有创立这个基础。现代国家既然是由于自身的发展而不得不挣脱旧的政治桎梏的市民社会的产物，所以，它就用**宣布人权**的办法从自己的方面来承认自己的出生地和自己的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 年 9 月—1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45 页。

没有任何宗教特权的政治上完备的现代国家，也就是完

备的基督教国家;因此,完备的基督教国家不仅能够解放犹太人,而且是真正地解放了他们,同时按这种国家的本性来说,也应该解放他们。

事实上,鲍威尔先生已经指出德国犹太人的妄想:他们在没有任何社会政治生活的国家里要求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在只有政治特权的地方要求政治权利。在这方面已经向鲍威尔先生表明,他自己也沉浸在关于"德国政治制度"的"妄想"之中,而且一点也不亚于犹太人。正因为这样,他以"基督教国家"不可能从政治上解放犹太人这一点来说明犹太人在德意志国家的处境。他歪曲了事情的真相,他把特权国家、基督教德意志国家设想成绝对的基督教国家。与此相反,曾经向他证明:没有任何宗教特权的政治上完备的现代国家,也就是完备的基督教国家;因此,完备的基督教国家不仅能够解放犹太人,而且是真正地解放了他们,同时按这种国家的本性来说,也应该解放他们。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 年 9 月—1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42—143 页。

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

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与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

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

在法国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最初,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头脑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一切人类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后来这句话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同这些原理相矛盾的现实,实际上从上到下都被颠倒了。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的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性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理性的王国才开始出现。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1—372页。

资产阶级为了达到它的目的，就必然要取得自由讨论自身利益、观点以及政府的行动的可能。它把这叫作“出版自由权”。

贵族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资产阶级化了。他们抛弃了信义、爱情和信仰，大都开始贩卖甜菜、烧酒和羊毛。羊毛市场成了他们的主要竞争场所。另一方面，在发展过程中，专制国家的旧社会基础已经消失，它已成了束缚新的资产阶级社会及其改变了的生产方式和改变了的需求的桎梏。资产阶级从自己的物质利益出发，必然要提出参与政权的要求。只有它自己才能利用各项法律来满足它的商业和工业的要求。它必然要从既不学无术而又妄自尊大的腐朽的官僚手中把照管它的这些“最神圣的利益”的权力夺取过来。它必然要要求监督国家财政的权利，因为它认为自己是财富的创造者。资产阶级在剥夺了官僚对所谓教育的垄断权以后，在意识到它在真正理解资产阶级社会要求方面优越于官僚以后，它也想获得同它的社会地位相称的政治地位。资产阶级为了达到它的目的，就必然要取得自由讨论自身利益、观点以及政府的行动的可能。它把这叫作“**出版自由权**”。它必然要取得毫无阻碍地**结成社团**的可能。它把这叫作“**结社自由权**”。同样，它必然要取得**信仰自由**等等，而这是**自由竞争**的必然后果。

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1848 年 12 月 7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21 页。

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的代表是资产阶级。于是资产阶级

开始了自己的统治。人权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理论了。

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和他们的党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他们混淆了以真正的奴隶制为基础的古代实在论民主共和国和以被解放了的奴隶制即资产阶级社会为基础的现代唯灵论民主代议制国家。一方面，不得不以人权的形式承认和批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即工业的、笼罩着普遍竞争的、以自由追求私人利益为目的的、无政府的、塞满了自我异化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个性的社会，另一方面又想在事后通过单个的人来取缔这个社会的各种生命表现，同时还想仿照古代的形式来建立这个社会的政治首脑，这是多么巨大的错误！

这种错误是悲剧性的，圣茹斯特在临刑之日指着悬挂在康瑟尔热丽大厅里的那块写着"人权宣言"的大牌子，以自傲的口吻说道："但创造这个的毕竟是我。"就在这块牌子上宣布了人的权利，而这种人不会是古代共和国的人，正像他的经济状况和工业状况不是古代的一样。

这里不是替恐怖主义者的错误做历史的辩解的地方。

"在罗伯斯比尔倒台以后，政治的启蒙和运动就迅速向成为拿破仑的俘获物这个方向上发展，因此拿破仑在雾月十八日之后不久就能够说：'有了我的地方长官、宪兵和僧侣，我就能够利用法国来做我所愿做的一切。'"

正好相反，世俗的历史却告诉我们：罗伯斯比尔倒台以后，从前想获得空前成就并耽于幻想的政治启蒙运动，才初次开始平凡地实现。尽管恐怖主义竭力要使资产阶级社会为古代政治生活制度牺牲，革命还是把资产阶级社会从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正式承认了这个社会。在执政内阁时代，资

产阶级社会的生活浪潮迅速高涨起来。于是出现了创办商业和工业企业的热潮、发财致富的渴望、新的资产阶级生活的喧嚣忙乱，在这里，这种生活的享受初次表现出自己的放肆、轻佻、无礼和狂乱；法兰西的土地得到了真正的开发，土地的封建结构已经被革命的巨锤打得粉碎，现在无数新的所有者以第一次出现的狂热对这块土地进行了全面的耕作，解放了的工业也第一次活跃起来；——这就是刚刚诞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的某些表现。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的代表是资产阶级。于是资产阶级开始了自己的统治。人权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理论了。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 年 9 月—1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56—157 页。

……资产阶级的阶级政治统治倒是来自这些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宣布为必然规律和永恒规律的现代生产关系。

现代的资产阶级财产关系靠国家权力来“维持”，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权力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关系。因此，哪里的政权落到资产阶级手里，哪里的无产者就必须将它推翻。无产者本身必须成为权力，而且首先是革命的权力。

……

其实，如果资产阶级从政治上即利用国家权力来“维持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它是不会成功的。“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以现代分工、现代交换形式、竞争、积聚等等为前提，决不是来自资产阶级的阶级政治统治，相反，资产阶级的阶级政

治统治倒是来自这些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宣布为必然规律和永恒规律的现代生产关系。因此，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覆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的辅助因素（如1794年时就是这样）。所以，法国的恐怖统治所能起的作用，只是通过自己的猛烈锤击，像施法术一样把全部封建遗迹从法国地面上一扫而光。这样的事情是怯懦的资产阶级在几十年中也办不到的。因此，人民的流血牺牲只是给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同样，如果资产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经济条件没有充分成熟，要推君主专制也只能是暂时的。人们为自己建造新世界，不是如**粗俗之徒的**成见所臆断的靠“地上的财富”，而是靠他们垂死的世界上所有的历来自己创置的产业。他们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首先必须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1847年10月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31—332页。

新的资产阶级社会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建立在已经改变了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它也要取得政权，它要从代表衰亡社会的利益的人物手中夺取这种政权，因为这种政权的全部组织是在完全不同的物质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

联合议会所代表的首先是大地产。而大地产是中世纪**封**

建社会的真正基础。与此相反，**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我们的**社会，是以工业和商业为基础的。土地所有权本身已经失去了它过去的全部生存条件，它依赖于商业和工业。因此，在我们这个时代，农业是根据工业原则经营的，而旧的封建主已沦为经营牲畜、羊毛、谷物、甜菜和烧酒等等的工厂主，已沦为像所有商人一样经营这类工业品的人！尽管他们死死抱住自己的旧成见不放，实际上他们正在变成资产者，用尽可能少的费用生产尽可能多的东西，在价格最低廉的地方买进来，在价格最昂贵的地方卖出去。所以，这些先生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赢利方式证明，他们那种传统的高傲自大完全是虚伪的。土地所有权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因素是以**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为前提的。联合议会代表的就是这种早已不存在的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早已不复存在，而这种方式的代表人物虽然死死抱住旧的特权不放，但是他们分享新社会的福利并不比别人少些，并且同样地剥削新社会以自肥。新的资产阶级社会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建立在已经改变了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它也要取得政权，它要从代表衰亡社会的利益的人物手中夺取这种政权，因为这种政权的全部组织是在完全不同的物质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于是就产生了革命**。由此可见，革命既反对**专制王权**，反对旧社会的这个最高政治表现，也反对**等级代表制**，因为等级代表制所代表的是一种早已被现代工业消灭了的社会制度，或者最多是些日益被资产阶级社会所超过、排挤和破坏的高傲的**等级残余**。在这种情况下，怎么竟能想出荒谬的主意，让联合议会——这一旧社会的代

表——对这个用革命方法确定了自己权利的新社会颁布法律呢?

据说这是为了保存**法制基础**。可是,诸位先生,你们怎样理解保存法制基础呢?保存那些属于前一个社会时代的、由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社会利益的代表人物所创立的法律,——这只能意味着把这种与共同需要相矛盾的利益提升为法律。但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现在我手里拿着的这本 Code Napoléon〔拿破仑法典〕并没有创立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相反地,产生于18世纪并在19世纪继续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只是在这本法典中找到了它的法律的表现。这一法典一旦不再适应社会关系,它就会变成一叠不值钱的废纸。你们不能使旧法律成为新社会发展的基础,正像这些旧法律不能创立旧社会关系一样。

旧法律是从这些旧社会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它们也必然同旧社会关系一起消亡。它们不可避免地要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不顾社会发展的新的需要而保存旧法律,实质上不是别的,只是用冠冕堂皇的词句作掩护,维护那些与时代不相适应的私人利益,反对成熟了的共同利益。**这种保存法制基础**的做法,其目的在于使那些现在**已经不占统治地位的**私人利益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利益;其目的在于强制社会接受那些已被这一社会的生活条件、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交换以及物质生产本身宣判无效的法律;其目的在于使那些专门维

护私人利益的立法者继续掌握政权;其结果会导致滥用国家权力去强迫大多数人的利益服从少数人的利益。因此,这种做法时刻与现存的需要发生矛盾,它阻碍交换和工业的发展,它准备着以**政治革命**方式表现出来的**社会危机**。

马克思:《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1849 年 2 月 8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290—292 页。

……自由的理论和特权的实际势力之间不但不存在任何矛盾,特权的实际消灭、自由的工业和自由的贸易等反而与"自由的理论"相适应……

现代的"**公法状况**"的基础、现代发达的国家的基础,并不像**批判**所想的那样是由特权来统治的社会,而是**废除了特权**和**消灭了特权**的社会,是使在政治上仍被特权束缚的生活要素获得自由活动场所的发达的**市民社会**。在这里,**任何"特权的闭塞"**既不和别的闭塞对立,也不和公法状况对立。自由工业和自由贸易消除了特权的闭塞,从而也消除了各种特权的闭塞之间的斗争;相反地,它们却把从特权下解放出来的、已经不和别人联系(即使是**表面上**的一般结合)的人放在特权的地位上(这种特权把人们和社会整体分离开来,而同时又把他们结合在一个规模很小的、特殊的团体里面),并且引起了人反对人、个人反对个人的斗争。同样整个的**市民社会**只是由于**个人的特性**而彼此分离的个人之间的相互斗争,是摆脱了特权桎梏的自发的生命力的不可遏止的普遍运动。**民主的代议制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对立是公法**团体**和**奴隶制**的

典型对立的完成。在现代世界中每一个人都是奴隶制度的成员，同时也是公法团体的成员。市民社会的奴隶制恰恰在表面上看来是最大的自由，因为它似乎是个人独立的完备形式；这种个人往往把像财产、工业、宗教等这些孤立的生活要素所表现的那种既不再受一般的结合也不再受人所约束的不可遏止的运动，当作自己的自由，但是，这样的运动反而成了个人的完备的奴隶制和人性的直接对立物。这里，代替了特权的是法。

这么说来，在这里，自由的理论和特权的实际势力之间不但不存在任何矛盾，特权的实际消灭、自由的工业和自由的贸易等反而与“自由的理论”相适应，任何特权的闭塞都不与公法状况相对立，批判所发现的矛盾已被消除——只有在这里，才存在着完备的现代国家。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 年 9 月—1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48—149 页。

权利的公平和平等，是 18、19 世纪的资产者打算在封建制的不公平、不平等和特权的废墟上建立他们的社会大厦的基石。

李嘉图的价值定义，尽管有不祥之兆，但是也有使善良的资产者喜爱和珍贵的一面。它以不可抗拒的威力诉诸他们的公平感。权利的公平和平等，是 18、19 世纪的资产者打算在封建制的不公平、不平等和特权的废墟上建立他们的社会大厦的基石。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劳动产品按照这个价值尺度

在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之间自由交换，这些——正如马克思已经证明的——就是现代资产阶级全部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意识形态建立于其上的现实基础。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尺度，这个认识一经确立，善良的资产者必然会因世界的邪恶而感到自己最高尚的感情深受伤害……

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哲学的贫困〉德文版序言》（1884年10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10页。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从而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劳动的各要素表现为独立的、异己的和相互独立的要素。

如果有人说，所使用的劳动量取决于现存资本量，那么，这种说法只在下述情况下才是正确的（绝对地说）：这是绝对的**同义反复**，这种同义反复所以**不**表现为同义反复，只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从而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劳动的各要素表现为**独立的、异己的**和相互**独立**的要素。这只是表明，从事劳动的人数的增长取决于**他们的劳动生产率**（或者说，至少以这种生产率为界限），即取决于这样的劳动生产率：它一方面表现为他们本身的生产能力的发展，以及这种能力在现在和**过去**被运用时所表现的精力、知识和合乎目的的程度。而第二，它表现为它借以发生作用的各种**已建立的生产力**的或大或小的基础，并且也表现为**年再生产的这样一种规模**，这种规模应足以满足下一年的原料、生活资料和生产本

身的需要。

马克思:《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1861 年 8 月—1862 年年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8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68 页。

事实越是明显地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家就越是热心地起劲地把资本主义以前世界的法的观念和所有权观念应用到这个已经完成的资本世界。

在西欧,政治经济学的故乡,原始积累的过程多少已经完成。在这里,资本主义制度或者已经直接征服整个国民生产,或者在这种关系还不很发达的地方,它也至少间接地控制着那些与它一起继续存在的、属于过时的生产方式的、腐朽的社会阶层。事实越是明显地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家就越是热心地起劲地把资本主义以前世界的法的观念和所有权观念应用到这个已经完成的资本世界。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册 资本的生产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876 页。

它(现代哲学)认为国家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在这里,必须实现法律的、伦理的、政治的自由,同时,个别公民服从国家的法律也就是服从他自己的理性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

从前的研究国家法的哲学家是根据本能,例如功名心、善交际,或者虽然是根据理性,但并不是社会的而是个人的理性来构想国家的。现代哲学持有更加理想和更加深刻的观点,

它是根据整体观念来构想国家的。它认为国家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在这里，必须实现法律的、伦理的、政治的自由，同时，个别公民服从国家的法律也就是服从他自己的理性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对聪明人来说，指出这一点已经足够了。

马克思：《〈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写于1842年6月28日—7月3日之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8页。

在这些失败中灭亡的并不是革命，而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是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中的产物，即革命党在二月革命以前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概念和方案……

除了很少几章之外，1848—1849年的革命编年史中每一较为重要的章节，都冠有一个标题：**革命的失败！**

在这些失败中灭亡的并不是革命，而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是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中的产物，即革命党在二月革命以前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概念和方案，这些都不是**二月胜利**所能使它摆脱的，只有一连串的**失败**才能使它摆脱。

总之，革命的进展不是在它获得的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中，相反，是在产生一个联合起来的、强大的反革命势力的过程中，即在产生一个敌对势力的过程中为自己开拓道路的，只是通过和这个敌对势力的斗争，主张变革的党才走向成熟，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党。

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49 年底—1850 年 3 月底和 1850 年 10 月—11 月 1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31 页。

美国是一个独特的国家,它是沿着纯粹资产阶级的道路发展起来的,没有任何封建的旧东西,但在发展过程中却从英国不加选择地接受了大量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残余……

美国是一个独特的国家,它是沿着纯粹资产阶级的道路发展起来的,没有任何封建的旧东西,但在发展过程中却从英国不加选择地接受了大量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残余,诸如英国的习惯法、宗教、宗派主义;在这个国家里,对实际活动和资本集中的需要导致了对任何理论的普遍轻视,这种轻视理论的态度,只是现在才在最有教养的知识阶层中有所克服,——在这样一个国家里,人们只有通过自己接连犯错误,才能认识清楚本身的社会利益。这种情况工人也避免不了;工联、社会主义者、"劳动骑士"等等队伍中的混乱局面还要继续存在一个时候;他们只有在使自己受到损失以后,才会变得聪明起来。但是主要的是他们已经投入了运动,事情一般说来已经有了进展,坚冰已被打破,而且现在一切将迅速(比任何地方都要迅速)前进,虽然他们所走的是一条他们所特有的、从理论观点看来几乎是荒唐的道路。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886 年 9 月 16—17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522 页。

孟什维克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表现了惊人的盲目无知，他们看不到，在俄国农民的生活条件下，俄国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在意识形态上只能表现为对平分土地的救星作用的“信仰”。

孟什维克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表现了惊人的盲目无知，他们看不到，在俄国农民的生活条件下，俄国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在意识形态上只能表现为对平分土地的救星作用的“信仰”。“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可以是正确的”①，——对恩格斯的这句话，我们的孟什维克是永远也理解不了的。他们这些学究在揭露民粹派学说的错误时，闭眼不看这些冒牌社会主义学说反映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现代斗争的真相。

列宁：《资产阶级的“向左转”和无产阶级的任务》（1909年4月8日〔21日〕），《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86页。

无产阶级的党是一个自由的联盟，建立这个党就是为了同资产阶级“思想”（应读作：意识形态）作斗争，为了捍卫和实现一种明确的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无产阶级的党是一个自由的联盟，建立这个党就是为了同资产阶级“思想”（应读作：意识形态）作斗争，为了捍卫和实现一种明确的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这是起码的常识。马克西莫夫、萨任之流政治上的错误使他们忘记了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09页。——编者注

这个起码的常识。不是由于他们个人虚伪，而是由于他们的政治立场错误，他们才宣传资产阶级的口号。这种错误的表现是，一些“前进派分子”一心想把无产阶级向后拖，朝资产阶级哲学观念（马赫主义）一边拖；另一些“前进派分子”对哲学漠不关心，只是要求给马赫主义以……“完全自由”。因此，他们都不得不玩弄外交手腕，胡说八道，玩捉迷藏，抓住资产阶级口号不放。

列宁：《论“前进派分子”的派别组织》（1909年8月30日〔9月12日〕），《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9页。

政党内的派别是由思想一致的人组成的集团，其目的首先是从某个方面影响党，以便在党内尽可能一丝不差地贯彻自己的原则。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真正的思想一致。

政党内的派别是由思想一致的人组成的集团，其目的首先是从某个方面影响党，以便在党内尽可能一丝不差地贯彻自己的原则。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真正的思想一致。任何想要弄清布尔什维克派内部冲突问题的真相的人，都应当懂得我们对党的统一和对派别的统一的要求的这一差别。

列宁：《〈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文献》（1909年6—7月），《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三）一般意识形态或社会意识形式

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

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

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是从敌对阶级的物质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中产生的。

《改革报》把问题转移到“良心”方面去，而关于道德的空谈现在就成为根除一切祸害的手段了。由此看来，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是由这两个阶级的思想产生的了。但这种思想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是从社会关系中产生的。而这种关系又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是从敌对阶级的物质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中产生的。在《改革报》看来，如果这两个阶级不再意识到自己的真正状况和自己的真正对立，并用1793年那

种“爱国的”情感和漂亮话做鸦片来麻醉自己，对它们会有好处的。多么软弱无力呵！

马克思：《巴黎〈改革报〉论法国状况》（1848年11月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34页。

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

在波旁王朝时期进行统治的是**大地产**连同它的僧侣和仆从；在奥尔良王朝时期进行统治的是金融贵族、大工业、大商业，即**资本**和它的随从者——律师、教授和健谈家。正统王朝不过是地主世袭权力的政治表现，而七月王朝则不过是资产阶级暴发户篡夺权力的政治表现。所以，这两个集团彼此分离决不是由于什么所谓的原则，而是由于各自的物质生存条件，由于两种不同的占有形式；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旧有的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之间的竞争。当然，把它们同某个王朝联结起来的同时还有旧日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这有谁会否认呢？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

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大约1851年12月中—1852年3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1页。

……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的葬仪》（1883年3月18日前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94—597页。

……只有根据他们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结构……才能够既理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也理解一定社会形态下自由的精神生产。

最后，施托尔希所理解的精神生产，还包括统治阶级中专门执行社会职能的各个阶层的职业活动。这些阶层的存在以及他们的职能，只有根据他们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结构才能够理解。

因为施托尔希不是**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本身，他把物质生产当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考察，而不是当作这种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所以他就失去了理解的基础，而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能够既理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也理解一定社会形态下自由的精神生产。

马克思：《〈资本论〉第四卷第一册　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6页。

……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

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重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

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这个规律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在这部著作中,他用这段历史检验了他的这个规律;即使已经过了33年,我们还是不能不说,这个检验获得了辉煌的成果。

恩格斯:《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85年第三版序言》(1885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3页。

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但是,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不过,在一定民族的各种关系的范围内,这也可能不是因为现在该民族范围内出现了矛盾……

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但是,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不过,在一定民族的各种关系的范围内,这也可能不是因为现在

该民族范围内出现了矛盾，而是因为在该民族意识和其他民族的实践之间，亦即在某一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普遍意识之间出现了矛盾（就像目前德国的情形那样）——既然这个矛盾似乎只表现为民族意识范围内的矛盾，那么在这个民族看来，斗争也就限于这种民族废物，因为这个民族就是废物本身。但是，意识本身究竟采取什么形式，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我们从这一大堆赘述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上述三个因素即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因为**分工**不仅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而要使这三个因素彼此不发生矛盾，则只有再消灭分工。此外，不言而喻，“怪影”、“枷锁”、“最高存在物”、“概念”、“疑虑”显然只是孤立的个人的一种唯心的、思辨的、精神的表现，只是他的观念，即关于真正经验的束缚和界限的观念；生活的生产方式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交往形式就在这些束缚和界限的范围内运动着。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1845 年秋—大约 1846 年 5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 年版第 1 卷，第 82—83 页。

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

但是，不管阶级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

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 年 12 月—1848 年 1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92—293 页。

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

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作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存在的东西来对待了。人们头脑中发生的这一思想过程，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这一事实，对这些人来说必然是没有意识到的，否则，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 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54 页。

……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

这样，我们看到，宗教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

料，因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但是，这些材料所发生的变化是由造成这种变化的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引起的。在这里只说这一点就够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页。

那些决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物质生活，即他们的相互制约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是国家的现实基础，而且在一切还必需有分工和私有制的阶段上，都是完全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那些决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物质生活，即他们的相互制约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是国家的现实基础，而且在一切还必需有分工和私有制的阶段上，都是完全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些现实的关系决不是国家政权创造出来的，相反地，它们本身就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在这种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个人除了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自己的力量外，他们还必须给予他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的内容总是决定于这个阶级的关系，这是由例如私法和刑法非常清楚地证明了的。这些个人通过法律形式来实现自己的意志，同时使其不受他们之中任何一个单个人的任性所左右，这一点之不取决于他们的意志，如同他们的体重不取决于他们的唯心主义的意志或任性一样。他们的个人统治必须同时是一个一般的统治。他们个人的权力的基础就是他们的生活条

件,这些条件是作为对许多个人共同的条件而发展起来的,为了维护这些条件,他们作为统治者,与其他的个人相对立,而同时却主张这些条件对所有的人都有效。由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这种意志的表现,就是法律。正是这些互不依赖的个人的自我肯定以及他们自己意志的确立(在这个基础上这种相互关系必然是利己的),才使自我舍弃在法律、法中成为必要,不过,自我舍弃是在个别场合,而利益的自我肯定是在一般场合(因此不是对于他们,而只是"对于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自我伸张才算作是自我舍弃)。对被统治的阶级说来也是如此,法律和国家是否存在,这也不是他们的意志所能决定的。例如,只要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竞争成为多余的东西,因而还这样或那样地不断产生竞争,那么,尽管被统治阶级有消灭竞争、消灭国家和法律的"意志",然而它们所想的毕竟是一种不可能的事。此外,当关系还没有发展到能够实现这个意志以前,这个"意志"的产生也只是存在于思想家的想象之中。当关系发展到足以实现这种意志的时候,思想家就会认为这种意志纯粹是随心所欲的,因而在一切和一切情况下都是可能的东西。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1845 年秋—大约 1846 年 5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377—379 页。

实际上,不是国家由于统治意志而存在,相反地,是从个人的物质生活方式中所产生的国家同时具有统治意志的

形式。

实际上，不是国家由于统治意志而存在，相反地，是从个人的物质生活方式中所产生的国家同时具有统治意志的形式。如果统治意志失去了自己的统治，那么，不仅意志改变了，而且也是物质存在和个人的生活改变了，而且也只因为这一点，个人的意志才发生变化。法和法律有时也可能“继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也不再是统治的了，而是只剩下一个名义，关于这种情况的明显例子，我们在古罗马和英国的法制史中可以看到许多。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1845 年秋—大约 1846 年 5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379 页。

当社会生存的物质条件发展到迫切需要变革它的官方政治形式的时候，旧政权的整个面貌就发生变化。

君主制所扮演的暴虐、反动角色只是表明在旧社会的孔隙中形成了新社会，这种新社会必然也感到政治外壳（旧社会的天然外皮）是反自然的桎梏而必须撑破。这些新的破坏性社会因素越不发达，旧政权的即使是最凶猛的反动派也越保守。这些新的破坏性社会因素越发达，旧政权的即使是最无关紧要的保守意图也越反动。君主权力的反动性并不证明这种权力创造旧社会，倒是相反地证明，只要旧社会的物质条件消亡，君主权力本身也就消灭。它的反动性同时就是旧社会的反动性，因为旧社会仍然是官方的社会，因此也仍然是权

力的**官方享有者**或**官方权力**的享有者。

当社会生存的物质条件发展到迫切需要变革它的官方政治形式的时候，旧政权的整个面貌就发生变化。所以，现在君主专制不实行**集权**（集权本是它的开明措施）而打算实行**分权**。君主专制产生于封建等级垮台以后，它积极参加过破坏封建等级的活动，而现在却力图保留哪怕是封建割据的**外表**。如果说君主专制从前保护过工商业，以此鼓励过资产阶级上升，并且还曾经把工商业看作使国家富强、使自己显赫的必要条件，那么现在君主专制到处都成了工商业（它们正在成为已经很强大的资产阶级手中日益可怕的武器）发展道路上的障碍。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1847年10月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41—342页。

共产党人认为，废除国家只有作为废除阶级的必然结果才有意义，随着阶级的废除，自然就没有必要用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力量去镇压其他阶级了。

废除捐税的背后就是废除国家。共产党人认为，废除国家只有作为废除阶级的必然结果才有意义，随着阶级的废除，自然就没有必要用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力量去镇压其他阶级了。在资产阶级国家里，废除国家就是要把国家的权力降回到北美的国家权力的水平。在北美，阶级矛盾还发展得很不充分；阶级冲突每一次都由于把过剩的无产阶级人口迁往西部而得到平息；国家政权的干预在东部降到了最低限度，在西

部则根本不存在。在封建国家里，废除国家就是要废除封建制度，建立通常的资产阶级国家。在德国，在废除国家的口号后面，不是隐藏着畏怯地逃避面临的斗争，就是隐藏着对**资产阶级**自由的过分吹嘘，甚至把它吹嘘为**各个人**的绝对独立和自主，再不然就是隐藏着资产者在资产阶级利益的发展不受阻碍的前提下对一切国家形式所抱的无所谓态度。既然关于"在最高意义上"废除国家的这种宣传在形式上都如此荒唐，当然柏林的施蒂纳和孚赫之流在这点上就无可厚非了。

马克思、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上发表的书评》（1850年3月中—4月18日之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1页。

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毁坏。那些相继争夺统治权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胜利者的主要战利品。

第一次法国革命所抱的目的是破坏一切地方的、区域的、城市的和各省的特殊权力以造成全国的公民的统一，它必需把专制君主制所已经开始的事情——中央集权加以发展，但是它同时也就扩大了政府权力的容量、属性和走卒的数目。拿破仑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正统王朝和七月王朝并没有增添什么新的东西，不过是扩大了分工，这种分工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分工愈益造成新的利益集团，即造成用于国家管理的新对象，而愈益扩大起来。每一种**共同的**利益，都立即脱离社会而作为一个最高的**普遍的**利益来与社会相对立，都不

再是社会成员的自主行为而成为政府活动的对象——从某一村镇的桥梁、校舍和公共财产起，直到法国的铁路、国家财产和国立大学止。最后，议会制共和国在它反对革命的斗争中，除采用高压手段而外，还不得不加强政府权力的工具和集中化。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那些相继争夺统治权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胜利者的主要战利品。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大约1851年12月中—1852年3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5—676页。

在每次人民革命以后——这些革命标志着阶级斗争进程（发展过程）中的新进展阶段——国家政权的压迫性质就表现得更加残酷无情、更加赤裸无隐……

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与此同时，政府权力就愈益具有资本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的性质，具有为以暴力保证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政治力量的性质，具有纯粹是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在每次人民革命以后——这些革命标志着阶级斗争进程（发展过程）中的新进展阶段——国家政权的压迫性质就表现得更加残酷无情、更加赤裸无隐……二月革命升起了“社会共和国”的旗帜，这样它从一开始就证明了：国家政权的真正意义已被揭露；它冒充为维护公共利益的武装力量、假装体现着社会的共同利益——站在相互敌对的私人利益之上并把它们保持在

各自的活动范围之内——的面具已被戳破;它作为阶级专制的工具的秘密已被识破;工人们要求共和制,已不再把它当作旧的阶级统治制度的一种政治变形,而是把它当作消灭阶级统治本身的革命手段。统治阶级面对着"社会共和国"的威胁,本能地感觉到:过去的那些王朝的称号本身就意味着某一集团的胜利和另一集团的失败,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人的利益压倒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土地压过资本或者资本压过土地;而无名的议会制共和国的统治则能够变成统治阶级所有相互敌对的集团的股份公司。与工人阶级对立的、迄今仍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不管它以怎样的特殊形式占有群众的劳动,但是它有一个共同一致的**经济**利益,这就是或者作为地主和资本家直接地,或者作为地主与资本家的国家寄生虫间接地来保持劳动受奴役的地位、坐享劳动的果实;这就是强制推行那种使生产者群众,"贱民",成为只是上等人汲取财富和进行统治的泉源的"秩序"。因此,急于以首先大肆掠夺财产来证明自己是财产保护者的正统派、奥尔良派、资产阶级共和派以及波拿巴派冒险分子,便纠合起来,组成"**秩序党**"——这是无产阶级在欢呼"**社会共和国**"声中进行的这次革命的实际结果。秩序党的议会制共和国不仅是统治阶级的恐怖统治。国家政权到了他们的手里就变成了资本家、地主、他们的国家寄生虫用来压制生产者的革命愿望的**公开的内战的工具**。

在君主制度下,统治阶级的在野集团还往往在人民面前谴责当权政府的镇压措施及其宣布的原则;统治阶级的反对派集团采用为人民利益呼吁、装出人民保护者姿态、要求维护人民自由权利的办法来使人民关心他们的派系争执。但是,

在无名的共和制度下，统治阶级的各个集团把过去旧制度的一切镇压手段都混合起来（从所有过去制度的武库里取出一切镇压的武器），无情地加以运用，共同举行叛逆的庆宴。他们卑鄙无耻地否认他们过去的声明许诺，践踏他们的“所谓”原则，诅咒他们自己以这些原则的名义挑起的革命，并且诅咒共和国这个名称本身，虽然只有这种共和国的无名统治才能广泛地容纳他们共同参加反对人民的十字军。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二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59—661页。

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意志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

从传统的观点看来（这种观点也是黑格尔所尊崇的），国家是决定的因素，市民社会是被国家决定的因素。表面现象是同这种看法相符合的。就单个人来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意志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同样，市民社会的一切要求（不管当时是哪一个阶级统治着），也一定要通过国家的意志，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这是问题的形式方面，这方面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要问一下，这个仅仅是形式上的意志（不论是单个人的或国家的）有什么内容呢？这一内容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人们所期望的正是这个而不是别的呢？在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时，我们就发现，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意志总的说

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

国家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

国家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社会创立一个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这种机关就是国家政权。它刚一产生，对社会来说就是独立的，而且它越是成为某个阶级的机关，越是直接地实现这一阶级的统治，它就越独立。被压迫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必然要变成政治的斗争，变成首先是反对这一阶级的政治统治的斗争；对这一政治斗争同它的经济基础的联系的认识，就日益模糊起来，并且会完全消失。即使在斗争参加者那里情况不完全是这样，但是在历史编纂学家那里差不多总是这样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页。

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来说是独立的力量，马上就产生了另外的意识形态。

但是，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来说是独立的力量，马上就产生了另外的意识形态。这就是说，在职业政治家那里，在公法

理论家和私法法学家那里，同经济事实的联系就完全消失了。因为经济事实要以法律的形式获得确认，必须在每一个别场合都采取法律动机的形式，而且，因为在这里，不言而喻地要考虑到现行的整个法的体系，所以，现在法律形式就是一切，而经济内容则什么也不是。公法和私法被看作两个独立的领域，它们各有自己的独立的历史发展，它们本身都可以系统地加以说明，并需要通过彻底根除一切内部矛盾来作出这种说明。

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越来越错综复杂，越来越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但是这一联系是存在着的。从15世纪中叶起的整个文艺复兴时期，在本质上是城市的从而是市民阶级的产物，同样，从那时起重新觉醒的哲学也是如此。哲学的内容本质上仅仅是那些和中小市民阶级发展为大资产阶级的过程相适应的思想的哲学表现。在上一世纪的那些往往既是哲学家又是政治经济学家的英国人和法国人那里，这种情形是表现得很明显的，而在黑格尔学派那里，这一情况我们在上面已经说明了。

现在我们再简略地谈谈宗教，因为宗教离开物质生活最远，而且好像是同物质生活最不相干。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他们本身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界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但是，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作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存在的东西来对待

了。人们头脑中发生的这一思想过程，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这一事实，对这些人来说必然是没有意识到的，否则，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254页。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会思维；既然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那么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

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例如，在某一国家的某个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为夺取统治而争斗，因而，在那里统治是分享的，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于是分权就被宣布为“永恒的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99页。

过了时的社会力量，虽然它存在的基础早已腐朽，可是，在名义上它还控制着权力的一切象征，它继续苟延残喘，同时在它尚未宣告死亡和宣读遗嘱的时候，继承者们就为遗产而争吵了起来。

过了时的社会力量，虽然它存在的基础早已腐朽，可是，在名义上它还控制着权力的一切象征，它继续苟延残喘，同时在它尚未宣告死亡和宣读遗嘱的时候，继承者们就为遗产而争吵了起来。为历史所证明的古老真理告诉我们：正是这种社会力量在咽气以前还要作最后的挣扎，由防御转为进攻，不但不避开斗争，反而挑起斗争，并且企图从那种不但令人怀疑而且早已被历史所谴责的前提中作出最极端的结论来。现在英国寡头政治的表现就是这样。它的孪生姊妹——教会的表现也是这样。

马克思：《反教会运动。——海德公园的示威》（1855年6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63页。

中世纪的历史只知道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但是到了18世纪，资产阶级已经强大得足以建立他们自己的、同他们的阶级地位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了……

中世纪的历史只知道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但是到了18世纪，资产阶级已经强大得足以建立他们自己的、同他们的阶级地位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了，这时他们才进行了他们的伟大而彻底的革命——法国革命，而且仅仅诉诸法律的和政治的观念，只是在宗教挡住他们的道路时，他们才理会宗教；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要用某种新的宗教来代替旧的宗教；大家知道，罗伯斯比尔在这方面曾遭受了怎样的失败。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页。

迄今存在过的联合体，不论是自然地形成的，或者是人为地造成的，实质上都是为经济目的服务的，但是这些目的被意识形态的附带物掩饰和遮盖了。

迄今存在过的联合体，不论是自然地形成的，或者是人为地造成的，实质上都是为经济目的服务的，但是这些目的被意识形态的附带物掩饰和遮盖了。古代的巴力斯、中世纪的城市或行会、封建的土地贵族联盟——这一切都有意识形态的附带目的……

恩格斯：《论未来的联合体》（188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7页。

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美国的资产阶级社会现在还很不成熟，没有把阶级斗争发展到显而易见和一目了然的地步，关于这一点，北美唯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查·亨·凯里**（费拉得尔菲亚人）提供了十分出色的证明。他攻击**李嘉图**这个资产阶级的最典型的代表者①和无产阶级的最顽强的反对者，认为他的著作是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制度的一切敌人的军火库。他不仅指责李嘉图，而且指责马尔萨斯、穆勒、萨伊、托伦斯、威克菲尔德、麦克库洛赫、西尼耳、惠特利、理·琼斯等等，一句话，指责欧洲的经济学权威，说他们分裂社会和制造内战，因为他们证明了：各个不同阶级的经济基础一定会在它们中间引起一种必然的、不断发展的对立。他拼命驳斥他们，虽然他不像愚蠢的海因岑那样把阶级的存在同**政治**特权和**垄断**的存在联系起来，但是他想证明，**经济**条件——地租（地产）、**利润**（资本）和工资（雇佣劳动）不是斗争和对立的条件，而是联合与和谐的条件。实际上他只是证明，美国的“不成熟的”社会关系在他看来是“正常的关系”。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

① 在手稿上，马克思在“代表者”一词上面写了“表达者”一词。——编者注

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像海因岑这类不仅否认阶级斗争,甚至否认阶级存在的无知的蠢才只不过证明:尽管他们发出一阵阵带有血腥气的和自以为十分人道的叫嚣,他们还是认为资产阶级赖以进行统治的社会条件是历史的最后产物,是历史的极限;他们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奴才。这些蠢才越不懂得资产阶级制度本身的伟大和暂时存在的必然性,他们的那副奴才相就越令人作呕。

马克思:《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52年3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08—509页。

……而正是伊壁鸠鲁使直接的意识形态、自为存在成为一种自然的形态。

当我们承认自然是有理性的时候,我们对它的依附关系就不复存在。自然对我们的意识来说,不再是恐惧的来源,而正是伊壁鸠鲁使直接的意识形态、自为存在成为一种自然的形态。只有当自然被认为完全摆脱了自觉的理性,本身被看作是理性的时候,它才完全成为理性的财产。对自然的任何关系本身同时也就是自然的异化。

马克思:《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笔记七》(1839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3—174页。

(四)意识形态的社会认识根源

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

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诚然,唯灵论的、神学的批判的批判仅仅知道(至少它在自己的想象中知道)历史上的政治、文学和神学方面的重大事件。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工,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 年 9 月—1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91 页。

这全部历史在梅恩那里都溶化到所谓"道德因素"中去了……

他以部分地听起来正确的言词掩饰起来的肤浅批评首先表现在以下的话中:"这就是它(共同体的{des Gemein-

wesens｝)的历史,即在每一个社会｛community｝中决定着统治者如何运用或不去运用他的不可抵挡的强制力量的**全部**历史前提”。

但是这全部历史在梅恩那里都溶化到所谓“道德因素”中去了,因为他作为真正的法学家和思想家**直率地**继续说道:构成这一历史的所有一切,即全部大量的**意见**、**感情**、**信仰**、各种各样的**迷信**和**偏见**,继承下来的和自己学到的,其中有些是社会制度造成的,有些是**人的天生的素质**造成的,——所有这一切都被分析法学家抛开了。**所以**,由他们给统治权下的定义所包含的限制中可以得出:我们本国的女王和议会可以下令处死瘦弱的儿童,或建立 letters de cachet[①]的制度。

马克思:《亨利·萨纳姆·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881 年 4—6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647—648 页。

……(市民社会)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

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仍必须作为民族起作用,对内仍必须组成为国家。“市民社会”这一用

① 不经侦讯就逮捕或驱逐的国王命令。——编者注

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Gemeinwesen]。真正的市民社会①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②上层建筑的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131页。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

从宗教的、哲学的和一切意识形态的观点对共产主义提出的种种责难，都不值得详细讨论了。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

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

① “市民社会”的原文是“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这个术语也有“资产阶级社会”的意思。——编者注

② 原文是idealistische，本意是唯心主义的。这里是指观念的、意识形态的。——编者注

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 年 12 月—1848 年 1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91—292 页。

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

无论它提出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个目标，无论目标本身涂上的革命颜色是淡是浓，其内容始终是一样的：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然而也不应该狭隘地认为，似乎小资产阶级原则上只是力求实现其自私的阶级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证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同时也就是唯一能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消除的一般条件。同样，也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崇拜小店主的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

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代表**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大约1851年12月中—1852年3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4页。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

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1859年—1861年经济学著作和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2—413页。

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

由此可见，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强大的、一切时代中最强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政治论证的全部传统方式崩溃了；爱国的义勇精神愤慨地起来反对这种无礼的观点。因此，新的世界观不仅

必然遭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对，而且也必然遭到一群想靠自由、平等、博爱的符咒来翻转世界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反对。这种世界观激起了德国庸俗的民主主义空喊家极大的愤怒。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力图剽窃新的思想，然而对这些思想又极端无知。

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8月3—1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9页。

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的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

历史上所有其他的偶然现象和表面的偶然现象都是如此。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的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于平行。

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3页。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

因此，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

我们采用这种方法，是从历史上和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关系出发，因而在这里是从我们所遇到的最初的经济关系出发。我们来分析这种关系。既然这是一种**关系**，这就表示其中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我们分别考察每一个方面；由此得出它们相互关联的性质，它们的相互作用。于是出现了需要解决的矛盾。但是，因为我们这里考察的不是只在我们头脑中发生的抽象的思想过程，而是在某个时候确实发生过或者还在发生的现实过程，因此这些矛盾也是在实践中发展着的，并且可能已经得到了解决。我们考察这种解决的方式，发现这是由建立新关系来解决的，而这个新关系的两个对立面我们现在又需要展开说明，等等。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 年 8 月 3 日—15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3—44 页。

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智慧的历史的基础。

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①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1883年6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页。

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人们在生产人类必需的产品时彼此所发生的关系。用这种关系才能解释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人的意向、观念和法律。

---

① 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我在英译本序言中说过：在我看来这一思想对历史学必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我们两人早在1845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当时我个人独自在这方面达到什么程度，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就是最好的说明。但是到1845年春我在布鲁塞尔见到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考虑成熟，并且几乎像我在上面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编者注

黑格尔的哲学谈论精神和观念的发展，它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它从精神的发展中推演出自然界、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关系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保留了黑格尔关于永恒的发展过程的思想，而抛弃了那种偏执的唯心主义观点；他们面向实际生活之后看到，不能用精神的发展来解释自然界的发展，恰恰相反，要从自然界，从物质中找到对精神的解释……与黑格尔和其他黑格尔主义者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物主义者。他们用唯物主义观点观察世界和人类，看出一切自然现象都有物质原因作基础，同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受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制约的。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人们在生产人类必需的产品时彼此所发生的关系。用这种关系才能解释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人的意向、观念和法律。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 年 9 月 7 日〔19 日〕以后），《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0—91 页。

……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的、绝对的真理接近的界限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但是这个真理的存在是无条件的，我们向这个真理的接近也是无条件的。

从现代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的、绝对的真理接近的**界限**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但是这个真理的存在**是无条件的**，我们向这个真理的接近也是无条件的。图画的轮廓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而这幅图画描绘客观地存在着的模特儿，这是无条件的。在我们认识事物本质的过程中，我们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条件下进到发现煤焦油

中的茜素或发现原子中的电子,这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然而,每一个这样的发现都意味着"绝对客观的认识"前进一步,这是无条件的。一句话,任何思想体系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可是,任何科学的思想体系(例如不同于宗教的思想体系)都和客观真理、绝对自然相符合,这是无条件的。你们会说: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这种区分是不确定的。我告诉你们:这种区分正是这样"不确定",以便阻止科学变为恶劣的教条,变为某种僵死的凝固不变的东西;但同时它又是这样"确定",以便最坚决果断地同信仰主义和不可知论划清界限,同哲学唯心主义以及休谟和康德的信徒们的诡辩划清界限。这里是有你们没有看到的界限,而且由于你们没有看到这个界限,你们滚入了反动哲学的泥坑。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界限。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2—10月),《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6页。

……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不同趋向的根源。

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者更确切地说,把唯物主义贯彻和推广运用于社会现象领域,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只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研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探索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把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看作这些关系的根源;第二,以往的理论从来忽视居民群众

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零星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因为它考察了所有各种矛盾的趋向的总和，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准确测定的、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的条件，排除了选择某种“主导”思想或解释这种思想时的主观主义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不同趋向的根源。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们即群众的动机是由什么决定的，各种矛盾的思想或意向间的冲突是由什么引起的，一切人类社会中所有这些冲突的总和是怎样的，构成人们全部历史活动基础的、客观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条件是怎样的，这些条件的发展规律是怎样的，——马克思对这一切都注意到了，并且指出了科学地研究历史这一极其复杂、充满矛盾而又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的途径。

列宁：《马克思的学说》(1914 年 11 月)，《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25 页。

如果说我们的法律的、哲学的和宗教的观念，都是一定社会内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近枝或远蔓，那么，这些观念终究不能抵抗因这种经济关系的完全改变所产生的影响。

如果说我们的法律的、哲学的和宗教的观念，都是一定社

会内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近枝或远蔓，那么，这些观念终究不能抵抗因这种经济关系的完全改变所产生的影响。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导言》（1892年4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7页。

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

由此可见，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当然也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

……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经济的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

在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于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中，这里我们只能谈到两点。

第一点就是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以前所有的历史观，都以下述观念为基础：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求，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决定全部历史的又是政治变动。可是，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政治变动的动因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没有人发问过。只有在法国历史编纂学家和部分英国历史编纂学家的新学派中，才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至少从中世纪起，欧洲历史的动力是新兴资产阶级为争取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同封建贵族所作的斗争。现在马克思则证明，至今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可是，这些阶级是由于什么而产生和存在的呢？是由于当时存在的粗鄙的物质条件，即各该时代社会借以生产和交换必要生活资料的那些条件……从这个观点来看，在充分认识了该阶段社会经济状况（而我们那些历史编纂学家当然完全没有这种认识）的条件下，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同样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经济的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的而

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之义此时终于获得了承认。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1877年6月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136页。

……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

此外，被忽略的还有一点，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两人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都把重点首先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和歪曲，保尔·巴尔特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4页。

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劳动产品按照这个价值尺度在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之间自由交换，这些——正如马克思已经证明的——就是现代资产阶级全部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意识形态建立于其上的现实基础。

李嘉图的价值定义，尽管有不祥之兆，但是也有使善良的资产者喜爱和珍贵的一面。它以不可抗拒的威力诉诸他们的公正感。权利的公正和平等，是18、19世纪的资产者打算在封建制的不公正、不平等和特权的废墟上建立他们的社会大厦的基石。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劳动产品按照这个价值尺度在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之间自由交换，这些——正如马克思已经证明的——就是现代资产阶级全部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意识形态建立于其上的现实基础。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尺度，这个认识一经确立，善良的资产者必然会因世界的邪恶而感到自己最高尚的感情深受伤害，这个世界，虽然名义上承认公正原则，但是事实上时时刻刻都在肆无忌惮地抛弃公平原则。特别是小资产者，他们的诚实劳动——即使只是他的帮工和学徒的劳动——在大生产和机器的竞争下天天跌价，特别是小生产者，必然会迫切希望有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产品按它的劳动价值来交换终于成为完全的毫无例外的真理，换句话说，他们必然迫切希望有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只有商品生产的一个规律绝对地不折不扣地发生作用，而唯一能够保证这条规律发生作用的那些条件，即商品生产以致资本主义生产的其他规律都排除了。

这种空想在现代小资产者（现实的或精神的）的思想中是多么根深蒂固，由下述事实就可证明：这种空想早在1831年已经由约翰·格雷系统地发挥过；在30年代，英国还在实际上试办并在理论上宣扬过；1842年洛贝尔图所在德国，1846年蒲鲁东在法国，都把它宣布为最新真理；1871年洛贝尔图斯再次把它宣称为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并当作他的社

会遗嘱;1884 年,它又在一群利禄之徒中间找到了信徒,这些人以信奉洛贝尔图斯为名,准备借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谋取一己的私利。

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哲学的贫困〉德文版序言》(1884 年 10 月 23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210—211 页。

既然唯物主义总是用存在解释意识而不是相反,那么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时,唯物主义就要求用社会存在解释社会意识。

马克思认识到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不完备性和片面性,确信必须"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①。既然唯物主义总是用存在解释意识而不是相反,那么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时,唯物主义就要求用社会存在解释社会意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中说:"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推广运用于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如下的完整的表述: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0 页。——编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10 页。——编者注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样的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地确定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解决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编者注

列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11月),《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3—424页。

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

由此可见,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①,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②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

① 手稿的最初方案:"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的一定的个人"。——编者注

② 手稿中删去以下这段话:"这些个人所产生的观念,或者是关于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的观念,或者是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的观念,或者是关于他们自身的状况的观念。显然,在这几种情况下,这些观念都是他们的现实关系和活动、他们的生产、他们的交往、他们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有意识的表现,而不管这种表现是现实的还是虚幻的。相反的假设,只有除了现实的、受物质制约个人的精神以外还假定有某种特殊的精神的情况下才能成立。如果这些个人的现实关系的有意识的表现是虚幻的,如果他们在自己的观念中把自己的现实颠倒过来,那么这又是他们狭隘的物质活动方式以及由此而来的他们狭隘的社会关系造成的"。——编者注

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das Bewuß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ß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72页。

……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中也反映出先前已经存在着并且正在斗争着的各个阶级的斗争，但是这个斗争同样是头足倒置地、不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不是作为阶级斗争、而是作为维护各种政治原则的斗争反映出来的，并且是这样头足倒置起来，以致需要经过上千年我们才终于把它的真相识破。

在上述关于我对生产和商品贸易的关系以及两者和货币

贸易的关系的见解的几点说明中，我基本上也已经回答了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问题。从分工的观点来看问题最容易理解。社会产生它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也获得了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同这些人相对立而独立起来，于是就出现了国家。然后便发生像在商品贸易中和后来在货币贸易中发生的那种情形：新的独立的力量总的说来固然应当尾随生产的运动，然而由于它本身具有的、即它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它又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反作用。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大的独立性并且一经确立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正如在货币市场中，总的说来，并且在上述条件之下，是反映出，当然是**头足倒置**地反映出工业市场的运动一样，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中也反映出先前已经存在着并且正在斗争着的各个阶级的斗争，但是这个斗争同样是头足倒置地、不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不是作为阶级斗争、而是作为维护各种政治原则的斗争反映出来的，并且是这样头足倒置起来，以致需要经过上千年我们才终于把它的真相识破。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 年 10 月 27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00—701 页。

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以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

决不能避免这种情况：推动人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头脑，甚至吃喝也是由于通过头脑感觉到饥渴而开始，并且同样由于通过头脑感觉到饱足而停止。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以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如果一个人只是由于他追求“理想的意图”并承认“理想的力量”对他的影响，就成了唯心主义者，那么任何一个发育稍稍正常的人都是天生的唯心主义者了，怎么还会有唯物主义者呢？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页。

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

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

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时代的还是有关当代的资料——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这些困难的排除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这里我们只举出几个我们用来与意识形态相对照的抽象，并用历史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1845 年秋—大约 1846 年 5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3—74 页。

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

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恩格斯：《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696页。

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

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

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57年10月—1858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43页。

思想的社会关系不过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

他们的基本思想(在摘自马克思著作的上述引文中也已表达得十分明确)是把社会关系分成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思想的社会关系不过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而物质的社会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而形成的,是人维持生存的活动的(结果)形式。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9页。

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反映可能是对被反映者的近似正确的复写,可是如果说它们是同一的,那就荒谬了。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不是同一的,这正如一般存在和一般意识不是同一的一样。人们进行交往时,是作为有意识的生物进行的,但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是同一的。在一切稍微复杂的社会形态中,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中,人们在交往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在形成什么样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又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律发展的,等等。例如,一个农民在出售谷物时,他就和世界市场上的世界谷物生产者发生"交往",可是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也没有意识到从交换中形成什么样的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反映可能是对被反映者的近似正确的复写，可是如果说它们是同一的，那就荒谬了。意识总是**反映**存在的，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看不到这个原理与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有着直接的和**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不可能的。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 年 2—10 月），《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18—219 页。

唯物主义的方法在这里就往往只限于把政治冲突归结为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而把各个政党看作是这些阶级以及阶级集团的大体相应的政治表现。

对于某一个时期的经济史的清晰的概观，决不能在当时就得到，而只有在事后，即在搜集和整理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在这里，统计是必要的辅助手段，而统计总是落在事件之后。因此，在研究当前的事件时，往往不得不把这个最重要的因素看作是固定的，把所研究的时期开始时存在的经济状况看作是在整个时期内不变的，或者只考虑这个状况中那些从现有的明显事件本身产生出来因而同样是十分明显的变化。所以，唯物主义的方法在这里就往往只限于把政治冲突归结为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而把各个政党看作是这些阶级以及阶级集团的大体相应的政治表现。

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1895年3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6—507页。

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

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在这两种场合下,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2—10月),《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1—222页。

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

对德国的许多青年著作家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大体上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

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了很少的一点工作，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但是，许许多多年轻的德国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那时就可能有一个巴尔特冒出来，并攻击在他那一流人中间反正已经退化为空话的问题本身。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 年 8 月 5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91—692 页。

主观主义被社会过程是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代替了，没有这种观点，当然也就无所谓社会科学。

“活的个人”在每个这样的社会经济形态范围内的活动，这些极为多样的似乎不能加以任何系统化的活动，已被概括起来，并归结为各个在生产关系体系中所起的作用上、在生产条件上、因而在生活环境的条件上以及在这种环境所决定的利益上彼此不同的个人集团的活动，一句话，归结为**各个阶级**的活动，而这些阶级的斗争决定着社会的发展。这就推翻了主观主义者天真幼稚、纯粹机械的历史观，他们满足于历史是由活的个人创造的这种空洞的论点，而不愿分析这些个人的

活动是由什么社会环境决定的，是怎样决定的。主观主义被社会过程是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代替了，没有这种观点，当然也就无所谓社会科学。

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1894年底—1895年初），《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3页。

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中，即使有70个马克思也不能够把握住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变化的总和；至多是发现这些变化的规律，在主要的基本的方面指出这些变化及其历史发展的客观的逻辑。

在世界经济中，每一个生产者都意识到自己给生产技术带来了某种变化，每一个货主都意识到他在用一些产品交换另一些产品，但是这些生产者和货主都没有意识到，他们这样做是在改变着**社会存在**。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中，即使有70个马克思也不能够把握住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变化的总和；至多是发现这些变化的**规律**，在主要的基本的方面指出这些变化及其历史发展的**客观的**逻辑。所谓客观的，并不是指有意识的生物的社会（即人的社会）能够不依赖于有意识的生物的存在而存在和发展（波格丹诺夫在自己的“理论”中所**强调**的仅仅是这些废话），而是指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们的**社会意识**。你们过日子、经营事业、生儿育女、生产物品、交换产品等等，这些事实形成事件的客观必然的链条、发展的链条，这个链条不依赖于你们的**社会**意识，永远也不会为**社会**意

识所完全把握。人类的最高任务，就是从一般的和基本的特征上把握经济演进（社会存在的演进）的这个客观逻辑，以便使自己的社会意识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阶级的意识尽可能清楚地、明确地、批判地与它相适应。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2—10月），《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221页。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

……

但是，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需要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间战斗的。在罗马共和国的高度严格的传统中，资产阶级社会的斗士们找到了理想和艺术形式，找到了他们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内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自我欺骗。例如，在100年前，

在另一发展阶段上，克伦威尔和英国人民为了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借用过旧约全书中的语言、热情和幻想。当真正的目的已经达到，当英国社会的资产阶级改造已经实现时，洛克就排挤了哈巴谷。

由此可见，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务，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大约1851年12月中—1852年3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586页。

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现代社会主义）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

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1页。

既然这个人还没有发现，物质生存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生存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

……我在维也纳的《德意志言论》杂志上看到了莫里茨·维尔特这只不祥之鸟所写的关于保尔·巴尔特所著一书[①]的评论[②]，这个批评使我也对该书本身产生了不良的印象。我想看看这本书，但是我应当说，如果莫里茨这家伙正确地引用了巴尔特的一段话，在这段话中，巴尔特说他在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所能找到的哲学等等依赖于物质生存条件的唯一的例子，就是笛卡儿宣称动物是机器，那么我就只好为这个人竟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感到遗憾了。既然这个人还没有发现，物质生存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生存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那么，他就决不能了解他所谈论的那个问题了。但是，我已经说过，这全是第二手的东西，而莫里茨这家伙是一个讨厌的朋友。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正像马克思就70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0—691页。

① 保·巴尔特：《黑格尔和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编者注

② 莫·维尔特：《现代德国对黑格尔的侮辱和迫害》。——编者注

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

随着财富的发展，因而也就是随着新的力量和不断扩大的个人交往的发展，那些成为共同体的基础的经济条件，那些与共同体相适应的共同体各不同组成部分的政治关系，以理想的方式来对共同体进行直观的宗教（这二者又都是建立在对自然界的一定关系上的，而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个人的性格、观点等等，也都解体了。**单是科学**——即财富的最可靠的形式，既是财富的产物，又是财富的生产者——**的发展**，就足以使这些共同体解体。但是，**科学**这种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的发展**，只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即财富的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

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在现实中，意识的这种限制是同**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程度**，因而是同财富的一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当然，发展不仅是在旧的基础上发生的，而且就是**这个基础本身的发展**。这个**基础**本身的最高发展（这个基础变成的花朵；但这仍然是**这个**基础，是作为花朵的**这株**植物；因此，开花**以后**和开花的结果就是枯萎），是达到这样一点：这时基础本身取得的形式使它能和**生产力的最高发展**，因而也和个人的最丰富的发展相一致。一旦达到这一点，进一步的发展就表现为衰落，而新的发展则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开始。

马克思：《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1857 年底—1858 年 5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39—540 页。

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多半也是间接决定的，因为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

至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的领域，即宗教、哲学等等，那么它们都有一种被历史时期所发现和接受的史前的东西，这种东西我们今天不免要称之为愚昧。这些关于自然界、关于人本身的性质、关于灵魂、魔力等等的形形色色的虚假观念，多半只是在消极意义上以经济为基础；史前时期的低级经济发展有关于自然界的虚假观念作为补充，但是有时也作为条件，甚至作为原因。虽然经济上的需要曾经是，而且越来越是对自然界的认识不断进展的主要动力，但是，要给这一切原始状态的愚昧寻找经济上的原因，那就太迂腐了。科学的历史，就是把这种愚昧逐渐消除的历史，或者说，是用新的、但越来越不荒唐的愚昧加以代替的历史。从事这些事情的人们又属于分工的特殊部门，并且认为自己是致力于一个独立的领域。只要他们形成社会分工之内的独立集团，他们的产物，包括他们的错误在内，就要反过来影响全部社会发展，甚至影响经济发展。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本身又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支配作用的影响之下。例如在哲学上，拿资产阶级时期来说这种情形是最容易证明的。霍布斯是第一个现代唯物主义者（18 世纪意义上的），但是当专制君主制在整个欧洲处于全盛时期，并在英国开始和人民进行斗争的时候，他是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洛克在宗教上和政治上都是 1688 年的阶级妥协的产儿。英国自然神论者和他们的更彻底的继承者

法国唯物主义者都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法国人甚至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哲学家。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中始终显现着德国庸人的面孔——有时积极地,有时消极地。但是,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因此,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18 世纪的法国对英国来说是如此(法国人是以英国哲学为依据的),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但是,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普遍的学术繁荣一样,也是经济高涨的结果。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也具有最终的至上权力,这在我看来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这种至上权力是发生在各该领域本身所规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例如在哲学中,它是发生在这样一种作用所规定的条件的范围内,这种作用就是各种经济影响(这些经济影响多半又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等的外衣下起作用)对先驱所提供的现有哲学材料发生的作用。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多半也是间接决定的,因为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 年 10 月 27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03—704 页。

二、统治阶级和统治思想

(一)劳动支配与思想支配

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

国民经济学由于不考察工人(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而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当然,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大约 1844 年 5 月底 6 月初—8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69—270 页。

对劳动能力来说,产品也表现为他人的材料、他人的工具和他人的劳动的结合,即表现为他人的财产,而劳动能力在生产结束后,由于消耗了生命力而变得更加贫穷,然而又总是作为与自己的生活条件相分离的单纯主体的劳动能力而重新开

始自己的苦工。

劳动的客观条件取得了与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主体的存在——从资本变成资本家;另一方面,劳动能力与它自己的条件相对立的单纯主体的存在,使劳动能力具有对于这些条件来说只是无所谓的客观形式——劳动能力只是具有特殊使用价值的**价值**,而与实现它自身的条件,即与具有别种使用价值的**各价值相并列**。因此,并不是这些条件在生产过程中作为劳动能力的实现条件来实现,而是相反,劳动能力仅仅作为把**这些条件**当作与劳动能力相对立的自为存在的价值来增殖和保存的条件,而从生产过程中出来。

劳动能力加工的材料是**他人的**材料;同样工具是**他人的**工具;工人的劳动只表现为材料和工具这些实体的附属品,因而对象化在不属于**他**的东西中。甚至活劳动本身也表现为**他人的东西**而与活劳动能力相对立——而活劳动就是活劳动能力的劳动,就是活劳动能力自己的生命表现——,因为活劳动为换取对象化劳动,为换取劳动自身的产品已经出让给资本了。劳动能力把活劳动看作他人的东西,如果资本愿意向劳动能力支付报酬而不让它劳动,劳动能力是会乐意进行这种交易的。可见,劳动能力自身的劳动对劳动能力来说,就像材料和工具一样是他人的——从对劳动的管理等方面来看,劳动对劳动能力来说也是他人的。因此,对劳动能力来说,产品也表现为他人的材料、他人的工具和他人的劳动的结合,即表现为**他人的财产**,而劳动能力在生产结束后,由于消耗了生命力而变得更加贫穷,然而又总是作为与自己的生活条件相分离的单纯主体的劳动能力而重新开始自己的苦工。

马克思:《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1857 年底—1858 年 5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54—455 页。

……在于不归工人所有,而归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资本所有,归巨大的对象[化]的权力所有,这种对象[化]把社会劳动本身当作自身的一个要素而置于同自己相对立的地位。

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物的条件即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相比必然增长,——这其实是一个同义反复的命题,因为,劳动生产力的增长无非是使用较少的直接劳动就能创造较多的产品,从而社会财富越来越表现为劳动本身创造的劳动条件,——这一事实,从资本的观点看来,不是社会活动的一个要素(物化劳动)成为另一个要素(主体的、活的劳动)的越来越庞大的躯体,而是(这对雇佣劳动是重要的)劳动的客观条件对活劳动具有越来越巨大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就通过这些客观条件的规模而表现出来),而社会财富的越来越巨大的部分作为异己的和统治的权力同劳动相对立。关键不在于**对象化**,而在于**异化,外化**,外在化,在于不归工人所有,而归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资本所有,归巨大的对象[化]的权力所有,这种对象[化]把社会劳动本身当作自身的一个要素而置于同自己相对立的地位。

马克思:《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1857 年底—1858 年 5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43—244 页。

工人丧失所有权,而对象化劳动拥有对活劳动的所有权,

或者说资本占有他人劳动,——两者只是在对立的两极上表现了同一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基本条件,而决不是同这种生产方式毫不相干的偶然现象。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受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观念的严重束缚,在他们看来,劳动的社会权力**对象化**的必然性是跟这些权力同活劳动相**异化**的必然性分不开的。但是随着活劳动的**直接**性质被扬弃,即作为单纯**单个**劳动或者作为单纯内部的一般劳动或单纯外部的一般劳动的性质被扬弃,随着个人的活动被确立为直接的一般活动或**社会**活动,生产的物的要素也就摆脱这种异化形式;这样一来,这些物的要素就被确立为这样的财产,确立为这样的有机社会躯体,在其中个人作为单个人,然而是作为社会的单个的人再生产出来。使个人在他们的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在他们的生产的生活过程中处于上述状况的那些条件,只有通过历史的经济过程本身才能创造出来;这些条件既有客观的条件,也有主观的条件,它们只不过是同一些条件的两种不同的形式。

工人丧失所有权,而对象化劳动拥有对活劳动的所有权,或者说资本占有他人劳动,——两者只是在对立的两极上表现了同一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基本条件,而决不是同这种生产方式毫不相干的偶然现象。这种分配方式就是生产关系本身,不过是从分配角度来看罢了。

马克思:《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1857 年底—1858 年 5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44—245 页。

对象化劳动，价值本身作为自私的本质，即作为资本与工人相对立，由于资本的承担者是资本家，因此它也就作为资本家与工人相对立。

要使劳动成为雇佣劳动，要使工人作为非所有者进行劳动，不是出卖商品，而是出卖对他自身的劳动能力的支配权，即要使他按照劳动能力能够出卖的唯一方式来出卖劳动能力本身，实现他的劳动的那些条件就必须作为**异化的条件，异己的权力**，受他人的意志支配的条件，即异己的财产同他相对立。**对象化劳动**，价值本身作为**自私的本质**，即作为**资本**与工人相对立，由于资本的承担者是资本家，因此它也就作为**资本家**与工人相对立。

马克思：《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1861 年 8 月—1862 年 3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24—125 页。

劳动转化为资本，从潜在意义上来说，是资本和劳动交换的结果。这种转化只有在生产过程本身中才得到实现。

〔……工人必然会越来越贫穷，因为他的劳动的创造力作为资本的力量，作为**异己的权力**而同他相对立。他把劳动作为财富的生产力**让渡出去**；而资本把劳动作为这种生产力来占有。可见，劳动和劳动产品所有权的分离，劳动和财富的分离，已经包含在这种交换行为本身之中。作为奇特的结果出现的东西，已经存在于前提本身之中。因此，对于工人来说，他的劳动的生产性**成了异己的权力**，总之，他的劳动既然不是**能力**，而是运动，是**现实的**劳动，就会是这样的；相反，资

本是通过**占有他人劳动**而使自己的价值增殖的。至少，资本的价值增殖的可能性是由此产生的；是作为劳动和资本交换的结果出现的。这种关系只有在（资本实际消费他人劳动的）生产行为本身中**才得到实现**。劳动能力被工人作为**预先存在的**交换价值同货币形式的等价物相交换，而这个货币形式的等价物又被工人用来同商品形式的等价物相交换，这些商品由工人消费。劳动在这个交换过程中是非生产的；它只是对资本来说才变成生产的；劳动只能从流通中取出它已经投入流通的东西，即一个预定的商品量，而这既不是劳动本身的产品，也不是劳动本身的价值。〔因此，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任何增长，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家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支配劳动的**客观权力**增长。〕劳动转化为资本，**从潜在意义上来说**，是资本和劳动交换的结果。**这种转化**只有在**生产过程**本身中**才得到实现**。〕

马克思：《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1861 年 8 月—1862 年 3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83—184 页。

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是，劳动条件作为某种独立的、人格化的东西同活劳动相对立，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

总之，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是，劳动条件作为某种独立的、人格化的东西同活劳动相对立，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

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正因为这样，劳动条件才成为**资本**，而拥有劳动条件的商品所有者则作为**资本家**同工人相对立。在实际的劳动过程中，劳动条件同活劳动的这种分离当然不再存在了，但是劳动的总过程却是资本的过程，是归结为资本的过程。工人在这个过程中是作为**劳动**出现的，因而他本身是资本的一个要素。

马克思：《〈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1861 年 8 月—1863 年 7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514 页。

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

所有这些对共产主义的物质产品的占有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责备，也被扩及到精神产品的占有和生产方面。正如阶级的所有制的终止在资产者看来是生产本身的终止一样，阶级的教育的终止在他们看来就等于一切教育的终止。

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

但是，你们既然用你们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教育、法等等的观念来衡量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主张，那就请你们不要同我们争论了。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

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

你们的利己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这种利己观念是你们和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谈到古代所有制的时候你们所能理解的，谈到封建所有制的时候你们所能理解的，一谈到资产阶级所有制你们就再也不能理解了。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9页。

资产阶级著作家在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义进行斗争的时期提出的原则和理论无非是实际运动在理论上的表现……

封建财产关系的废除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建立绝不是由一种从一定的理论原则即自己的核心出发，并从此进一步做出结论的学说中产生出来的。相反，资产阶级著作家在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义进行斗争的时期提出的原则和理论无非是实际运动在理论上的表现，同时可以精确地看出，这种理论上的表现以其所处实际运动的阶段的不同而反映出空想主义的、教条主义的、学理主义的程度也往往不同。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1847年10月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52—353页。

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从宗教的、哲学的和一切意识形态的观点对共产主义提出的种种责难，都不值得详细讨论了。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

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 年 12 月—1848 年 1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91—292 页。

而寡头政治却不能理解下面这一简单事实：政治权力只不过是经济权力的产物；迫使寡头政治让出经济权力的那个阶级，将来总有一天也会夺得政治权力。

我们还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联合内阁向曼彻斯特学派所作的这些让步一一列举下去。这些让步究竟证明什么呢？这些让步说明：工业资产阶级，尽管它目前在议院中的力量微弱，仍然是左右局势的真正主人。任何政府，辉格党政府也好，托利党政府也好，联合政府也好，只有为资产阶级做好准备工作，才能保持住政权，而不让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纵观 1825 年以来的不列颠立法，大家就会发现，只是以在财政方面对资

产阶级不断让步为代价，才在政治方面抗住了资产阶级。而寡头政治却不能理解下面这一简单事实：政治权力只不过是经济权力的产物；迫使寡头政治让出经济权力的那个阶级，将来总有一天也会夺得政治权力。

马克思：《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预算》（1853年4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

……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

因此，我们拒绝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作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伦理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无理要求，这种要求的借口是，道德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相反地，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没有人怀疑，在这里，在道德方面也和人类认识的所有其他部门一样，总的说是有过进步的。但是我们还没有越出阶级的道德。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5页。

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

这些外部关系并未排除“依赖关系”，它们只是使这些关系变成普遍的形式；不如说它们为人的依赖关系造成普遍的基础。个人在这里也只是作为一定的个人互相发生关系。这种与人的依赖关系相对立的物的依赖关系也表现出这样的情形（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立的独立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本身相对立而独立化的、他们互相间的生产关系）：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57年8月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任何得到历史承认的群众的“利益”，当它最初出现于世界舞台时，总是在“思想”或“观念”中远远地超出自己的实际界限，很容易使自己和全人类的利益混淆起来。

根据过去的、非批判的历史，即根据和绝对批判的意旨相违背的历史，应该更严格地区分下述两点：群众对这样或那样的目的究竟“关怀”到什么程度，这些目的“唤起了”群众多少“热情”。“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另一方面，不难了解，任何得到历史承认的群众的“利益”，当它最初出现于世界舞台时，总是在“思想”或“观念”中远远地超出自己的实际界限，很容易使自己和全人类的利益混淆起

来。这种**错觉构成傅立叶**所谓的每个历史时代的**色调**。资产阶级在1789年革命中的**利益**决不是"**不成功的**",它"**压倒了**"一切,并获得了"**实际成效**",尽管"**激情**"已经消失,尽管这种利益用来装饰自己的摇篮的"**热情**"之花也已经枯萎。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只有对那样的群众来说革命才是"不成功的",这种群众的**政治**"观念"并不是关于自己的实际"**利益**"的观念,所以他们的真正的主导原则和革命的主导原则并不是一致的,他们获得解放的现实条件和资产阶级借以解放自身和社会的那些条件是根本不同的。所以,如果说能够代表一切伟大的历史"活动"的革命是不成功的,那么,其所以不成功,是因为革命在本质上不超出其生活条件的范围的那部分群众,是并不包括全体居民在内的**特殊的、有限的**群众。如果说革命是不成功的,那么,并不是因为革命"**唤起了**"群众的"**热情**",并不是因为它引起了群众的"**关怀**",而是因为对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群众来说,革命的原则并不代表他们的**实际**利益,不是**他们自己的**革命原则,而**仅仅**是一种"**观念**",因而也仅仅是暂时的**热情**和表面的**热潮**之类的东西。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月—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3—104页。

资产阶级借以在其中活动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决不是单一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这种对抗性质表现得越明

显，经济学家们，这些资产阶级生产的学术代表就越和他们自己的理论发生分歧，于是在他们中间形成了各种学派。

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本身是封建时期无产阶级[①]残存物的无产阶级相伴随。资产阶级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展它的对抗性质，起初这种性质或多或少是掩饰起来的，只是处于隐蔽状态。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在它的内部发展着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展开了斗争，这个斗争在双方尚未感觉到，尚未予以注意、重视、理解、承认并公开宣告以前，最初仅表现为局部的暂时的冲突，表现为一些破坏行为。另一方面，如果说现代资产阶级的全体成员由于组成一个与另一个阶级相对立的阶级而有共同的利益，那么，由于他们互相对立，他们的利益又是对立的，对抗的。这种利益上的对立是由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的经济条件产生的。资产阶级借以在其中活动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决不是单一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这些关系只有不断消灭资产阶级单个成员的财富和产生出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

这种对抗性质表现得越明显，经济学家们，这些资产阶级生产的学术代表就越和他们自己的理论发生分歧，于是在他们中间形成了各种学派。

---

① 在马克思送给娜·吴亭娜的那一本上面此处是“劳动阶级”。——编者注

宿命论的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对他们所谓的资产阶级生产的有害方面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正如资产者本身在实践中对他们赖以取得财富的无产者的疾苦漠不关心一样。这个宿命论学派有古典派和浪漫派两种。古典派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他们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污垢、提高生产力、使工商业获得新的发展的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参加这一斗争并专心致力于这一狂热活动，只是经受着暂时的偶然的苦难，并且它自己的看法也是如此。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是这一时代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有利于财富的生产。在他们看来，贫困只不过是每一次分娩时的阵痛，无论是自然界还是工业都要经历这种情况。

浪漫派属于我们这个时代，这时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处于直接对立状态，贫困像财富那样大量产生。这时，经济学家便以饱食的宿命论者的姿态出现，他们自命高尚、蔑视那些用劳动创造财富的活人机器。他们的一言一语都仿照他们的前辈，可是，前辈们的漠不关心只是出于天真，而他们的漠不关心却已成为卖弄风情了。

其次是**人道学派**，这个学派对现时生产关系的坏的方面倒是放在心上的。为了不受良心的责备，这个学派想尽量缓和现有的对比；他们对无产者的苦难以及资产者之间的剧烈竞争表示真诚的痛心；他们劝工人安分守己，好好工作，少生孩子；他们建议资产者节制一下生产热情。这个学派的全部

理论建立在理论和实践、原理和结果、观念和应用、内容和形式、本质和现实、法和事实、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之间无限的区别上面。

博爱学派是完善的人道学派。他们否认对抗的必然性；他们愿意把一切人都变成资产者；他们愿意实现理论，只要这种理论与实践不同而且本身不包含对抗。毫无疑问，在理论上把现实中随时都要遇到的矛盾撇开不管并不困难。那样一来，这种理论就会变成理想化的现实。因此，博爱论者愿意保存那些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而不要那种构成这些范畴并且同这些范畴分不开的对抗。博爱论者以为，他们是在严肃地反对资产者的实践，其实，他们自己比任何人都更像资产者。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节选）（1847 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53—154 页。

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内，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者也受资本主义观念的支配。

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状态内，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者也受资本主义观念的支配。以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而著名的巴尔扎克，在他最后的一部小说《农民》里，切当地描写了一个小农为了保持住一个高利贷者对自己的厚待，如何白白地替高利贷者干各种活，并且认为，他这样做，并没有向高利贷者献出什么东西，因为他自己的劳动不需要花费他自己的现金。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三册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

……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阶级立场及其对各种宗教的扶持同各种时髦哲学流派的思想内容之间的联系。

我们俄国那些喜欢自命为先进人物的知识分子,同他们在其他各国的伙伴们一样,很不喜欢用狄慈根所说的评价来考察问题。他们所以不喜欢这样做,是因为真理的光芒是刺眼的。只要稍微深入思考一下当今那些有教养的人在国家政治、一般经济、日常生活以及其他方面对于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依赖,就可以了解狄慈根这句一针见血的评语是绝对正确的。只要回顾一下欧洲各国经常出现的时髦哲学流派中的多数流派,哪怕只回顾一下由于镭的发现而兴起的哲学流派,直到目前正在竭力抓住爱因斯坦学说的哲学流派,就可以知道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阶级立场及其对各种宗教的扶持同各种时髦哲学流派的思想内容之间的联系了。

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2年3月12日),《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7页。

(二)统治思想与阶级利益

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

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

总之，统治阶级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所有历史编纂学家，主要是18世纪以来的历史编纂学家所共有的这种历史观，必然会碰到这样一种现象：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而言，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①] 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不能够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因此，这一阶级的胜利对于其他未能争得统治地位的阶级中的许多个人来说也是有利的，但这只是就这种胜利使这些个人现在有可能升入统治阶级而言。当法国资产阶级推翻了贵族的统治之后，它使许多无产者有可能升到无产阶级之上，但是只有当他们变成资产者的时候才达到这一点。由此可见，每一个新阶级赖以实现自己统治的基础，总比它以前的统治阶级所依赖的基础要宽广一些；可是后来，非统治阶级和正在进行统治的阶级之间的

① 马克思加了边注："（普遍性符合于：（1）与等级相对的阶级；（2）竞争、世界交往等等；（3）统治阶级的人数众多；（4）共同利益的幻想。起初这种幻想是真实的；（5）玄想家的欺骗和分工）"。——编者注

对立也发展得更尖锐和更深刻。这两种情况使得非统治阶级反对新统治阶级的斗争在否定旧社会制度方面，又要比过去一切争得统治的阶级所作的斗争更加坚决、更加彻底。

只要阶级的统治完全不再是社会制度的形式，也就是说，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那么，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整个假象当然就会自行消失。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101页。

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

因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所以可以得出结论：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获得了政治形式。由此便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法律是以意志为基础的，而且是以脱离其现实基础的意志即**自由**意志为基础的。同样，法随后也被归结为法律。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页。

当前社会的交往形式以及统治阶级的条件同走在前面的

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愈大，由此产生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以及它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分裂愈大，那么当初与这种交往形式相适应的意识当然也就愈不真实……

当前社会的交往形式以及统治阶级的条件同走在前面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愈大，由此产生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以及它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分裂愈大，那么当初与这种交往形式相适应的意识当然也就愈不真实，也就是说，它不再是与这种交往形式相适应的意识了；这种交往形式中的旧的传统观念（在这些观念中，现实的个人利益往往被说成是普遍的利益）也就愈发下降为唯心的词句、有意识的幻想和有目的的虚伪。但是，这些东西被生活揭穿得愈多，它们对意识本身的作用愈小，那么它们对自身的捍卫也就愈坚决，而这个标准社会的语言也就愈加虚伪，愈加道德化，愈加神圣化。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1845 年秋—大约 1846 年 5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331 页。

法律、道德和宗教在他们（无产阶级）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

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旧社会的生活条件已经被消灭了。无产者是没有财产的；他们和妻子儿女的关系同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再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了；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法律、道德、宗教在

他们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 年 12 月—1848 年 1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83 页。

一切条顿民族最初所共有的古代习俗所以能够作为传统延续到 19 世纪，就是因为它不必承担很大的费用和风险，就能给不列颠的阶级议会披上一件人民性的外衣。统治阶级从这种习俗中得到的好处就是，人民群众总是在不同程度上热情地把统治阶级的派别利益作为自己的民族利益来参与。

也许有人会觉得，发明这种举手表决的选举，这种危险的手续，是为了嘲弄普选权，同“贱民”（陆军大臣贝雷斯福德少校的用语）开个有趣的贵族式的玩笑。但是这样想是错误的。一切条顿民族最初所共有的古代习俗所以能够作为传统延续到 19 世纪，就是因为它不必承担很大的费用和风险，就能给不列颠的阶级议会披上一件人民性的外衣。统治阶级从这种习俗中得到的好处就是，人民群众总是在不同程度上热情地把统治阶级的派别利益作为自己的民族利益来参与。只是当资产阶级开始在辉格党和托利党这两个官方政党之旁采取独立的立场时，工人群众才开始在提名日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地行动。但是举手表决和投票表决之间、提名日和选举结果揭晓日之间的对立，没有哪一年像在最近这次 1852 年选举中表现得这样明显，这样鲜明地表现为敌对原则之间的冲突，这样势不两立，这样广泛，遍及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马克思:《宪章派》(1852年7月25日—8月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6页。

多数人即使参加了,他们也只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少数人效劳;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情形,或者甚至只是由于多数人采取消极的不反抗的态度,于是看起来就好像这个少数代表了全体人民。

以往的一切革命,结果都是某一阶级的统治被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排挤;但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而言,都只是区区少数。一个统治的少数这样被推翻了,另一个少数又取代它执掌政权并依照自己的利益改造国家制度。每次这都是一个由于经济发展状况而有能力并且负有使命进行统治的少数集团,正因为如此,并且也只是因为如此,所以在变革发生时,被统治的多数或者站在这个少数集团方面参加变革,或者安然听之任之。但是,如果撇开每一次的具体内容不谈,那么这一切革命的共同形式就在于:它们都是少数人的革命。多数人即使参加了,他们也只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少数人效劳;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情形,或者甚至只是由于多数人采取消极的不反抗的态度,于是看起来就好像这个少数代表了全体人民。

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1895年3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0—511页。

那些义愤填膺的叫嚣都变成了对现存阶级统治的掩掩盖盖的承认，并且完全变成了不平的牢骚和抱怨，其所以抱怨与不满，原因就是资产者没有让自己的未被承认的天才人物们领导社会，由于很实际的理由没有接受这些老爷们的荒唐的呓语。

全部历史的过程不决定于活生生的人民群众本身的发展，他们本身自然为一定的、本身也在历史上产生和变化着的条件所左右，全部历史过程取决于永恒的永远不变的自然规律，它今天离开这一规律，明天又接近这一规律，一切都以是否正确地认识这一规律为转移。这种对永恒的自然规律的正确认识是永恒的真理，其他一切都是虚假的。根据这种观点，一切实际的阶级矛盾，尽管因时代不同而各异，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巨大的永恒的矛盾，就是深谙永恒的自然规律并依照它行动的人，即贤人与贵人，和误解它曲解它并和它背道而驰的人，即愚人与贱人之间的矛盾。因此，历史上产生的阶级差别是自然差别，人们必须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尊敬这些差别，并且承认它们是永恒的自然规律的一部分，即应当崇拜天才。这样，对历史发展过程的整个见解便简单得像前世纪伊留米纳特和共济会会员的陈腐平凡的智慧那样，简单得像《魔笛》中的普通道德和被弄得极端庸俗腐化的圣西门主义那样。这样，老问题又自然产生了：到底该由谁来统治？这个问题经过十分详细但却非常肤浅的讨论，终于有了一个答案：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因此非常自然地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需要统治的人是很多很多的，但是任何时候统治的也不能太多，因为统治就是不断地向群众揭示和解释自然

规律的意义。但是怎样发现贵人和贤人呢？没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来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去找寻。于是变成纯粹自然差别的历史的阶级差别又显露出来。高贵者之所以高贵，是因为他聪明而博学。所以必须在独享教育权利的阶级即特权阶级中去寻找这样的人；而这些阶级本身也要在它们当中找出这样的人，并且对他们想当贵人和贤人的要求作出选择。因此，特权阶级现在即使不成为十足的贵人和贤人的阶级，至少也是说话时“条理分明”的阶级；而被压迫的阶级当然是“哑巴，是说话条理不清”的阶级，因此阶级统治又重新得到肯定。而那些义愤填膺的叫嚣都变成了对现存阶级统治的掩掩盖盖的承认，并且完全变成了不平的牢骚和抱怨，其所以抱怨与不满，原因就是资产者没有让自己的未被承认的天才人物们领导社会，由于很实际的理由没有接受这些老爷们的荒唐的呓语。浮夸的言谈在这里如何变为自己相反的东西，高贵的有学问的聪明人实际上怎样变为庸俗的愚昧无知的蠢人，关于这点卡莱尔本人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

马克思、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上发表的书评》（1850年3月中—4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8—319页。

许多曾经团结在这个旗号下反对过六月起义者的政党中的任何政党只要企图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守住革命的战场，它就要被“财产，家庭，宗教，秩序！”这一口号所战胜。

在六月的日子里，一切阶级和党派都团结成一个**维护秩**

序的党来反对无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党。它们从“**社会之敌**”手里“救出了”社会。它们选择了旧社会的格言“**财产、家庭、宗教、秩序**”作为自己的军队的口令，并用“在此标记下你必胜！”这句话激励反革命十字军征讨。从这时起，许多曾经团结在这个旗号下反对过六月起义者的政党中的任何政党只要企图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守住革命战场，它就要被“财产、家庭、宗教、秩序！”这一口号所战胜。每当社会的统治者集团范围缩小时，每当比较狭小的利益压倒比较广大的利益时，社会就得救了。任何最单纯的资产阶级财政改革的要求、任何最平凡的自由主义的要求、任何最表面的共和主义的要求、任何最浅薄的民主主义的要求，都同时被当作“侵害社会的行为”加以惩罚，被当作“社会主义”加以指责。最后，连那些“宗教和秩序”的最高祭司自己也被踢出他们的皮蒂娅的座椅，半夜里被拖下床，关进囚车，投入监狱或流放；他们的神殿被拆毁，他们的嘴被封住，他们的笔被折断，他们的法律被撕毁，这一切都是为了宗教、财产、家庭和秩序。一群群酩酊大醉的兵士对那些站在自己阳台上的资产者即秩序的狂信者开枪射击，亵渎他们的家庭圣地，炮击他们的房屋以取乐，这一切都是为了财产、家庭、宗教和秩序。最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败类组成为**维护秩序的神圣队伍**，而主人公克拉普林斯基就以“**社会救主**”的资格进入了土伊勒里宫。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中—1852年3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3—594页。

既然资产阶级把它从前当作“自由主义”颂扬的东西指责为“社会主义”，那么它就是承认它本身的利益要求它逃避自身统治的危险。

既然资产阶级认为任何一种社会生活表现都危害“安宁”，那么它又怎能希望在社会上层保持**不安宁的制度**，即保持自己那个——照它的一位发言人的说法——生存在斗争中并且靠斗争生存的**议会制度**呢？靠辩论生存的议会制度怎能禁止辩论呢？既然这里每种利益、每种社会措施都被变成一般的思想，并被当作一种思想来讨论，那么在这种条件下怎么能把某种利益、某种措施当作一种高出思维的东西而强使人们把它当作信条来接受呢？发言人在讲坛上的斗争，引起了报界低级作家的斗争；议会中的辩论俱乐部必然要由沙龙和酒馆中的辩论俱乐部来补充；议员们经常诉诸民意，就使民意有理由在请愿书中表示自己的真正的意见。既然议会制度将一切事情交给大多数决定，那么议会以外的大多数又怎能不想作决定呢？既然你们站在国家的顶峰上拉提琴，那么站在下面的人跟着跳舞不正是意料之中的事吗？

总之，既然资产阶级把它从前当作“**自由主义**”颂扬的东西指责为“**社会主义**”，那么它就是承认它本身的利益要求它逃避**自身统治**的危险；要恢复国内的安宁，首先必须使它的资产阶级议会安静下来，要完整地保持它的社会权力，就应该摧毁它的政治权力；只有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政治上注定同其他阶级一样毫无价值，个别资产者才能继续剥削其他阶级，安逸地享受财产、家庭、宗教和秩序；要挽救它的钱包，必须把它头上的王冠摘下，而把保护它的剑像达摩克利斯剑一

样地悬在它自己的头上。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中—1852年3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7—628页。

在(黑格尔的模仿者)这样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建立任何唯物主义学说的。

可是,如果进一步问:究竟什么是思维和意识,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那么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这里不言而喻,归根到底也是自然界产物的人脑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

但是,杜林先生不允许自己这样简单地对待问题。他不仅以人类的名义来思维——这本身已经是件相当了不起的事情,——而且以一切天体上的有意识的和能思维的生物的名义来思维。

……

因此,为了使人们不致怀疑其他某个天体上二乘二等于五,杜林先生就不能把思维称作人的思维,因而只好使思维脱离唯一的真实的基础,即脱离人和自然界,而在我们看来思维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于是杜林先生就绝望地陷入使他以"模仿者"黑格尔的模仿者的面目出现的那种意识形态里。附带说一下,我们还要更加频繁地在其他天体上欢迎杜林先生。

不言而喻,在这样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建立任何唯物主义学说的。我们以后会看到,杜林先生不得不一再把有意识的行动方式,即把普通话中叫作上帝的东西,硬塞给自然界。

此外,我们的现实哲学家把全部现实的基础从现实世界搬到思想世界,还有另一种动机。关于这种一般世界模式论、关于这种存在的形式原则的科学,正是杜林先生的哲学的基础。如果世界模式论不是从头脑中,而仅仅是通过头脑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如果存在的基本原则是从实际存在的事物中得来的,那么为此我们所需要的就不是哲学,而是关于世界和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证知识;由此产生的也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 年 9 月—1878 年 6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74—375 页。

事实越是明显地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家就越是热心地起劲地把资本主义以前世界的法的观念和所有权观念应用到这个已经完成的资本世界。

政治经济学在原则上把两种极不相同的私有制混同起来了。其中一种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另一种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为基础。它忘记了,后者不仅与前者直接对立,而且只是在前者的坟墓上成长起来的。

在西欧,政治经济学的故乡,原始积累的过程多少已经完成。在这里,资本主义制度或者已经直接征服整个国民生产,

或者在这种关系还不很发达的地方，它也至少间接地控制着那些与它一起继续存在的、属于过时的生产方式的、腐朽的社会阶层。事实越是明显地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家就越是热心地起劲地把资本主义以前世界的法的观念和所有权观念应用到这个已经完成的资本世界。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册　资本的生产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76页。

资产阶级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力求“在经济学上”证明它从前批判过的东西是合理的。

相反，一旦资产阶级占领了地盘，一方面自己掌握国家，一方面又同以前掌握国家的人妥协；一旦资产阶级把意识形态阶层看作自己的亲骨肉，到处按照自己的本性把他们改造成为自己的伙计；一旦资产阶级自己不再作为生产劳动的代表来同这些人对立，而真正的生产工人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并且同样说它是靠别人劳动生活的；一旦资产阶级有了足够的教养，不是一心一意从事生产，而是也想从事“有教养的”消费；一旦连精神劳动本身也愈来愈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一旦发生了这些情况，事情就反过来了。这时资产阶级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力求“在经济学上”证明它从前批判过的东西是合理的。加尔涅等人就是资产阶级在这方面的代言人和良心安慰者。此外，这些经济学家（他们本人就是教士、教授等等）也热衷于证明自己“在生产上的”有用性，“在经济学上”证明自己的薪金的合理性。

马克思:《〈资本论〉第四卷第一册 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5页。

马尔萨斯得出的唯一的实际结论在于:为地主在1815年要求的保护关税辩护——这是巴结贵族,——并且对财富生产者的贫困进行新的辩解,为劳动剥削者进行新的辩护。从这一方面来说,是巴结工业资本家。

马尔萨斯干了什么呢?

他利用安德森的理论,代替自己的(也是剽窃来的)几何级数和算术级数的怪诞幻想——他把这种怪诞幻想当作"漂亮辞句"保留着——来证明自己的人口论。在安德森理论的实际结论符合地主利益的限度内,他保留安德森理论的实际结论,——仅仅这一事实就证明,马尔萨斯同安德森本人一样,不了解这个理论同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联系;——他不去考察这个理论的创始人的反证,就利用这个理论去反对无产阶级。从这个理论出发,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向前迈进一步的使命就落到了李嘉图身上,这就是:在理论上,作出商品的价值规定等等,并阐明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在实践上,反对资产阶级生产基础上的土地私有权的必要性,并且更直接地反对国家促进这种土地所有权发展的一切措施,如谷物法。马尔萨斯得出的唯一的实际结论在于:为地主在1815年要求的保护关税辩护——这是巴结贵族,——并且对财富生产者的贫困进行新的辩解,为劳动剥削者进行新的辩护。从这一方面来说,是巴结工业资本家。

马尔萨斯的特点，是思想**极端卑鄙**，——只有牧师才可能这样卑鄙，他把人间的贫困看作对罪恶的惩罚，而且在他看来，非有一个“悲惨的尘世”不行，但是同时，他考虑到他所领取的牧师俸禄，借助于关于命运的教义，认为使统治阶级在这个悲惨的尘世上“愉快起来”，对他是极为有利的。这种思想的卑鄙还表现在马尔萨斯的科学工作上。**第一**，表现在他无耻的熟练的**剽窃**手艺上；**第二**，表现在他从科学的前提做出的那些**看人眼色的**而不是**毫无顾忌的**结论上。

马克思：《〈资本论〉第四卷第二册　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Ⅱ），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123—124 页。

英国工人阶级憎恨马尔萨斯——科贝特粗鲁地称他为“江湖牧师”——对马尔萨斯的这种憎恨是完全正当的；人民凭着真实的本能感觉到，在这里反对他们的不是一个科学的人，而是一个被他们的敌人收买的统治阶级的辩护士，是统治阶级的无耻的献媚者。

李嘉图的毫无顾忌不仅是**科学上的诚实**，而且从他的立场来说也是**科学上的必要**。因此对李嘉图来说，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究竟是毁灭土地所有权还是毁灭工人，这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这种进步使工业资产阶级的资本贬值，李嘉图也是欢迎的。如果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使**现有的**固定资本贬值一半，那将怎样呢？——李嘉图说，——要知道人类劳动生产率却因此提高了一倍。这就是**科学上的诚实**。如果说李嘉图的观点整个说来符合**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只是**因为**工业资

产阶级的利益符合生产的利益，或者说，符合人类劳动生产率发展的利益，并且**以此为限**。凡是资产阶级同这种发展发生矛盾的场合，李嘉图就**毫无顾忌地**反对资产阶级，就像他在别的场合反对无产阶级和贵族一样。

而**马尔萨斯**呢！这个无赖，从已经由科学得出的（而且总是他**剽窃来的**）前提，只做出对于贵族反对资产阶级以及对于贵族和资产阶级两者反对无产阶级来说，是“**合乎心意的**”（有用的）结论。因此，他不希望**为生产而生产**，他所希望的只是在维持或加强**现有制度**并且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那种限度内的生产。

他的第一部著作，就已经是靠牺牲原著而剽窃成功的最明显的写作例子之一。这部著作的**实际**目的，是为了英国**现**政府和**土地贵族**的利益，“从经济学上”证明法国革命及**其英国的支持者**追求改革的意图是空想。一句话，这是一本歌功颂德的小册子，它维护现有制度，反对历史的发展；而且它还为反对革命法国的战争辩护。

他1815年关于保护关税和地租的著作，部分地是要证明他以前为生产者的贫困所作的辩解，但首先是为了维护反动的土地所有权，反对“开明的”、“自由的”和“进步的”资本，特别是要证明英国立法当时为了保护贵族利益反对工业资产阶级而采取的**倒退措施**是正确的。最后，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反对**李嘉图的，这本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把“工业资本”及其生产率依以发展的那些规律的绝对要求，纳入从土地贵族、国教会（马尔萨斯所属的教会）、政府养老金领取者和食税者的现有利益看来是“有利的”和“适宜的”“范

围”。但是,一个人如果力求使科学去**适应**不是从科学本身(不管这种科学如何错误),而是从**外部**引出的、与科学**无关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观点,我就说这种人“**卑鄙**”。

……

马尔萨斯牧师就完全不同了。他[也]为了生产而把工人贬低到驮畜的地位,甚至使工人陷于饿死和当光棍的境地。[但是]在同样的生产的要求减少地主的“地租”时,在同样的生产的要求威胁国教会的“什一税”或“食税者”的利益时,或者,在为了一部分代表生产进步的工业资产阶级而去牺牲另一部分本身利益阻碍生产进步的工业资产阶级时,——总之,在贵族的某种利益同资产阶级的利益对立时,或者,在资产阶级中保守和停滞的阶层的某种利益同进步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对立时,——在所有这些场合,马尔萨斯“牧师”都不是为了生产而牺牲特殊利益,而是竭尽全力**企图**为了现有社会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集团的特殊利益而牺牲生产的要求。为了这个目的,他在科学领域内**伪造**自己的结论。这就是他**在科学上**的卑鄙,他对科学的犯罪,更不用说他那无耻的熟练的剽窃手艺了。马尔萨斯在科学上的结论,是看着统治阶级特别是统治阶级的反动分子的“**眼色**”捏造出来的;这就是说,马尔萨斯为了这些阶级的利益而**伪造**科学。相反,对于被压迫阶级,他的结论却是**毫无顾忌的**,**残酷无情的**。他不单单是**残酷无情**,而且**宣扬**他的**残酷无情**,厚颜无耻地以此自夸,并且在用他的结论反对“无权者”时,把他的结论**夸大到极端**,甚至**超过了**从他的观点看来还可以在科学上说得过去的程度。

因此,英国工人阶级憎恨马尔萨斯——科贝特**粗鲁地**称

他为“江湖牧师”(科贝特虽然是当代英国最大的政论家;但他缺少莱比锡大学教授的教养,并且公开反对“学者的语言”),——对马尔萨斯的这种憎恨是完全正当的;人民凭着真实的本能感觉到,在这里反对他们的不是一个科学的人,而是一个被他们的敌人收买的统治阶级的辩护士,是统治阶级的无耻的献媚者。

一个最初发现某种思想的人,可能由于善意的误解,把这种思想夸大到极端;而一个把这种思想夸大到极端的剽窃者,却总是把这种夸大当作“有利可图的生意”。

马克思:《〈资本论〉第四卷第二册 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25—128页。

在这个矛盾中,政治经济学只是说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或者也可以说,雇佣劳动,即从本身中异化出来的劳动的本质,这种劳动创造的财富作为别人的财富和它相对立,它自己的生产力作为它的产品的生产力和它相对立,它的致富过程作为自身的贫困化过程和它相对立,它的社会力量作为支配它的社会力量和它相对立。但是,这些政治经济学家把社会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表现出来的这种一定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说成是一般的、永恒的形式,说成是自然的真理,而把这种生产关系说成是社会劳动的绝对(而不是历史地)必然的、自然的、合理的关系。

政治经济学,随着它的不断发展,——这种发展,就基本原则来说,在李嘉图的著作里表现得最突出,——越来越明确

地把劳动说成是价值的唯一要素和使用价值的唯一[积极的]创造者,把生产力的发展说成是实际增加财富的唯一手段,而把劳动生产力的尽可能快的发展说成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实际上,这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特别是李嘉图的著作,在它证明价值规律既不受土地所有权也不受资本积累等等的破坏的时候,其实只是企图把一切和这种见解矛盾或似乎矛盾的现象从理论中排除出去。但是,正像劳动被理解为交换价值的**唯一**源泉和使用价值的积极源泉一样,"**资本**"也被同一些政治经济学家,特别是大卫·李嘉图(在他以后,托伦斯、马尔萨斯、贝利等人更是这样)看作是生产的调节者、财富的源泉和生产的目的,而在他们的著作里,劳动表现为雇佣劳动,这种雇佣劳动的承担者和实际工具必然是赤贫者(而且这里还有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起作用),他们只是生产费用的一个项目和单纯的生产工具,注定只能拿最低限度的工资,每当工人对资本来说成为"多余的"时候,还不得不降到这一最低限度以下。在这个矛盾中,政治经济学只是说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或者也可以说,雇佣劳动,即从本身中异化出来的劳动的本质,这种劳动创造的财富作为别人的财富和它相对立,它自己的生产力作为它的产品的生产力和它相对立,它的致富过程作为自身的贫困化过程和它相对立,它的社会力量作为支配它的社会力量和它相对立。但是,这些政治经济学家把社会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表现出来的这种一定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说成是一般的、永恒的形式,说成是自然的真理,而把**这种**生产关系说成是社会劳动的绝对(而不是历史地)必然的、自然的、合理的关系。由于

受到资本主义生产视野的局限，他们把社会劳动在这里借以表现的**对立**形式说成和摆脱了上述对立的这一劳动本身一样是必然的。这样，他们一方面把绝对意义上的**劳动**（因为在他们看来，雇佣劳动和劳动是等同的），另一方面又把同样绝对意义上的**资本**，把工人的贫困和不劳动者的财富同时说成是财富的唯一源泉，他们不断地在绝对的矛盾中运动而毫不觉察。（**西斯蒙第**由于觉察到了这种矛盾而在政治经济学上开辟了一个时代。）“劳动，**或者说**，资本”——在李嘉图的这种说法中，矛盾本身以及把这种矛盾当作等同的东西说出来的那种天真，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但是很明显，既然使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理论上作了这种毫不留情的表述的那同一种现实的发展，又发展了现实本身所包含的实际矛盾，特别是发展了英国日益增长的“国民”财富和日益增长的工人贫困之间的对立，其次，既然这些矛盾在李嘉图以及其他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中得到了**理论上**中肯的、尽管是无意识的表现，那么，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思想家抓住了在理论上已经给他们准备好了的矛盾，是十分自然的。劳动是交换价值的唯一源泉和使用价值的唯一的积极的创造者。你们这样说。另一方面，你们说，**资本**就是一切，而工人算不了什么，或者说，工人仅仅是资本的生产费用的一个项目。你们自己驳倒了自己。资本**不过**是对工人的诈骗，**劳动**才是**一切**。

马克思：《〈资本论〉第四卷第三册　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Ⅲ），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284—285 页。

随着政治经济学的深入发展，它不仅自己表现出矛盾和对立，而且它自身的对立面，也随着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现实矛盾的发展而出现在它的面前。与这种情况相适应，庸俗政治经济学也就有意识地越来越成为辩护论的经济学，并且千方百计力图通过空谈来摆脱反映矛盾的思想。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缺点和错误是：它把**资本的基本形式**，即以占有别人劳动为目的的生产，不是解释为社会生产的**历史**形式，而是解释为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不过它自己已通过它的分析开辟了一条消除这种解释的道路。

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正当政治经济学本身由于它的分析而使它自己的前提瓦解、动摇的时候，正当政治经济学的对立面也已经因此而多少以经济的、空想的、批判的和革命的形式存在的时候，庸俗政治经济学开始嚣张起来。因为政治经济学和由它自身产生的对立面的发展，是同资本主义生产固有的社会矛盾以及阶级斗争的**现实**发展齐头并进的。只是在政治经济学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即在亚·斯密以后）和形成稳固的形式时，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因素，即作为现象观念的单纯的现象复写，即它的庸俗因素，才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特殊表现形式从中分离出来。例如**萨伊**就把**亚·斯密**著作中这里或那里渗透的庸俗观念分离出来，并作为特殊的结晶和亚·斯密并存。随着**李嘉图**的出现和由他引起的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庸俗经济学家也得到了新的营养（因为他自己什么也不生产），政治经济学越是接近它的完成，也就是说它越是走向深入和发展成为对立的体系，它自身的庸俗因素，由于用它按照自己的方法准备的材料把自己

充实起来，就越是独立地和它相对立，直到最后在学术上的混合主义和无原则的折衷主义的编纂中找到了自己至上的表现。

随着政治经济学的深入发展，它不仅自己表现出矛盾和对立，而且它自身的对立面，也随着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现实矛盾的发展而出现在它的面前。与这种情况相适应，庸俗政治经济学也就有意识地越来越成为**辩护论的**经济学，并且千方百计力图通过空谈来摆脱反映矛盾的思想。因此，**萨伊**同例如**巴师夏**比较起来还算是一个批评家，还算无所偏袒，因为他在斯密的著作里发现的矛盾相对说来还是未发展的，而巴师夏却是一个职业的调和论者和辩护论者，虽然他不仅在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中发现了经济学本身在内部已经形成的矛盾，而且发现了在社会主义和当时日常的阶级斗争中正在形成的矛盾。再加上，庸俗政治经济学在其较早的发展阶段，找到的材料还没有完全加工好，因此它本身在参与解决经济问题的时候还或多或少地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出发，例如**萨伊**就是这样，而那位巴师夏却只有剽窃，并且力图用自己的论据把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不合口味的**方面消除掉。

马克思：《〈资本论〉第四卷第三册　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Ⅲ），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556—557 页。

它（庸俗经济学）越是在异化的形式上来认识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种形态，它就越是接近于普通观念的要素，也就是越在它自己的自然要素中浮游。

异化形式使古典的，因而也使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家感到困难，他们试图通过分析来剥去这种形式，可是庸俗政治经济学却正好是在产品价值的各个不同部分相互对立的**异化**中第一次感到十分自在：正如一个经院哲学家在谈到“圣父、圣子和圣灵”这一公式时感到十分自在一样，庸俗经济学家在谈到“土地—地租，资本—利息，劳动—工资”这一公式时也感到十分自在。因为这正是这样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中，这些关系在现象上似乎直接相互联系着，因而也在受这种生产方式束缚的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观念和意识中存在着。庸俗政治经济学认为它越是实际上仅仅从事于把普通观念译成学理主义的语言，它就越是单纯、**合乎自然**和对公众有益，就和一切理论上的吹毛求疵离得越远。因此，它越是在异化的形式上来认识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种形态，它就越是接近于普通观念的要素，也就是越在它自己的自然要素中浮游。

马克思：《〈资本论〉第四卷第三册　附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59页。

蒲鲁东先生不把政治经济学范畴看作实在的、暂时的、历史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而神秘地颠倒黑白，把实在的关系只看作这些抽象的体现。

蒲鲁东先生主要是由于缺乏历史知识而没有看到：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

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这样他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作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作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所以，蒲鲁东先生不把政治经济学范畴看作实在的、暂时的、历史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而神秘地颠倒黑白，把实在的关系只看作这些抽象的体现。这些抽象本身竟是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已安睡在天父心怀中的公式。

马克思：《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1846 年 12 月 28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44—445 页。

蒲鲁东先生不是直接肯定资产阶级生活对他说来是永恒的真理。他间接地说出了这一点，因为他神化了以观念形式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既然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被他想象为范畴形式、观念形式，他就把这些产物视为自行产生的、具有自己的生命的、永恒的东西。可见，他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视野。

蒲鲁东先生不是直接肯定**资产阶级生活**对他说来是**永恒的真理**。他间接地说出了这一点，因为他神化了以观念形式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既然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被他想象为范畴形式、观念形式，他就把这些产物视为自行产生的、具有自己的生命的、永恒的东西。可见，他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视野。由于他谈到资产阶级的观念时，认为它们是永恒

真理，所以他就寻找这些观念的综合，寻求它们的平衡，而没有看到，现在它们达到平衡的方式是唯一可能的方式。

其实，他所做的是一切好心的资产者所做的事情。他们都说，竞争、垄断等等在原则上，即如果把它们看作抽象的观念，是生活的唯一的基础，但是它们在实践中还得大加改善。他们全都希望有竞争而没有竞争的悲惨后果。他们全都希望有一种不可能的事情，即希望有资产阶级生活的条件而没有这些条件的必然后果。他们全都不了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是一种历史性的和暂时的形式，也正像封建方式的情况一样。他们之所以犯这个错误，是由于在他们看来作为资产者的人是一切社会的唯一可能的基础，是由于他们不能想象会有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那里人不再是资产者。

所以，蒲鲁东先生必然是一个**空论家**。变革现代世界的历史运动，对他来说不过是要发现两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正确的平衡、综合的问题。于是这个机灵的家伙就借用他的敏锐感觉来发现上帝的隐秘思想，发现两个孤立思想的统一，而这两个思想所以是孤立的，仅仅是因为蒲鲁东先生把它们从实际生活中孤立出来，把它们从现代生产即作为这两个思想所表现的种种现实的结合物的现代生产中孤立出来。蒲鲁东先生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由于人们既得的生产力和他们的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相互冲突而产生的伟大历史运动，代替了一个民族内各个阶级间以及各个民族彼此间准备着的可怕的战争，代替了唯一能解决这种冲突的群众的实践和暴力的行动，总之，代替了这一广阔的、持久的和复杂的运动。可见，历史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

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

您现在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蒲鲁东先生十分强烈地敌视一切政治运动。在他看来,现代各种问题不是解决于社会行动,而是解决于他头脑中的辩证的旋转运动。由于在他看来范畴是动力,所以要改变范畴,是不必改变现实生活的。完全相反。范畴必须改变,而结果就会是现存社会的改变。

蒲鲁东先生一心想调和矛盾,因而完全避开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必须把这些矛盾的基础本身推翻呢?他完全像一个空论的政治家,想把国王、众议院、贵族院一并当作社会生活的构成部分,当作永恒的范畴。他只是寻求一个新公式,以便把这些力量平衡起来,而这些力量的平衡正是建立在现代运动的基础上,在这个运动中,各个力量时而取胜时而失败。

马克思:《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1846 年 12 月 28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47—449 页。

……把国家对自由竞争的每一种干涉——保护关税、同业公会、烟草垄断、个别工业部门的国有化、海外贸易公司、皇家陶瓷厂——都叫作"社会主义",纯粹是曼彻斯特的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胡说。

……把国家对自由竞争的每一种干涉——保护关税、同业公会、烟草垄断、个别工业部门的国有化、海外贸易公司、皇家陶瓷厂——都叫作"社会主义",纯粹是曼彻斯特的资产阶

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胡说。对这种胡说我们应当**批判**，而不应当**相信**。如果我们相信它，并且根据它建立起一套理论，那么，只要提出下面的简单论据就会使这套理论连同它的前提一起破产，这种论据就是：此类所谓的社会主义一方面不过是封建的反动，另一方面不过是榨取金钱的借口，而它的间接目的则是使尽可能多的无产者变成依赖国家的公务员和领养老金者，同时，除了一支有纪律的士兵和公务员大军以外，再组织一支类似的工人大军。在国家长官，而不是在工厂监工的监视下举行强制性的选举——好一个美妙的社会主义！但是，如果相信资产阶级这一套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而只是假装相信的说法，那就会得出结论：国家等于社会主义……

恩格斯：《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1年3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4—645页。

李斯特先生的理论的特点以及整个德国资产阶级的特点是：他们为了维护他们的剥削愿望而不得不到处求助于“社会主义的”词句，从而全力维护早已遭到驳斥的骗局。

既然资产阶级的整个愿望实质上在于使工厂制度达到“英国的”繁荣程度，使工业主义成为社会的调节者，即引起社会的解体，所以资产者不得不表明，他关心的仅仅是一切社会生产的和谐，是社会的组织。他通过保护关税限制对外贸易，他断言农业通过工厂工业将迅速达到它的高度繁荣。因此，社会组织总括起来就是工厂。工厂是社会的组织者。工厂所造成的竞争制度是最好的社会联合。工厂制度所创造的

社会组织是**真正的社会组织**。

当然,资产阶级有理由把它的利益一般地设想为同一的利益,正像**狼**作为**狼**同它的狼伙伴有同一的(同样的)利益一样,而不管一只狼即不是其他狼在猛抓猎物时的利益有多么大。

最后,李斯特先生的理论的特点以及整个德国资产阶级的特点是:他们为了维护他们的剥削愿望而不得不到处求助于"社会主义的"词句,从而全力维护早已遭到驳斥的骗局。我们将在各个相应的地方指出,李斯特先生的词句,如果从中作出结论的话,还是**共产主义的**呢!当然,我们决不是指责有那么一个李斯特先生和他的德国资产阶级玩弄共产主义,然而这种共产主义向我们提供了关于"善良的"、"唯心主义的"资产者内心虚弱、欺蒙诈骗和无耻伪善的新证明。它向我们证明,这种唯心主义实际上不过是某种可厌的唯物主义的无耻的、无思想的伪装而已。

马克思:《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5 年 3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51 页。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对立面,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本身的著作中,特别是在李嘉图的著作中找到自己的理论前提的……

看来,只有美国人凯里和法国人巴师夏的著作是一个例外,巴师夏承认他是以凯里为依据的。他们两人都懂得,[资

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对立面,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本身的著作中,特别是在李嘉图的著作中找到自己的理论前提的,而后者应被看作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完备的和最后的表现。因此,他们两人都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在现代经济学中历史地取得的理论表现,必须当作谬误来加以抨击,并且必须在古典经济学家朴素地描绘生产关系的对抗的地方,证明生产关系是和谐的。他们两人从事写作的民族环境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但却驱使他们产生了同样的意向。

马克思:《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1857 年 7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 页。

在本国内瓦解了这种基本和谐的英国,通过竞争在世界市场上到处都破坏这种基本和谐,所以它是普遍和谐的破坏因素。

经济规律的和谐在整个世界上表现为不和谐,使凯里感到惊讶的是,这种不和谐甚至在美国也开始出现。这种奇特的现象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凯里用竭力追求工业垄断的英国对世界市场的破坏作用来解释。起初,英国的关系在国内被经济学家们的错误理论搞乱了。现在,作为世界市场的统治力量的英国在国外搞乱了世界各国经济关系的和谐。这种不和谐是真实的,而不只是以经济学家们的主观理解为根据。

凯里眼中的英国的经济状况,同乌尔卡尔特眼中的俄国的政治状况是一样的。凯里认为,经济关系的和谐是建立在

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和谐合作上的。在本国内瓦解了这种基本和谐的英国,通过竞争在世界市场上到处都破坏这种基本和谐,所以它是普遍和谐的破坏因素。能够防御这一点的,只有保护关税,这是抵制英国大工业破坏力量的国家强力的屏障。于是,国家成了"经济和谐"的最后避难所,而它最初被斥之为这些和谐的唯一的破坏者。

……

在巴师夏那里,这一切都不存在。这些关系的和谐是一种彼岸性,这种彼岸性正好从法国疆界的尽头开始,存在于英国和美国。这只是非法国的即英国和美国的关系的想象的、理想的形式,而不是像他在他自己的国土上所看到的那种现实的形式。因此,如果说在他那里和谐决不是来自丰富的生动的直观,而相反地是从贫乏的、紧张的、对立的反思中产生的夸张的产物,那么,在他那里唯一现实的要素就是要求法国放弃它的经济上的疆界。

……

凯里的普遍性是美国人的普遍性。对他来说,法国和中国是同样近的。他总是表现为居住在太平洋和大西洋沿岸的人。巴师夏的普遍性是无视一切国家。作为真正的美国人,凯里从四面八方收集旧大陆给他提供的大量材料,但不是为了去认识这些材料的内在精神,从而承认这些材料特有的生存权利,而是把它们作为死的例子,作为毫无差别的材料来进行加工,用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用来证实他从美国人的立场出发抽象出来的论点。所以他漫游世界,占有大量未加批判的统计材料,像图书目录似的博学多识。相反,巴师夏提供的

是虚构的历史，他提供的抽象有时采取理性的形式，有时采取假想事变的形式，不过，这些事变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过，就像神学家那样，把罪恶有时看作人的本质的规律，有时看作原罪的历史。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57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1页。

被塞进现存关系中的、安慰其中一方去容忍另一方的这种陈腐思想，被巴师夏先生从现存关系中搬出来，并说成是产生这一关系的历史基础。

当一切经济学家谈论资本和雇佣劳动、利润和工资的现存关系，并向工人证明，工人无权分享取得利润的机会的时候，当他们想劝慰工人安于对资本家的从属地位的时候，他们向工人指出，工人与资本家相反，工人取得收入的某种固定性，这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并不为资本的巨大冒险行为所左右。这完全像唐·吉诃德安慰桑乔·潘萨那样：虽然老是挨揍，并不需要勇敢。可见，经济学家们在同利润相对立的意义上赋予雇佣劳动制度的那个规定，在巴师夏那里变成同过去的劳动形式相对立的意义上的雇佣劳动制度的规定，被看作比这些过去关系下的劳动报酬前进了一步。被塞进现存关系中的、安慰其中一方去容忍另一方的这种陈腐思想，被巴师夏先生从现存关系中搬出来，并说成是产生这一关系的历史基础。

经济学家们说，在工资和利润、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

中,固定性的优点属于工资。

巴师夏先生说,固定性,即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方面,是产生雇佣劳动制度的历史基础(或者说,属于不是同利润相对立意义上的工资,而是同劳动报酬的过去形式相对立意义上的工资),因此也是产生利润,产生整个关系的历史基础。

这样,在他那里,关于工资和利润的关系的一个方面的这种陈腐思想就悄悄地变为整个这种关系的历史基础。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他一直在为这样一种社会主义而冥思苦想,这种社会主义往后到处都被他梦想为联合体的最初形式。这个例子表明,在经济学家们的论述中只是占次要地位的那些辩护性的陈腐思想,在巴师夏那里具有多么重要的形式。

马克思:《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1857 年 7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5—16 页。

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资本与一般的生产工具的差别)。

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例如,没有生产工具,哪怕这种生产工具不过是手,任何生产都不可能。没有过去的、积累的劳动,哪怕这种劳动不过是由于反复操作而积聚在野蛮人手上的技巧,任何生产都不可能。资本,别的不说,也是生产

工具,也是过去的、客体化了的劳动。可见资本是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这样说是因为恰好抛开了正是使"生产工具"、"积累的劳动"成为资本的那个特殊。因此,生产关系的全部历史,例如在凯里看来,是历代政府的恶意篡改。

马克思:《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1857 年 8 月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6—27 页。

他们(经济学家)所要说的是,生产不同于分配等等,应当被描写成局限在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于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

相反,他们所要说的是,生产不同于分配等等(参看穆勒的著作),应当被描写成局限在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于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这是整套手法的多少有意识的目的。在分配上,他们则相反地认为,人们事实上可以随心所欲。即使根本不谈生产和分配的这种粗暴割裂以及生产和分配的现实关系,总应该从一开始就清楚地看到:无论在不同社会阶段上分配方式如何不同,总是可以像在生产中那样提出一些共同的规定来,可以把一切历史差别混合或融化在**一般人类**规律之中。

马克思:《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1857 年 8 月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8 页。

如果在考察生产时把包含在其中的这种分配撇开，生产显然是一个空洞的抽象；相反，有了这种本来构成生产的一个要素的分配，产品的分配自然也就确定了。

照最浅薄的理解，分配表现为产品的分配，因此它离开生产很远，似乎对生产是独立的。但是，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如果在考察生产时把包含在其中的这种分配撇开，生产显然是一个空洞的抽象；相反，有了这种本来构成生产的一个要素的分配，产品的分配自然也就确定了。正因为如此，力求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来理解现代生产并且主要是研究生产的经济学家李嘉图，不是把生产而是把分配说成现代经济学的本题。从这里，又一次显出了那些把生产当作永恒真理来论述而把历史限制在分配范围之内的经济学家是多么荒诞无稽。

马克思：《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1857 年 8 月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7—38 页。

他(巴师夏)断言雇佣劳动制度是一种不重要的、纯粹外表的形式，是一种联合形式，这种联合形式本身同劳动和资本的经济关系无关。

巴师夏先生表现了非凡的智慧，他断言雇佣劳动制度是一种非本质的、纯粹外表的形式，是一种联合体形式，这种联

合体形式**本身**同劳动和资本的经济关系无关。他说，如果工人很富裕，能维持到产品完成和出售的时候，那么，雇佣劳动制度就不会妨碍工人即雇佣劳动去同资本家订立那种像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订立的同样有利的合同。因此，坏处并不在于雇佣劳动制度的形式，而在于不以雇佣劳动制度为转移的各种条件。巴师夏先生自然没有想到，这些条件本身就是**雇佣劳动制度的条件**。如果工人同时又是资本家，那么，他们事实上就不是作为劳动的工人，而是作为劳动的资本家——也就是不以雇佣工人的形式——来和不劳动的资本发生关系。因此，对巴师夏先生来说，正如**利润**和**利息**是同一个东西一样，工资和利润**本质上**也是同一个东西。他把这称作**经济关系的和谐**：各经济关系只是**表面上**存在，而在本质上其实只有一种关系，即简单交换的关系。因此，在巴师夏先生看来，**本质的**形式本身是**无内容的**，也就是非现实的形式。

马克思：《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1857 年底—1858 年 5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83—284 页。

……工人就和资本家分享劳动产品了，这种说法是极其荒谬的资产阶级滥调。

固定资本在它作为生产资料（机器体系是生产资料的最适合的形式）的规定中，只是从两方面生产价值，即增加产品的价值：（1）由于固定资本具有**价值**，就是说，它本身就是劳动产品，是对象化形式上的一定的劳动量；（2）由于固定资本通过提高劳动的生产力，使劳动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创造出更

大量的维持活劳动能力所必需的产品，从而提高剩余劳动对必要劳动的比例。可见，说什么由于资本家利用固定资本（况且，固定资本本身就是劳动的产品，并且不过是被资本占有的**他人劳动**的产品）使工人的劳动减轻了（相反，资本家利用机器使工人的劳动失去了一切独立性和吸引力），或者使工人劳动的时间缩短了，所以工人就和资本家分享劳动产品了，这种说法是极其荒谬的资产阶级滥调。

马克思：《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1857 年底—1858 年 5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96 页。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永恒的，而这种生产关系的分配形式则是历史的……

利润像工资一样，表现为**分配形式**。但是，因为资本只有通过利润再转化为资本，再转化为追加资本，才能增长，所以利润也是**资本的生产形式**；这和下面这种情况完全一样：从资本的观点看来，工资是单纯的**生产关系**，而从工人的观点看来，却是分配关系。

这里表明，分配关系本身是由生产关系产生的，并且是从另一个角度表现的生产关系本身。其次还表明，生产同消费的关系是由生产本身造成的。所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有一种荒谬的观点，例如约·斯·穆勒也是这样，他认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永恒的，而这种生产关系的分配形式则是历史的，这种荒谬观点表明，穆勒既不懂前者，也不懂后者。

……

因此,不能用简单的交换关系来说明收入。在交换中得到的价值所具有的代表资本或收入的质,是由处于简单交换之外的关系决定的。因此,像和谐的自由贸易派所做的那样,把这些比较复杂的形式化为简单的交换关系,是荒谬的。如果从简单交换的观点出发,并且把积累看作单纯货币(交换价值)的积累,那么,资本的利润和收入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1857 年底—1858 年 5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60 页。

经济学家从来不可能把剩余价值同他们自己提出的等价交换规律一致起来。

尽管这个过程这样简单,但到目前为止还是不能被人理解。经济学家从来不可能把剩余价值同他们自己提出的等价交换规律一致起来。社会主义者总是停留在这个矛盾上,反复谈论这个矛盾,但他们不理解劳动能力这种商品的特殊性质,不理解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就是创造交换价值的活动。

总之,通过这个过程,通过货币与劳动能力相交换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劳动能力的消费,货币转化为**资本**。经济学家把这叫作**货币向生产资本的转化**。他们在这里一方面是指资本还有其他形式,在资本的其他形式中,这个基本过程虽然作为前提而存在,但已经在形式中消失了。另一方面,他们是指,只要劳动能力作为商品同货币相对立,货币就是向资本的这种转化的**可能性**,也就是**潜在的**资本,虽然货币只有通过这种

过程本身才能转化为现实资本。但是,根据可能性来看,货币可以转化为资本。

马克思:《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1861 年 8 月—1862 年 3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99 页。

资本的辩护士为了把资本说成是生产的永恒因素,说成是与一切社会形式无关、为任何劳动过程因而也就是为一般劳动过程所固有的关系,便把资本同资本借以存在的使用价值混为一谈;同样,经济学家先生们为了回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某些现象,宁愿忘记资本的本质的东西……

资本的辩护士为了把资本说成是生产的永恒因素,说成是与一切社会形式无关、为任何劳动过程因而也就是为一般劳动过程所固有的关系,便把资本同资本借以存在的使用价值混为一谈;同样,经济学家先生们为了回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某些现象,宁愿忘记资本的本质的东西,即资本是把自身设定为价值的价值,因而资本不仅是自我保持的价值,而且同时是自我增加的价值。例如,他们忘记这一点是为了说明生产过剩是不可能的。在这里,资本家被看成这样一种人,他只关心一定产品(他靠出卖他的商品来占有这些产品)的消费,而不关心预先存在的价值、购买力本身、抽象财富本身的增加。

马克思:《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1861 年 8 月—1862 年 3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10—111 页。

他们(经济学家)把生产关系看作是自然的、永恒的规律;而把分配关系看作是人为的、历史上产生的和受人类社会控制等等的关系。

在这里,工资——因为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在我们面前表现为一种**生产形式**;正如我们把**剩余价值**和它的创造列入作为生产关系的**资本**的概念中一样。其次,才应当表明,这些生产关系是怎样同时又表现为分配关系的(有可能时,也应当更详细地分析把劳动能力理解为工人的资本这种谬论)。这样做之所以必要,部分地也是为了要指出,把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看作不是同类的关系,这是荒谬的。例如,约·斯·穆勒和其他许多经济学家就是这样,他们把生产关系看作是自然的、永恒的规律;而把分配关系看作是人为的、历史上产生的和受人类社会控制等等的关系。另一方面,例如,把剩余价值说成是收入(因而是收入的范畴),这是一种把问题简单化的公式,例如,在考察资本积累时就是这样。

马克思:《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1861 年 8 月—1862 年 3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81—182 页。

实际上不得不把包含在产品中的剩余价值解释为某种看不见的、神秘的属性,不得不从不变资本中引出剩余价值。由于有这种表现,就造成了雇佣劳动与徭役劳动之间的差别,在工人中产生了幻想。

在**工资**[或者:**劳动的报酬**]这个词中已经包含着这个说

法，由这个词可以得出结论：劳动的报酬等于劳动的价格，等于劳动的价值。但是，这个没有概念的形式在工人以及资本家的意识中都存在（因为它是在现实中直接表现的形式），因此，它是庸俗政治经济学顽固地坚持的形式，庸俗政治经济学以为，政治经济学科学与其他一切科学的特征差别在于，后者力图说明被掩盖在日常现象后面的，因而按其形式总是与日常现象（例如，太阳围绕地球运动的现象）相矛盾的本质，而前者则宣称日常现象单纯转化为同样日常的观念是科学的真正事业。**劳动力的价值**以这种歪曲的和派生的形式呈现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表面，获得了自己的日常表现（自己的公开的形式），即劳动的**价值**或以货币表现的劳动的**价格**，在这种歪曲的和派生的形式中，**有酬**劳动与**无酬**劳动之间的差别完全消失了，因为工资就是**工作日**的报酬和它的等价物——实际上是它的产品的等价物。因此，实际上不得不把包含在产品中的剩余价值解释为某种看不见的、神秘的属性，不得不从不变资本中引出剩余价值。由于有这种表现，就造成了雇佣劳动与徭役劳动之间的差别，**在工人中**产生了**幻想**。

马克思：《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1861 年 8 月—1863 年 7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631—632 页。

这些辩护的企图证明他们（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用心不良，并证明他们没有能力把独特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同资本的社会自身所宣扬的所有权的一般规律调和起来。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把资本看作永恒的和自然的生产形式，然后又竭力为自己对资本的这种看法辩护，把资本生成的条件（而且是幻想的条件）说成是资本现在实现的条件，换句话说，把资本家还是作为非资本家——因为他还只是正在变为资本家——用来进行占有的要素，说成是资本家已经作为资本家用来进行占有的条件。

〔自然的生产规律！当然，这里是指资产阶级生产的自然规律，即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生产所遵循的规律。如果没有这些规律，资产阶级生产体系就是根本不可思议的。当然，这里指的是表现这一定生产方式的性质，从而也就是它的自然规律的问题。但是，正像这种生产方式本身是历史的一样，它的性质和这种性质的规律也是历史的。亚细亚的，或古代的，或封建的生产方式的自然规律是实质上不同的规律。另一方面，毫无疑问，一切形式的人类生产都具有某些不变的规律或关系。这种共同之处很简单，可以概括为很少几个共同点。〕

这些辩护的企图证明他们用心不良，并证明他们没有能力把独特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同资本的社会自身所宣扬的所有权的一般规律调和起来。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方法表明必然包含着历史考察之点，或者说，表明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包含着超越自己的、对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加以说明之点。因此，要揭示资产阶级经济的规律，无须描述生产关系的真实历史。但是，对这些生产关系正确地加以考察和推断，总是会得出这样一些原始的方程式，这些方程式会说明这个制度之前的过去。一方面，如果

说资产阶级前的阶段表现为仅仅是历史的，即已经被扬弃的前提，那么，现代的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从而把自身设定为未来社会的历史前提的那些条件。

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3—164页。

由于这种被歪曲的关系（资本和劳动的歪曲关系），必然在生产过程本身中产生出相应的被歪曲的观念，颠倒了的意识，而这些东西由于流通过程本身的变形和变态而完成了。

我们在考察资本生产过程时已经看到，在这种关系的性质中包含着如下的内容：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转移到资本身上的生产力；实际上以资本家的形态而存在的过去劳动和价值的独立化和人格化，构成资本实质的过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反过来，工人就其作为对象存在而言向单纯的物质劳动能力，向商品，向资本生产性的转化——所有这一切，都不表现为社会生产关系的结果，而是相反，社会生产关系倒表现为作为生产过程各特殊要素的上述诸对象和劳动之间的物质关系的结果。在资本的关系中——即使撇开资本的流通过程来考察这种关系——具有本质特征的是神秘化，是被歪曲的世界即主客体的颠倒，就像在货币上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由于这种被歪曲的关系，必然在生产过程本身中产生出相应的被歪曲的观念，颠倒了的意识，而这些东西由于流通过程本身的变形和变态而完成了。然而资本家作为资本家，无非是

资本本身的这种运动。他在现实中是怎样的,他在意识中也是怎样的。因为他体现着关系的肯定的统治的一方,所以这些矛盾并不使他不安,相反,只有处在这些矛盾中间,他才感到很美好,而受这同一种被歪曲了的观念束缚的雇佣工人,则只是处在这种关系的另一极上,是被压迫的一方,实践迫使他反对所有这种关系,从而反对与这种关系相适应的观念、概念和思维方式。

马克思:《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1861 年 8 月—1862 年 3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13—414 页。

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历史权利。正因为如此,资本无意之中为一个更高的生产方式创造物质条件。

这种[利润率下降的]单纯可能性使李嘉图(同样使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学派)忧虑不安,这恰恰证明李嘉图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有着深刻的理解。李嘉图被谴责为对"人"漠不关心,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时只看到生产力的发展,而不管这种发展以怎样的牺牲为代价,——他不顾及分配,从而不顾及消费,——这恰恰是李嘉图最有意义之处。**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历史**权利。正因为如此,资本无意之中为一个更高的生产方式创造物质条件。这里李嘉图所不安的是,利润——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力和积累的条件以及积累的动力——受到生产的发展规律本身的危害。而数量关系在这里就是一切。

在这里他只是预感到的东西事实上有其深刻的原因。这里以**纯经济的**方式，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出发，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表明了它的**相对性**，即它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历史的并与一定的物质生产条件的有限发展时代相适应的**生产方式**。

马克思：《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1861 年 8 月—1862 年 3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62 页。

这种买卖关系的不断更新仅仅以特殊依赖关系的经常存在为媒介，同时又使这种依赖关系的经常存在具有一种虚伪的假象，似乎它是平等的、彼此同样自由的各个商品所有者之间的交易和契约。现在，这种引导的关系本身又表现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发生的物化劳动对活劳动进行统治的内在要素。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仅是价值或商品**转化为资本**，资本家把这种商品的一部分拿到市场上去，一部分保留在自己的劳动过程中；而且这些**已转化**为资本的产品不是**资本家的**产品，而是工人的产品。资本家为了取得劳动而不断地把工人的产品的一部分——必要生活资料——卖给工人，以保存和增加劳动能力即**买者**本人，并且不断地把工人的产品的另一部分即客观的劳动条件，作为资本自行增殖的手段，作为**资本**贷给工人。所以，在工人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进行再生产时，资本家也把工人作为**雇佣工人**，从而作为自身劳动的卖者进行再生产。单纯的商品卖者的关系包括：这些商品的卖者

交换他们自身的、体现在不同使用价值中的劳动。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经常结果，劳动能力的买和卖包括：工人必须不断地用自己的活劳动买回自己本身的产品的一部分。这样，商品所有者的单纯关系的假象就消失了。劳动能力的这种不断的买卖，以及工人本身所生产的商品作为工人劳动能力的买者和作为不变资本这两者间的不断对立，仅仅表现为一种媒介形式，使工人受资本支配，使活劳动成为保存和增加与自己相独立的物化劳动的单纯手段。作为劳动购买者的资本和作为劳动售卖者的工人之间的关系的这种永久化，是这种生产方式内在的一种媒介形式；但这种形式仅仅在形式上与生产条件所有者奴役劳动、占有劳动的其他更直接的形式有所区别。这种形式作为单纯的货币关系掩盖了现实的交易和通过买卖这种媒介而不断更新的经常依赖性。不仅这种交易的条件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而且连一方用来买和另一方必须卖的东西，也是过程的结果。这种买卖关系的不断更新仅仅以特殊依赖关系的经常存在为媒介，同时又使这种依赖关系的经常存在具有一种虚伪的假象，似乎它是平等的、彼此同样自由的各个商品所有者之间的交易和契约。现在，这种引导的关系本身又表现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发生的物化劳动对活劳动进行统治的内在要素。

因此，人们产生了错误的看法：

有些人错误地把雇佣劳动，把劳动向资本的出售，从而把雇佣劳动的形式看作是外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东西；这种形式是本质的、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不断重新生产出来的这种生产关系的媒介形式；

还有些人错误地把这种表面关系，把这种质的形式化，把资本关系的假象看作是资本关系的本质本身，因而试图把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说成是商品所有者之间的一般关系，以此为这种关系辩护并抹杀这种关系的特征。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册第六章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1863 年 7 月—1864 年 6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9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24—126 页。

把资本主义积累混同为并且用术语来说即转化为一种完全同资本主义积累相对立、相排斥的过程，而与这一过程相适应的那种生产方式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在其废墟上得以建立起来的生产方式。这是政治经济学极力维护的幻想之一。

历史等等的条件会与直接生产者群众被剥夺的相对程度的大小相适应，对生产资料积聚的相对规模发生不同的影响，由于这种历史等等的条件，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发展阶段是极其不同的。但是，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恰恰同直接生产者本身的“积蓄”和“积累”成反比，这种直接生产者在法国比在英国多得多。生产者的剩余劳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积蓄”、“积攒”、“积累”和集合为大笔数目，也就是说，被集中，被用作资本，这种剩余劳动也就在同样大的程度上由生产者的雇主而不是由生产者本人积累起来等等；因此，相当大部分的实际生产者也就在同样大的程度上被剥夺掉“积蓄”、“积攒”、“积累”的可能性和条件，总之，被剥夺掉在一定程度上占有自己剩余劳动的任何可能性（因为他

们在不同程度上**被剥夺了**自己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的积累和积聚,是依靠于和适应于**大量占有他人剩余劳动**的能力,以及这些人本身对自身剩余劳动提出任何要求的相应的不可能性。因此,用下述办法来解释并说明资本主义积累是最可笑的幻想、谬误或欺骗,这种办法就是:把资本主义积累混同为并且用术语来说即转化为一种完全同资本主义积累相对立、相排斥的过程,而与这一过程相适应的那种生产方式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在其废墟上得以建立起来的生产方式。这是政治经济学极力维护的幻想之一。在这种资产阶级社会里,确实会有这样的情况,即只要一个工人绝顶聪明,善于投机钻营,天生具有资产阶级的本能,而运气又非常好,那他自己就能变成**他人劳动的剥削者**。但是,在没有劳动可供剥削的地方,既不会有资本家,也不会有资本主义生产。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册第六章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1863 年 7 月—1864 年 6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9 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35—136 页。

如果说亚·斯密是向大工业过渡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经济学家,因而他主要是从中等资产者的角度来看积累,那么,李嘉图是大工业的经济学家,他是从大资产者的角度来看事物。

如果说亚·斯密是向大工业过渡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经济学家,因而他主要是从中等资产者的角度来看积累,那么,李嘉图是**大工业的经济学家**,他是从大资产者的角度来看事

物。为生产而生产,再生产最大可能地增长,特别是劳动生产力的增长,是最终的和决定性的目的。但是,李嘉图认为,为了这个目的没有必要宣传节约。既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他来说是自然的和绝对的社会生产方式,而消费是任何生产的自然目的,那么,生产的自由发展必然包括一切形式的消费的发展,因此同资本一样,分为奢侈品的消费和其他产品的消费,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决定的,也就是说,是由利润率在不同资本之间的平均化决定的。李嘉图不再同意亚·斯密的下述偏见:对劳动的需求会随着积累的增长而增长,因而工资,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会相应地得到改善。相反他指出,如果随着积累和伴随着积累的大工业的发展,对劳动的需求绝对增长,那么相对来说这种需求减少,而且会形成经常的过剩人口。(一些人成为多余的。)生产的工人阶级在这里只是作为机器而存在,这种机器为劳动条件的所有者(即为资本家和地主的私人需要)和为国家的集体需要(即为国家所能支配的**国民财富**)而生产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斯密认为财富就是最大可能的生产工人人数,李嘉图则相反,他认为,与同一剩余产品和靠这个剩余产品为生的另一部分人口相比的尽可能少的生产人口,这只是劳动生产力得到最大限度发展的证明。说到奢侈品的消费,他甚至证明,对工人来说,地主消费这些奢侈品比资本家消费这些奢侈品更为有利,因为这些商品的消费会推动大量的工人,因为地主消费这些商品需要更多的食客、仆役等等,而头脑清醒的资本家却宁愿获得永久性的奢侈品。因此,地主通过自己的需求也会在劳动市场上产生有利于非生产工人的影响,地主通过自己的消

费会比资本家更多地提高对劳动的需求。亚·斯密曾担心，数量大到不能容许地步的一部分生产工人会转化为非生产工人，这种担心对李嘉图来说已不存在，他知道，大工业会不断地创造出过剩人口，因此，他始终面临着充斥的劳动市场。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186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21—522页。

西斯蒙第感觉到大工业的矛盾，坚决反对为生产而生产，反对生产力在这样一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绝对发展，在这种生产方式中，现有资本的价值增殖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是最终目的。

西斯蒙第感觉到大工业的矛盾，坚决反对为生产而生产，反对生产力在这样一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绝对发展，在这种生产方式中，现有资本的价值增殖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是最终目的。因此，他希望使一定条件下的一定消费成为生产的调节者。因此，他特别关心资本（从而生产消费）和收入的比例；虽然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经济学上多少有些意义的发现。但是，收入同资本的交换以及收入同收入的交换，从而再生产的整个均衡性，经常由于剩余产品过多地再转化为资本而遭到破坏，这种再转化就是有积聚相伴随的积累，不断扩大机器和固定资本的使用，结果也就是工人阶级状况不断恶化。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186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23页。

古典政治经济学把生产过程的过渡性的历史形式说成是永恒的自然形式时，它是在进行欺骗。

重商主义体系在其公式 G—G′中清楚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这种特点，而古典政治经济学在重商主义体系面前进行启蒙式的自夸时却忘记了这一特点，忘记了**创造价值的价值**，即价值作为资本的性质。因此，它装腔作势地喜欢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看作简单劳动过程，而不是看作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动因不是使用价值，而是致富本身，也就是说，不是单纯形成剩余价值，而是形成规模不断扩大的剩余价值，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标准形式不是简单再生产的公式，而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公式，或者说，是同时作为积累过程的生产过程的那种生产过程的公式，即 P—W′—G′—W′—P′这一形式。这是**为生产而生产**的公式，是生产资本为了创造具有更高的**自行增殖能力的生产资本**而执行职能的公式。反映着生产过程对人实行专制的这一公式，统治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优秀人物所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统治着**李嘉图**。这个公式得到历史的证实。因为资本主义时期的历史任务，就是对人和物来说无情地保证生产过程的物质因素和社会结合达到成熟地步，直到生产过程能够被置于人的有计划的社会监督之下并服从于人的统治。但是，当古典政治经济学把生产过程的过渡性的历史形式说成是永恒的自然形式时，它是在进行欺骗。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1868 年底—1870 年中），《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 50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6—47 页。

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在能够利用旧的官僚的、行政集中的国家机构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之前，必须把它加以改造。

至于您以前对《宣言》序言[①]中引用《法兰西内战》一书的一个地方所提出的询问，您大概会同意原书中所给予的答复（《内战》第 19 页及以下各页）。如果您那里没有这本书，我可以寄一本给您。这仅仅是为了指明下列事实：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在能够利用旧的官僚的、行政集中的国家机构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之前，必须把它加以改造；然而，**所有**资产阶级共和派从 1848 年以来，在他们处于反对派地位的时候，一直都在抨击这一机器；但是一当他们取得了政权，他们就不加改变地把它接受过来，部分地利用它来反对反动派，但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用来反对无产阶级。在《内战》一书中，把公社的**不自觉的**倾向当作多少有些自觉的计划而归功于它，这在当时的情况下证明是正确的，甚至是必要的。俄国人做得很对，他们已经把《内战》一书中的这个地方载入自己的《宣言》译本的附录。如果当时发行部不那样紧催，我们也会这样做并再做些别的。

恩格斯：《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4 年 1 月 1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81 页。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72 年德文版序言》。——编者注

任何一个社会分化成各种政党的现象，都是在震动全国的深刻危机发生时表现得最为明显。

一个国家的政治自由愈多，它的代表机构愈健全、愈民主化，人民群众就愈容易弄清党派斗争，愈便于学习政治，即愈便于揭穿骗局和查明真相。

任何一个社会分化成各种政党的现象，都是在震动全国的深刻危机发生时表现得最为明显。那时政府不得不在社会各阶级中寻找支柱；严重的斗争会把各种空话以及一切微不足道、无关大局的东西一扫而光；各政党会竭尽全力向人民群众表白，而受可靠的本能支配并具有公开斗争经验的群众，则会跟着代表这个或那个阶级利益的政党走。

这种危机时期总是决定着一国的社会力量在几年甚至几十年间党派的组合。例如在德国，这种危机是 1866 年和 1870 年的战争；在俄国，这种危机是 1905 年的事变。不回顾一下这一年的事变，就不能理解我国各政党的实质，就不能认清俄国各政党代表的是哪些阶级。

列宁：《论俄国各政党》（1911 年 5 月 10 日〔23 日〕），《列宁全集》第 21 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83 页。

（三）思想统治的策略

资产阶级就为建立在道德原则基础上的选举而斗争，并且强迫议会通过根据这种精神制定的法律，使其中每一项法律都成为抵御土地贵族的地方势力的保障。

从工商业中间阶级即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官方的政党在辉格党和托利党旁边出现的时候起，特别是从1831年通过改革法案后，各个阶级和政党彼此间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资产者对耗费颇大的竞选手腕，对大选的这些**不必要的开支**丝毫不感到兴趣。他们认为，同土地贵族竞争，利用一般的道德手段要比个人出钱来得便宜。另一方面，他们意识到他们代表着普遍的在现代社会中占主要地位的利益，因此他们能够要求选民本着全民的利益、而不按个人或地方的动机行事；他们越是坚持上述要求，后一种影响选民的手段就越是（由于选民的成分本身）主要地成为土地贵族的武器，而不为中间阶级所使用。因此，资产阶级就为建立在道德原则基础上的选举而斗争，并且强迫议会通过根据这种精神制定的法律，使其中每一项法律都成为抵御土地贵族的地方势力的保障。

马克思：《选举中的舞弊》（1852年8月14日—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6页。

革命打破了资产阶级的思想错觉，反革命打消了他们的政治要求。

Landjunker〔容克地主们〕本来寄厚望于《政治周刊》的戴王冠的撰稿人（《政治周刊》当时天天鼓吹必须给普鲁士那种借助教书先生、军曹、警察、税吏和饱学官僚来实行的平凡无奇的政治制度中加进富有诗意的贵族统治），但是只得满足于国王的暗中同情，而得不到他的实际让步。资产阶级还太软弱，不敢进行积极的活动，只得跟随在黑格尔门徒所领导的

向旧世界的宗教、思想、政治开火的理论家大军后面。在以前任何时期,哲学批判都没有像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位的头八年中那样大胆、有力和盛行;威廉四世想用中世纪神秘主义代替弗里德里希二世搬运到普鲁士来的"肤浅的"唯理论。这一时期的哲学之所以强大有力,完全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实际上的软弱;他们既然不能在实际生活中向过时的制度进攻,就必须让那些在思想领域进攻这种制度的大胆的理想主义者占先……

……革命所争得的一切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宪制代议权——虽然保留下来了,但只是作为贵族阶级的特权保留下来。另一方面,如果说在过去的时期资产阶级扶植了哲学运动,那么现在贵族已把它连根铲除而代之以虔诚主义。凡是开明的教授都被赶出大学校门;viri obscuri〔蒙昧主义者〕、亨格施坦堡、施塔尔 tutti quanti〔之流〕掌握了普鲁士所有的教育机构,从乡村小学校起直到柏林的高级师范学院为止。警察和行政机构不是被摧毁了,而是变成了统治阶级的简单工具。连工业自由也遭到攻击;由于专利权制度变成了一种庇护、恫吓、贿赂的强有力的手段,所以大城市的手工业者又被重新赶进行帮、行会以及其他各式各样属于过去时代的陈旧形式之中。这样,国王在他专制统治的头八年里梦寐以求而不得实现的那些最大胆的幻想,由于革命而全部实现了,并且在 1850—1857 年这八年期间,这些都是明明白白的、可以感觉得出的现实。

但是事情还有另外的一面。革命打破了资产阶级的思想错觉,反革命打消了他们的政治要求。这样,资产阶级就被赶

回去干他们唯一在行的事情——商业和工业，而且我认为，在最近10年当中，相对地说，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民在这方面都没有获得德国人特别是普鲁士人那样巨大的进步。

马克思：《普鲁士状况》（1859年1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27—729页。

法国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就迫使它一方面要根本破坏一切议会权力、包括它自己的议会权力的存在条件，另一方面则使得与它相敌对的行政权成为不可克制的权力。

在法国这样的国家里，行政权支配着由50多万人组成的官吏大军，也就是经常和绝对控制着大量的利益和生存；在这里，国家管制、控制、指挥、监视和监护着市民社会——从它那些最广大的生活表现起，直到最微不足道的行动止，从它的最一般的生存形式起，直到个人的私生活止；在这里，这个寄生机体由于非常的中央集权而无处不在，无所不知，并且极其敏捷、极其灵活，同时现实的社会机体却又是极无自动性、极其软弱、极不固定；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十分明显，国民议会如果不同时简化国家管理，不尽可能缩减官吏大军，最后，如果不让市民社会和舆论界创立本身的、不依靠政府权力的机关，那么它一旦失掉分配阁员位置的权限，也就失掉任何实际影响了。但是，法国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恰恰是和保持这个庞大而分布很广的国家机器最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它在这里安插自己的多余的人口，并且以国家薪俸形式来补充它用利润、利息、地租和酬金形式所不能获得的东西。另一方面，资产阶

级的政治利益又迫使它每天都要加强压制，即每天都要增加国家政权的经费和人员，同时又不断地进行反对社会舆论的战争，并由于猜疑而去摧残和麻痹独立的社会运动机关，如果不能把它们根本割掉的话。这样，法国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就迫使它一方面要根本破坏一切议会权力、包括它自己的议会权力的存在条件，另一方面则使得与它相敌对的行政权成为不可克制的权力。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中—1852年3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3—624页。

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处在自由竞争的无限的统治之下，总共只留下一个必需的最低限度的行政管理，以便在对内对外政策上保障资产阶级的共同阶级利益并管理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而就连这个最低限度的行政管理也必须组织得尽可能合理而经济。

可以看出，这些不列颠资产阶级的先进战士即曼彻斯特学派的信徒们认为，旧英国的每一种制度都是既昂贵又无用的机器，它的唯一的作用就是阻碍国家以最低的生产费用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和自由地交换自己的产品。他们最终的要求必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处在自由竞争的无限的统治之下，总共只留下一个必需的最低限度的行政管理，以便在对内对外政策上保障资产阶级的共同阶级利益并管理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而且就连这个

最低限度的行政管理也必须组织得尽可能合理而经济。在别的国家这样的政党就会叫作**民主党**。但它必然是革命的,而且它或多或少有意识地追求的最终目的是,彻底消灭作为贵族国家的旧英国。然而,它最近的目的却是实现议会改革,议会改革会使进行这种革命所必需的立法权转到它的手里。

马克思:《宪章派》(1852 年 7 月 25 日—8 月 2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23—424 页。

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所以他们要取得政权就只有使金钱成为人在立法上的行为能力的唯一标准。

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所以他们要取得政权就只有使金钱成为人在立法上的行为能力的唯一标准。他们一定得把历代的一切封建特权和政治垄断权合成一个**金钱**的大特权和大垄断权。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之所以具有**自由主义**的外貌,原因就在于此。资产阶级消灭了国内各个现存等级之间一切旧的差别,取消了一切依靠专横而取得的特权和豁免权。他们不得不把选举原则当作统治的基础,也就是说在原则上承认平等;他们不得不解除君主制度下书报检查对报刊的束缚;他们为了摆脱在国内形成独立王国的特殊的法官阶层的束缚,不得不实行陪审制。就这一切而言,资产者真像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但是资产阶级实行这一切改良,只是为了用**金钱**的特权代替已往的一切个人特权和世袭特权。这样,他们通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的限制,使选举原则成为本阶级独有的财产。平等原则又由于被限制为仅仅

在“法律上的平等”而一笔勾销了，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即限制在目前主要的不平等的范围内的平等，简括地说，就是简直把**不平等**叫作平等。这样，出版自由就仅仅是资产阶级的特权，因为出版需要**钱**，需要购买出版物的人，而购买出版物的人也得要有**钱**。陪审制也是资产阶级的特权，因为他们采取了适当的措施，只选“有身份的人”做陪审员。

……虽然工人比资产阶级先进，但是他们还看不出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即资产阶级的解放和工人阶级的解放之间的根本区别；当**金钱**还没有在政治上获得解放，当资产阶级还没有成为唯一的统治阶级的时候，工人们是不能识别**金钱**的自由和**人**的自由之间的区别的。

恩格斯：《德国状况》（1846 年 2 月 20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647—648 页。

改造社会的事业被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动。

黑格尔的过错在于双重的不彻底性：（1）他宣布哲学是绝对精神的定在，同时又不肯宣布**现实的哲学家**就是**绝对精神**；（2）他仅仅**在表面上**把作为绝对精神的绝对精神变成历史的创造者。既然绝对精神只是 post festum〔**事后**〕才通过哲学家**意识**到自身这个具有创造力的世界精神，所以它的捏造历史的行动也只是发生在哲学家的意识中、见解中、观念中，只是发生在思辨的想象中。布鲁诺先生取消了黑格尔的这种不彻底性。

首先,他宣布**批判**是绝对精神,而**他自己**是**批判**。批判的因素被排斥于群众之外,同样,群众的因素也被排斥于批判之外。所以**批判**认为自己并不是通过**群众**体现出来,而仅仅是通过一小撮杰出人物即**鲍威尔**先生及其门徒体现出来的。

接着布鲁诺先生又取消了黑格尔的另一种不彻底性:如果说黑格尔精神只是 post festum〔**事后**〕在幻想中创造历史,那么,鲍威尔先生则和他以外的其他群众相反,他是**有意识地**在扮演**世界精神**的角色;他现在就已经**戏剧性地**对待这批群众,而且在深思熟虑之后却故意发明历史和实现历史。

一方面是群众,他们是消极的、精神空虚的、非历史的、**物质的**历史因素;另一方面是**精神**、**批判**、布鲁诺先生及其伙伴,他们是积极的因素,一切**历史**行动都是由这种因素产生的。改造社会的事业被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动**。

不仅如此!批判、已经体现出来的批判即布鲁诺先生及其伙伴对待群众的态度,实际上就是现代的**唯一**的历史态度。现代的全部历史都归结为这两个方面在相互关系上的运动。所有的对立面都消融在这一**批判的**对立面中了。

既然批判的批判只有在同群众,即同**愚蠢**的对立中才能**具体地存在**,所以它就不得不经常为自己**制造**这种对立面,法赫尔、埃德加尔和施里加三位先生就足以证明批判在它的专长方面,也就是在它对人和物进行**群众的愚化**方面所特有的高深造诣。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 年 9—1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09—110 页。

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同进行统治的个人分割开来，主要是同生产方式的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各种关系分割开来，并由此作出结论说，历史上始终是思想占统治地位，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从这些不同的思想中抽象出“一般思想”、观念等等，并把它们当作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东西，从而把所有这些个别的思想和概念说成是历史上发展着的一般概念的“自我规定”。

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同进行统治的个人分割开来，主要是同生产方式的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各种关系分割开来，并由此作出结论说，历史上始终是思想占统治地位，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从这些不同的思想中抽象出“一般思想”、观念等等，并把它们当作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东西，从而把所有这些个别的思想和概念说成是历史上发展着的一般概念的“自我规定”。在这种情况下，从人的概念、想象中的人、人的本质、一般人中能引申出人们的一切关系，也就很自然了。思辨哲学就是这样做的。黑格尔本人在《历史哲学》的结尾承认，他“所考察的仅仅是一般概念的前进运动”，他在历史方面描述了“真正的神正论”。现在又可以重新回复到“概念”的生产者，回复到理论家、玄想家和哲学家，并作出结论说：哲学家、思维着的人本身自古以来就是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这个结论，如我们所看到的，早就由黑格尔表述过了。这样，证明精神在历史上的最高统治（施蒂纳的教阶制）的全部戏法，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手段：

第一，必须把进行统治的个人——而且是由于种种经验的原因、在经验的条件下和作为物质的个人进行统治的个

人——的思想同这些进行统治的个人本身分割开来，从而承认思想或幻想在历史上的统治。

第二，必须使这种思想统治具有某种秩序，必须证明，在一个承继着另一个而出现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得把这些思想看作是“概念的自我规定”（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这些思想凭借自己的经验的基础，彼此确实是联系在一起的，还因为它们被仅仅当作思想来看待，因而就变成自我差别，变成由思维产生的差别）。

第三，为了消除这种“自我规定着的概念”的神秘外观，便把它变成某种人物——“自我意识”；或者，为了表明自己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又把它变成在历史上代表着“概念”的许多人物——“思维着的人”、“哲学家”、玄想家，而这些人又被看作是历史的制造者、“监护人会议”、统治者①。这样一来，就把一切唯物主义的因素从历史上消除了，就可以任凭自己的思辨之马自由奔驰了。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1845 年秋—大约 1846 年 5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01—102 页。

资产阶级把国王作为防备人民的避雷针，而把人民作为防备国王的避雷针。

① 马克思加了边注：“一般人：‘思维着人的精神’”。——编者注

《改革报》仍然用2月里的漂亮话来判断二月革命的性质。在二月革命中,资产阶级的专制政治根本没有被摧毁,而是获得了充分完善的表现。王冠,即掩盖着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最后一道封建的灵光圈,已被摘掉。赤裸裸的资本统治暴露出来了。在二月革命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反对共同的敌人而斗争。当共同的敌人一被消灭,战场上就只剩下这两个敌对的阶级,它们两者之间就必然要开始决战。可是,有人会问我们,既然二月革命已建立了完备的资产阶级统治,为什么又会发生资产阶级退向保皇主义这种新的转变呢?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了。因为资产阶级留恋那个时期,当时它占居统治地位而不用对自己的统治负责;当时介于资产阶级和人民之间的虚构的权力既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效劳,又替资产阶级掩护;当时资产阶级有个戴着王冠的替罪羊,每当无产阶级要向资产阶级本身射击的时候,炮弹总是落在替罪羊的身上,而一旦这个替罪羊成了资产阶级的累赘以及资产阶级想把自己的政权确立为专为自身服务的政权,资产阶级就自动同无产阶级联合起反对它。资产阶级把国王作为防备人民的避雷针,而把人民作为防备国王的避雷针。

马克思:《巴黎〈改革报〉论法国状况》(1848年11月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32页。

……每个党都宁愿让自己的政敌保持接替自己执政的能力,而不愿互相破坏政治"声誉",使统治阶级的统治彻底垮台。

我非常认真地读完了《正教会和天主教会的权利和特

权》(这是人们对政府关于东方问题的蓝皮书的俏皮的称呼),并打算在最近向读者简要地评述一下这个外交上的迷宫。现在我只是肯定地说,历史上也许从来没有过比这更骇人听闻的表明政府的卑鄙和愚蠢的文献。让我们也回忆一下贝利先生在下院对这些蓝皮书的评价:

"至于说到消息,这些蓝皮书里有的是,但是请注意,这不是正式的消息,而只是从一本**精心编写的、对政府乐意隐瞒的一切只字不提的**蓝皮书中可以知道的东西。我这样讲是根据自己亲身的经验(喊声:"听啊!听啊!",政府席上则发出笑声),我知道这个提交下院的关于外交问题的蓝皮书是怎样编写出来的。"

我非常清楚,有一次有人责备帕麦斯顿勋爵歪曲了关于阿富汗战争的文件,隐瞒了发出的紧急函件中的一些极为重要的段落,甚至还故意捏造了一些段落,对此他作了如下的很机智的回答:

"先生,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那么,是什么东西妨碍了接替我们的那两届我们的政敌的政府——其中有一届还执政五年——宣布这件事实并把真正的文件公布出来呢?"

但是我同样地非常清楚,蓝皮书里这种诡计的秘密,恰恰就是辉格党和托利党轮流执政的秘密:每个党都宁愿让自己的政敌保持接替自己执政的能力,而不愿互相破坏政治"声誉",使统治阶级的统治彻底垮台。

马克思:《蓝皮书。——2月6日的议会辩论。——奥尔洛夫伯爵的使命。——联军舰队的行动。——爱尔兰旅。——关于工人议会的召开》(1854年2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1—62页。

明显的阶级差别、过分细致的分工以及报界的婆罗门制造的所谓“舆论”，已经把人们的性格弄成了千篇一律，连莎士比亚恐怕都认不出自己的同胞。

大陆上人们习惯地认为，岛民约翰牛是有“独特性”或“个人特性”的。一般说来，这种看法是把早先的英国人和现代的英国人混为一谈了。其实相反，明显的阶级差别、过分细致的分工以及报界的婆罗门制造的所谓“舆论”，已经把人们的性格弄成了千篇一律，连莎士比亚恐怕都认不出自己的同胞。有差别的已不是单个人，而是他们的“职业”和阶级。如果不看职业而只看日常生活，那么一位“体面的”英国人同另一位就十分相像，连莱布尼茨也未必能找出他们之间的差别，或者 differentia specifica〔特种差别〕。那种大受赞扬的个人特性被排除于政治范围和社会范围之外以后，便在私人生活的怪癖和胡闹中找到了最后的避难所，以便不时在这些地方 sans gêne〔无拘束地〕再来表现一下自己，而人们这时却意识不到他们已陷入了怎样可笑的境地。

马克思：《英国记事》（1862 年 2 月 3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5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490 页。

波拿巴主义对工人和资本家的态度的特点是：它阻止他们互相厮打。这就是说它保护资产阶级不受工人的暴力进攻，鼓励两个阶级之间小规模的和平冲突，此外则不准它们有任何一点政治权力。

波拿巴主义对工人和资本家的态度的特点是：它阻止他

们互相厮打。这就是说它保护资产阶级不受工人的暴力进攻,鼓励两个阶级之间小规模的和平冲突,此外则不准它们有任何一点政治权力。没有结社权,没有集会权,没有新闻出版自由;普选权是处在官僚制度压迫下,以致反对派的当选几乎是不可能的;再就是警察专权,这种专权甚至在警察国家——法国也从来没有见到过。除此以外,还直接收买资产阶级当中和工人当中的一部分人,收买前一部分人所使用的手段是大量的信用欺诈,小资本家的钱由于这样的欺诈而跑进大资本家的口袋;收买后一部分人所使用的手段是兴办大量的公共工程,这样的工程在大城市里除去集结了天然的、独立的无产阶级以外,还集结了人为的、拥护帝国的、从属于政府的无产阶级。最后,就是通过虚假的英勇战争使民族自豪感得到满足,可是这种得到欧洲最高当局许可的战争总是为了反对当时共同的替罪羊,并且只是在胜利预先得到保证的条件下进行的。

马克思:《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1865年1月27日—2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108页。

内部联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现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论信仰,还在现存制度实际崩溃以前就会破灭。因此,在这里统治阶级的绝对利益就是把这种缺乏思想的混乱永远保持下去。

小孩子同样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

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按比例分配劳动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

科学的任务正是在于阐明价值规律是**如何**实现的。所以，如果想一开头就“说明”一切表面上和规律矛盾的现象，那就必须**在**科学**之前**把科学提供出来。李嘉图的错误恰好是，他在论价值的第一章[①]里就把尚待阐明的一切可能的范畴都假定为**已知的**，以便证明它们和价值规律是等同的。

另一方面，如您所正确地指出的，**理论的历史**确实证明，对价值关系的理解**始终**是**一样的**，只是有的比较清楚，有的比较模糊，有的掺杂着较多的错觉，有的包含着较多的科学的明确性。因为思维过程本身是在一定的条件中生成的，它本身是一个**自然过程**，所以真正能理解的思维永远只能是一样的，只是随着发展的成熟程度（其中也包括思维器官发展的成熟程度）逐渐地表现出区别。其余的一切都是废话。

庸俗经济学家根本想不到，实际的日常的交换关系和价值量是**不能直接等同**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

①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编者注

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当庸俗经济学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却傲慢地断言事物从现象上看是另外的样子的时候,他们自以为这是作出了伟大的发现。实际上,他们所断言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外表,并且把它当作最终的东西。这样一来,科学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但是,在这里事情还有另外的背景。内部联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现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论信仰,还在现存制度实际崩溃以前就会破灭。因此,在这里统治阶级的绝对利益就是把这种缺乏思想的混乱永远保持下去。那些造谣中伤的空谈家不凭这一点,又凭什么取得报酬呢?他们除了根本不允许人们在政治经济学中进行思考以外,就拿不出任何其他的科学王牌了。

马克思:《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7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0—581页。

……关于这种观念的永恒性即上述物的依赖关系的永恒性的信念,统治阶级自然会千方百计地来加强、扶植和灌输。

这些外部关系并未排除"依赖关系",它们只是使这些关系变成普遍的形式;不如说它们为人的依赖关系造成普遍的基础。个人在这里也只是作为一定的个人互相发生关系。这种与人的依赖关系相对立的物的依赖关系也表现出这样的情形(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立的独立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本身相对立而独立化的、他们互相间的生产关系):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

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

关系当然只能表现在观念中，因此哲学家们认为新时代的特征就是新时代受观念统治，从而把推翻这种观念统治同创造自由个性看成一回事。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更容易犯这种错误，因为上述关系的统治（上述物的依赖关系，不用说，又会转变为一定的，只不过除掉一切错觉的人的依赖关系）在个人本身的意识中表现为观念的统治，而关于这种观念的永恒性即上述物的依赖关系的永恒性的信念，统治阶级自然会千方百计地来加强、扶植和灌输。

（当然，对于封建时代的“纯粹人的关系”等等的错觉，一刻也不能忘记：（1）这种关系本身在自己的范围内，在一定的阶段上具有物的性质，例如，从纯粹军事隶属关系到地产关系的发展就表明这一点；但是（2）由这些关系没落而转变成的物的关系，其本身具有狭隘的、为自然所决定的性质，因而表现为人的关系，而在现代世界中，人的关系则表现为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纯粹产物。）

马克思：《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1857 年 8 月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14—115 页。

你们（立宪民主党人）在如此重大问题上用“发誓”的空话来模糊群众的政治意识，而不是启发他们的政治意识，你们用耸人听闻的词句来搅乱人们的头脑……

说得多么动听啊，动听得“不得了”！如果十月党人“发

誓”要消灭上述祸害，罗季切夫就决心饶恕他们！饶舌的先生，别再撒谎了，不仅十月党人，就连**你们**立宪民主党人，不管怎样“发誓”，都不会**消灭**任何重大的祸害。你们在如此重大问题上用“发誓”的空话来**模糊**群众的政治意识，而不是启发他们的政治意识，你们用耸人听闻的词句来**搅乱**人们的头脑，而不是心平气和地说明、简单明了地论述：**为什么**这条“毒蛇”掌握了、能够掌握和必然掌握现有的政权。

罗季切夫先生没有说明这一点，他不敢径直地正视问题的根源和实质，他同十月党人的区别根本不在问题的提法上，不在原则上，而只是在动听词句使用得多少上。只要稍微用心地看看他的发言，稍微考虑一下他的发言，就可以看出，他所持的观点实际上是十月党人的观点，**仅仅**因为如此他才会答应，如果他们“发誓”就“饶恕”他们。所有这些饶恕，所有这些誓言不过是那些害怕稍微底一点的民主主义的自由派演出的一幕滑稽剧。由此就产生了人们从罗季切夫关于“均衡”的言论，从给洛普欣所作的辩护词等中看到的那种对问题的提法。十月党人和自由派的立场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列宁：《三项质询》（1911 年 12 月），《列宁全集》第 21 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85 页。

报刊、教堂讲坛、滑稽小报，总之，统治阶级所掌握的一切工具则人为地保持和加深这种对立。这种对立就是英国工人阶级虽有自己的组织但没有力量的秘密所在。

但是，英国资产阶级在爱尔兰当前的经济中还有更重要得多的利益。由于租地日益集中，爱尔兰就不断为英国的劳

动市场提供自己的过剩人口，因而就压低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工资，使他们的物质状况和精神状况恶化。

而最重要的是：英国所有的工商业中心的工人阶级现在都**分裂为**英国无产者和爱尔兰无产者这样两个**敌对**阵营。普通的英国工人憎恨爱尔兰工人，把他们看作会降低自己生活水平的竞争者。英国工人在爱尔兰工人面前觉得自己是**统治民族**的一分子，正因为如此，他们就把自己变成了本民族的贵族和资本家用来**反对爱尔兰**的工具，从而巩固了贵族和资本家**对他们自己**的统治。他们对爱尔兰工人怀着宗教、社会和民族的偏见。他们对待爱尔兰工人的态度大致像以前美国各蓄奴州的白种贫民对待黑人的态度。而爱尔兰人则以同样的态度加倍地报复英国工人。同时他们把英国工人看作**英国对爱尔兰统治**的同谋者和愚笨的工具。

报刊、教堂讲坛、滑稽小报，总之，统治阶级所掌握的一切工具则人为地保持和加深这种对立。**这种对立**就是**英国工人阶级**虽有自己的组织但**没有力量的秘密所在**。这就是资本家阶级能够保持它的权力的秘密所在。这一点资本家阶级自己是非常清楚的。

祸害还不止于此。它还越过了大洋。英国人和爱尔兰人之间的对立是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冲突的隐秘的基础。它使两国工人阶级之间不可能有任何认真的和诚意的合作。

马克思：《马克思致齐·迈耶尔和奥·福格特》(1870年4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1页。

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

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

但是,你们既然用你们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教育、法等等的观念来衡量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主张,那就请你们不要同我们争论了。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

你们的利己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这种利己观念是你们和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谈到古代所有制的时候你们所能理解的,谈到封建所有制的时候你们所能理解的,一谈到资产阶级所有制你们就再也不能理解了。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 年 12 月—1848 年 1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89 页。

……资产者认为道德教育就是灌输资产阶级的原则,而且资产阶级没有使人民受到真正教育的经费,即使有这笔经费,它也不肯使用。

……不需受任何教育就干得了的简单劳动代替复杂劳动;我们也不打算指出,现代工业日益迫使七岁以上的儿童从

事机器劳动，不仅使他们成为资产阶级的收入的来源，而且成为他们双亲即无产者收入的来源；工厂管理制度使学校教育法失效，普鲁士就是一个例子；我们也不打算指出，即使工人受到智力教育，这种教育对他的工资也毫无直接影响；教育一般说来取决于生活条件，资产者认为道德教育就是灌输资产阶级的原则，而且资产阶级没有使人民受到真正教育的经费，即使有这笔经费，它也不肯使用。

马克思：《工资》（1847 年 12 月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648 页。

资产阶级社会把它曾经反对过的一切具有封建形式或专制形式的东西，以它自己所特有的形式再生产出来。

有一大批所谓“高级”劳动者，如国家官吏、军人、艺术家、医生、牧师、法官、律师等等，他们的劳动有一部分不仅不是生产的，而且实质上是破坏性的，但他们善于依靠出卖自己的“非物质”商品或把这些商品强加于人，而占有很大部分的“物质”财富。对于这一批人来说，在**经济学**上被列入丑角、家仆一类，被说成靠真正的生产者（更确切地说，靠生产当事人）养活的食客、寄生者，决不是一件愉快的事。这对于那些向来显出灵光、备受膜拜的职务，恰恰是一种非同寻常的亵渎。政治经济学在其古典时期，就像资产阶级本身在其发家时期一样，曾以严格的批判态度对待国家机器等等。后来它理解到——这在它的实践中也表现出来——并且根据经验认识到，这种继承下来的所有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完全非生产的阶级的社会结合的必要

性,就是由资产阶级自己的组织中产生出来的。

如果上述"非生产劳动者"不生产享受,因此对他们的服务的需求不完全取决于生产当事人想如何花掉自己的工资或利润;相反,如果他们成为必要,或自己使自己成为必要,部分地是因为存在肉体上的疾病(如医生)或精神上的虚弱(如牧师),部分地是因为个人利益的冲突和民族利益的冲突(如政治家、一切法学家、警察、士兵);如果这样,那么,在亚当·斯密看来,就像在产业资本家本身和工人阶级看来一样,他们就表现为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因此必须尽可能地把这种非生产费用缩减到最低限度,尽可能地使它便宜。资产阶级社会把它曾经反对过的一切具有封建形式或专制形式的东西,以它自己所特有的形式再生产出来。因此,对这个社会阿谀奉承的人,尤其是对这个社会的上层阶级阿谀奉承的人,他们的首要业务就是,在理论上甚至为这些"非生产劳动者"中纯粹寄生的部分恢复地位,或者为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的过分要求提供根据。事实上这就宣告了意识形态阶级等等是**依附于资本家**的。

但是,**第二**,有一部分生产当事人(物质生产本身的当事人),时而被这一些经济学家,时而被那一些经济学家称为"非生产的"。例如,代表工业资本利益的那部分经济学家(李嘉图)把土地所有者称为"非生产的"。另一些经济学家(例如凯里)把本来意义的商人称为"非生产的"劳动者。后来甚至又有一些人把"资本家"本人也称为非生产的,或者至少企图把资本家对物质财富的要求归结为"工资",即归结为一个"生产劳动者"所取得的报酬。脑力劳动者中间的许多

人，看来都倾向于对资本家的生产性持这种怀疑观点。因此，已经是作出妥协并且承认不直接包括在物质生产当事人范围内的一切阶级都具有“生产性”的时候了。大家互相帮忙，并且，像《蜜蜂的寓言》中那样，必须证明，即使根据“生产的”、经济学的观点，资产阶级世界连同它的所有“非生产劳动者”一起，也是所有世界中最美好的世界；何况一些“非生产劳动者”从自己方面已经对那些根本是“为享受果实而生的”阶级的生产性，或者对那些如土地所有者那样无所事事的生产当事人等等作出了批判的考察。**无所事事的人**也好，他们的**寄生者**也好，都必须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地位。

第三，随着资本的统治的发展，随着那些和创造物质财富没有直接关系的生产领域实际上也日益依附于资本，——尤其是在实证科学（自然科学）被用来为物质生产服务的时候，——政治经济学上的阿谀奉承的侍臣们便认为，对任何一个活动领域都必须加以推崇并给以辩护，说它是同物质财富的生产“联系着”的，说它是生产物质财富的手段；他们对每一个人都表示敬意，说他是“第一种”意义的“生产劳动者”，即为资本服务的、在这一或那一方面对资本家发财致富有用的劳动者，等等。

这里，应当首先提出的是马尔萨斯之流，他们直接为“**非生产劳动者**”和明显的寄生者辩护，说这些人是必要的和有用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四卷第一册　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7—170页。

（四）意识形态阶层（阶级）

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在统治阶级中间表现出来……

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在统治阶级中间表现出来，因此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玄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主要的谋生之道，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并且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因为在实际中他们是这个阶级的积极成员，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在这一阶级内部，这种分裂甚至可以发展成为这两部分人之间的某种程度的对立和敌视，但是一旦发生任何实际冲突，即当阶级本身受到威胁的时候，当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好像不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而且好像拥有与这一阶级的权力不同的权力这种假象也趋于消失的时候，这种对立和敌视便会自行消失。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关于这个革命阶级的前提所必须讲的，在前面已经讲过了。

然而，在考察历史进程时，如果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阶级本身分割开来，使这些思想独立化，如果不顾生产这些思想的条件和它们的生产者而硬说该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这些或那些思想，也就是说，如果完全不考虑这些思想的基础——个人和历史环境，那就可以这样说：例如，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荣誉、忠诚，等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

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平等,等等。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9—100页。

……意识形态阶级等等是依附于资本家的。

资产阶级社会把它曾经反对过的一切具有封建形式或专制形式的东西,以它自己所特有的形式再生产出来。因此,对这个社会阿谀奉承的人,尤其是对这个社会的上层阶级阿谀奉承的人,他们的首要业务就是,在理论上甚至为这些"非生产劳动者"中纯粹寄生的部分恢复地位,或者为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的过分要求提供根据。事实上这就宣告了意识形态阶级等等是**依附于资本家**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四卷第一册 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8—169页。

……一旦资产阶级占领了地盘,一方面自己掌握国家,一方面又同以前掌握国家的人妥协;一旦资产阶级把意识形态阶层看作自己的亲骨肉,到处按照自己的本性把他们改造成为自己的伙计。

……一旦资产阶级占领了地盘,一方面自己掌握国家,一方面又同以前掌握国家的人妥协;一旦资产阶级把意识形态阶层看作自己的亲骨肉,到处按照自己的本性把他们改造成为自己的伙计;一旦资产阶级自己不再作为生产劳动的代表

来同这些人对立，而真正的生产工人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并且同样说它是靠别人劳动生活的；一旦资产阶级有了足够的教养，不是一心一意从事生产，而是也想从事“有教养的”消费；一旦连精神劳动本身也愈来愈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一旦发生了这些情况，事情就反过来了。这时资产阶级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力求“在经济学上”证明它从前批判过的东西是合理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四卷第一册　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5页。

由于国家的这种情况，也就产生了在其他国家从来没有过的循规蹈矩的官僚意识以及在德国很流行的关于国家的一切幻想；由于这种情况，也就产生了德国理论家不依赖市民的那种虚假的独立性，即这些理论家用以表达市民的利益的形式和这些利益本身之间的假象的矛盾。

总之，自宗教改革以来，德国的发展就具有了完全的小资产阶级的性质。旧的封建贵族绝大部分在农民战争中被消灭了，剩下的或者是直属帝国的小诸侯，或者是些小地主，或者是些乡居的容克地主；这些小诸侯逐渐取得相当的独立地位并在极小的偏僻的地区内仿效君主专制；这些小地主在小庄园内耗尽了自己的微产，后来就靠在小邦军队和政府办公室中找个小职位以糊口；而这些乡居的容克地主过的生活在最不讲究的英国乡绅或法国 gentilhomme de province〔乡绅〕看来都是不体面的。农业的经营方式既不是小块经营，也不是

大生产，它虽然保存着农奴的依附和徭役，但决不能唤醒农民去寻求解放，因为这种经营方式本身不能使积极革命的阶级形成起来，也因为没有与这样的农民阶级相适应的革命资产阶级。

……小小荷兰的资产阶级比人数众多的德国市民强大，荷兰资产阶级已有很发展的阶级利益，而德国市民却没有共同利益，只有分散的小眼小孔的利益。与利益的分散性相适应的是政治组织的分散性——许多小公国和帝国自由市。在德国，政治集中所需要的一切**经济**条件都不具备，怎么能谈到**政治**集中呢？由于每一个生活领域都软弱无力（这里既谈不上等级，也谈不上阶级，而顶多只能谈已属过去的等级和尚未形成的阶级），因此其中任何一个领域都不能获得绝对的统治。由此产生的必然结果是，在德国以最畸形的、半家长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君主专制的时代里，由于分工而取得了对公共利益的管理权的特殊领域，获得了异乎寻常的、在现代官僚政治中更为加强的独立性。这样一来，国家就构成一种貌似独立的力量，而这种在其他国家曾是暂时现象（过渡阶段）的情况，在德国一直保持到现在。由于国家的这种情况，也就产生了在其他国家从来没有过的循规蹈矩的官僚意识以及在德国很流行的关于国家的一切幻想；由于这种情况，也就产生了德国理论家不依赖市民的那种虚假的独立性，即这些理论家用以表达市民的利益的形式和这些利益本身之间的假象的矛盾。

……不管是康德或德国市民（康德是他们的利益的粉饰者），都没有觉察到资产阶级的这些理论思想是以物质利益

和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为基础的。因此，康德把这种理论的表达与它所表达的利益割裂开来，并把法国资产阶级意志的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从而就把这种意志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12—213页。

所有过去的时代，实行这种吸血的制度，都是以各种各样的道德、宗教和政治的借口来粉饰的：教士、哲学家、律师和政治家总是向人民说，为了他们自己的幸福他们必定要忍饥挨饿，因为这是上帝的意旨。

在历史上各个时期中，绝大多数的人民都不过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充当了一小撮特权者发财致富的工具。但是所有过去的时代，实行这种吸血的制度，都是以各种各样的道德、宗教和政治的借口来粉饰的：教士、哲学家、律师和政治家总是向人民说，为了他们自己的幸福他们必定要忍饥挨饿，因为这是上帝的意旨。而现在却完全相反，自由贸易论者蛮横宣称：“你们工人是奴隶，并将永远做奴隶，因为只有你们当奴隶，我们才能增加自己的财富和幸福，因为你们不做奴隶，我们这个国家统治阶级就不能继续统治下去。”于是，压迫的秘密现在终于揭开了；现在幸亏有自由贸易论者，人民才终于能够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处境；现在问题终于直截了当地提出来

了:**有我无你,有你无我!** 因此,我们认为公开的敌人比虚伪的朋友好,蛮横的自由贸易论者比伪善的贵族慈善家好,贵格会会士布莱特比阿什利勋爵好。

恩格斯:《十小时工作日问题》(1850 年 2 月 9 日—大约 20 日之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82—283 页。

一些冷酷无情的政治经济学家,即靠这个制度发财的人所雇佣的奴仆,他们用一系列的像比例的运算法则那样无可辩驳的和严格的推论来证明,不能以任何方式触及现行制度,否则将遭到"国家毁灭"的惩罚。

一方面有人描绘了令人心碎的情景:谈到儿童成长受阻碍,他们受到残害;谈到妇女抛开家务和幼儿的情况;谈到整整几代人都染上了慢性病,谈到无数的人失去了生命,谈到在整个国家人们的幸福都已经破灭,——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那本来就已经非常富有的一小撮人发财。这里没有丝毫的捏造,这一切都是事实,都是铁的事实。尽管如此,却没有人敢于要求消灭这种丑恶的制度;而只是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加以限制。另一方面,出现了一些冷酷无情的政治经济学家,即靠这个制度发财的人所雇用的奴仆,他们用一系列的像比例的运算法则那样无可辩驳的和严格的推论来证明,不能以任何方式触及现行制度,否则将遭到"国家毁灭"的惩罚。

恩格斯:《十小时工作日问题》(1850 年 2 月 9 日—大约 20 日之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83 页。

这些玄想家们实在轻信，总是对某一个时代关于本时代的一切幻想信以为真，或者对某一个时代的玄想家们关于那个时代的一切幻想信以为真。

虽然有了最近的经验，但是照德意志意识形态看来，把中世纪送入坟墓的那些斗争仍然只不过是激烈的神学上的争论。在我们的爱国的历史学家和聪明的政治家们看来，只要那个时代的人能够对天国事物取得一致的认识，他们就毫无理由去为人间的事物争吵了。这些玄想家们实在轻信，总是对某一个时代关于本时代的一切幻想信以为真，或者对某一个时代的玄想家们关于那个时代的一切幻想信以为真。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夏—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81页。

一旦中间阶级获得了统治权，它（小资产阶级）就陷入强烈的民主主义狂热，但当低于它的那个阶级——无产阶级企图展开独立的运动时，它马上就变得意志消沉，忧虑重重。

在德国，由于大资本家和大工业家作为一个阶级尚不发达，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人数非常之多。在较大的城市中，它几乎占居民的大多数；在较小的城市中，由于没有更富裕的竞争对手同它争夺势力，它完全居于支配地位。这个阶级在所有现代国家和现代革命中，都居于极重要的地位，而在德国则尤其重要，在最近德国各次斗争中，它常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的地位是介于较大的资本家（商人和工业家）即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或产业工人阶级之间，这种地位

就决定了它的特性。它力图爬上资产阶级的地位,但命运中的一点点不顺利就把这个阶级中的某些人抛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在君主制的和封建的国家里,这个阶级的生存要仰赖于宫廷和贵族的惠顾,失去这些主顾,这个阶级的大部分就会破产。在较小的城市里,驻军、地方政府、法院以及它们的属员,通常便是这个阶级繁荣的基础,没有这些,小店主、裁缝、鞋匠、木匠等就无法生存。因此,这个阶级永远摇摆在两者之间:既希望跻身于较富有的阶级的行列,又惧怕堕入无产者甚至乞丐的境地;既希望参加一份对公共事务的领导以增进自己的利益,又唯恐不合时宜的对抗行为会触怒政府,——他们的生存是操在政府手里的,因为政府有权力使他们失掉最好的主顾;他们拥有的财产很少,而财产的稳固程度是与财产的数额成正比的,因此,这一阶级的观点是极端动摇的。它在强有力的封建或专制君主政府面前卑躬屈膝,百依百顺,但当中间阶级得势的时候,它就转到自由主义方面来;一旦中间阶级获得了统治权,它就陷入强烈的民主主义狂热,但当低于它的那个阶级——无产阶级企图展开独立的运动时,它马上就变得意气消沉,忧虑重重。我们以后将会看到,在德国,这个阶级如何在这种种不同的状态中变来变去。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 年 8 月 17 日—1852 年 9 月 23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10 页。

工厂制度的热心的辩护士们在斥责社会劳动的任何一种

普遍组织时，只会说这种组织将把整个社会变成一座工厂，这一点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资产阶级意识一方面称颂工场手工业分工，工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局部工人绝对服从资本，把这些说成是为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劳动组织，同时又同样高声责骂对社会生产过程的任何有意识的社会监督和调节，把这说成是侵犯资本家个人的不可侵犯的财产权、自由和自决的“独创性”。工厂制度的热心的辩护士们在斥责社会劳动的任何一种普遍组织时，只会说这种组织将把整个社会转化为一座工厂，这一点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册第四篇第十二章　分工和工场手工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12—413页。

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对立，使得由各个意识形态阶层构成的上层建筑成为必要……

施托尔希认为，医生生产健康（但他也生产疾病），教授和作家生产文化（但他们也生产蒙昧），诗人、画家等等生产趣味（但他们也生产乏味），道德家等等生产道德，传教士生产宗教，君主的劳动生产安全，等等……这种说法事实上是说，所有这些活动，这些“服务”，都生产现实的或想象的使用价值；后来的著作家不断重复这种说法，用以证明上述这些人都是斯密所谓的生产劳动者，也就是说，他们直接生产的不是特殊种类的产品，而是物质劳动的产品，所以他们直接生产财

富。在施托尔希的书中还没有这种荒谬说法。其实这种荒谬说法完全可以由以下各点来说明：

(1)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各种职能是互为前提的；

(2)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对立，使得由各个意识形态阶层构成的上层建筑成为必要，这些阶层的活动不管是好是坏，因为是必要的，所以总是好的；

(3)一切职能都是为资本家服务，为资本家谋"福利"；

(4)连最高的精神生产，也只是由于被描绘为、被错误地解释为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才得到承认，在资产者眼中才成为可以原谅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四卷第一册　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8页。

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行动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

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行动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因为这是思维过程，所以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他从纯粹的思维中——不是从他自己的思维中，就是从他的先辈的思维中得出的。他和纯粹的思维材料打交道，他直率地认为这种材料是由思维产生的，而不去研究任何其他的、比较疏远的、不从属于思维的根源。而且这在他看来是不言

而喻的，因为在他看来，任何人的行动既然都是通过思维进行的，最终似乎都是以思维为基础的了。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4—95页。

私人的货币，消费者的货币，第一是所有政治和意识形态阶层的货币，第二是地租获得者的货币，第三是所谓资本家（而不是工业资本家）、国家债权人等等的货币……

至于在两种不同的贸易形式中出现的货币，即在真正贸易中的通货和在收入同商品即一部分资本相交换中的通货，那么，只确认它们之间的分离是不够的，也要考虑它们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私人的货币，消费者的货币，第一是所有政治和意识形态阶层的货币，第二是地租所有者的货币，第三是所谓资本家（而不是工业资本家）、国家债权人等等的货币，甚至工人的货币（在储蓄银行中），简言之，也就是居民中不从事贸易的各阶级的收入超过他们的日常开支，以及超过他们认为必须始终由自己支配、也就是作为个人储备来保存（贮藏）的那部分货币以上的余额，这种余额是存款的主要来源，而存款又成为商业货币的主要基础。

马克思：《反思》（1851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40页。

所有这些卓越的历来受人尊敬的职业——君主、法官、军官、教士等等，所有由这些职业产生的各个旧的意识形态阶

层,所有属于这些阶层的学者、学士、教士……在经济学上被放在与他们自己的、由资产阶级以及有闲财富的代表(土地贵族和有闲资本家)豢养的大批仆从和丑角同样的地位。

这是还具有革命性的资产阶级说的话,那时它还没有把整个社会、国家等等置于自己支配之下。所有这些卓越的历来受人尊敬的职业——君主、法官、军官、教士等等,所有由这些职业产生的各个旧的意识形态阶层,所有属于这些阶层的学者、学士、教士……**在经济学上**被放在与他们自己的、由资产阶级以及有闲财富的代表(土地贵族和有闲资本家)豢养的大批仆从和丑角同样的地位。他们不过是社会的**仆人**,就像别人是他们的仆人一样。他们**靠别人劳动**的产品生活。因此,他们的人数必须减到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国家、教会等等,只有在它们是管理和处理生产的资产者的共同利益的委员会这个情况下,才是正当的;这些机构的费用必须缩减到必要的最低限度,因为这些费用本身属于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这种观点具有历史的意义,一方面,它同古代的见解形成尖锐的对立,在古代,物质生产劳动带有奴隶制的烙印,这种劳动被看作仅仅是有闲的市民的立足基石;另一方面,它又同由于中世纪瓦解而产生的专制君主国或贵族君主立宪国的见解形成尖锐的对立,就连孟德斯鸠自己都还拘泥于这种见解,他天真不过地把它表达如下(《论法的精神》第 7 篇第 4 章):"富人不多花费,穷人就要饿死。"

马克思:《〈资本论〉第四卷第一册　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Ⅰ),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14—315 页。

要做到这一点，单有探寻“捷径”的善良天真的愿望是很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在“各个阶级间重新配置社会力量”，需要成为这样一个思想家，他不是代表置身于斗争之外的直接生产者，而是代表那些投身于火热的斗争并完全与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分开”的人们。

我们可以回答他说：不，这不是陀螺，不是车轮，不是天命的规律，不是天帝的旨意；它是由“活的个人”，即属于优势社会力量方面的那些“活的个人”，“突破重重障碍”（诸如直接生产者或旧贵族阶层代表的反抗）来推动的。因此，要使车轮朝另一方向转动，在反对“活的个人”（即不属于任何意识形态阶层而直接代表切身经济利益的社会分子）时必须依靠“活的个人”，在反对阶级时必须依靠阶级。要做到这一点，单有探寻“捷径”的善良天真的愿望是很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在“各个阶级间重新配置社会力量”，需要成为这样一个思想家，他不是代表置身于斗争之外的直接生产者，而是代表那些投身于火热的斗争并完全与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分开”的人们。这是**唯一的**因而也是最简捷的“使人类走向幸福的途径”，通过这一途径不仅能减轻现存社会的弊病，不仅能靠加速这个社会的发展来缩短其寿命，而且能最后消灭它，使“车轮”（已不是国家力量的“车轮”，而是社会力量的“车轮”）完全朝另一方向转动。

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1894 年底—1895 年初），《列宁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18 页。

（五）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价值剖析

［一］资产阶级民主

民主正是资产阶级即工商业中间阶级的要求。

如果《先驱晨报》竟把我们在上面援引的约翰·罗素的那些胡诌叫作是“做一切事情！”如果它以弗罗斯特、威廉斯以及其他人的命运来警告小个子约翰·罗素，说他搞的是爱戴国王、尊重贵族和保护主教的“民主”，那么，《先驱晨报》所说的“不做任何事情”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而整个这件事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德比勋爵在上院宣称自己是“民主”的公开反对者，并且谈论民主就像谈论必须与之进行斗争的唯一的党派一样。于是，不可避免的约翰·罗素出场了，他出来研究这种民主的实质，即财富的增长，这种财富的智力的增长，以及它的通过舆论和合法的机构来影响政府的要求的增长。由此可见，民主正是资产阶级即工商业中间阶级的要求。德比勋爵以这种民主的反对者的姿态出现，而约翰·罗素勋爵则自告奋勇地充当这种民主的旗手。两人都一致默认：他们本阶级即贵族阶级内部的旧的内讧已经不能引起国内的任何兴趣。因此，罗素已经准备抛弃“辉格党人”这个称号而改名“民主主义者”——如果这是打倒他的对手的一个必要的条件的话。在这种情况下，辉格党人实际上将继续扮演过去的角色，正式充当中间阶级的奴仆。由此可见，罗素所提出改组党的计划，归结起来不过是要给党起一个新的名称。

马克思:《建立新反对党的尝试》(1852年10月13日—16日之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6—467页。

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历史,那就很明显: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

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历史,那就很明显: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附带说一下,"纯粹民主"不仅是既不了解阶级斗争也不了解国家实质的**无知之谈**,而且是十足的空谈,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民主将演变成习惯,**消亡下去**,但永远也不会是"纯粹的"民主)。

"纯粹民主"是自由主义者用来愚弄工人的谎话。历史上有代替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也有代替资产阶级民主的无产阶级民主。

……

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正是这个真理,这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不理解的。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考茨基不去对那些使一切资产阶级民主变为对富人的民主的条件进行科学的批判,反而奉献出一些使资产阶级"称心快意"的东西。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0—601页。

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它也将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

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时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①]直到现在，这个真理对社会主义者说来，还是无可争辩的，而这个真理就包含着对**国家**的承认——直到胜利了的社会主义转变为完全的共产主义为止。恩格斯关于国家**消亡**的名言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在提纲第1条中特意着重指出，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它也将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只要我们的论敌还没有用某种"取消国家"的新观点来代替马克思主义，他们的论断就是完全错误的。

他们不谈国家（也**就是说**不谈确定国**界**！），而谈"社会主义文化圈"，也就是故意选择一种含糊到把一切有关国家的问题都抹杀掉的说法！这是一种可笑的同义反复；如果没有国家，当然也就没有国界问题。那时**整个**民主政治纲领都是不必要的了。国家一旦"消亡"，共和国也就不再存在。

列宁：《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1916年7月），《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19页。

现代民主的秘密不过就是伪装高贵的人（sham_noble）提高了地位，由于传统和重新制造的幻想而受到了崇拜。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1页。——编者注

卡莱尔否定这一点。他把民主和普选权仅仅看作是各国人民的一种流行病,他们得病是受了议会政治毫无缺点这种英国人的迷信观点的影响。依靠普选权来治理国家就像绕道合恩角时迷失了航路的海船水手一样:他们不研究风向、气候和使用六分仪,却用投票来选择道路,并宣布多数人的决定是不会错的。无论是对于个人或对于社会来说,问题都只在于发现宇宙的真正调节者,发现和当时的一定任务相关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并依照这种规律行事。谁给我们揭示这些永恒的规律,我们就跟着谁,"哪怕是俄国的沙皇,宪章派的议会,坎特伯雷的大主教或是达赖喇嘛"。但是我们怎样去发现上帝的这些永恒的意旨呢?采用每人发一张选票然后按人头计算的普选制来达到这个目的,无论怎样也是最下策。宇宙有它独具的特点,它始终把自己的秘密只显示给少数杰出的人,显示给极少数贵人和贤人。因此从来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在民主的基础上存在。那希腊人和罗马人呢?现在每一个人都知道,它们根本不是民主政体,这些国家的基础是奴隶制。至于法兰西的各种共和政体就更不用谈了。北美共和国模式又怎样呢?美国人到目前为止甚至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美国的居民没有政府;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无政府状态加警察。这种状况之所以能存在完全是由于存在着尚未开发的辽阔土地和从英国带来的对警棍的尊敬心理。随着人口的增长这种情况就会消失。

……

现在我们也知道现代民主的秘密、来源和必要性了。现代民主的秘密不过就是伪装高贵的人(sham_noble)提高了地

位，由于传统和重新制造的幻想而受到了崇拜。

马克思、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上发表的书评》（1850年3月中—4月18日之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6—317页。

资产阶级口头上标榜自己是民主阶级，而实际上并不如此，它承认原则的正确性，但是从来不在实践中实现这种原则……

这个虚伪的宪法中永远存在的矛盾足以说明，资产阶级口头上标榜自己是民主阶级，而实际上并不如此，它承认原则的正确性，但是从来不在实践中实现这种原则，法国真正的“宪法”不应当在我们所叙述的宪章中寻找，而应当在我们已经向读者简要地介绍过的以这个宪章为基础制定的组织法中寻找。这个宪法里包含了原则，——细节留待将来再说，而在这些细节里重新恢复了无耻的暴政！

马克思：《1848年11月4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1851年5月24日—6月8日之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92页。

民主制度是资产阶级制度中最纯粹最完善的一种。在这种制度下，一方面是极自由、极广泛、极鲜明的阶级斗争，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尽量施展种种阴谋诡计和狡猾的伎俩，“从思想上”影响雇佣奴隶，其目的是要引诱他们脱离反对雇佣奴隶制的斗争。

世界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反对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暴力、迫害、禁止和镇压。这基本上是农奴制的、中世纪的方法。各国都有一些资产阶级的阶层和集团(在先进国家比较少,在落后国家比较多)喜欢采用这种方法。在工人反对雇佣奴隶制的一定时刻,特别是在紧急关头,**一切**资产阶级都主张采用这种方法。例如,英国的宪章运动、法国的1849年和1871年都有过这样的历史时刻。

资产阶级对付工人运动的另一种方法是分化工人,瓦解工人队伍,收买无产阶级的某些代表或某些集团,以便把他们拉到资产阶级方面去。这类方法不是农奴制的,而是现代的**纯粹**资产阶级的方法,是适应发达的和文明的资本主义制度、适应民主制度的方法。

民主制度是资产阶级制度中最纯粹最完善的一种。在这种制度下,一方面是极自由、极广泛、极鲜明的阶级斗争,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尽量施展种种阴谋诡计和狡猾的伎俩,"从思想上"影响雇佣奴隶,其目的是要引诱他们脱离反对雇佣奴隶制的斗争。

列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1914年6月28日〔7月11日〕),《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4页。

政治民主仅仅是资本主义之上的上层建筑的可能的(虽然对"纯粹"的资本主义来说在理论上也是正常的)形式之一。

一般地说,政治民主仅仅是资本主义之上的上层建筑的可能的(虽然对"纯粹"的资本主义来说在理论上也是正常

的)形式之一。正如事实所表明的,不论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都是在各种政治形式中发展的,并且使所有这些形式服从于自己。因此,说民主的一种形式和一个要求"不能实现",在理论上是根本不正确的。

列宁:《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1916年7月),《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页。

……它(资产阶级民主)实质上始终是少数人的即只是有产阶级的、只是富人的民主制度。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它最顺利的发展条件下,比较完全的民主制度就是民主共和制。但是这种民主制度始终受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狭窄框子的限制,因此它实质上始终是少数人的即只是有产阶级的、只是富人的民主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始终与古希腊共和国的自由即奴隶主的自由大致相同。由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条件,现代的雇佣奴隶被贫困压得喘不过气,结果都"无暇过问民主","无暇过问政治",大多数居民在通常的平静的局势下都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9页。

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

总之,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

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将第一次提供人民享受的、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同时对少数人即剥削者实行必要的镇压。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提供真正完全的民主，而民主愈完全，它也就愈迅速地成为不需要的东西，愈迅速地自行消亡。

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下存在的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而且是少数人对多数人实行镇压的特殊机器。很明显，剥削者少数要能有系统地镇压被剥削者多数，就必须实行极凶狠极残酷的镇压，就必须造成大量的流血，而人类在奴隶制、农奴制和雇佣劳动制下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1—192页。

在任何一个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没有“一般民主”，而只有资产阶级民主；这里所说的专政也不是“一般专政”，而是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对压迫者和剥削者即资产阶级的专政。

首先，这条论据使用了“一般民主”和“一般专政”的概念，而没有提到是哪一个阶级的民主和专政。这样站在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似乎是全民的立场上提问题，就是公然嘲弄社会主义的基本学说——阶级斗争学说，那些投靠资产阶级的社会党人口头上承认这一学说，实际上却把它忘记了。因为在任何一个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没有“一般民主”，而

只有资产阶级民主;这里所说的专政也不是"一般专政",而是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对压迫者和剥削者即资产阶级的专政,其目的是战胜剥削者为保持自己的统治而进行的反抗。

历史教导我们,从来没有一个被压迫阶级,不经过专政时期,即不经过夺取政权并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总要不惜采取一切罪恶手段来进行的最猛烈、最疯狂的反抗的时期,就取得了统治,就能够取得统治。尽管反对"一般专政"而竭力吹嘘"一般民主"的社会党人现在替资产阶级的统治辩护,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也是经过一系列起义、内战,用暴力镇压国王、封建主、奴隶主及其复辟尝试才取得政权的。各国社会党人在自己的著作和小册子中,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在鼓动演说中,曾千百万次地向人民说明这些资产阶级革命、这种资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性质。因此,目前借谈论"一般民主"来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借谴责"一般专政"来大反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公然背叛社会主义,在实际上投降资产阶级,就是否认无产阶级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权利,并且正好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已在全世界遭到破产、战争已经造成了革命形势的历史关头来维护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列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1919年3月上旬),《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2—693页。

"法制基础"意味着:人民权利的合法根据——革命,在政府和资产阶级之间所缔结的constrtsocial〔社会契约〕中并不存在。

普鲁士资产阶级在其反对封建社会和王权的斗争中，被迫以人民的名义为自己要求了一种武器——结社权、出版自由等等，现在，当受骗的人民已不再利用这种武器去**拥护**资产阶级而流露出要利用它去**反对**资产阶级这种危险意图的时候，难道不应当把人民手中的这种武器摧毁吗？

资产阶级确信：在它同王权进行**协商**的道路上，在它同屈从自己命运的旧国家成立协定的道路上，显然只有一个障碍，一个唯一的障碍，这就是人民——puer robustus sed malitiosus，就像霍布斯所说的那样。**人民**和**革命**！

……

革命是人民对资产阶级同王权达成协议的抗议。因此，同王权达成协议的资产阶级**必然要抗议革命**。

这就是在伟大的**康普豪森**执政时期发生的事情。**三月革命没有得到承认**。柏林国民代议机关**否决**了关于承认三月革命的提案，从而确认自己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代议机关**，是**协商派议会**。

这个议会把已经发生的事情宣布为没有发生。它在普鲁士人民面前大声宣布：人民并不是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实行革命去反对王权，人民实行革命是为了使王权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去反对人民自己！这样，革命人民的**权利的法律根据**便被消灭，而为保守的资产阶级找到了**法制基础**。

……“法制基础”只不过意味着：革命并没有获得自己的基础，旧社会也没有失去自己的基础，三月革命只不过是“推动”在旧普鲁士国家内部早就在酝酿的王权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勾结”的一个“事故”，国王本人在以往颁布的敕令中早就

承认了这种勾结的需要，只是认为这种勾结在三月以前并不是“**刻不容缓**”的。总之，“**法制基础**”意味着：资产阶级在三月**以后**，仍然企图像在三月**以前**那样的基础上同国王进行谈判，就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革命，好像联合议会未经革命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法制基础”意味着：人民权利的合法根据——**革命**，在政府和资产阶级之间所缔结的 constrtsocial〔社会契约〕中并不存在。**资产阶级从旧普鲁士的立法中引申出自己的要求，为的是不让人民从新普鲁士的革命中引申出任何要求**。

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1848 年 12 月 9、11、15 和 29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30、131、132 页。

……正像民主派把人民这个词变成圣物一样，你们用无产阶级这个词来玩这套把戏。

马克思在说明他的关于分裂的建议时，曾经说过以下的一段话：“少数派用教条主义观点代替批判观点，用唯心主义观点代替唯物主义观点。少数派不是把现实关系、而**仅仅**把意志看作革命的动力。我们对工人说：不仅为了改变现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 15 年、20 年、50 年的内战和国际斗争，而你们却相反地对工人们说：‘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睡大觉’。我们特别向德国工人指出德国无产阶级不够成熟，而你们却非常笨拙地向德国手工业者的民族感情和等级偏见阿谀逢迎，当然这样做是比较受欢

迎的，正像民主派把**人民**这个词变成圣物一样，你们用**无产阶级**这个词来玩这套把戏。你们像民主派一样，用革命的空话代替革命的发展”等等。

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10月25日—12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9页。

一般资本主义特别是帝国主义把民主变为幻想，同时，资本主义又造成群众中的民主意向，建立民主设施，使得否定民主的帝国主义和渴望民主的群众之间的对抗尖锐化。

一般资本主义特别是帝国主义把民主变为幻想，同时，资本主义又造成群众中的民主意向，建立民主设施，使得否定民主的帝国主义和渴望民主的群众之间的对抗尖锐化。不能用任何最“理想的”民主改造，而只能用经济变革来推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但是无产阶级如果不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受到教育，就不能实现经济变革。不**夺取银行**，不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就不能战胜资本主义，但是如果不组织全体人民对从资产阶级手里夺来的生产资料进行民主管理，不吸收全体劳动群众，即无产者、半无产者和小农来民主地组织自己的队伍、自己的力量和参加国家的管理，就不能实现这些革命措施。帝国主义战争可以说是对民主的三重否定（一、任何战争都是用暴力代替“权利”；二、帝国主义本身就是对民主的否定；三、帝国主义战争使共和国完全等同于君主国），但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起义的兴起和发展，同民主的反抗和义愤的增长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社会主义导致**任何**国家

的消亡，因而也导致任何民主的消亡，但是社会主义不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能实现的，无产阶级专政把对付资产阶级即少数居民的暴力同充分发扬民主结合起来，而民主就是全体居民群众真正平等地、真正普遍地参与一切国家事务，参与解决有关消灭资本主义的一切复杂问题。

……

马克思主义解决民主问题的方法就在于，进行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要利用一切民主设施和反资产阶级的意向，为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和推翻资产阶级作好准备。这种利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经济派”、托尔斯泰主义者等人往往认为，这似乎是对“资产阶级的”和机会主义的观点所作的一种不正当的让步，正如彼·基辅斯基认为，“在金融资本时代”坚持民族自决，似乎是对资产阶级观点所作的一种不正当的让步一样。马克思主义教导说，拒绝利用由资产阶级建立的和被资产阶级歪曲的目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民主设施，——这样去“同机会主义作斗争”，就是向机会主义彻底投降！

列宁：《对彼·基辅斯基（尤·皮达可夫）〈无产阶级和金融时代的“民族自决权”〉一文的回答》（1916年8—9月），《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112页。

普选权正是一根磁针，它虽然摆动了几次，但最后总是指向这个负有统治使命的阶级。

《国民报》认为，存在着一种统一的全民意志。这种意志

并不是互相矛盾的各种意志的总和，而是一种统一的、一定的意志。这到底是什么呢？

这就是多数人的意志。

而多数人的意志又是什么呢？

这就是从多数人的利益、生活状况和生存条件中产生的一种意志。

可见，要有同样的意志，这些多数人就要有同样的利益、同样的生活状况、同样的生存条件，或者他们至少必须在自己的利益上、在自己的生活状况上、在自己的生存条件上，暂时互相密切地结合在一起。

说得明白一点，所谓人民的意志，多数人的意志，并不是个别等级和阶级的意志，而是**唯一的一个阶级**和在社会关系即在工业和商业关系方面都从属于这个唯一的统治阶级的其他阶级以及阶级的某些部分的意志。

“从这里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所谓全民意志就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吗？

当然是这样。普选权正是一根磁针，它虽然摆动了几次，但最后总是指向这个负有统治使命的阶级。

马克思：《柏林〈国民报〉致初选人》（1849年1月25—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35页。

普选权实际上只是资产阶级在1831年通过议会改革所取得的那种东西的奇异的概括性表现。

普选权在英国所产生的效果同它在法国所产生的效果相

反，正像这两个国家的城市和农村的情况相反一样。这也就说明了法国和英国对普选权的要求具有恰好相反的性质。在那里，这是政治思想家的要求，这种要求在某种程度上（以他的信仰为转移）能够得到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支持。而在这里，这种要求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为一方和人民群众为另一方之间的分水岭。在那里，它具有政治问题的性质；而在这里，它具有社会问题的性质。在英国，当普选权成为人民群众的口号以前，争取普选权的鼓动工作就已有了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时期。在法国，普选权先实行，然后才开始它的历史道路。在法国，遭到毁灭的是普选权的实践；而在英国，则是普选权的思想。在本世纪的最初几十年，在弗兰西斯·伯德特爵士、卡特赖特少校和科贝特时代，普选权还带有不明显的唯心主义性质；由于这种性质，普选权就成为一切不直接属于执政阶级的居民阶层的良好愿望。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普选权实际上只是资产阶级在 1831 年通过议会改革所取得的那种东西的奇异的概括性表现。而在 1838 年以后，对普选权的要求在英国就不具有真正的特殊的性质。证据是：连休谟和奥康奈尔也在宪章上签了名。1842 年，最后的幻想消失了。这时洛维特做了一次最后的但是徒劳无益的尝试，企图把对普选权的要求说成是所谓激进派和人民群众的普遍的要求。从这时起，就不再存在对普选权实质的任何怀疑了。对它的名称也没有疑问了。这是人民群众的宪章，它意味着人民群众取得作为实现他们的社会要求的手段的政治权力。1848 年普选权在法国被理解为全民团结的口号，而在英国却被理解为战争的口号。在那里，普选权是革命的直接内容；在这里，

革命是普选权的直接内容。如果追溯一下普选权在英国的历史，那么可以看到，随着英国现代社会及其永无止境的矛盾——由于工业的发展而产生的矛盾的发展，普选权逐渐地摆脱了唯心主义的性质。

马克思：《行政改革协会。——人民宪章》（1855年6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00—301页。

［二］资产阶级自由

……伪善的隐蔽的奴隶制至少在口头上是承认自由权的……这就是历史性的进步……

农奴在战争时期为自己的主人卖命；工厂工人在和平时期为老板卖命。农奴的主人是野蛮人，他把农奴看作牲口；工人的老板是文明人，他把工人看作机器。总之，这两种人的情况大体上是一样的，如果说哪一种人的情况更坏一些的话，那自然就是自由的工人。两种人都是奴隶，对前一种人的奴役不是伪善的，是明显的，公开的，而对后一种人的奴役却是伪善的，狡猾地蒙蔽着被奴役者本人和所有其他的人，这是比旧的农奴制更坏的神学的[①]奴隶制。托利党人慈善家们称工厂工人为white slaves（白奴），那是正确的。但是这种伪善的隐蔽的奴隶制至少在口头上是承认自由权的；它在爱好自由的舆论面前是要低头的；而比起旧的奴隶制来，这就是历史性的

① 在1887年和1892年的英译本中是“伪善的”（hypocritical）。——编者注

进步，至少是自由的原则已被承认了，而被压迫者自己也关心如何使这个原则实现。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 年 9 月—1845 年 3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471—472 页。

资产阶级为了达到它的目的，就必然要取得自由讨论自身利益、观点以及政府的行动的可能。

贵族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资产阶级化了。他们抛弃了信义、爱情和信仰，大都开始贩卖甜菜、烧酒和羊毛。羊毛市场成了他们的主要竞争场所。另一方面，在发展过程中，专制国家的旧社会基础已经消失，它已成了束缚新的资产阶级社会及其改变了的生产方式和改变了的需求的桎梏。资产阶级从自己的物质利益出发，必然要提出参与政权的要求。只有它自己才能利用各项法律来满足它的商业和工业的要求。它必然要从既不学无术而又妄自尊大的腐朽的官僚手中把照管它的这些“最神圣的利益”的权力夺取过来。它必然要要求监督国家财政的权利，因为它认为自己是财富的创造者。资产阶级在剥夺了官僚对所谓教育的垄断权以后，在意识到它在真正理解资产阶级社会要求方面优越于官僚以后，它也想获得同它的社会地位相称的政治地位。资产阶级为了达到它的目的，就必然要取得自由讨论自身利益、观点以及政府的行动的可能。它把这叫作“**出版自由权**”。它必然要取得毫无阻碍地**结成社团**的可能。它把这叫作“**结社自由权**”。同样，它必然要取得**信仰自由**等等，而这是**自由竞争**的必然后果。

普鲁士资产阶级在1848年3月前夕曾走上了实现自己全部愿望的正确道路。

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1848年12月9、11、15和2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1页。

迄今为止的所有宪法都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只有苏维埃宪法现在和将来都始终不渝地有利于劳动者,是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强有力的工具。

迄今为止的所有宪法都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只有苏维埃宪法现在和将来都始终不渝地有利于劳动者,是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强有力的工具。列宁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资产阶级宪法与苏维埃宪法在"出版和集会自由"的要求上的区别。在那里,出版和集会自由为资产阶级独自垄断;在那里,资产阶级在自己的沙龙里集会,发行用银行的资金出版的大型报纸,以散布谎言和诽谤,毒化人民群众的意识;在那里,扼杀工人报刊,不准工人报刊对掠夺性战争发表自己的言论和意见,迫害反对战争的人,禁止他们集会。而在这里,在苏维埃俄国,出版工人报刊,它们为劳动者服务。在俄国,我们剥夺资产阶级豪华的宅第馆所,交给工人使用,作为他们的俱乐部,这才是真正的集会自由。

列宁:《在普列斯尼亚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7月26日),《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04页。

……为了真正的自由它(世俗社会主义)除了要求唯心

的“意志”外，还要求完全能感触得到的物质的条件。

世俗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原理就否认**纯理论领域内的**解放，认为这是幻想，为了**真正的**自由它除了要求唯心的“**意志**”外，还要求完全能感触得到的物质的条件。“群众”认为，甚至为了争得一些只是用来从事“**理论**”研究的时间和经费，也必须进行物质的、实际的变革；这样的“**群众**”在神圣的批判面前显得多么低下呵！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 年 9 月—1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21 页。

自由！承认自由人性！特权！多么动听的字眼。为了进行辩护何不使用这些字眼来规避某些问题！

自由！承认自由人性！特权！多么动听的字眼。为了进行辩护何不使用这些字眼来规避某些问题！

自由？这里指的是**政治**自由。已经向鲍威尔先生指出，当犹太人要求自由而又不想放弃自己的宗教的时候，他正是在“**从事政治**”，而不是提出任何与**政治**自由相抵触的条件。已经向鲍威尔先生指出，把**人划分**为非宗教的**公民**和宗教的**个人**，这同政治解放毫不矛盾。已经向他指出，当国家摆脱了**国教**并且让宗教在市民社会范围内存在时，国家就从宗教下解放出来了，同样，当单个的**人**已经不再把宗教当作**公事**而当作自己的**私事**来对待时，他**在政治上**也就从宗教下解放出来了。最后，已经指出，法国**革命**对**宗教**的**恐怖**态度远没有驳倒这种看法，相反地，却证实了这种看法。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 年 9 月—1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43 页。

宪法的每一条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

宪法的每一条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所以,当自由这个**名字**还备受尊重,而只是对它的真正实现设下了——当然是根据合法的理由——种种障碍时,不管这种自由在**日常的**现实中的存在怎样被彻底消灭,它在宪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无损、不可侵犯的。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 年 12 月中—1852 年 3 月 25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98 页。

自由的理论和特权的实际势力之间不但不存在任何矛盾,特权的实际消灭、自由的工业和自由的贸易等反而与"自由的理论"相适应……

现代的"**公法状况**"的基础、现代发达的国家的基础,并不像**批判**所想的那样是由特权来统治的社会,而是**废除了特权和消灭了特权**的社会,是使在政治上仍被特权束缚的生活要素获得自由活动场所的发达的**市民社会**。在这里,**任何"特权的闭塞"**既不和别的闭塞对立,也不和公法状况对立。

自由工业和自由贸易消除了特权的闭塞，从而也消除了各种特权的闭塞之间的斗争；相反地，它们却把从特权下解放出来的、已经不和别人联系（即使是表面上的一般结合）的人放在特权的地位上（这种特权把人们和社会整体分离开来，而同时又把他们结合在一个规模很小的、特殊的团体里面），并且引起了人反对人、个人反对个人的斗争。同样整个的**市民社会**只是由于**个人的特性**而彼此分离的个人之间的相互斗争，是摆脱了特权桎梏的自发的生命力的不可遏止的普遍运动。**民主的代议制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对立是公法**团体**和**奴隶制**的**典型**对立的完成。在现代世界中每一个人都是奴隶制度的成员，**同时**也是公法团体的成员。**市民社会的奴隶制**恰恰在**表面**上看来是最大的**自由**，因为它似乎是个人**独立**的完备形式；这种个人往往把像财产、工业、宗教等这些孤立的生活要素所表现的那种既不再受一般的结合也不再受人所约束的不可遏止的运动，当作**自己的**自由，但是，这样的运动反而成了个人的完备的奴隶制和人性的直接对立物。这里，代替了**特权**的是**法**。

这么说来，在这里，自由的理论和特权的实际势力之间不但不存在任何矛盾，特权的实际消灭、**自由的**工业和**自由的**贸易等反而与“自由的理论”相适应，**任何**特权的闭塞都不与公法状况相对立，批判所发现的矛盾已被**消除**——只有在这里，**才存在着完备的现代国家**。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 年 9 月—1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48—149 页。

对于他(工人),事情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这种表面的自由一方面虽然也一定会给他带来某些真正的自由,可是另一方面也有它的坏处,即没有人保障他的生计。

这种奴隶制和旧式的公开的奴隶制之间的全部差别仅仅在于现代的工人似乎是自由的,因为他不是一次就永远卖掉,而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按日、按星期、按年卖掉的,因为不是一个主人把他卖给另一个主人,而是他自己不得不这样出卖自己,因为他不是某一个人的奴隶,而是整个有产阶级的奴隶。对于他,事情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这种表面的自由一方面虽然也一定会给他带来某些真正的自由,可是另一方面也有它的坏处,即没有人保障他的生计。他的主人(资产阶级)如果对他的工作、对他的生存不再感到兴趣,就随时可以把他赶出去,让他去饿死。可是,对资产阶级来说,现在的情况比起旧的奴隶制来却是无比地有利:他们可以随便在什么时候辞退自己的工人,同时并不因此使投下的资本受到损失,工人劳动的代价无论如何要比奴隶劳动的代价便宜得多,这是亚当·斯密为了安慰他们而给他们算清了的①。

---

① "人们说,奴隶体力的消耗是由他的主人花钱来补偿的,而自由工人体力的消耗则由自己花钱来补偿。实际上自由工人体力的消耗也是由他的主人花钱来补偿的。短工和仆人等等的工资应当保持一定的高度,以便让他们能够按照社会方面日益增长、保持稳定、或不断降低的需求来延续短工和仆人的后代。但是,如果说自由工人体力的消耗也是由他的主人来花钱来补偿的,那么这种消耗比起奴隶体力的消耗来要主人花的钱通常到底要少得多的。用来恢复或补偿奴隶体力的消耗的基金通常是由懒散的主人和漫不经心的监工来管理的",如此等等(A. Smith.《Wealth of Nations》[亚当·斯密"原富"]麦克库洛赫第4卷版第1卷第8节第134页)。——恩格斯原注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 年 9 月—1845 年 3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364 页。

这些自由中的每一种都被宣布为法国公民的绝对权利,然而总是加上一个附带条件……

资产阶级共和派独占的**统治**,只是从 1848 年 6 月 24 日起存在到 12 月 10 日止。这种统治的结果就是**拟定共和主义宪法和宣布巴黎戒严**。

新的**宪法**实质上不过是 1830 年宪章的共和主义化的版本。七月王朝的过高的选举资格限制,甚至把资产阶级的一大部分人也排挤在政治统治之外,这是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存在不相容的。二月革命立刻取消了这种选举资格限制而宣布了直接的普遍的选举权。资产阶级共和派不能把这一事件一笔勾销。他们只得补充了一个限制条款,规定选民必须是在选区居住 6 个月的。旧有的行政、市政、司法和军队等等组织,仍然原封不动;宪法上作了变更,而这种变更只涉及目录而没有涉及内容,只涉及名称而没有涉及事物。

1848 年各种自由的必然总汇,人身、新闻出版、言论、结社、集会、教育和宗教等自由,都穿上宪法制服而成为不可侵犯的了。这些自由中的每一种都被宣布为法国公民的**绝对**权利,然而总是加上一个附带条件,说明它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时才是无限制的,而这些法律正是要使各种个人自由彼此之间以及同公共安全协调起来。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中—1852年3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6—597页。

难道任何国债不是压在整个国民经济身上的抵押,不是阉割人民的自由吗?

然而,即使对撒丁来说,新公债也提醒我们一个可恶的事实:在我们这个时代,为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人民刚迈出第一步,就好像有一种恶鬼般的宿命力量把他们推向新的奴役。难道任何国债不是压在整个国民经济身上的抵押,不是阉割人民的自由吗?难道它不是产生新型的名叫国家债权人的无形暴君吗?无论如何,如果说法国人为了继续做奴隶而在不到10年之内把自己的国债增加了一倍,那么,意大利人为了获得自由,大概要担负起同样的债务了。

马克思:《新的撒丁公债。——行将举办的法国公债和印商公债》(1860年8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6页。

自由主义的关于进步的学说,也包括着社会方面的进步,而那些只是倾向于虚饰的奇谈怪论的所谓的社会主义者们,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他们包办了社会的进步。

至于作者的倾向,那我们在其中也可以分别出双重的趋向。因为他极力证明,现代社会,从经济上来考察,孕育着另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所以他力图在社会关系方面作为规律

确立的，只是达尔文在自然史方面所确立的同一个逐渐变革的过程。这种逐渐的变化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在社会关系方面也在发生着，从古代起，经过中世纪到我们现在为止；而就我们所知，在科学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认真地断定说，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已经对于现代社会的未来发展做出了结论。反之，自由主义的关于进步的学说，也包括着社会方面的进步，而那些只是倾向于虚饰的奇谈怪论的所谓的社会主义者们，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他们包办了社会的进步。应该承认，马克思与通常社会主义者比较起来的功绩是：他指出，甚至在现代条件的极端片面发展伴随直接的恐惧的后果的地方也存在着进步。这一点在描写由整个工厂制度而来的贫富等对比时到处都可以看到。正由于对论题的这种批评的观点，作者提供了——无疑地是违反着自己的意志的——反对任何专门家的社会主义[Sozialismus von Fach]的最有力的论据。

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观察家报〉作》（1887年12月12日—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55页。

即使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集会自由”也只是一句空话，因为富人拥有一切最好的公共建筑物和私人建筑物，同时还有足够的空闲时间去开会，开起会来还有资产阶级政权机构保护。

“集会自由”可以看作是代表“纯粹民主”要求的典型口号。任何一个没有脱离本阶级的觉悟工人都不难明白，在剥

削者不甘心被推翻而进行反抗、死抱住自己特权不放的时候和情况下,答应给剥削者以集会自由,是很荒唐的。当资产阶级还是革命阶级的时候,无论在1649年的英国,或者在1793年的法国,它都没有把"集会自由"给予那些招引外国军队并"集会"策划复辟活动的君主派分子和贵族。如果现在这些早已变得反动的资产阶级要求无产阶级事先保证,尽管资本家一定会拼命抗拒对他们的剥夺,也要给这些剥削者以"集会自由",那么工人们只能对资产阶级的虚伪付之一笑。

另一方面,工人们很清楚,即使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集会自由"也只是一句空话,因为富人拥有一切最好的公共建筑物和私人建筑物,同时还有足够的空闲时间去开会,开起会来还有资产阶级政权机构保护。而城乡无产者和小农,即大多数居民,既无房屋开会,又无空闲时间,更无人保护。只要情况还是这样,"平等"即"纯粹民主"就是骗局。要取得真正的平等,要真正实现劳动者的民主,首先必须没收剥削者的一切公共建筑物和豪华的私人建筑物,首先必须让劳动者有空闲时间,还必须由武装工人而不是由贵族军官或资本家军官及其唯命是从的士兵来保护劳动者的集会自由。

只有在实行这种变革之后再来谈集会自由和平等,才不是对工人、劳动者和穷人的嘲弄。但是能够实行这种变革的,只有劳动者的先锋队,即推翻资产阶级剥削者的无产阶级。

列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1919年3月上旬),《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页。

资本家总是把富人发横财的自由和工人饿死的自由叫作“自由”。资本家把富人收买报刊的自由、利用他们的财富假造所谓社会舆论的自由叫作出版自由。

“出版自由”也是“纯粹民主”的主要口号之一。但是工人们知道,而且各国社会党人也曾无数次承认,只要最好的印刷所和大量的纸张被资本家霸占,只要资本还保持着对报刊的控制(在世界各国,民主制度与共和制度愈发达,这种控制也就表现得愈明显,愈露骨,愈无耻,例如美国就是这样),这种自由就是骗局。要为劳动者、为工人和农民争得真正的平等和真正的民主,首先必须剥夺资本雇用著作家、收买出版社和报纸的可能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推翻资本的压迫,打倒剥削者,镇压他们的反抗。资本家总是把富人发横财的自由和工人饿死的自由叫作“自由”。资本家把富人收买报刊的自由、利用他们的财富假造所谓社会舆论的自由叫作出版自由。这些事实再次表明,维护“纯粹民主”实际上就是维护使富人能控制群众教育工具的最肮脏最腐败的制度,就是欺骗人民,用冠冕堂皇然而虚伪透顶的言辞诱使人民放弃把报刊从资本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具体历史任务。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将是由共产主义者建立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会有靠损害别人来发财致富的可能性,不会有直接或间接使报刊屈从于货币权力的客观可能性,不会有任何东西能阻碍每个劳动者(或大大小小的劳动者团体)享有并行使其使用公有印刷所及公有纸张的平等权利。

列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1919年3月上旬),《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696页。

资本家把劳动叫作自由劳动，然而农民和工人却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资本家，结果是他们只有饿死的自由。

同志们！这个地方以前是沙皇的纪念碑，但是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给劳动解放纪念碑奠基了。资本家把劳动叫作自由劳动，然而农民和工人却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资本家，结果是他们只有饿死的自由。我们把这种劳动叫作雇佣奴隶制。我们知道，在目前艰难时期的条件下要很好地组织自由劳动和进行工作是不容易的。今天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在这条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我们只要这样继续走下去，就能建立真正自由的劳动。

列宁：《在劳动解放纪念碑奠基典礼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20年5月1日），《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7页。

［三］资产阶级的平等

建立在这一基础（交换价值过程）上的所有权、自由和平等的三位一体，不仅在理论上首先是由17和18世纪的意大利的、英国的和法国的经济学家们加以论述的。而且这种三位一体也只是在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中才得到实现。

因此，流通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过程，不但尊重自由和平等，而且自由和平等是它的产物；它是自由和平等的现实基础。作为纯粹观念，自由和平等是交换价值过程的各种要素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自由和平等不过是另一次方上的再生产物而

已。这种情况也已为历史所证实。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所有权、自由和平等的三位一体,不仅在理论上首先是由17和18世纪的意大利的、英国的和法国的经济学家们加以论述的。而且这种三位一体也只是在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中才得到实现。古代世界不是以交换价值为生产的基础,相反地是由于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毁灭,它产生了具有完全相反的和主要只是地方性内容的自由和平等。另一方面,在古代世界中,简单流通的要素在自由民范围内至少已发展起来,所以下面这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在罗马,特别是在罗马帝国——它的历史正是古代共同体解体的历史——,法人的规定,交换过程的主体的规定,已得到阐述,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就其基本规定来说已经制定出来,而首先为了和中世纪相对抗,它必然被当作新兴工业社会的法被提出来。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5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2页。

资产阶级在同中世纪的、封建的、农奴制的等级特权的斗争中,提出了全体公民权利平等的要求。

社会民主党人所理解的平等,在政治方面是指**权利平等**,在经济方面,我们刚才已经说过,是指**消灭阶级**。至于确立人类在力气和才能(体力和智力)上的平等,社会主义者连想也没有想过。

凡达到一定年龄的国家公民,只要不是患通常的痴呆病,也不是患自由派教授那样的痴呆病,都享有同样的政治权利,

这是权利平等的要求。首先提出这种要求的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人所共知的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可以证明这一点,如果杜冈先生不是专门为了欺骗学生和工人,不是为了用"消灭"社会主义来讨好掌权者而引证"经验"的话,他是很容易弄清这一点的。

资产阶级在同中世纪的、封建的、农奴制的等级特权的斗争中,提出了全体公民权利**平等**的要求。比如俄国跟美国、瑞士等国家不同,直到现在,在俄国的整个政治生活中,无论是国务会议选举,还是杜马的选举,无论是地方管理,还是纳税以及其他许许多多方面,都仍然保持着贵族的等级特权。

就是最迟钝最不开展的人也能领悟到,在体力和智力上,贵族等级的每个人都**不是**平等的,"纳税等级"、"平民"、"下层"或"无特权的"农民等级也一样,人们彼此之间也**不是**平等的。但是,所有的贵族在享有**权利**这一点上都是**平等的**,而所有的农民在不享有权利这一点上也都是平等的。

列宁:《自由派教授论平等》(1914 年 3 月 11 日〔24 日〕),《列宁全集》第 24 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91—392 页。

平等思想本身就是商品生产关系的反映,资产阶级借口个人绝对平等,把这种思想变为反对消灭阶级的斗争工具。

资产阶级民主由它的本性所决定的一个特点就是抽象地或从形式上提出平等问题,包括民族平等问题。资产阶级民主在个人平等的名义下,宣布有产者和无产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形式上或法律上的平等,用这种弥天大谎来欺骗被压

迫阶级。平等思想本身就是商品生产关系的反映，资产阶级借口个人绝对平等，把这种思想变为反对消灭阶级的斗争工具。要求平等的实际含义只能是要求消灭阶级。

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1920年6—7月），《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6页。

资本主义既有形式上的平等，又有经济上的不平等和随之而来的社会的不平等。

资本主义既有形式上的平等，又有经济上的不平等和随之而来的社会的不平等。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之一，是资产阶级的拥护者自由派用谎言掩盖着的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却不了解的一个特点。由于资本主义的这一特点，在争取经济平等的坚决斗争中，就必须公开承认存在着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必须把对这种公开的承认作为无产阶级国家制度的基础（苏维埃宪法）。

但是资本主义连形式上的平等（法律上的平等，饱食者和挨饿者、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平等”）也**不能**彻底做到。这种不彻底性的最鲜明的表现之一，就是男女间**权利不平等**。权利的完全平等在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甚至在最共和、最民主、最先进的资产阶级国家里，也是不曾有过的。

列宁：《迎接国际劳动妇女节》（1920年3月4日），《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3页。

各阶级的平等，照字面上理解，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所拼命鼓吹的"资本和劳动的协调"。

各阶级的平等,照字面上理解,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所拼命鼓吹的"**资本和劳动的协调**"。不是**各阶级的平等**——这是谬论,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相反地是消灭阶级,这才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真正秘密,也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伟大目标。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1869 年 3 月 9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394 页。

……这些人(德国社会民主党)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

……在德国,我们党内流行着一种腐败的风气,在群众中有,在领导(上层阶级出身的分子和"工人")中尤为强烈。同拉萨尔分子的妥协已经导致同其他不彻底分子的妥协:在柏林(通过莫斯特)同杜林及其"崇拜者"妥协,此外,也同一帮不成熟的大学生和过分聪明的博士妥协,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一个人在运用它以前认真地、客观地研究它)。《未来》杂志的出版人赫希柏格博士先生是这种倾向的一个代表者,他已经"捐资"入党,——我假定他怀有"无比高贵的"意图,但是,我不理会任何"意图"。世界上很难找到一

种比他的《未来》杂志的纲领①更可悲、更“谦逊地自负”的东西了。

马克思:《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1877年10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7页。

只要存在着资本的统治,任何平等,即使是小业主即农民使用全民土地的平等,都不会使人民摆脱贫困、失业和压迫。

工人阶级争取自由,为的是使自由为全体人民服务,而不是仅仅为达官显贵效劳。工人需要自由,为的是展开广泛的斗争,使劳动彻底摆脱资本的压迫,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只要存在着资本的统治,任何平等,即使是小业主即农民使用全民土地的平等,都不会使人民摆脱贫困、失业和压迫。只有全体工人团结起来,在劳动者群众的支持下,才能打碎压迫各国工人的资本的枷锁。在社会主义社会,自由和平等不会是骗人的了;劳动者不会因小规模的单独经营而分散;共同劳动积累起来的财富将造福人民群众,而不是压迫人民群众;劳动者的统治将消灭任何民族、宗教或性别之间的任何压迫。

列宁:《告选民书草案》(1906年11月23日〔12月6日〕),《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4页。

实行目前那种平等的民主共和国是虚伪的,是骗人的,在

① 指赫希柏格在《未来》杂志上发表的社论《社会主义和科学》。——编者注

那里没有实现平等，也不可能有平等；妨碍人们享受这种平等的，是生产资料、货币和资本的私有权。

革命在自己的进程中把一个个剥削阶级相继打倒。它首先打倒了君主制，把平等仅仅理解为要有选举出来的政权，要有共和国。革命向前发展，打倒了地主，你们知道，当时反对中世纪制度、反对封建制度的全部斗争，是在“平等”的口号下进行的。不分等级，一律平等，百万富翁和穷光蛋也一律平等，——载入史册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最伟大的革命家都是这样讲，这样想，这样真心认为的。反对地主的革命是在平等的口号下进行的，那时人们把百万富翁和工人应有同样的权利叫作平等。革命又向前发展了，它说，“平等”（我们在自己的纲领中是没有专门谈到这一点，但我们总不能没完没了地重复。这一点就同我们谈到自由时所说的一样清楚）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的压迫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这是我们说的，而且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们说，实行目前那种平等的民主共和国是虚伪的，是骗人的，在那里没有实现平等，也不可能有平等；妨碍人们享受这种平等的，是生产资料、货币和资本的私有权。富人房产的所有权可以一下子夺过来，资本和生产工具也可以较快地夺过来，但是要把货币的所有权拿过来，你试试看吧。

要知道，货币是社会财富的结晶，是社会劳动的结晶，货币是向一切劳动者征收贡赋的凭证，货币是昨天的剥削的残余。这就是所谓货币。能不能想法一下子把货币消灭呢？不能。还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前，社会主义者就说过，货币是不能一下子就废除的，而我们根据切身的经验也可以证实这一点。

要消灭货币，需要很多技术上的成就，更困难得多和重要得多的是组织上的成就。而在货币消灭之前，平等始终只能是口头上的、宪法上的，每个有货币的人都有事实上的剥削权利。我们没有做到一下子废除货币。我们说，目前货币还保留着，而且在从资本主义旧社会向社会主义新社会过渡的时期，还要保留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平等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

恩格斯说得万分正确：平等的概念如果与消灭阶级无关，那就是一种极端愚蠢而荒谬的偏见。资产阶级的教授们企图用平等这个概念来证明我们想使一个人同其他的人平等。他们企图用他们自己捏造的这种无稽之谈来责备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由于自己无知，竟不知道，社会主义者，即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过，如果不把平等理解为消灭阶级，平等就是一句空话。我们要消灭阶级，从这方面说，我们是主张平等的。但是硬说我们想使所有的人彼此平等，那就是无谓的空谈和知识分子的愚蠢的捏造，这些知识分子有时装腔作势，玩弄字眼，然而毫无内容，尽管他们把自己称为作家，有时称为学者，或者称为别的什么人。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争取的平等就是消灭阶级。因此也要消灭工农之间的阶级差别。这正是我们的目的。工农之间还有阶级差别的社会，既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解释社会主义这个字眼，是可以把这种社会叫作社会主义社会的，但这是一种诡辩，是字眼上的争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争论字眼是没有必要的。有一点很清楚：只要工农之间的阶级差别还存在，

我们就不能无所顾忌地谈论平等，以免为资产阶级张目。农民是宗法制时代的阶级，是由几十年几百年的奴隶制培植起来的阶级；农民在这整个期间一直是**小业主**，起初从属于其他阶级，后来在形式上是自由和平等的，但都是**私有者和食物的占有者**。

列宁：《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9 年 5 月），《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15—816 页。

他们所说的自由就是少数人牟取暴利的自由、发财的自由、商业周转的自由；他们所说的平等就是资本家和工人的平等；边沁的统治就是小资产阶级关于自由平等的偏见的统治。

同志们，你们也许记得马克思是怎样描写工人进入现代资本主义工厂的，马克思在分析有纪律的、文明的和“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奴隶地位时是怎样探究劳动者遭受资本压迫的原因的，他是怎样说明生产过程的原理的，他是怎样描述工人进入资本主义工厂，使得资本主义工厂能掠夺剩余价值、奠定整个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基础、造成少数人致富而群众受压迫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当马克思在他那部著作中谈到这个最重要最根本的地方即着手分析资本主义剥削时，他说了这样一句讽刺话：“我要引你们去的地方，乃是资本家榨取利润的场所，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由、平等和边沁。”马克思说这句话是要强调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所宣扬所辩护的思想，因为在战胜了封建主的资产阶级看来，在以资本的统治、金钱的统治、对劳动者的剥削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

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正是“自由、平等和边沁”。他们所说的自由就是少数人牟取暴利的自由、发财的自由、商业周转的自由；他们所说的平等就是资本家和工人的平等；边沁的统治就是小资产阶级关于自由平等的偏见的统治。

列宁：《在全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9 年 7 月 13 日），《列宁全集》第 37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24 页。

用“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来代替“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这也是很成问题的。

用“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来代替“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这也是很成问题的。在国和国、省和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间总会有生活条件方面的某种不平等存在，这种不平等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阿尔卑斯山的居民和平原上的居民的生活条件总是不同的。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平等的王国，这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为根据的片面的法国看法，这种看法作为一定的发展阶段在当时当地曾经是正确的，但是，像以前的各个社会主义学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样，它现在也应当被克服，因为它只能引起思想混乱，而且因为已经有了阐述这一问题的更精确的方法。

恩格斯：《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75 年 3 月 18 日—28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24 页。

[四]资产阶级的博爱

博爱只有在资产阶级利益还和无产阶级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继续存在。

博爱只有在资产阶级利益还和无产阶级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继续存在。学究们拘守1793年旧的革命传统;社会主义的空谈家曾为人民向资产阶级企求施舍,并且被许可做冗长的说教和败坏自己的声誉,直到把无产阶级的狮子催眠入睡为止;共和党人要求全部旧的资产阶级制度,只是不要戴王冠的首领;王朝反对派从事变中得到的不是内阁的更换,而是王朝的崩溃;正统主义者不是想脱去奴仆的服装,而是仅仅想改变一下式样,——这些人物就是人民在实现自己的二月革命时的同盟者。

恩格斯:《六月革命》(1848年6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4页。

1856年的宣言在慈善的词句后面隐藏着很大的不人道。

事实上,1856年的宣言在慈善的词句后面隐藏着很大的不人道。它原则上把战争从各国人民的战争变成了各国政府的战争。它赋予财产以不可侵犯性,但是对人却不给予这种不可侵犯性。它为贸易挡住了战争恐怖,从而使工商业阶级可以无视这种恐怖。此外,不言而喻,1856年宣言的人道借口只是给欧洲观众看的,和神圣同盟的宗教借口完全一样。

马克思:《华盛顿政府与西方列强》(1861 年 12 月 20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5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452 页。

资产阶级所关心的是伪善地打着和平的幌子甚至打着博爱的幌子来进行这个战争……

如果说,资产阶级所关心的是伪善地打着和平的幌子甚至打着博爱的幌子来进行这个战争,那么,相反地,只有揭露事实的真相,只有撕开这个伪善的假面具才能对工人有利;所以,甚至工人对资产阶级及其奴仆所采取的最强暴的敌对行动,也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暗中对付工人的种种手段的公开的毫不掩饰的表现而已。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 年 9 月—1845 年 3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501 页。

临时政府曾经断言,似乎用"博爱"的词句可以消灭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

临时政府曾经断言,似乎用"博爱"的词句可以消灭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借助幻想可以消除阶级斗争,它对民族矛盾和对外战争也完全采取这种态度。在临时政府的庇护下,波兰、意大利和匈牙利的压迫者和法国资产阶级一起又重新站稳了脚跟,而后者在 6 月底就已实现了拉马丁的博爱,为了在国内能够从容地进行内战,为了不妨碍"正直的"温和的共和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去消灭胜利了的红色共和国——工人共和国,卡芬雅克支持对外媾和。

马克思:《法兰西共和国的对外政策》(1849年4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69页。

与这种在想象中消灭阶级关系相适应的词句,就是博爱——人人都骨肉相连、情同手足。这样和气地抛开阶级矛盾,这样温柔地调和对立的阶级利益,这样想入非非地超越阶级斗争……

由巴黎工人创造出来的卢森堡宫委员会总还算有一个功劳,这就是它从欧洲的一个讲坛上泄露了19世纪革命的秘密:**无产阶级的解放**。《通报》在不得不正式宣传一些"荒诞呓语"时脸红了,这些"荒诞呓语"原先埋藏在社会主义者的伪经里,只是间或作为一种又可怕又可笑的遥远的奇谈传进资产阶级的耳鼓。欧洲忽然从它那资产阶级的假寐中惊醒了。于是,在把金融贵族和一般资产阶级混为一谈的那些无产者的观念里,在甚至否认有阶级存在或至多也只认为阶级不过是立宪君主制产物的那些共和主义庸人的想象里,在先前被拒于政权之外的那些资产阶级集团伪善的词句里,**资产阶级的统治**已随着共和国的成立而被排除了。这时,一切保皇党人都变成了共和党人,巴黎所有百万富翁都变成了工人。与这种在想象中消灭阶级关系相适应的词句,就是**博爱**——人人都骨肉相连、情同手足。这样和气地抛开阶级矛盾,这样温柔地调和对立的阶级利益,这样想入非非地超越阶级斗争,一句话,博爱——这就是二月革命的真正口号。只是纯粹出于**误会**才造成各阶级的分裂,于是2月24日拉马丁就把临时

政府叫作“消除**各阶级间所存在的可怕误会**的政府”。巴黎无产阶级就沉醉在这种宽大仁慈的博爱气氛中了。

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49 年底—1850 年 3 月底和 1850 年 10 月—11 月 1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42 页。

(六)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价值观基础

[一]消灭阶级

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

因此,无产阶级所提出的平等要求有双重意义。或者它是对明显的社会不平等,对富人和穷人之间、主人和奴隶之间、骄奢淫逸者和饥饿者之间的对立的自发反应——特别是在初期,例如在农民战争中,情况就是这样;它作为这种自发反应,只是革命本能的表现,它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找到自己被提出的理由。或者它是从对资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反应中产生的,它从这种平等要求中吸取了或多或少正当的、可以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成了用资本家本身的主张发动工人起来反对资本家的鼓动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它是和资产阶级平等本身共存亡的。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我们已经举出了关于这方面的例子,

当我们转到杜林先生关于未来的幻想时，我们还会发现更多的这类例子。

可见，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所以，这样的平等观念说它是什么都行，就不能说是永恒的真理。如果它现在对广大公众来说——在这种或那种意义上——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它像马克思所说的，“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那么这不是由于它具有公理式的真理性，而是由于18世纪的思想得到普遍传播和仍然合乎时宜。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8—449页。

消灭阶级——这就是使全体公民在同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处于同等的地位……

美国没有贵族，而且资产者和无产者享有同样的政治权利。可是他们的阶级地位不是平等的：一些人，即资本家阶级，他们掌握生产资料，靠工人的无酬劳动生活；另一些人，即雇佣工人、无产者阶级，他们没有生产资料，全靠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维持生活。

消灭阶级——这就是使全体公民在同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处于同等的地位，这就是说，全体公民都同样可以利用公有的生产资料、公有的土地、公有的工厂等进行劳动。

列宁:《自由派教授论平等》(1914 年 3 月 11 日[24 日]),《列宁全集》第 24 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92 页。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①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②,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 年 12 月—1848 年 1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94 页。

① "联合起来的个人"在 1888 年英文版中是"巨大的全国联合体"。——编者注

② "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在 1872 年、1883 年和 1890 年德文版中是"消灭了阶级本身"。——编者注

……消灭阶级，这才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真正秘密，也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伟大目标。

各阶级的平等，照字面上理解，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所拼命鼓吹的“**资本和劳动的协调**”。不是**各阶级的平等**——这是谬论，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相反地是**消灭阶级**，这才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真正秘密，也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伟大目标。

但是，如果看一下“**各阶级的平等**”这句话的上下文，那么这个地方似乎纯粹是一个被忽略的笔误，总委员会相信，你们不会拒绝从你们的纲领中删去这个可能引起如此危险的误解的词句的。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1869 年 3 月 9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394 页。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

为了消灭阶级，首先就要推翻地主和资本家。这一部分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了，但这只是任务的一部分，而且**不是**最困难的部分。为了消灭阶级，其次就要消灭工农之间的差别，使**所有的人**都成为**工作者**。这不是一下子能够办到的。这是一个无比困难的任务，而且必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这个任务不能用推翻哪个阶级的办法来解决。要解决这个任务，只有把整个社会经济在组织上加以改造，只有从个体的、单独的小

商品经济过渡到公共的大经济。这样的过渡必然是非常长久的。采用急躁轻率的行政手段和立法手段，只会延缓这种过渡，给这种过渡造成困难。只有帮助农民大大改进以至根本改造全部农业技术，才能加速这种过渡。

列宁：《无产阶级时代的政治和经济》（1919年10月30日），《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2—273页。

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

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在海牙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1872年9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5页。

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

“伯尔尼”国际即黄色国际的错误，就在于它的领袖们只在口头上承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却害怕思索到底，害怕作出恰恰是资产阶级觉得特别可怕和绝对不能接

受的必然结论。他们害怕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也是一个阶级斗争时期，只要阶级没有消灭，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不过它的形式有所改变，在推翻资本后的初期变得更加残酷，更加独特。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并不停止阶级斗争，而是继续阶级斗争，直到消灭阶级——当然，是在另一种环境中，在另一种形式下，采取另一些手段。

"消灭阶级"是什么意思呢？凡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都承认社会主义的这个最终目的，但远不是所有的人都深入思索过它的含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显然，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要完成这一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必须克服无数小生产残余的反抗（往往是特别顽强特别难于克服的消极反抗），必须克服与这些残余相联系的巨大的习惯势力和保守势力。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 年 6 月 28 日），《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0—11 页。

我们这一时代的口号必然是而且应当是:消灭阶级,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情地揭露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关于自由和平等的偏见,同这些偏见作无情的斗争。

消灭封建主义及其遗迹、实行资产阶级的(也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制度的原则,在世界历史上用了整整一个时代。而这一世界历史时代的口号必然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消灭资本主义及其遗迹、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的原则,构成现在已经开始的世界历史的新时代的内容。我们这一时代的口号必然是而且应当是:消灭阶级,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情地揭露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关于自由和平等的偏见,同这些偏见作无情的斗争。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丝毫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政权、共产国际的根本原则等等问题。

列宁:《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1920年11月4日和12月11日),《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23页。

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

摆脱了私有制压迫的大工业的发展规模将十分宏伟,相形之下,目前的大工业状况将显得非常渺小,正像工场手工业和我们今天的大工业相比一样。工业的这种发展将给社会提供足够的产品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现在由于私有制的压迫和土地的分散而难以利用现有改良成果和科学成就的农业,将来同样也会进入崭新的繁荣时期,并将给社会提供足够的

产品。这样一来,社会将生产出足够的产品,可以组织分配以满足全体成员的需要。因此,社会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相互敌对的阶级就是多余的了。这种划分不仅是多余的,甚至是和新的社会制度互不相容的。阶级的存在是由分工引起的,现在这种分工将完全消失,因为要把工业和农业生产提高到上面说过的水平,单靠机械和化学的辅助手段是不够的,还必须相应地发展使用这些手段的人的能力。当上个世纪的农民和工场手工业工人被卷入大工业的时候,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而成为完全不同的人,同样,由整个社会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完全不同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人来,共同经营生产不能由现在这种人来进行,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只隶属于某一个生产部门,受它束缚,听它剥削,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只能发展自己才能的一方面而偏废了其他各方面,只熟悉整个生产的某一个部门或者某一个部门的一部分。就是现在的工业也越来越不能使用这样的人了。由整个社会共同地和有计划地来经营的工业,更加需要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能够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因此,现在已被机器破坏了的分工,即把一个人变成农民、把另一个人变成鞋匠、把第三个人变成工厂工人、把第四个人变成交易所投机者,将完全消失。教育将使年轻人能够很快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将使他们能够根据社会需要或者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教育将使他们摆脱现在这种分工给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这样一来,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于是各个不同的阶级也必然

消灭。因此,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一方面不容许阶级继续存在,另一方面这个社会的建立本身为消灭阶级差别提供了手段。

由此可见,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也将消失。从事农业和工业的将是同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单从纯粹物质方面的原因来看,这也是共产主义联合体的必要条件。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仅仅适应于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阶段,这种状态是一切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一点现在人们就已经深深地感觉到了。

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这就是废除私有制的主要结果。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 年 10 月底—11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42—243 页。

没有无产阶级这一被压迫阶级的专政,便不可能消灭阶级。

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

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的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奋起同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抗衡，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发动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各剥削阶级及其国家。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而获得胜利的社会所采取的政治形式将是民主共和国，它将日益集中该民族或各该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同还没有转向社会主义的国家作斗争。没有无产阶级这一被压迫阶级的专政，便不可能消灭阶级。没有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各落后国家的比较长期而顽强的斗争，便不可能有各民族在社会主义下的自由联合。

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1915 年 8 月 10 日〔23 日〕），《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54 页。

……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举行社会主义革命，使人民摆脱压迫，并不需要马上消灭阶级；应该由最有觉悟和最有组织的工人掌握政权。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记住工人们常常忘记的一条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理：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举行社会主义革命，使人民摆脱压迫，并不需要马上消灭阶级；应该由最有觉悟和最有组织的工人掌握政权。工人应该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这是你们大多数人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70 多年以前写成并在世界各国以各种语言流传的《共产党宣言》中已经读到过的真理。

列宁:《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文献》(1918 年 6 月),《列宁全集》第 34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24 页。

全体被剥削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必须在这个过渡时期(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实行统治,以便彻底消灭阶级,镇压剥削者的反抗……

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就是工人阶级要懂得必须实行本阶级的**统治**并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实行这种**统治**。全体被剥削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必须在这个过渡时期实行**统治**,以便彻底消灭阶级,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把被资本主义压制、摧残和搞成一盘散沙的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团结**在城市工人的周围,同他们结成最紧密的联盟。

列宁:《给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代表会议主席团的信》(1918 年 9 月 17 日),《列宁全集》第 35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89 页。

无产阶级应当是统治其他一切阶级的阶级。我们不可能在共产主义完全实现以前消灭阶级差别。

我们谈到无产阶级专政时说过,无产阶级应当是统治其他一切阶级的阶级。我们不可能在共产主义完全实现以前消灭阶级差别。阶级将仍然存在,因为我们还没有消灭剥削者,即大资产阶级和地主,我们正在无情地剥夺他们。但是对待中农和小农,又当别论了。在无情地镇压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同时,我们应当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吸引过来。当他们说他们愿意中立、愿意同我们保持睦邻关系的时候,我们回答说:我们也

只需要这一点。我们从来没有期望你们会成为共产主义者。

列宁:《在莫斯科党工作人员大会上关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的报告》(1918年11月27日),《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3页。

要消灭阶级,就需要一个阶级的专政时期,一个被压迫阶级的专政时期……

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本权力**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象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

……

要消灭阶级,就需要一个阶级的专政时期,一个被压迫阶级的专政时期,这个阶级不仅能推翻剥削者,不仅能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而且能在思想上与全部资产阶级民主观念,与关于自由平等的一切市侩空谈决裂(实际上,马克思早已指出,这种空谈意味着**商品所有者**的"自由平等",即**资本家和工人**的"自由平等")。

列宁:《向匈牙利工人致敬》(1919年5月27日),《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6—377页。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依然存在,但每个阶级都起了变化,它们相互间的关系也起了变化。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

下，阶级斗争并不消失，只是采取了别的形式。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为此，无产阶级专政已做了它能做的一切。但是要一下子消灭阶级是办不到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始终是存在的**。阶级一消失，专政也就不需要了。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是不会消失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依然存在，但**每个**阶级都起了变化，它们相互间的关系也起了变化。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并不消失，只是采取了别的形式。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是被压迫阶级，是被剥夺了任何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阶级，是唯一同资产阶级直接对立和完全对立的因而也是唯一能够革命到底的阶级。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成了**统治**阶级：它掌握着国家政权，支配着已经公有化的生产资料，领导着动摇不定的中间分子和中间阶级，镇压着剥削者的日益强烈的反抗。这些都是阶级斗争的**特殊**任务，是无产阶级以前不曾提出也不可能提出的任务。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剥削者阶级，即地主和资本家阶级，还没有消失，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剥削者已被击溃，可是还没有被消灭。他们还有国际的基础，即国际资本，他们是国际资本的一个分支。他们还部分地保留着某些生产资料，还有金钱，还有广泛的社会联系。正是由于他们遭到失败，他们反抗的劲头增长了千百倍。

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政治和经济》（1919 年 10 月 30 日），《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6—67 页。

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只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

民主派小资产者只不过希望实现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只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

恩格斯:《共产主义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9页。

所有社会主义者都把无政府状态理解为:在无产阶级运动的目的——消灭阶级——达到以后,为了保持为数极少的剥削者对由生产者组成的社会绝大多数的压迫而存在的国家政权就会消失,而政府职能就会变成简单的管理职能。

"无政府状态——这就是他们的只从各种社会主义体系中剽窃了一些标签的导师巴枯宁的战马。所有社会主义者都把无政府状态理解为:在无产阶级运动的目的——消灭阶级——达到以后,为了保持为数极少的剥削者对由生产者组成的社会绝大多数的压迫而存在的国家政权就会消失,而政府职能就会变成简单的管理职能。同盟则本末倒置,它宣布

在无产阶级队伍中实行无政府状态，是摧毁集中在剥削者手中的强大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最可靠的手段。它以此为借口，竟要求国际在旧世界正力图置国际于死地的时候，用无政府状态来代替自己的组织。”

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家工人协会》（1873 年 4—7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382—383 页。

我们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不同的是，我们懂得战争和国内阶级斗争有必然的联系，懂得不消灭阶级，不建立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消灭战争……

社会党人一向谴责各民族之间的战争，认为这是一种野蛮的和残暴的行为。但是我们对战争的态度，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平的拥护者和鼓吹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有原则的区别。我们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不同的是，我们懂得战争和国内阶级斗争有必然的联系，懂得不消灭阶级，不建立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消灭战争，再就是我们完全承认国内战争即被压迫阶级反对压迫阶级——奴隶反对奴隶主、农奴反对地主、雇佣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是合理的、进步的和必要的。

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1915 年 7—8 月），《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10 页。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要消灭民族的（以至一切政治的）压

迫是不可能的。为此必须消灭阶级，也就是说，实行社会主义。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要消灭民族的（以至一切政治的）压迫是**不可能**的。为此**必须**消灭阶级，也就是说，实行社会主义。但是，以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决不完全归结于经济。要铲除民族压迫，必须有社会主义生产这个基础，但是，在这个基础上**还**必须有民主的国家组织、民主的军队等等。无产阶级把资本主义改造成社会主义之后，就会造成完全铲除民族压迫的**可能**。“只有”——“只有”！——在各方面都充分实行民主，直到按照居民的“共同感情”确定国界，直到有分离的充分自由，这种可能才会变为**现实**。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在实际上**消除民族间的任何细微的摩擦和不信任，加速民族的接近和融合，其结果便是国家**消亡**。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我们的波兰同事却错误地离开了它。

列宁：《关于自觉问题的争论总结》（1916年7月），《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页。

恩格斯说得万分正确：平等的概念如果与消灭阶级无关，那就是一种极端愚蠢而荒谬的偏见。

恩格斯说得万分正确：平等的概念如果与消灭阶级**无关**，那就是一种极端愚蠢而荒谬的偏见。资产阶级的教授们企图用平等这个概念来证明我们想使一个人同其他的人平等。他们企图用他们自己捏造的这种无稽之谈来责备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由于自己无知，竟不知道，社会主义者，即现代科学

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过，如果不把平等理解为消灭阶级，平等就是一句空话。我们要消灭阶级，从这方面说，我们是主张平等的。但是硬说我们想使所有的人彼此平等，那就是无谓的空谈和知识分子的愚蠢的捏造，这些知识分子有时装腔作势，玩弄字眼，然而毫无内容，尽管他们把自己称为作家，有时称为学者，或者称为别的什么人。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争取的平等就是消灭阶级。因此也要消灭工农之间的阶级差别。这正是我们的目的。工农之间还有阶级差别的社会，既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解释社会主义这个字眼，是可以把这种社会叫作社会主义社会的，但这是一种诡辩，是字眼上的争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争论字眼是没有必要的。有一点很清楚：只要工农之间的阶级差别还存在，我们就不能无所顾忌地谈论平等，以免为资产阶级张目。农民是宗法制时代的阶级，是由几十年几百年的奴隶制培植起来的阶级；农民在这整个期间一直是**小业主**，起初从属于其他阶级，后来在形式上是自由和平等的，但都是**私有者和食物的占有者**。

列宁：《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9 年 5 月 19 日），《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16—817 页。

［二］劳动优先

……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

自然界在一起它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但是劳动的作用还远不止于此。它是一切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6年，1885—1886年作了个别补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3—374页。

……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

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迄今为止的人自己的生产资料对人的奴役。不言而喻，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4页。

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开垦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他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

一块地方只是由于部落在那里打猎才成为狩猎地区；土地只是由于耕作才成为个人身体的延伸。在罗马城建起来而其周围的土地被罗马公民耕种之后，共同体的条件便和以前不同了。所有这些共同体的目的就是把形成共同体的个人作为所有者保持下来，即再生产出来，也就是说，在这样一种客观存在方式中把他们再生产出来，这种客观存在方式既形成公社成员之间的关系，同时又因而形成公社本身。但是，这种再生产必然既是旧形式的重新生产，同时又是旧形式的破坏。例如，在每一个人均应占有若干亩土地的地方，人口的增长就给这样做造成了障碍。要想消除这种障碍，就得向外殖民，要实行殖民就必须进行征服战争。这样就有奴隶等等。还有，例如，公有地扩大了，这样代表共同体的贵族就增加了等等。

可见，旧共同体的保持包含着被它当作基础的那些条件的破坏，这种保持会转向对立面。例如，如果设想，原有土地面积上的生产率能够通过发展生产力等等（在旧的传统的耕作方式下，这种发展恰好是最缓慢的）而提高，那么，这就意味着会有新的劳动方式，新的劳动结合，每天会有很大一部分时间用在农业上等等，而这又会破坏共同体的旧有的经济条件。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开垦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他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

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

马克思：《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1857 年 8 月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86—487 页。

……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册第四篇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56—557 页。

共产主义青年团要使大家从小就在自觉的有纪律的劳动中受教育。

在旧社会中，是各家各户单独劳动，除了压迫老百姓的地主和资本家外，谁也没有组织过劳动。任何一种劳动，不管它怎样脏，怎样吃力，我们都应当把它组织起来，使每个工人和农民对自己都有这样的认识：我是自由劳动大军的一分子，不需要地主和资本家，我自己就会建设自己的生活，建立共产主义的秩序。共产主义青年团要使大家从小就在自觉的有纪律的劳动中受教育。这样我们才有希望完成现在所提出的任务。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 年 10 月 2 日),《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96 页。

少说些漂亮话,多做些平凡的、日常的工作,多关心每普特粮食和每普特煤吧!

少说些漂亮话,多做些平凡的、日常的工作,多关心每普特粮食和每普特煤吧!多多努力使挨饿的工人和褴褛的农民所必需的每一普特粮食和每一普特煤,不是通过奸商的交易,通过资本主义的方式获得,而是通过像莫斯科—喀山铁路的粗工和铁路员工这样的普通劳动者自觉自愿的奋不顾身的英勇劳动来获得。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 年 6 月 28 日),《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8 页。

模范的生产工作,模范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对取得和分配每普特粮食所表现的模范的关心和诚实,模范的食堂,某个工人住房和某个街区的模范的清洁卫生工作……

模范的生产工作,模范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对取得和分配每普特粮食所表现的模范的认真负责态度,模范的食堂,某个工人住房和某个街区的模范的清洁卫生工作,——这一切是我们的报刊和每个工人和农民组织应当比现在更加十倍注意和关心的对象。所有这些都是共产主义的幼芽,照管这些幼芽是我们共同的和首要的义务。不管我们的粮食和生产状况怎样困难,但在布尔什维克执政的一年半中还是在

各方面取得了无可怀疑的进展:粮食的收购量从3000万普特(1917年8月1日至1918年8月1日)增到一亿普特(1918年8月1日至1919年5月1日);蔬菜业发展了,未播种的土地面积减少了,在燃料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开始得到铁路运输改善,等等。在这样的总的背景下,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支持下,共产主义的幼芽不会夭折,一定会茁壮地成长起来,发展成为完全的共产主义。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页。

……莫斯科—喀山铁路的粗工和铁路工人首先在实际上证明了他们确实能像共产主义者一样工作,然后他们才称自己的创举是"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应当努力争取,而且一定要做到。

在这方面,"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是一个十分宝贵的例外,因为这里,莫斯科—喀山铁路的粗工和铁路工人首先在实际上证明了他们确实能像共产主义者一样工作,然后他们才称自己的创举是"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应当努力争取,而且一定要做到。今后不论是谁,只要未经艰苦劳动和长期劳动的实际成效以及真正按共产主义精神办事的模范事迹证实,就把自己的企业、机关或事业称作公社,都应当被看成骗子或空谈家,受到无情的嘲笑和羞辱。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页。

随着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终结了。

只有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又是同各个人向完全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同样，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同过去受制约的交往向个人本身的交往的转化，也是相互适应的。随着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终结了。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条件总是表现为偶然的，而现在，各个人本身的独自活动，即每一个人本身特殊的个人职业，才是偶然的。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1845 年秋—大约 1846 年 5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30 页。

共产主义劳动，从比较狭窄和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一种为社会进行的无报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为了履行一定的义务、不是为了享有取得某些产品的权利、不是按照事先规定的法定定额进行的劳动，而是自愿的劳动……

共产主义劳动，从比较狭窄和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一种为社会进行的无报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为了履行一定的义务、不是为了享有取得某些产品的权利、不是按照事先规定的法定定额进行的劳动，而是自愿的劳动，是无定额的劳动，是不指望报酬、不讲报酬条件的劳动，是按照为公共利益劳动的习惯、按照必须为公共利益劳动的自觉要求（这已成

为习惯)来进行的劳动,这种劳动是健康的身体的需要。

大家都明白,我们,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社会制度,还远远不能广泛地、真正普遍地实行**这种**劳动。

但是提出这个问题,由整个先进无产阶级(共产党和工会)和国家政权提出这个问题,就已经是在这条路上前进了一步。

要成就一件大事业,必须从一点一滴做起。

另一方面,"大事业"成功之后,即推翻资本家所有制并把政权交给无产阶级的国家变革实现之后,要在新基础上建设经济生活,也只**能从一点一滴**做起。

星期六义务劳动、劳动军、劳动义务制——这就是具体实行社会主义劳动和共产主义劳动的各种方式。

在具体实行的时候,还有许许多多的缺点。对这些缺点采取讥笑(或幸灾乐祸)态度的,除了维护资本主义的人以外,就只有那些毫无头脑的人了。

在这样崭新、艰难和伟大的事业中,缺点、错误和失误是不可避免的。谁害怕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谁被这些困难吓倒,谁见了这些困难就悲观失望或者张皇失措起来,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

列宁:《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1920 年 4 月 8 日),《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30 页。

共产主义青年团必须把自己的教育、训练和培养同工农的劳动结合起来,不要关在自己的学校里,不要只限于阅读共产主义书籍和小册子。只有在与工农的共同劳动中,才能成

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青年团员应当利用自己的每一刻空闲时间去改善菜园工作,或在某个工厂里组织青年学习等等。我们要把俄国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富裕的国家。因此共产主义青年团必须把自己的教育、训练和培养同工农的劳动结合起来,不要关在自己的学校里,不要只限于阅读共产主义书籍和小册子。只有在与工农的共同劳动中,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必须使大家都看到,入团的青年个个都是有文化的,同时又都善于劳动。当大家看到,我们已经废除了旧学校里的旧的强迫纪律,代之以自觉的纪律,看到每个青年都去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看到他们利用每个近郊菜园来帮助居民,那时人民就不会用从前的眼光来看待劳动了。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 年 10 月 2 日),《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95—296 页。

[三]人民至上

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煞各个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概括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一定的成分。

马克思说的是"人民"。但是我们知道,马克思一向都是无情地反对那些认为"人民"是一致的、认为人民内部没有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幻想。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煞各个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概括那些

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一定的成分。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6页。

人们不要利用这个字眼来掩盖自己对人民内部的阶级对抗的无知。

是的,是**人民**革命。社会民主党过去和现在都有充分的理由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派滥用人民一语。它要求人们不要利用这个字眼来掩盖自己对人民内部的阶级对抗的无知。它坚决主张无产阶级的党必须保持完全的阶级独立性。但是它把"人民"分为各个"阶级",并不是要先进的阶级闭关自守,把自己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因考虑不让世界的经济主人退出而阉割自己的活动,而是要先进的阶级不沾染中间阶级的不彻底、不稳定和不坚决的毛病,从而能以更大的毅力和更大的热情领导全体人民去为全体人民的事业奋斗。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5页。

……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

好像只有满足思想、符合思想的那种理解才不再是表面的理解。布鲁诺先生只是**为了摆摆样子**才把思想和对它的**理解**之间的**关系**搬出来,正像他只是**为了摆摆样子**才把不成功的历史**活动**对**群众的关系**搬出来一样。因此,如果绝对的批

判真的谴责什么东西是“表面的”,那就是谴责过去的全部历史,因为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绝对的批判推翻群众的历史并打算用批判的历史取而代之(见茹尔·法赫尔先生的论英国的迫切问题的文章)。根据过去的、非批判的历史,即根据和绝对批判的意旨相违背的历史,应该更严格地区分下述两点:群众对这样或那样的目的究竟“关怀”到什么程度,这些目的“唤起了”群众多少“热情”。“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另一方面,不难了解,任何得到历史承认的群众的“利益”,当它最初出现于世界舞台时,总是在“思想”或“观念”中远远地超出自己的实际界限,很容易使自己和全人类的利益混淆起来。这种错觉构成傅立叶所谓的每个历史时代的色调。资产阶级在1789年革命中的利益决不是“不成功的”,它“压倒了”一切,并获得了“实际成效”,尽管“激情”已经消失,尽管这种利益用来装饰自己的摇篮的“热情”之花也已经枯萎。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只有对那样的群众来说革命才是“不成功的”,这种群众的政治“观念”并不是关于自己的实际“利益”的观念,所以他们的真正的主导原则和革命的主导原则并不是一致的,他们获得解放的现实条件和资产阶级借以解放自身和社会的那些条件是根本不同的。所以,如果说能够代表一切伟大的历史“活动”的革命是不成功的,那么,其所以不成功,是因为革命在本质上不超出其生活条件的范围的那部分群众,是并不包括全体居民在内的特殊的、有限的群众。如果说革命是不成功的,那

么，并不是因为革命“**唤起了**”群众的“**热情**”，并不是因为它引起了群众的“**关怀**”，而是因为对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群众来说，革命的原则并不代表他们的**实际**利益，不是**他们自己的**革命原则，而**仅仅**是一种“**观念**”，因而也仅仅是暂时的**热情**和表面的**热潮**之类的东西。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 年 9 月—1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02—104 页。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在批判的历史中，一切事情自然都完全不是这样报道的，批判的历史认为，在历史活动中重要的不是行动着的群众，不是经验的活动，也不是这一活动的经验的**利益**，而仅仅是寓于“**这些东西里面**”的“**观念**”。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 年 9 月—1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04 页。

随着人们历史创造活动的扩大和深入，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民群众在数量上也必定增多起来。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

群众队伍的扩大”①,——这些话表达了哲学历史理论最深刻最重要的原理之一,对这种哲学历史理论,我们的民粹派分子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了解和不能了解的。随着人们历史创造活动的扩大和深入,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民群众在数量上也必定增多起来。然而民粹派分子在议论一般居民、特别是议论劳动居民时,总是把他们看作是采取某些比较合理的措施的对象,看作是应当听命走这一条或那一条道路的材料,而从来没有把各个居民阶级看作是在既定道路上独立的历史活动家,从来也没有提出过在既定道路上可以发展(或者相反,可以削弱)这些历史创造者独立和自觉活动的条件这样一个问题。

列宁:《我们拒绝什么遗产?》(1897 年底),《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27—128 页。

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

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由此可见,从字面的**意思**看来,上述批判的说法仍然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即仍然是“**探讨**”。

并未被这种探讨所涉及的法国革命产生了超出整个旧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04 页。——编者注

界秩序的思想范围的思想。1789 年在 Cercle social〔社会小组〕中开始、中途以勒克莱尔克和卢为主要代表、最后以巴贝夫密谋的失败而暂时遭到失败的革命运动，产生了共产主义的思想。1830 年革命以后，在法国，这种思想又为巴贝夫的友人邦纳罗蒂所倡导。这种思想经过彻底的研讨，就成为新世界秩序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 年 9 月—1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52 页。

只有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才是能够取得“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的力量……

只有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才是能够取得“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的力量，我们是就主要的巨大的力量来说的，并且把农村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人民”）分别算到了这两种力量中去。“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一早已由《前进报》指出过的结论，是我们的新火星派怎么也无法避开的。除此而外，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取得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 年 6—7 月），《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62 页。

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是少数人，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

历史上有过各种各样的变化；依靠信息、忠诚和其他优秀

的精神品质,这在政治上是完全不严肃的。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是少数人,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如果这些少数人不中群众的意,群众有时就会对他们不太客气。

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1922年3月27日),《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2页。

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出色地把以下两方面结合起来:既以完全科学的冷静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演进的客观进程,又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并建立起同某些阶级的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出色地把以下两方面结合起来:既以完全科学的冷静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演进的客观进程,又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并建立起同某些阶级的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

列宁:《反对抵制》(1907年6月26日[7月9日]),《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7页。

[四]劳动者的联合

……但是劳动权就是支配资本的权力,支配资本的权力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

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

劳动权在资产阶级的意义上是一种胡说，是一种可怜的善良愿望，但是劳动权就是支配资本的权力，支配资本的权力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

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49 年底—1850 年 3 月底和 1850 年 10 月—11 月 1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65—166 页。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 年 12 月—1848 年 1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83 页。

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现在第一次出现了，但它确实是出现了。

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有形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无法摆脱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此外，这种占有还由于消除了现在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挥霍而为全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现在第一次出现了，但它**确实是出现了**。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11—412页。

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

不实现这个任务，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最近半个世纪以来，有些社会主义者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次又一次地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多读读这些社会主义者的著作，我们就会看到，这些社会主义者都毫无例外

地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科学摆脱资产阶级的桎梏,摆脱资本的奴役,摆脱做卑污的资本主义私利的奴隶的地位。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点。而且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一定会实现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困难和它的全部力量也就在于了解这个真理。

列宁:《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8 年 5 月 26 日),《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46 页。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和人的利益并不是彼此对立的,而是一致的……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和人的利益并不是彼此对立的,而是一致的,因而竞争就消失了。当然也就谈不到个别阶级的破产,更谈不到像现在那样的富人和穷人的阶级了。在生产和分配必要的生活资料的时候,就不会再发生私人占有的情形,每一个人都不必再单枪匹马地冒着风险企求发财致富,同样也就自然而然地不会再有商业危机了。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无论生产和消费都很容易估计。既然知道每一个人平均需要多少物品,那就容易算出一定数量的人需要多少物品;既然那时生产已经不掌握在个别私人企业主的手里,而是掌握在公社及其管理机构的手里,那也就不难按照需求来调节生产了。

……

如果说，文明甚至在现在就已经教人们懂得，只有维护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利益，才能有自己的利益，从而尽可能地使警察机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变成多余的东西，那么，在利益的共同已经成为基本原则、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已经没有什么差别的社会里，情况还不知要好多少倍呵！

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说》（1845 年 2 月 8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605—609 页。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

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①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

① 1891 年发表时这里没有“他们的”。——编者注

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 年 4 月底—最迟 5 月 7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9—20 页。

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

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到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

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

为达到这个伟大目标所做的一切努力至今没有收到效果,是由于每个国家里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不够团结,由于各国工人阶级彼此间缺乏亲密的联合;

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

马克思:《国家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1871 年 11—12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475 页。

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

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 年 12 月—1848 年 1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84 页。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

现在结束我的话：在经济、财政、银行方面给合作社以种种优惠，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对组织居民的新原则应该给予的支持。但这还只是一般地提出任务，因为在实践上这一任务的全部内容还是不清楚的，还没有详细规划出来，也就是说，应该善于找出我们对合作化的“奖励”方式（和奖励条件），找出我们能用来充分帮助合作社的奖励方式，找出我们

能用来培养出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奖励方式。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

列宁:《论合作社》(1923 年 1 月 14 日),《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70—771 页。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也就是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没有力量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 年 12 月—1848 年 1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93 页。

这种集体所有制只有通过组成为独立政党的生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才能实现。

鉴于

生产者阶级的解放是不分性别和种族的全人类的解放；

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之后才能获得自由；

生产资料属于生产者只有两种形式：

(1)个体形式，这种形式从来没有作为普遍事实而存在，并且日益为工业进步所排斥；

(2)集体形式，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为这种形式创造了物质的和精神的因素；

鉴于这种集体所有制只有通过组成为独立政党的生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才能实现；

要建立上述组织，就必须使用无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尤其包括借助于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的普选权；

法国工人社会主义者提出其经济方面努力的最终目的是使全部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并决定以下述最低纲领参加选举作为组织和斗争的手段。

马克思：《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草案)》(1880年5月10日前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42—443页。

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

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12页。

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

们的社会性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14页。

[五]事实平等

资产者的平等(消灭阶级特权)完全不同于无产者的平等(消灭阶级本身)。如果超出后者的范围,即抽象地理解平等,那么平等就会变成荒谬。

资产者的平等(消灭阶级特权)完全不同于无产者的平等(消灭阶级本身)。如果超出后者的范围,即抽象地理解平等,那么平等就会变成荒谬。正因为这样,杜林先生最后又不得不把武装的和行政的、法庭的和警察的暴力从后门引进来。

可见,**平等的观念本身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个观念的形成,需要全部以往的历史,因此它不是自古以来就作为真理而存在的。现在,在大多数人看来,它在原则上是不言而喻的,这不是由于它具有公理的性质,而是由于**18世纪的思想的传播**。因此,如果说这两个著名的男人今天置身于平等的基础上,那么,这正是因为他们被想象为19世纪的"有教养的"人,而且这对于他们说来是很"**自然的**"。**现实的**人过去和现

在如何行动，都始终取决于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

恩格斯：《〈反杜林论〉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671页。

消灭阶级是我们的基本要求，不消灭阶级，消灭阶级统治在经济上就是不可思议的事。

在“阶级统治”后面，少了“和阶级本身”几个字。消灭阶级是我们的基本要求，不消灭阶级，消灭阶级统治在经济上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我提议不用“为了所有人的平等权利”代之以“为了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等等。**平等义务**，对我们来说，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平等权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补充，而且使平等权利失去道地资产阶级的含义。

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1891年6月18日—29日之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9页。

不消灭阶级，就谈不到个人的真正自由（不是有产者的自由），就谈不到人与人之间在社会政治关系上的真正平等（不是有产者和无产者、饱食者和挨饿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虚伪的平等）。

只要还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即使土地私有制已经废除，还存在农具和耕畜的私有制）和自由贸易，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存在。而无产阶级专政则是同这个基础进行胜利斗争的唯一手段，是消灭阶级的唯一途径。不消灭阶级，就谈

不到个人的真正自由(**不是有产者的**自由),就谈不到人与人之间在社会政治关系上的真正平等(**不是有产者和无产者**、饱食者和挨饿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虚伪的平等**)。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消灭阶级,其途径,一方面是推翻剥削者,镇压他们的反抗;另一方面是中立小业主,使他们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动摇不定不敢于造成危害。

列宁:《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1920年11月4日和12月11日),《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24—425页。

一旦社会全体成员在占有生产资料方面的平等即劳动平等、工资平等实现以后,在人类面前不可避免地立即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要更进一步,从形式上的平等进到事实上的平等,即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

民主意味着平等。很明显,如果把平等正确地理解为消灭**阶级**,那么无产阶级争取平等的斗争以及平等的口号就具有极伟大的意义。但是,民主仅仅意味着**形式上的**平等。一旦社会全体成员**在**占有生产资料**方面**的平等即劳动平等、工资平等实现以后,在人类面前不可避免地立即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要更进一步,从形式上的平等进到事实上的平等,即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至于人类会经过哪些阶段,通过哪些实际措施达到这个最高目的,那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页。

[六]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这里谈的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个人,而决不是任何偶然的个人,至于不可避免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它本身就是个人自由发展的共同条件。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要消灭关系对个人的独立化、个性对偶然性的屈从、个人的私人关系对共同的阶级关系的屈从等等,归根到底都要取决于分工的消灭。我们也曾指出,只有交往和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这样普遍的程度,以致私有制和分工变成了它们的桎梏的时候,分工才会消灭。我们还曾指出,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灭,因为现存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力是全面的,所以只有全面发展的个人才可能占有它们,即才可能使它们变成自己的自由的生活活动。我们也曾指出,现代的**个人必须**去消灭私有制,因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它们在私有制的统治下竟成了破坏力量,同时还因为阶级对立达到了极点。最后,我们曾指出,私有制和分工的消灭同时也就是个人在现代生产力和世界交往所建立的基础上的联合。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即在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会中,这种发展正是取决于个人间的联系,而这种个人间的联系则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即经济前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的团结一致以及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因此,这里谈的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个人,而决不是任何偶然的个人,至于不可避

免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它本身就是个人自由发展的共同条件。当然，个人关于个人间的相互关系的意识也将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因此，它既不会是“爱的原则”或 dévouement〔自我牺牲精神〕，也不会是利己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1845 年秋—大约 1846 年 5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516 页。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①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②，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

① “联合起来的个人”在 1888 年英文版中是“巨大的全国联合体”。——编者注

② “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在 1872 年、1883 年和 1890 年德文版中是“消灭了阶级本身”。——编者注

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 年 12 月—1848 年 1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94 页。

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 年 1 月—3 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14 页。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您找出一则您所期望的题词。我认为,马克思是当代唯一能够和伟大的佛罗伦萨人①

① 但丁。——编者注

相提并论的社会主义者。但是,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句话(意大利文刊物《社会评论》第35页),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恩格斯:《恩格斯致朱·卡内帕》(1894年1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0—731页。

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

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这就是废除私有制的主要结果。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10月底—1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页。

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

"……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

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马克思《资本论》）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 年 9 月—1878 年 6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45—646 页。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13 页。——编者注

马克思:《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1857 年底—1858 年 5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07—108 页。

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

结果就是:生产力——财富一般——从趋势和可能性来看的普遍发展成了基础,同样,交往的普遍性,从而世界市场成了基础。这种基础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而个人从这个基础出发的实际发展是对这一发展的**限制**的不断扬弃,这种限制被意识到是限制,而不是被当作**神圣的界限**。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由此而来的是把他自己的历史作为**过程**来理解,把对自然界的认识(这也作为支配自然界的实践力量而存在着)当作对他自己的现实躯体的认识。发展过程本身被设定为并且被意识到是这个过程的前提。但是,要达到这点,首先必须使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成为**生产条件**,不是使一定的**生产条件**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马克思:《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1857 年底—1858 年 5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41 页。

三、意识形态虚假性与拜物教

(一)意识形态虚假性的基本含义

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行动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

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行动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因为这是思维过程,所以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他从纯粹的思维中——不是从他自己的思维中,就是从他的先辈的思维中得出的。他和纯粹的思维材料打交道,他直率地认为这种材料是由思维产生的,而不去研究任何其他的、比较疏远的、不从属于思维的根源。而且这在他看来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他看来,任何人的行动既然都是通过思维进行的,最终似乎都是以思维为基础的了。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梅林》(1893 年 7 月 14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9 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94—95 页。

批判所做的，仅仅是“用现存事物的范畴来制定公式”，也就是用现存的黑格尔哲学和现存的社会意向来制定公式。

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甚至就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也会使得整个批判感到羞愧。英国和法国的工人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工人甚至创造了人，批判家却永远是不通人性的人〔Unmensch〕，然而，他的确对于自己是一个批判的批判家这一点感到一种内心的满足。

“弗洛拉·特莉斯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妇女的教条主义的例子，这种教条主义离开公式就寸步难行，并且还用现存事物的范畴来制定公式。”

批判所做的，仅仅是“用现存事物的范畴来制定公式”，也就是用现存的黑格尔哲学和现存的社会意向来制定公式。公式除了公式便什么也没有。而且尽管批判在竭力抨击教条主义，但是它还是宣称自己是教条主义，而且是妇女的教条主义。它是一个老太婆，而且将来仍然是一个老太婆；它是年老色衰、孀居无靠的黑格尔哲学。这个哲学搽胭抹粉，把她那干瘪得令人厌恶的抽象的身体打扮起来，在德国的各个角落如饥似渴地物色求婚者。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 年 9 月—1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2 页。

这种办法，用思辨的话来说，就是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这种了解方式就是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

如果我从现实的苹果、梨、草莓、扁桃中得出“**果实**”这个一般的观念，如果再进一步**想象**我从现实的果实中得到的“**果实**”〔《die Frucht》〕这个抽象观念就是存在于我身外的一种本质，而且是梨、苹果等等的**真正的**本质，那么我就宣布（用**思辨的话**说）“**果实**”是梨、苹果、扁桃等等的“**实体**”，所以我说：对梨说来，决定梨成为梨的那些方面是非本质的，对苹果说来，决定苹果成为苹果的那些方面也是非本质的。作为它们的本质的并不是它们那种可以感触得到的实际的定在，而是我从它们中抽象出来又硬给它们塞进去的本质，即我的观念中的本质——“**果实**”。于是我就宣布：苹果、梨、扁桃等等是“**果实**”的简单的存在形式，是它的**样态**。诚然，我的有限的、基于感觉的理智**辨别出**苹果不同于梨，梨不同于扁桃，但是我的思辨的理性却说这些感性的差别是非本质的、无关重要的。思辨的理性在苹果和梨中看出了**共同的东西**，在梨和扁桃中看出共同的东西，这就是“**果实**”。具有不同特点的现实的果实从此就只是**虚幻的**果实，而它们的真正的本质则是“**果实**”这个“实体”。

用这种方法是得不到内容特别**丰富的规定**的。如果有一位矿物学家，他的全部学问仅限于说一切矿物实际上都是“矿物”，那么，这位矿物学家不过是**他自己想象中**的矿物学家而已。这位思辨的矿物学家看到任何一种矿物都说，这是“**矿物**”，而他的学问就是天下有多少种矿物就说多少遍“矿物”这个词。

思辨的思维从各种不同的现实的果实中得出一个抽象的“果实”——“一般果实”，所以为了要达到某种现实内容的假

象，它就不得不用这种或那种方法从“**果实**”、从**实体**返回到现实的**千差万别的**平常的果实，返回到梨、苹果、扁桃等等上去。但是，要从现实的果实得出“**果实**”这个抽象的观念是很容易的，而要从“**果实**”这个抽象的观念得出各种现实的果实就很困难了。不但如此，要从抽象转到抽象的**直接对立面**，不**抛弃**抽象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此，思辨哲学家抛弃了“**果实**”这个抽象，但是，他是用一种**思辨的、神秘的**方法来抛弃的，就是说，使人看来好像他并**没有**抛弃抽象似的。因此他事实上也只是在表面上越出了抽象的圈子而已……

……

可见，基督教认为只有**一个**上帝的化身，而思辨哲学却认为有多少事物就有多少化身，譬如在现在这个例子里，在思辨哲学看来，每一个单个的果实就都是实体的，即绝对果实的特殊化身。所以思辨哲学家最感兴趣的就是把现实的、普通的果实的**存在**制造出来，然后故弄玄虚地说：苹果、梨、扁桃、葡萄存在着……

……

这种办法，用思辨的话来说，就是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这种了解方式就是**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 年 9 月—1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71—75 页。

在这种批判的庸俗化的形式中重复了思辨的高见：人和历史所以存在，是为了使真理达到自我意识。

真理，对鲍威尔先生来说也像对黑格尔一样，是一具自己论证自己的**自动机器**。人始终都要尾随其后。现实发展的结果，也像在黑格尔那里一样，不外是**被证明了的即被意识到了的真理**。因此，绝对的批判就会和鼠目寸光的神学家同声问道：

“如果历史的任务并不是要**证明**这些最简单的真理（例如，地球绕日运行），那么还要历史干什么呢？”

从前的目的论者认为，植物所以存在，是为了给动物充饥，动物所以存在，是为了给人类充饥，同样，历史所以存在，是为了给理论的充饥（即**证明**）这种消费行为服务。人为了历史而存在，而历史则为了**证明真理**而存在。在这种**批判的**庸俗化的形式中重复了思辨的高见：人和历史所以存在，是为了使**真理**达到**自我意识**。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 年 9 月—1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00—101 页。

这种改变意识的要求，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借助于另外的解释来承认它。

既然这些青年黑格尔派认为，观念、思想、概念，总之，被他们变为某种独立东西的意识的一切产物，是人们的真正枷锁，就像老年黑格尔派把它们看作是人类社会的真正镣铐一样，那么不言而喻，青年黑格尔派只要同意识的这些幻想进行

斗争就行了。既然根据青年黑格尔派的设想，人们之间的关系、他们的一切举止行为、他们受到的束缚和限制，都是他们意识的产物，那么青年黑格尔派完全合乎逻辑地向人们提出一种道德要求，要用人的、批判的或利己的意识来代替他们现在的意识，从而消除束缚他们的限制。这种改变意识的要求，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借助于另外的解释来承认它。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1845 年秋—大约 1846 年 5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5—66 页。

属于这个或那个领域的外部事实作为并发的原因也能给这种发展以影响，但是这种事实又被默默地认为只是思维过程的果实，于是我们便始终停留在纯粹思维的范围之中，这种思维仿佛能顺利地消化甚至最顽强的事实。

历史思想家（历史在这里只是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神学的——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仅仅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集合名词）在每一科学部门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当然，属于这个或那个领域的外部事实作为并发的原因也能给这种发展以影响，但是这种事实又被默默地认为只是思维过程的果实，于是我们便始终停留在纯粹思维的范围之中，这种思维仿佛能顺利地消化甚至最顽强的事实。

正是宪法、法权体系、任何领域的思想观念的独立历史的这种外表，首先蒙蔽了大多数人。如果说，路德和加尔文“克服”了官方的天主教，黑格尔“克服”了费希特和康德，卢梭以其共和主义的“社会契约论”间接地“克服”了立宪主义者孟德斯鸠，那么，这仍然是神学、哲学、政治内部的一个过程，它表现为这些思维领域发展的一个阶段而且完全不越出思维的范围。而自从出现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永恒不变和绝对完善的资产阶级幻想以后，甚至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之“克服”重商主义者，也被看作纯思想的胜利，不是被看作改变了的经济事实在思维领域中的反映，而是被看作对随时随地都存在的实际条件最后达到的真正理解。如果狮心理查和菲力浦·奥古斯特实行了贸易自由，而不是卷入了十字军东征，那就可以避免五百年的贫穷和愚昧。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梅林》（1893 年 7 月 14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9 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95 页。

我们立刻就可以看出：这种幻想是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性或证明资本是人类生产本身不朽的自然要素的非常方便的方法。

一方面，我们说这样一些劳动过程的要素：这些要素同它们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所具有的**特殊社会性质**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我们又加入这样一种要素：这种要素属于同所有一定社会形式无关的、作为人与自然之间的永恒过程的**劳动过程**。下面我们会进一步看到，经济学家的这种幻想——

把资本对劳动过程的占有这件事同劳动过程本身混淆起来，从而把单纯劳动过程的**物的要素**转化为资本，因为资本在其中也转化为劳动过程的物的要素，——是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性质本身中产生出来的；这种幻想，在古典经济学家们那里只是当他们专门从劳动过程的观点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时候才保留着，因而他们在进一步的叙述中就改正了。但是我们立刻就可以看出：这种幻想是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性或证明**资本**是人类生产本身**不朽的自然要素**的非常方便的方法。劳动是人类生存的永恒自然条件。劳动过程从它的创造活动来考察，不外是劳动本身。因此，劳动过程的一般要素同任何一定的社会发展无关。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其中一部分已经是过去劳动的产品——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的任何劳动过程中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所以，如果我相信“总有些东西会留下来”这种说法，给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挂上**资本**的名称，那么我就已经**证明**：资本的存在是人类生产的永恒自然规律，用从俄国人那里偷来的刀割席草并且用这种席草编成自己的船的吉尔吉斯人，是同路特希尔德先生一模一样的资本家。我同样也可以证明：由于希腊人与罗马人喝酒和吃面包，他们就是参加了圣餐；由于土耳其人天天洗澡，他们就是每天都在洒天主教的圣水。这是无耻的肤浅的空谈，它不仅从某个**弗·巴师夏**那里，或者从**实用知识促进协会**的经济短评中，或者从某个**马提诺**妈妈的儿童读物中，而且甚至从真正的专门作者那里，煞有介事地放出来。用这种方式，不仅没有能按照预定的目的证明资本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而且正好相反，连资本在社会生产过程的一定历史

发展阶段上的必然性也被否定了，因为断言资本无非是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或者断言劳动过程的物的要素天生就是资本，当然是与下述回答相对立的：人需要的是资本，而不是资本家，换句话说，资本不外是为了欺骗群众而发明的名称。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册第六章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1863 年 7 月—1864 年 6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9 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6—58 页。

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

因此，在自然界中和历史上所显露出来的辩证的发展，即经过一切迂回曲折和暂时退步而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运动的因果联系，在黑格尔那里，只是概念的自己运动的翻版，而这种概念的自己运动是从来就有的、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发生的，但无论如何是同任何能思维的人脑无关的。这种意识形态的颠倒是应该消除的。我们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作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作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大部分也是如此。这样，

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36—337页。

（二）判别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方法论原则

财产、资本、金钱、雇佣劳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远不是想象中的幻影，而是工人自我异化的十分实际、十分具体的产物，因此也必须用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来消灭它们……

但是这些**群众的**共产主义的工人，例如在曼彻斯特和里昂的工场中做工的人，并不认为用**“纯粹的思维”**即单靠一些议论就可以摆脱自己的主人和自己实际上所处的屈辱地位。他们非常痛苦地感觉到**存在**和**思维**、**意识**和**生活**之间的**差别**。他们知道，财产、资本、金钱、雇佣劳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远不是想象中的幻影，而是工人自我异化的十分实际、十分具体的产物，因此也必须用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来消灭它们，以便使人不仅能在**思维**中、**意识**中，而且也能在群众的**存在**中、生活中真正成其为人。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月—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6页。

要真正地、实际地消灭这些词句，要从人们意识中消除这些观念，就要靠改变了的环境，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来实现。

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因此，这种历史观只能在历史上看到政治历史事件，看到宗教的和一般理论的斗争，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例如，某一时代想象自己是由纯粹"政治的"或"宗教的"动因所决定的——尽管"宗教"和"政治"只是时代的现实动因的形式——，那么它的历史编纂学家就会接受这个意见。这些特定的人关于自己的真正实践的"想象"、"观念"变成一种支配和决定这些人的实践的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和积极的力量。印度人和埃及人借以实现分工的粗陋形式在这些民族的国家和宗教中产生了等级制度，所以历史学家便认为似乎等级制度是产生这种粗陋的社会形式的力量。法国人和英国人至少抱着一种毕竟是同现实最接近的政治幻想，而德国人却在"纯粹精神"的领域中兜圈子，把宗教幻想推崇为历史的动力。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整个这种德国历史编纂学的最终的、达到自己"最纯粹的表现"的成果。对于德国历史编纂学来说，问题完全不在于现实的利益，甚至

不在于政治的利益，而在于纯粹的思想。这种历史哲学后来在圣布鲁诺看来也一定是一连串的“思想”，其中一个吞噬一个，最终消失于“自我意识”中。圣麦克斯·施蒂纳更加彻底，他对全部现实的历史一窍不通，他认为历史进程必定只是“骑士”、强盗和怪影的历史，他当然只有借助于“不信神”才能摆脱这种历史的幻觉而得救。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宗教的观点：它把宗教的人假设为全部历史起点的原人，它在自己的想象中用宗教的幻想生产代替生活资料和生活本身的现实生产。整个这样的历史观及其解体和由此产生的怀疑和顾虑，仅仅是德国人**本民族的**事情，而且对德国来说也只有**地域性**的意义。例如，近来不断讨论着如何能够“从神的王国进入人的王国”[①]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似乎这个“神的王国”除了存在于想象之中，还在其他什么地方存在过，而学识渊博的先生们不是一直生活在——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他们目前想要找到去路的那个“人的王国”之中，似乎旨在说明这个理论上的空中楼阁的奇妙性的科学娱乐——因为这不过是一种娱乐——恰恰不在于证明这种空中楼阁是从现实的尘世关系中产生的。通常这些德国人总是只关心把既有的一切无意义的论调变为某种别的胡说八道，就是说，他们假定，所有这些无意义的论调都具有某种需要揭示的特殊**意义**，其实全部问题只在于从现存的现实关系出发来说明这些理论词句。如前所说，要真正地、实际地消灭这些词句，从人们意识中消除这些观念，就要靠改变了的环境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来实现。

① 费尔巴哈：《因〈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而论〈基督教的本质〉》。——编者注

对于人民大众即无产阶级来说，这些理论观念并不存在，因而也不用去消灭它们。如果这些群众曾经有过某些理论观念，如宗教，那么现在这些观念也早已被环境消灭了。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4—95页。

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伟大的、一切时代中最伟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当德国的资产阶级、学究和官僚把英法经济学的初步原理当作不可侵犯的教条死记硬背，力求多少有些了解的时候，德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出现了。它的全部理论内容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它一出现，科学的、独立的、**德国的经济学**也就产生了。这种德国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后者的要点，在本书的序言中已经作了扼要的阐述。这篇序言的主要部分已经在《人民报》上刊载过，因此我们请读者去参看一下。下面这个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个原理非常简单，它对于没有被唯心主义的欺骗束缚住的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这个事实不仅对于理论，而且对于实践都是最革命的结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由此可见，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强大的、一切时代中最强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政治论证的全部传统方式崩溃了；爱国的义勇精神愤慨地起来反对这种无礼的观点。因此，新的世界观不仅必然遭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对，而且也必然遭到一群想靠**自由、平等、博爱**的符咒来翻转世界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反对。这种世界观激起了德国庸俗的民主主义空喊家极大的愤

怒。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力图剽窃新的思想，然而对这些思想又极端无知。

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二月革命把我们党推上了政治舞台，因此使它不可能进行纯科学的探讨。虽然如此，这个基本观点却像一根红线贯穿着党的一切文献。在所有这些文献中，每个场合都证明，每次行动怎样从直接的物质动因产生，而不是从伴随着物质动因的词句产生，相反地，政治词句和法律词句正像政治行动及其结果一样，倒是从物质动因产生的。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8月3—1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39页。

……问题并不在于实现某种空想的体系，而在于要自觉地参加我们眼前发生的改造社会的历史过程。

我们在这些小册子里，对构成当时“同盟”的秘密学说的那种法英两国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同德国哲学的混合物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为了代替这种混合物，我们提出把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结构的科学认识作为唯一牢靠的理论基础，最后并用通俗的形式说明：问题并不在于实现某种空想的体系，而在于要自觉地参加我们眼前发生的改造社会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福格特先生》(1860 年 2 月—1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37 页。

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实际上把这个思想分别运用于每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

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特别是从黑格尔以来,已经成了一般人的意识,以致它在这种一般形式中未必会遭到反对了。但是,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实际上把这个思想分别运用于每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如果人们在研究工作中始终从这个观点出发,那么关于最终解决和永恒真理的要求就永远不会提出了;人们就始终会意识到他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必然具有的局限性,意识到他们在获得知识时所处的环境对这些知识的制约性;人们对于还在不断流行的旧形而上学所不能克服的对立,即真理和谬误、善和恶、同一和差别、必然和偶然之间的对立也不再敬畏了;人们知道,这些对立只有相对的意义,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被断定为

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如此等等。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页。

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

这些古老的社会生产有机体比资产阶级的社会生产有机体简单明了得多，但它们或者以个人尚未成熟，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的脐带为基础，或者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为基础。它们存在的条件是：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这种实际的狭隘性，观念地反映在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间宗教中。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册　资本的生产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7页。

无数的单个愿望和单个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

但是，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相反，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各个时代和各个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因为在这一领域内，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预期的目的，总的说来在表面上好像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人们所预期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互相干扰，彼此冲突，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无数的单个愿望和单个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

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

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意识形态的形式、甚至以被神圣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

历史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所代表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都决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认为这些动机后面还有应当加以探究的别的动力；但是它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

因此，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

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意识形态的形式、甚至以被神圣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249页。

我们的叙述方法自然要取决于对象本身的性质。

我们的叙述主要是针对**布鲁诺·鲍威尔**的《文学总汇报》（我们手边有该杂志的前八期），因为在该报中鲍威尔的批判以及**整个德国思辨**的全部谰言达到了顶点。批判的批判（即"文学报"的批判）愈是用哲学把现实歪曲得令人捧腹，那就对我们愈有教益。**法赫尔**和**施里加**二人便是例子。对《文学报》所暴露的材料加以考察，就能帮助广大读者识破思辨哲学的幻想。这也就是我们写作本书的目的。

我们的叙述方法自然要取决于**对象本身的性质**。批判的批判在各方面都**低于**德国的理论发展水平。因此，假如我们**在这里**没有进而对这一发展本身**加以探讨**，那是由于我们所研究的对象的本质所致。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月—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页。

对经济学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经得到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

对经济学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经得到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既然在历史上也像在它的文献的反映上一样，大体说来，发展也是从最简单的关系进到比较复杂的关系，那么，政治经济学文献的历史发展就提供了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线索，而且，大体说来，经济范畴出现的顺序同它们在逻辑发展中的顺序也是一样的。这种形式看来有好处，就是比较明确，因为这正是跟随着**现实的**发展，但是实际上这种形式至多只是比较通俗而已。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并且，写经济学史又不能撇开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这就会使工作漫无止境，因为一切准备工作都还没有做。因此，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

我们采用这种方法，是从历史上和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关系出发，因而在这里是从我们所遇到的最初的经济关系出发。我们来分析这种关系。既然这是一种**关系**，这就表示其中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我们分

别考察每一个方面;由此得出它们相互关联的性质,它们的相互作用。于是出现了需要解决的矛盾。但是,因为我们这里考察的不是只在我们头脑中发生的抽象的思想过程,而是在某个时候确实发生过或者还在发生的现实过程,因此这些矛盾也是在实践中发展着的,并且可能已经得到了解决。我们考察这种解决的方式,发现这是由建立新关系来解决的,而这个新关系的两个对立面我们现在又需要展开说明,等等。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 年 8 月 3—15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3—44 页。

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

粗率和无知之处正在于把有机地联系着的东西看成是彼此偶然发生关系的、纯粹反思联系中的东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是感到,在现代警察制度下,比在例如强权下能更好地进行生产。他们只是忘记了,强权也是一种法,而且强者的权利也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于他们的"法治国家"中。

当与生产的一定阶段相应的社会状态刚刚产生或者已经衰亡的时候,自然会出现生产上的紊乱,虽然程度和影响有所不同。

总之: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

马克思:《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1857 年 8 月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9 页。

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

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但是,决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人们认识了地租,就能理解代役租、什一税等等。但是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

马克思:《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1857 年 8 月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6—47 页。

(三)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根源

现代犹太人的生活不能以他们的宗教(好像宗教就是一种特殊的孤芳自赏的本质)来解释;犹太教的生命力只能用虚幻地反映在犹太教中的市民社会的实际基础来解释。

在《德法年鉴》中曾经证明犹太精神是**依靠**历史、**通过**历史并且同历史**一起**保存下来和发展起来的,然而,这种发展不是神学家的眼睛,也不是在**宗教学**说中所能看到的,而只有世俗人的眼睛,只有在**工商业的实践**中才能看到。在《德法年鉴》中曾经说明,**为什么**实践中的犹太精神只有在完备的**基督教**世界里才能达到完备的程度;不但如此,那里还指出,它只不过是**基督教世界本身的**完备的**实践**。**现代**犹太人的生活不能以他们的宗教(好像宗教就是一种特殊的孤芳自赏的本质)来解释;相反地,犹太教的生命力只能用**虚幻地**反映在犹太教中的市民社会的实际基础来解释。因此,犹太人解放为人,或者人从**犹太精神**中获得解放,不应像鲍威尔先生那样理解为犹太人的特殊任务,而应理解为彻头彻尾渗透着犹太精神的现代世界的普遍的实践任务。已经证明,克服犹太本质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消灭市民社会中犹太精神**的任务,消灭现代生活实践中的非人性的任务,这种非人性的最高表现就是**货币制度**。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 年 9 月—1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40—141 页。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

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学家蒲鲁东先生把事物颠倒了，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这位哲学家蒲鲁东先生还告诉我们，这些原理和范畴过去曾睡在“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的怀抱里。

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连。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①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

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节选）（1847 年上

① 1885 年德文版改为“生产方式”。——编者注

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142页。

这一时期的哲学之所以强大有力,完全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实际上的软弱;他们既然不能在实际生活中向过时的制度进攻,就必须让那些在思想领域进攻这种制度的大胆的理想主义者占先。

资产阶级还太软弱,不敢进行积极的活动,只得跟随在黑格尔门徒所领导的向旧世界的宗教、思想、政治开火的理论家大军后面。在以前任何时期,哲学批判都没有像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位的头八年中那样大胆、有力和盛行;威廉四世想用中世纪神秘主义代替弗里德里希二世搬运到普鲁士来的"肤浅的"唯理论。这一时期的哲学之所以强大有力,完全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实际上的软弱;他们既然不能在实际生活中向过时的制度进攻,就必须让那些在思想领域进攻这种制度的大胆的理想主义者占先。

马克思:《普鲁士状况》(1859年1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27页。

只有抛开互相矛盾的教条,而去观察构成这些教条的隐蔽背景的各种互相矛盾的事实和实际的对抗,才能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种实证科学。

当经济学家先生们对地租是因土地的自然差别而作的支出还是仅仅是对土地所投资本的利息这个问题进行着纯教条

式的争论的时候，我们这里在农场主和大地主之间却进行着一场实际的生死斗争，这就是除因土地的差别而作的支出以外，地租还应当包括多少不是由大地主而是由租佃者把资本投入土地而得的利息。只有抛开互相矛盾的教条，而去观察构成这些教条的隐蔽背景的各种互相矛盾的事实和实际的对抗，才能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种实证科学。

恩格斯：《恩格斯致马克思》（1868 年 10 月 10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169—170 页。

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

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请那些因为人抱有自觉的“目的”，遵循一定的理想，而主张把社会演进从自然历史演进中划分出来的主观主义者先生们注意。）既然意识要素在文化史上只起着这样从属的作用，那么不言而喻，以这个文化为对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识的某种形式或某种结果为依据。换句话说，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客观现象。批判应该是这样的：不是把一定的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它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对这种批判唯一重要的是，把两种事实尽量精确地研究清楚，使它们在相互关系上表现为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特别需要的是同

样精确地把一系列已知的状态、它们的连贯性以及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联系研究清楚。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1894 年春夏),《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3—34 页。

……另一方面表明了一个错觉,仿佛私有制本身仅仅以个人意志即以对物的任意支配为基础。

在私法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作为普遍意志的结果来表达的。仅仅使用和滥用的权利[jus utendi et abutendi]就一方面表明私有制已经完全不依赖于共同体[Gemeinwesen],另一方面表明了一个错觉,仿佛私有制本身仅仅以个人意志即以对物的任意支配为基础。实际上,滥用[abuti]对于私有者具有极为明确的经济界限,如果他不希望他的财产从而他滥用的权利转入他人之手的话;因为仅仅从私有者的意志方面来考察的物,根本不是物;物只有在交往中并且不以权利为转移时,才成为物,即成为真正的财产(一种**关系**,哲学家们称之为观念)①。这种把权利归结为纯粹意志的法律上的错觉,在所有制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必然会造成这样的现象:某人在法律上可以对某物享有权利,但实际上并不拥有某物。例如,假定由于竞争,某一块土地不再提供地租,虽然这块土地的所有者在法律上享有权利,包括享有使用和滥用的

① 马克思加了边注:"**在哲学家们看来关系=观念。他们只知道'一般人'对自身的关系,因此,在他们看来,一切现实的关系都成了观念**"。——编者注

权利。但是这种权利对他毫无用处:只要他还未占有足够的资本来经营自己的土地,他作为土地所有者就一无所有。法学家们的这种错觉说明:在法学家们以及任何法典看来,各个人相互之间的关系,例如缔结契约这类事情,一般都是偶然的;他们认为这些关系可以随意建立或不建立,它们的内容完全依据缔约双方的个人意愿。

每当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创造出新的交往形式,例如保险公司等等,法便不得不承认它们都是获得财产的方式。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1845 年秋—大约 1846 年 5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33—134 页。

人们忘记他们的法起源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正如他们忘记他们自己起源于动物界一样。

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随着社会的进一步的发展,法律进一步发展为或多或少广泛的立法。这种立法越复杂,它的表现方式也就越远离社会日常经济生活条件所借以表现的方式。立法就显得好像是一个独立的因素,这个因素似乎不是从经济关系中,而是从自身的内在根据中,可以说,从"意志概念"中,获得它存在的理由和继续发展

的根据。人们忘记他们的法起源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正如他们忘记他们自己起源于动物界一样。随着立法进一步发展为复杂和广泛的整体，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工的必要性：一个职业法学家阶层形成起来了，同时也就产生了法学。法学在其进一步发展中把各民族和各时代的法的体系互相加以比较，不是把它们视为各该相应经济关系的反映，而是把它们视为自身包含自我根据的体系。比较是以共同点为前提的：法学家把所有这些法的体系中的多少相同的东西统称为**自然法**，这样便有了共同点。而衡量什么算自然法和什么不算自然法的尺度，则是法本身的最抽象的表现，即**公平**。于是，从此以后，在法学家和盲目相信他们的人们眼中，法的发展就只不过是使获得法的表现的人类生活状态一再接近于公平理想，即接近于永恒公平。而这个公平则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 年 5 月—1873 年 1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11—212 页。

按照他们（18 世纪的预言家）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这样的错觉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个新时代所具有的。

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 18 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

构。这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这类故事决不像文化史家想象的那样,仅仅表示对过度文明的反动和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同样,卢梭的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也不是以这种自然主义为基础的。这是假象,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其实,这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而在过去的历史时代,自然联系等等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这种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而在18世纪的预言家看来(斯密和李嘉图还完全以这些预言家为依据),这种个人是曾在过去存在过的理想;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这样的错觉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个新时代所具有的。斯图亚特在许多方面同18世纪对立并作为贵族比较多地站在历史基础上,从而避免了这种局限性。

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

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在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时,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在这方面无须多说。18 世纪的人们有这种荒诞无稽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是巴师夏、凯里和蒲鲁东等人又把这种看法郑重其事地引进最新的经济学中来,这一点本来可以完全不提。蒲鲁东等人自然乐于用编造神话的办法,来对一种他不知道历史来源的经济关系的起源作历史哲学的说明,说什么亚当或普罗米修斯已经有了现成的想法,后来这种想法就被实行了等等。再没有比这类想入非非的陈词滥调更加枯燥乏味的了。

马克思:《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1857 年 8 月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2—26 页。

整个资本家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不可能因为一个人得到了另一个人所失去的东西而发财致富,增大他们的总资本,或者说,产生出剩余价值。整个阶级是不能自己欺骗自己的。

我们就拿某个国家的所有资本家和他们在一年内所进行的买和卖的总和来说,虽然某一个人可能欺骗了另一个人,因而从流通中取得了比他投入的价值更大的价值,但是,流通中的资本价值总额不会因这一活动而有丝毫增加。换句话说,

整个资本家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不可能因为一个人得到了另一个人所失去的东西而发财致富,增大他们的总资本,或者说产生出剩余价值。整个阶级是不能自己欺骗自己的。流通中的资本的总额不可能因资本的个别组成部分在其所有者中间进行不同的分配而增大。由此可见,这类活动不管你打算进行多少次,也决不会使价值总额增大,不会产生新的价值或剩余价值,或者说,不会使流通中的全部资本产生利润。

马克思:《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1861 年 8 月—1862 年 3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6 页。

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这个发展的条件就表现为资本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仅是不管单个工人的意志如何而完成的,而且是直接反对单个工人的。

这种关系在它的简单形式中就已经是一种颠倒,是物的人格化和人的物化;因为这个形式和以前一切形式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资本家不是作为这种或那种个人属性的体现者来统治工人,他只在他是"资本"的范围内统治工人;他的统治只不过是物化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工人制造的产品对工人本身的统治。

但是,这种关系所以变得更加复杂,显得更加神秘,是因为随着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不仅这些直接物质的东西(它们都是劳动产品;从使用价值来看,它们是劳动产品,又是劳动的物的条件;从交换价值来看,它们是物化的一般劳动时间或货币)起来反对工人,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

立，就连社会地发展了的劳动的形式——协作、工场手工业（作为分工的形式）、工厂（作为以机器体系为自己的物质基础的社会劳动形式）——都表现为**资本的发展形式**，因此，从这些社会劳动形式发展起来的劳动生产力，从而还有科学和自然力，也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事实上，协作中的统一，分工中的结合，机器工业中自然力、科学和劳动产品的用于生产，所有这一切，都作为某种**异己的、物的**东西，纯粹作为不依赖于工人而支配着工人的劳动资料的存在形式，同单个工人相对立，正如劳动资料本身在它们作为材料、工具等简单可见的形式上，作为**资本的职能**，因而作为**资本家**的职能，同单个工人相对立一样。工人自己的劳动的社会形式，或者说，工人自己的社会劳动的形式，是完全不以单个工人为转移而形成的关系；工人从属于资本，变成这些社会构成的要素，但是这些社会构成并不属于工人。因而，这些社会构成，作为资本本身的**形态**，作为不同于每个工人的单个劳动能力的、属于资本的、从资本中产生并被并入资本的结合，同工人相对立。并且这一点随着下述情况的发展越来越具有实在的形式。这些情况是：一方面，工人的劳动能力本身由于上述社会形式而发生了形态变化，以致它在独立存在时，也就是说，**处在**这种资本主义联系**之外**时，就变得无能为力，它的独立的生产能力被破坏了；另一方面，随着机器生产的发展，劳动条件在工艺方面也表现为统治劳动的力量，同时又代替劳动，压迫劳动，使独立形式的劳动成为多余的东西。工人的劳动的**社会**性质作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化的**东西同工人相对立（例如，在机器生产部门，劳动的可见产品表现为劳动的统治者），在这个过

程中，各种自然力和科学——历史发展总过程的产物，它抽象地表现了这一发展总过程的精华——自然也发生同样的情况：它们作为资本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科学及其应用，事实上同单个工人的技能和知识分离了，虽然它们——从它们的源泉来看——又是劳动的产品，然而在它们进入劳动过程的一切地方，它们都表现为**被并入资本的东西**。使用机器的资本家不必懂得机器（见尤尔的著作）。但是，**在机器上**实现了的科学，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而事实上，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所有这些对科学、自然力和大量劳动产品的应用本身，只表现为**剥削**劳动的**手段**，表现为占有剩余劳动的手段，因而，表现为属于资本而同劳动对立的**力量**。资本使用这一切手段，当然只是为了剥削劳动，但是为了剥削劳动，资本必然要在生产过程中使用这些手段。所以，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这个发展的条件就表现为**资本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仅是不管单个工人的意志如何而完成的，而且是直接反对单个工人的。

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1863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39页。

……因为他们（政治经济学家们）没有同时把资本看作是历史上暂时的、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生产形式。

政治经济学家们没有把资本看作是一种关系。他们不可能这样看待资本，因为他们没有同时把资本看作是历史上暂时的、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生产形式。霍吉斯金本人也没有

这样来理解资本。只要这样的理解是为资本辩护的话，它就不是为政治经济学家们对资本的辩护进行辩护，而是相反地否定他们的辩护。因此，霍吉斯金同对资本的这种看法没有任何关系。

就霍吉斯金和政治经济学家们之间存在的情况来看，他的论战的性质看来是预先确定了的并且是很简单的。霍吉斯金本来只是应该借助政治经济学家们"科学地"发展了的一个方面，来反对他们不加考虑地、无意识地和天真地从资本主义的思想方式接受来的拜物教观念，并且大致这样说：

如果工人想利用自己的产品来进行新的生产，那就必须把过去劳动的产品（一般说，劳动产品）当作材料、工具和生活资料来使用。他的产品的这种一定的消费方式是生产性的。但是，对工人的产品的这种使用，工人消费自己产品的这种方式，同这种产品对工人本身的支配，同这种产品作为资本的存在，同原料和生活资料的集中掌握在个别资本家手中，以及同工人被剥夺了对他们产品的所有权，究竟有什么关系？这同工人首先必须白白地把自己的产品交给第三者，以便后来用自己的劳动再从第三者那里把它赎回来，为此他不得不付给第三者比产品里包含的劳动更多的劳动来交换这一产品，并且这样来为资本家创造新的剩余产品，又有什么关系呢？

马克思：《〈资本论〉第四卷第三册第二十一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01—302页。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把资本看作永恒的和自然的生产形式,然后又竭力为自己对资本的这种看法辩护……

资本**生成,产生**的条件预示着,资本还不存在,而只是**正在生成**;因此,这些条件随着现实的资本[出现]就消失了,在资本从自己的现实性出发而创造出自己的实现条件时就消失了。举例来说,如果说货币或自为存在的价值最初生成为资本时,要以资本家作为**非资本家**时所实现的**原始积累**——即使是靠货币或商品的所有者的节约,自己的劳动等等——为前提,也就是说,如果说货币生成为资本的前提表现为**资本**产生的一定的外在的**前提**,那么,一旦资本成为资本,它就会创造它自己的前提,即不通过交换而通过它本身的生产过程来占有创造新价值的现实条件。这些前提,最初表现为资本生成的条件,因而还不能从资本**作为资本**的**活动**中产生;现在,它们表现为资本自身实现的结果,是由资本造成的**现实**的结果,它们不**表现为资本产生的条件,而表现为资本存在的结果**。资本不再从自己的前提出发,它本身就是前提,它从它自身出发,自己创造出保存和增殖自己的前提。因此,在创造追加资本Ⅰ之前存在的条件,或者说表现资本的生成的条件,不属于以资本为前提的生产方式的范围,而是资本以前的资本生成的史前阶段,就像地球从流动的火海和气海的状态变为地球现在的形态所经历的过程,处于已经形成的地球的生命的彼岸一样。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把资本看作永恒的和**自然的**生产形式,然后又竭力为自己对资本的这种看法辩护,把资本生成的条件(而且是幻想的条件)说成是资本现在实现的条件,换句话说,把资本家还是作为**非资本家**——因为他还只

是正在变为资本家——用来进行占有的要素，说成是资本家已经**作为资本家**用来进行占有的条件。

马克思：《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1863 年 5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8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62—163 页。

认为资本是一种会自行再生产的东西，一种靠自身的天性而长久保存和增殖的价值，这种观念，曾经使普莱斯博士生出许多荒诞无稽的幻想。

认为资本是一种会自行再生产的东西，一种靠自身的天性而长久保存和增殖的价值，这种观念，曾经使普莱斯博士生出许多荒诞无稽的幻想。它们已经远远超过炼金术士的幻想。对于这些幻想，彼特深信不疑，而且，他在制定［国债］还债基金的条例时，把这些幻想当作他的财政智慧的基础。

马克思：《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1863 年 5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8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57 页。

正像经济学家们一方面犯了把资本的这些元素形式——商品和货币——本身跟资本等同起来的错误一样，他们另一方面又犯了把资本的使用价值存在方式——劳动资料——本身说成就是资本的错误。

正像经济学家们一方面犯了把资本的这些元素形式——商品和货币——本身跟资本等同起来的错误一样，他们另一方面又犯了把资本的使用价值存在方式——**劳动资料**——本身说成就是资本的错误。

在资本的最初的(可以说是)暂时的形式即**货币**(资本形成的起点)上,资本还只是作为货币存在着,从而还只是在**交换价值的独立形式**即其**货币表现**中作为一个**交换价值额**存在着。但是,这个货币必须自行增殖。交换价值必须用来创造更多的交换价值。**价值量**必须增加,就是说,现有价值不仅要保存自己,而且它还必须创造出一个**增量**,价值的**Δ**即**剩余价值**,从而使已知的价值即已知的货币额表现为流动量,使增量表现为流数。我们在考察资本流通过程的时候,还将返回来谈资本的这个独立的货币表现。在这里,当我们还只是同货币这个**直接生产过程的起点**打交道的时候,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资本在这里还只是作为一个一切使用价值都已消失不见的**已知的价值额**=G(货币)存在着,从而是以货币的形式存在着。这个价值额的**量**,受要转化为资本的**货币额的大小**或**数量**的限制。因此,这个价值额所以变成资本,是由于它的**量会增大**,由于它会转化为**一个变动的量**,由于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会产生流数的流动量。这个货币额所以**自在地**是资本,也就是说,按其**使命**来说是资本,只是因为它被使用、被支出的方式的目的是使自己**增大**,只是因为它被支出的**目的是使自己增大**。这一点,如果就现有价值额或货币额来说,表现为它的**规定**,它的内在动力,**趋势**,那么就**资本家**即这个货币额的所有者(这个货币额在他的手中必须执行这种职能)来说,就表现为**意图,目的**。但是,在资本(要生成的资本)的这个最初的简单的价值表现或货币表现中,对使用价值的一切关系都抽象掉了,消失了,因而,**实际生产过程**(商品生产等等)的一切破坏性干扰以及后来出现的引起混乱的偶然因素

也都消失了，表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征的特殊性质**，也以同样抽象简单的形式表现出来。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册第六章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1863 年 7 月—1864 年 6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9 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3—34 页。

……把资本主义积累混同为并且用术语来说即转化为一种完全同资本主义积累相对立、相排斥的过程，而与这一过程相适应的那种生产方式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在其废墟上得以建立起来的生产方式。这是政治经济学极力维护的幻想之一。

历史等等的条件会与直接生产者群众**被剥夺**的相对程度的大小相适应，对**生产资料积聚的相对规模**发生不同的影响，由于这种历史等等的条件，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发展阶段是极其不同的。但是，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恰恰同直接生产者本身的“积蓄”和“积累”成反比，这种直接生产者在法国比在英国多得多。生产者的剩余劳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积蓄”、“积攒”、“积累”和集合为大笔数目，也就是说，**被集中**，被用作资本，这种剩余劳动也就在同样大的程度上由生产者的雇主而不是由生产者本人积累起来等等；因此，相当大部分的实际生产者也就在同样大的程度上被剥夺掉“积蓄”、“积攒”、“积累”的可能性和条件，总之，被剥夺掉在一定程度上占有自己剩余劳动的任何可能性（因为他们在不同程度上**被剥夺了**自己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的积累和积聚，是依靠于和适应于**大量占有他人剩余劳动**的能力，

以及这些人本身对自身剩余劳动提出任何要求的相应的不可能性。因此,用下述办法来解释并说明资本主义积累是最可笑的幻想、谬误或欺骗,这种办法就是:把资本主义积累混同为并且用术语来说即转化为一种完全同资本主义积累相对立、相排斥的过程,而与这一过程相适应的那种生产方式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在其废墟上得以建立起来的生产方式。这是政治经济学极力维护的幻想之一。在这种资产阶级社会里,确实会有这样的情况,即只要一个工人绝顶聪明,善于投机钻营,天生具有资产阶级的本能,而运气又非常好,那他自己就能变成**他人劳动的剥削者**。但是,在没有劳动可供剥削的地方,既不会有资本家,也不会有资本主义生产。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册第六章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1863 年 7 月—1864 年 6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9 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35—136 页。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永恒的……

利润像工资一样,表现为**分配形式**。但是,因为资本只有通过利润再转化为资本,再转化为追加资本,才能增长,所以利润也是**资本的生产形式**;这和下面这种情况完全一样:从资本的观点看来,工资是单纯的**生产关系**,而从工人的观点看来,却是分配关系。

这里表明,分配关系本身是由生产关系产生的,并且是从另一个角度表现的生产关系本身。其次还表明,生产同消费

的关系是由生产本身造成的。所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有一种荒谬的观点,例如约·斯·穆勒也是这样,他认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永恒的,而这种生产关系的分配形式则是历史的,这种荒谬观点表明,穆勒既不懂前者,也不懂后者。

……

因此,不能用简单的交换关系来说明收入。在交换中得到的价值所具有的代表资本或收入的质,是由处于简单交换之外的关系决定的。因此,像和谐的自由贸易派所做的那样,把这些比较复杂的形式化为简单的交换关系,是荒谬的。如果从简单交换的观点出发,并且把积累看作单纯货币(交换价值)的积累,那么,资本的利润和收入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1857 年底—1858 年 5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60 页。

现代经济学家不断与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作斗争,这多半是因为这种主义以粗野而质朴的形式吐露了资产阶级生产的秘密:资产阶级生产受交换价值支配。

在 16、17 世纪这个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童年时期,一种普遍的求金欲驱使各国人民和王公组织远征重洋的十字军去追求黄金的圣杯[①],同样,现代世界的最初解释者即货币主义——重商主义不过是它的变种——的创始人,宣布金银即

① 马克思在他的校正本上加了一个注:"黄金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能要什么有什么。黄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哥伦布 1503 年寄自牙买加的一封信)——编者注

货币是唯一的财富。他们正确地说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使命就是赚钱,从简单商品流通观点来看,也就是形成既不蛀又不锈的永恒的财宝①。对于货币主义,是不能用价格3镑的1吨铁同3镑的金是同样大的价值量这样的说法来回答的。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交换价值的大小,而在于它的最适当的形式。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把世界贸易以及国民劳动中同世界贸易直接有关的特殊部门当作财富或货币的唯一真正源泉划分出来,这是由于在那个时代,国民生产大部分还处在封建形式中,还是当作直接的生存源泉为生产者本身服务。产品大部分并不转化为商品,因而也不转化为货币,它们完全不参加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因而不表现为一般抽象劳动的化身,实际上不形成资产阶级财富。把货币当作流通的目的,就是把交换价值或抽象财富、而不是把财富的任何物质要素当作决定生产的目标和推动生产的动机。同资产阶级生产的萌芽阶段相适应,那些被忽视的预言家坚持交换价值的坚实的、可以捉摸的和闪闪发光的形式,坚持它同一切特殊商品对立的一般商品的形式。当时真正的资产阶级的经济领域是商品流通的领域。所以他们从这个基本领域的观点来判断资产阶级生产的整个错综复杂的过程,混淆了货币和资本。现代经济学家不断与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作斗争,这多半是因为这种主义以粗野而质朴的形式吐露了资产阶级生产的秘密:资产阶级生产受交换价值支配。李嘉图——尽管他是错误的应用[理论]——曾在什么地方说过:即使在闹饥荒的时候,输入谷物

① 参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6章第19节。——编者注

也不是由于国民挨饿，而是由于谷商要赚钱。因此，政治经济学在批判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时，攻击这种主义是纯粹的幻想，只是虚构的理论，不承认它是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基本前提的野蛮形式，那是错误的。此外，这种主义不仅保留着历史的权利，而且在现代经济的一定领域中也完全享有它的公民权。在财富采取商品这个元素形式的资产阶级生产过程的一切阶段上，交换价值采取货币这个元素形式，而在生产过程的一切阶段，财富总是不断有一刹那再回到商品这个一般元素形式。甚至在最发达的资产阶级经济中，金银作为货币的这一独特职能——与金银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不同，并且是与一切其他商品相对立的——也没有被取消，而只是受到限制。因此，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还保留着它们的权利。金银作为社会劳动的直接化身、因而作为抽象财富的存在而与其他世俗的商品相对立这种旧教式的事实，自然有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新教的体面，资产阶级经济学由于唯恐染上货币主义的偏见，长期对货币流通现象失去判断力，下面的叙述就表明这一点。

马克思：《1859—1861 年经济学著作和手稿》（1858 年 8 月—1859 年 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52—554 页。

凯里正是用这种绝望的形式说出以下这个迟延的判断：和谐的交换价值的发展就是不和谐。

因此就产生了那些社会主义者的错误，特别是法国的社会主义者的错误，他们想要证明，社会主义就是实现不是由法

国革命所发现的，而是由它在历史上加以传播的资产阶级的理想，并且要竭力证明，交换价值**最初**（在时间上）或者按其概念（在其最适当的形式上）是普遍自由和平等的制度，但是被货币、资本等等歪曲了。或者他们断言，历史迄今为止企图以适合自由和平等的真实性质的方式来实现自由合平等的一切尝试都失败了，而现在他们，例如蒲鲁东，却发现了用这些关系的真正历史来代替它们的虚假历史的灵丹妙药。交换价值制度，或者更确切地说，货币制度，事实上是自由和平等的制度。但是，在更深入的发展中所出现的矛盾，是这种所有权、自由和平等本身的内在矛盾、混乱。它们有时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例如，认为交换价值不会从商品和货币形式发展为资本形式，或者说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不会发展为雇佣劳动，这是一种虔诚而愚蠢的愿望。这些社会主义者不同于资产阶级辩护士的地方就是：一方面他们觉察到这种制度的矛盾，另一方面抱有空想主义，不理解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的形态和理想的形态之间必然存在的差别，因而愿意做那种徒劳无益的事情，希望重新实现理想的表现本身，即神圣化的和由现实本身从自身投射出来的反思映象。

为了反对这种观点，有人从另一方面提出庸俗论据：同依据考察简单流通所得出的观点相对立的那些矛盾，即当我们进到生产过程的较具体阶段，从表面进到更深处时产生的那些矛盾，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假象。这实际上是断言，并且是通过**抽掉**社会生产过程比较发达的领域即比较发达的经济关系的特殊形式的办法来证明，一切经济关系都不过是简单交换即商品交换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所有权、自由和平等这些规定

的始终不变的关系的各种不同名称而已。就是说，例如他们从日常经验中借用以下事实：除货币和商品外，交换价值的关系还以资本、利息、地租、工资等形式出现。借助于某种极廉价的抽象过程，任意地时而抛掉特殊关系的这一方面，时而抛掉那一方面，来把这种关系化为简单流通的抽象规定，从而证明，个人在生产过程的比较发达的领域中所处的那种经济关系，只不过是简单流通的关系，等等。巴师夏先生就是用这种方式拼凑出他的经济学的神正论——《经济的和谐》。这类有气无力的、夸夸其谈的胡说竟被说成是一种进步，被用来同敢于无情地从纯粹形式上描述生产关系的斯图亚特、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对抗。但是，巴师夏并不是这种和谐论的发明者，相反，他是从美国人凯里那里抄袭来的。凯里是新大陆的成员，在他的观点中只有新大陆才作为历史背景而起作用。他在自己初期的篇幅巨大的著作中，曾证明存在着经济的“和谐”，而这种“和谐”还到处被归结为简单交换过程的抽象规定。他是这样来证明的：他说明这种简单的关系一方面由于国家，另一方面由于英国对世界市场的影响而到处被歪曲了。① 和谐自在地是存在的。但是，在美国以外的那些国家里，和谐被国家歪曲了，而在美国本身，则被这种

① 例如，如果在某一国家里，家长制的生产让位于工业生产，而伴随这一发展的解体过程只是从它的肯定方面去理解，那么这是和谐的。如果英国的大工业以惊人的方式瓦解了外国的家长制的或者小资产阶级的生产形式，那么这就是不和谐 的。他只看到一国内部的资本积聚和这种积聚作用的肯定的方面。但是，他斥之为英国垄断的积聚起来的英国资本对其他民族的资本所产生的影响，则是不和谐的。

关系所表现的最发达的形式，被这种关系的英国型的世界市场的现实歪曲了。为了恢复和谐，凯里别无他法，最终只有向他所揭露的国家这个恶魔呼救，把它作为守护神安置在和谐天堂的大门口——即实行保护关税。凯里毕竟是一个研究家，而不是巴师夏那样的美文学家，所以在他最近的一部著作中必然走得更远。美国最近18年的发展给他的和谐论以沉重打击，以致他把他始终坚持的“自然”“和谐”遭到歪曲的原因，不是看作由于国家的外部影响，而是看作由于**贸易**！结果是令人吃惊的：交换价值被当作和谐生产的基础来加以赞美，然后又说它被发达的交换形式即贸易依照交换价值的内在规律而消灭了！① 凯里正是用这种绝望的形式说出以下这个迟延的判断：和谐的交换价值的发展就是不和谐。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58年8—10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2—365页。

① 凯里实际上是美国唯一的有创见的经济学家，他的著作所以具有很大意义，是因为他的著作从材料上说到处是以资产阶级社会的最自由的、最广阔的现实为基础的。他以抽象的形式表述了庞大的美国[经济]关系，而且是在同旧大陆的对比中来表述的。在巴师夏那里，法国经济关系的细小性是唯一现实的背景，这种关系在他的和谐中到处都显露出来；与这种关系相反，理想化了的英国的和美国的生产关系被说成“实践理性的要求”。所以，凯里对特殊的经济问题，是富于独立的，可以说是真诚的研究的。每当巴师夏偶尔离开矫揉造作的陈词滥调去考察实际范畴（例如地租）时，他就干脆抄袭凯里。因此，凯里主要是克服同他的和谐相对立的那些矛盾，即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本身所阐述的那种形式上的矛盾，而巴师夏则同社会主义者进行争辩。凯里的较深刻的观点在政治经济学本身中遇到了对立面，他作为和谐论者不得不与之战斗，而好虚荣和好争辩的饶舌家[巴师夏]则只是在政治经济学之外看到了这种对立面。

……剩余价值和利润的混淆或区分不清，正是政治经济学中产生极大谬误的根源。

如果本来只应当正确地说明问题，那么，剩余价值和利润的混淆或区分不清，则是政治经济学中产生极大谬误的根源。杰出的经济学家们，例如李嘉图，当然没有把这两者绝对混淆起来，不过他们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表明他们明确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但是，正因为如此，在他们那里，一方面实际规律表现为实际运动的抽象，因而实际运动到处都在局部上同这种抽象相矛盾。另一方面，他们想用价值的或剩余价值的性质来强制地说明那些只是从利润形式的剩余价值中所产生出来的现象。由此就得出错误的规律。李嘉图在考察资本的一般性质时把竞争抽象掉了。另一方面，在考察价值的规定时，从一开始他就把固定资本等等作为决定的要素引了进来，因而正像马尔萨斯公正地指出的，李嘉图取消了自己虚构的规律，或把这个规律只归结为它的一个影子。其次，举例来说，他的门徒，如[詹姆斯·]穆勒和麦克库洛赫，又狂妄地企图把流通时间变为劳动时间，最后，不仅把活物的活动，而且把死物的活动，把死物的任何自然运动，都叫作**劳动**。在这方面，萨伊也是一样。

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1861年8月—186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6页。

他们（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某一特定时代的经济界限，但他们不懂得这些界限本身具有局限性，它们是历史发展

造成的，同样必然要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消失。

如果我们回想一下马尔萨斯，那么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秘密就暴露在我们面前了。这个秘密不过在于把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独有的、适应一定的物质生产状况的暂时的社会关系，变成永恒的、普遍的、固定的规律，即他们所说的自然规律。由物质生产过程中的革命和进化造成的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被政治经济学家们视为纯粹的空想。他们看到某一特定时代的经济界限，但他们不懂得这些界限本身具有局限性，它们是历史发展造成的，同样必然要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消失。

马克思：《战争问题。——不列颠的人口和贸易报告书。——议会动态》（1853 年 8 月 12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83 页。

在资产阶级经济没有用编造神话的办法把自己同过去的经济完全等同起来时，它对于以前的经济，特别是它曾经还不得不与之直接斗争的封建经济的批判，是与基督教对异教的批判或者新教对旧教的批判相似的。

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只是发展的一种对立的形式，所以，那些早期形式的各种关系，在它里面常常只以十分萎缩的或者完全歪曲的形式出现。公社所有制就是个例子。因此，如果说资产阶级经济的范畴适用于一切其他社会形式这种说法是对的，那么，这也只能在一定意义上来理解。这些范畴可以在发展了的、萎缩了的、漫画式的种种形式上，总是在有本

质区别的形式上,包含着这些社会形式。所说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在可能范围内完成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在资产阶级经济学没有用编造神话的办法把自己同过去的经济完全等同起来时,它对于以前的经济,特别是它曾经还不得不与之直接斗争的封建经济的批判,是与基督教对异教的批判或者新教对旧教的批判相似的。

马克思:《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1857 年 8 月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7 页。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虽然看到了生产在资本关系中是怎样进行的,但是他们看不到这种关系本身是怎样被生产的,同时看不到在这种关系中又怎样同时创造出瓦解这种关系的物质条件,从而看不到这种关系作为经济发展的、社会财富生产的必要形式的历史根据是怎样消除的。

资本主义关系本身的出现,必须以一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生产形式为前提。在过去的生产方式中,必然发展起那些超出旧生产关系并迫使旧生产关系转化为资本关系的交往手

段、生产资料和需要。但是，它们只需要发展到使劳动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的程度。然而，在这种已经改变了的关系的基础上，会发展起一种发生了特殊变化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一方面创造出新的物质生产力，另一方面它只有在这种新的物质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从而在实际上给自己创造出新的现实的条件。由此就会出现彻底的经济革命，这种革命一方面为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创造并完成它的现实条件，为它提供一种相应的形式，另一方面，在这个革命与工人相对立中发展起来的劳动生产力、生产条件与交往关系中，这个革命又为一个新生产方式，即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对立形式的新生产方式创造出现实条件，因而为一种新形成的社会生活过程，从而为新的社会形态创造出物质基础。

这是与那些被资本主义观念本身所束缚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根本不同的一种观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虽然看到了生产在资本关系中是怎样进行的，但是他们看不到这种关系本身是怎样被生产的，同时看不到在这种关系中又怎样同时创造出瓦解这种关系的物质条件，从而看不到这种关系作为经济发展的、社会财富生产的必要形式的历史根据是怎样消除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册第六章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1863 年 7 月—1864 年 6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9 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26 页。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是具有客观真实性的理论

形式，因为它们反映着现实的社会关系，不过这些关系只属于商品生产成为社会生产方式的这个一定的历史时期。

对社会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遵循着一条同实际运动完全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是从已经完全确定的材料、发展的结果开始的。给劳动产品打上商品烙印，因而已经决定着商品流通的那些形式，在人们试图了解它们的内在的含义而不是了解它们的历史性质（这些形式在人们看来是完全不变的）以前，就具有社会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因此，只有商品价格的分析才导致商品价值的量的决定，只有商品共同的货币表现才导致商品的价值性质的确定。但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已经获得的固定的形式，商品的货币形式，只是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生产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如果我说，小麦、上衣、皮靴等等把麻布当作抽象的人类劳动的一般化身而同它发生关系，这种说法的虚假和荒唐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当这些商品的生产者使这些商品同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麻布、金或银（这都是一回事）发生关系时，他们的私人劳动同社会总劳动的关系正是通过这种荒谬形式呈现在他们面前。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是具有客观真实性的理论形式，因为它们反映着现实的社会关系，不过这些关系只属于商品生产成为社会生产方式的这个一定的历史时期。因此，如果我们考察其他的生产形式，我们就会看到，在当前时期使劳动产品模糊不清的一切神秘性都立即消失了。

马克思：《著者亲自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片断》（1872 年 9 月—1875 年 11 月），《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1页。

……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

在这里我们立即得到一个贯穿着整个经济学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头脑中引起过可怕混乱的特殊事实的例子，这个事实就是：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诚然，这个或那个经济学家在个别场合也曾觉察到这种联系，而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它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从而使最难的问题变得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现在也能理解了。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8月3—1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页。

（四）拜物教批判

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

正是在生产者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生产者们才把他们不同种的有用劳动作为人类劳动等同起来。也正是在生产者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生产者们才按人类劳动力耗费的持续时间来计量他们的劳动量。但是，在我们的交易中，

在生产者们看来，他们自身劳动的这种社会性质却成了劳动产品本身的天然的社会属性，成了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规定；各种不同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在他们看来，成了劳动产品的价值属性；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量，在他们看来，成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最后，生产者之间因他们的劳动而结成的社会关系，在他们看来，成了这些物品即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或社会关系。正因为这样，在他们看来，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正如一物在视神经中留下的光的印象，不是表现为视神经本身的主观兴奋，而是表现为眼睛外面的物的客观形式。但是在视觉活动中，光确实从一物射到另一物，即从外界对象射入眼睛。这是物理的物之间的物理关系。相反，商品形式和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作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册　价值形式》（1867年6月17—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1—162页。

……物的使用价值对于人来说没有交换就能实现，就是

说，在物和人的直接关系中就能实现；相反，物的价值则只能在交换中实现，就是说，只能在一种社会关系中实现。

假如商品能说话，它们会说：我们的使用价值也许使人们很感兴趣；对我们来说，我们作为物，对使用价值毫不计较。我们关心的是我们的价值。我们彼此之间作为买卖的物所发生的关系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只是相互把对方看作交换价值。难道你们不认为经济学家下面所说的是商品内心的话吗？经济学家说："价值〈交换价值〉是物的属性，财富〈使用价值〉是人的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必然包含交换，财富则不然。"①"财富〈使用价值〉是人的属性，价值是商品的属性。人或共同体是富的，珍珠或金刚石是有价值的，珍珠或金刚石作为珍珠或金刚石是有价值的。"②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化学家在珍珠或金刚石中发现交换价值。可是那些发现或发明这类化学物质并吹嘘自己看问题深刻的经济学家，却发现物的使用价值同它们的物质属性无关，而它们的价值倒是它们作为物所具有的。在这里使他们确信这种看法的正是这样一种奇怪的情况：物的使用价值对于人来说没有交换就能实现，就是说，在物和人的直接关系中就能实现；相反，物的价值则只能在交换中实现，就是说，只能在一种社会关系中实现。在这里，我们不禁想起善良的道勃雷和他对巡丁西可尔的教导：

---

① 《评政治经济学上的若干用语的争论，特别是有关价值、供求的争论》，1821年伦敦版，第16页。

② 赛·贝利：《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1825年伦敦版，第165页。

"一个人长得漂亮是环境造成的,会写字念书才是天生的本领。"①

马克思:《著者亲自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片断》(1872 年 9 月—1875 年 1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9 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98—199 页。

经济学家们把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受这些关系支配的物所获得的规定性看作物的自然属性,这种粗俗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甚至是一种拜物教,它把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内在规定归之于物,从而使物神秘化。

经济学家们把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受这些关系支配的物所获得的规定性看作物的**自然属性**,这种粗俗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甚至是一种拜物教,它把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内在规定归之于物,从而使物神秘化。根据某物的自然属性来确定它是固定资本还是流动资本所遇到的困难,在这里使经济学家们破例地想到:物本身既不是固定资本,也不是流动资本,因而根本不是资本,正像成为货币决不是金的自然属性一样。

① 《评政治经济学上的若干用语的争论》一书的作者和赛·贝利责备李嘉图,说他把纯粹相对的交换价值变成了某种绝对的东西。恰恰相反,李嘉图是把珍珠、金刚石这种物在作为交换价值时所具有的表面的相对性,还原为这种外表所掩盖的真实关系,还原为它们作为人类劳动的单纯表现的相对性。如果说李嘉图派对贝利的答复既粗浅而又缺乏说服力,那只是因为他们在李嘉图本人那里找不到关于价值和价值形式即交换价值之间的内在关系的任何说明。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57年底—1858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

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代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化,这种普遍的对象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

因此,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

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代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化;这种普遍的对

象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因此,一方面,稚气的古代世界显得较为崇高。另一方面,古代世界在人们力图寻求闭锁的形态、形式以及寻求既定的限制的一切方面,确实较为崇高。古代世界是从狭隘的观点来看的满足,而现代则不给予满足;换句话说,凡是现代表现为自我满足的地方,它就是鄙俗的。

马克思:《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1857 年底—1858 年 5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79—480 页。

私有制不懂得要把粗陋的需要变为人的需要。它的理想主义不过是幻想、任意的奇想、突发的怪想;没有一个宦官不是厚颜无耻地向自己的君主献媚,并力图用卑鄙的手段来刺激君主的麻木不仁的享受能力,以骗取君主的恩宠;工业的宦官即生产者则更厚颜无耻地用更卑鄙的手段来骗取银币,从自己按照基督教教义去爱的邻人的口袋里诱取黄金鸟。

私有制不懂得要把粗陋的需要变为人的需要。它的理想主义不过是幻想、任意的奇想、突发的怪想;没有一个宦官不是厚颜无耻地向自己的君主献媚,并力图用卑鄙的手段来刺激君主的麻木不仁的享受能力,以骗取君主的恩宠;工业的宦官即生产者则更厚颜无耻地用更卑鄙的手段来骗取银币,从自己按照基督教教义去爱的邻人的口袋里诱取黄金鸟(每一种产品都是人们想用来诱骗他人的本质即他的货币的诱饵;每一个现实的或可能的需要都是使苍蝇飞近涂胶竿的弱点;

对共同的人的本质的普遍利用，正像每一个缺陷一样，对人来说是同天国联结的一个纽带，是使僧侣能够接近人心的途径；每一项急需都是一个机会，使人能够摆出一副格外殷勤的面孔走向自己的邻人并且对他说：亲爱的朋友，你需要什么，我给你，但是你知道，有先决条件；你知道，你应当用什么样的墨水给我写字据；既然我给你提供了享受，我也要敲诈你一下），——工业的宦官顺从他人的最下流的念头，充当他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牵线人，激起他的病态的欲望，默默盯着他的每一个弱点，然后要求对这种殷勤服务付酬金。

这种异化也部分地表现在：一方面所发生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另一方面产生着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最彻底的、粗陋的、抽象的简单化，或者毋宁说这种精致化只是再生出相反意义上的自身。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在工人那里也不再成其为需要了。人又退回到穴居，不过这穴居现在已被文明的污浊毒气污染，而且他在穴居中也只是**朝不保夕**，仿佛它是一个每天都可能离他而去的异己力量，如果他付不起房租，他每天都可能被赶走。他必须为这停尸房**支付租金**。**明亮的**居室，这个曾被埃斯库罗斯著作中的普罗米修斯称为使野蛮人变成人的伟大天赐之一，现在对工人来说已不再存在了。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都不再是人的需要了。**肮脏**，人的这种堕落、腐化，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意而言），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他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仅不再以人的方式存在，而且不再以**非人的**方式因而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人类劳动的最粗陋的**方**

式(工具)又重新出现了:例如,罗马奴隶的踏车又成了许多英国工人的生产方式和存在方式。人不仅没有了人的需要,他甚至连动物的需要也不再有了。爱尔兰人只知道有吃的需要,确切地说,只知道吃马铃薯,而且只是感染上斑点病的马铃薯,最次的一种马铃薯。但是,在英国和法国的每一个工业城市中都已有一个小爱尔兰。连野蛮人、动物都还有猎捕、运动等等的需要,有和同类交往的需要。机器、劳动的简单化,被利用来把正在成长的人、完全没有发育成熟的人——儿童——变成工人,正像工人变成无人照管的儿童一样。机器迁就人的软弱性,以便把软弱的人变成机器。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 年 5 月底 6 月初—8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39—341 页。

贯串于全书的历史观念不允许作者把经济规律看作是永恒的真理,而把它仅仅看作是某种暂时的社会状态的存在条件的表述……

贯串于全书的历史观念不允许作者把经济规律看作是永恒的真理,而把它仅仅看作是某种暂时的社会状态的存在条件的表述,对这种历史观念我们是很满意的;而遗憾的是,要在我们的官方经济学家那里找寻这本书里用来描述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状态及其存在条件的那种渊博的学识和敏锐的洞察力,将是徒劳的。像关于奴隶制的经济条件和规律、农奴制和依附农制的各种不同形态、自由工人的产生之类问题的研究,对于我们的经济学专家来说,到现在为止还是完全陌生

的。我们同样也很想听听这些先生们对本书中关于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的历史的和经济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阐述的意见；他们肯定能从这里学到一些新的东西。尤其是对于这些与自由竞争的一切传统理论完全相抵触的、而在这本书里根据官方的材料仍然得到了证明的事实；在自由竞争的祖国——英国，现在几乎每一个劳动部门都是通过国家干涉对日劳动时间进行严格的规定，并由工厂视察员进行监督；可是在劳动时间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不仅各个工业部门提高了生产，而且各个工人在缩短的时间内比原来较长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他们将会说些什么呢？

遗憾的是，不能否认，作者谈到德国官方经济学家时采用那种声色俱厉的语调不是没有其理由的。这些经济学家的观点或多或少都是属于“庸俗经济学”，他们为了眼前的声誉，出卖了自己的科学，背弃了科学的古典大师。他们高谈“和谐”，却纠缠在最平庸的矛盾中。让这本书给予他们的严厉教训把他们从昏睡中唤醒，提醒他们，经济学不是一头供给我们黄油的奶牛，而是一门需要人们认真地热心地投入其中的科学。

恩格斯：《为〈未来报〉写的〈资本论〉第一卷书评》（1867 年 10 月 12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06—307 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

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

在资本—利润(或者,更恰当地说是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中,在这个表示价值和财富一般的各个组成部分同其各种源泉的联系的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古典经济学把利息归结为利润的一部分,把地租归结为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使这二者以剩余价值的形式一致起来;此外,把流通过程当作单纯的形式变化来说明;最后,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把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归结为劳动;这样,它就把上面那些虚伪的假象和错觉,把财富的不同社会要素互相间的这种独立化和硬化,把这种物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化,把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宗教揭穿了。这是古典经济学的伟大功绩。然而,甚至古典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从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只能是这样,——也还或多或少地被束缚在他们曾批判地予以揭穿的假象世界里,因而,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不彻底性、半途而废状态和没有解决的矛盾之中。另一方面,实际的生产当事人对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些异化的不合理的形式,感到很自在,这也同样是自然的事情,因为他们就是在这些假象的形态中活动的,他们每天都要和这些形态打交道。庸俗经济学无非是对实际的生产当事人的日常观念进行教学式的、或多或少教义式的翻译,把这些观念安排在某种有条理的秩序中。因此,它会在这个消灭了整个

内部联系的三位一体中，为自己的浅薄的妄自尊大，找到自然的不容怀疑的基础，这也同样是自然的事情。同时，这个公式也是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因为它宣布统治阶级的收入源泉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并把这个观点推崇为教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三册第七篇各种收入及其源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40—941页。

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取得的权威，他作为生产的领导者和统治者的社会职能，同建立在奴隶生产、农奴生产等等基础上的权威，有重大的区别。

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取得的权威，他作为生产的领导者和统治者的社会职能，同建立在奴隶生产、农奴生产等等基础上的权威，有重大的区别。

尽管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对于直接生产者大众来说，他们的生产的社会性质是以实行严格管理的权威的形式，并且是以劳动过程的完全按等级组织的社会机制的形式出现的，——这种权威的承担者，只是作为同劳动相对立的劳动条件的人格化，而不是像在以前的各种生产形式中那样，是作为政治的统治者或神权政体的统治者得到这种权威的，——但是，在这种权威的承担者中间，在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互相对立的资本家本身中间，占统治地位的却是极端无政府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生产的社会联系只是表现为对于个人随意性起压倒作用的自然规律。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三册第七篇各种收入及其源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97—998页。

这些产品的生产者的"意识"可以完全不知道他们的商品的价值实际上是怎样决定的,或者说,是什么东西使他们的产品成为价值的……

这些产品的生产者的"意识"可以完全不知道他们的商品的价值实际上是怎样决定的,或者说,是什么东西使他们的产品成为价值的,——对于意识来说,这甚至可能不存在。产品的生产者被置于决定他们的意识的条件下,而他们自己却不一定知道。每个人都可以把货币作为货币使用,而不知道货币是怎么一回事。经济范畴反映在意识中是大大经过歪曲的。贝利所以把问题转入意识领域,是因为他在理论上走进了死胡同。

贝利不说,他自己所理解的"价值"(或"价值的原因")是什么,而对我们说,这是买者和卖者在交换活动中多想象的东西。

但是,实际上作为这个貌似哲理的词句的基础是:

(1)市场价格是由表现在供求关系中的不同情况决定的,而这些情况本身影响市场上的交易者的"意识"。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2)在**商品价值转化为费用价格**时要考虑到作为"补偿理由"影响意识或在意识中出现的"不同的情况"。但是,所有这些补偿理由只影响作为资本家的资本家的意识,并且它们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性质产生的,而不是由买者和卖

者的主观理解产生的。在买者和卖者的头脑中，它们毋宁说是作为不言而喻的“永恒真理”存在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四卷第三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77—178页。

现实的颠倒借以表现的歪曲形式，自然会在这种生产方式的当事人的观念中再现出来。这是一种没有想象力的虚构方式，是庸人的宗教。

收入的形式和收入的源泉以**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外表上表现出来的存在，它同潜在的联系以及中介环节是分离的。于是，**土地**成了**地租**的源泉，**资本**成了**利润**的源泉，**劳动**成了**工资**的源泉。现实的颠倒借以表现的歪曲形式，自然会在这种生产方式的当事人的观念中再现出来。这是一种没有想象力的虚构方式，是庸人的宗教。

马克思：《〈资本论〉第四卷附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99页。

商品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范畴一样，是一种在物的外壳掩盖下的人的关系。

理解商品的困难在于：商品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范畴一样，是一种在物的外壳掩盖下的人的关系。生产者使他们的产品作为**商品**互相发生关系，从而使他们的不同种类的劳动作为一般人类劳动互相发生关系，没有物这种中介，他们就办

不成这种事。这样一来，人的关系便表现为物的关系了。

对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来说，基督教，特别是新教，乃是合适的宗教。

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提要》（1868 年春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75 页。

只有从一定的历史社会形态的社会生产关系体系来看，并且只有从表现在大量的、重复亿万次的交换现象中的关系体系来看，才能了解什么是价值。

人们通过交换产品，使各种极不相同的劳动彼此相等。商品生产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体系中，各个生产者制造各种不同的产品（社会分工），而所有这些产品在交换中彼此相等。因此，一切商品的共同的东西，并不是某一生产部门的具体劳动，并不是某一种类的劳动，而是**抽象的**人类劳动，即一般的人类劳动。表现在全部商品价值总额中的一个社会的全部劳动力，都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亿万次交换的事实都证明这一点。因此，每一单个商品所表现的只是一定份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的大小由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或者说，由生产某种商品即某种使用价值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他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彼此相等，也就使他们的各种劳动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①一位旧经济学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90—91 页。——编者注

家说过，价值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不过他还应当补充一句：被物的外壳掩盖着的关系。只有从一定的历史社会形态的社会生产关系体系来看，并且只有从表现在大量的、重复亿万次的交换现象中的关系体系来看，才能了解什么是价值。

列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11月），《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8—429页。

它（商品）同时既是可感觉的，又是不可感觉的，它不再满足于用脚站在地上；可以说，它在其他商品面前用木脑袋倒立着，醉心于比它自己跳起舞来还要奇怪的狂想。

最初一看，商品好像是一种平凡的、简单的东西。相反，我们的分析却表明，商品是一种很复杂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商品就它是使用价值来说，不论从它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需要这个角度来考察，或者从它的属性是人类劳动的产物这个角度来考察，都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很明显，人的活动改变自然提供的物质，使它们变成有用的东西。例如，用木头做桌子，木头的形状就改变了。可是桌子还是木头，还是一个普通的可以感觉的物。但是桌子一旦作为商品出现，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它同时既是可感觉的，又是不可感觉的，它不再满足于用脚站在地上；可以说，它在其他商品面前用木脑袋倒立着，醉心于比它自己跳起舞来还要奇怪的狂想。

马克思：《著者亲自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片断》（1872年9月—1875年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6页。

因为媒介是支配它借以把我间接表现出来的那个东西的真正的权力，所以，很清楚，这个媒介就成为真正的上帝。对它的崇拜成为自我目的。

穆勒把**货币**称为交换的**媒介**，这就非常成功地用一个概念表达了事情的本质。货币的本质，首先不在于财产通过它转让，而在于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人的**、社会的行动**异化了**并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性，成为货币的属性。既然人使这种中介活动本身外化，他在这里只能作为丧失了自身的人、失去人性的人而活动；物的**相互关系**本身、人用物进行的活动变成某种在人之外的、在人之上的本质所进行的活动。由于这种**异己的媒介**——并非人本身是人的媒介，——人把自己的愿望、活动以及同他人的关系看作是一种不依赖于他和他人的力量。这样，他的奴隶地位就达到极端。因为媒介是支配它借以把我间接表现出来的那个东西的**真正的权力**，所以，很清楚，这个**媒介**就成为**真正的上帝**。对它的崇拜成为自我目的。同这个媒介脱离的物，失去了自己的价值。因此，只有在这些物**代表**这个媒介的情况下这些物才有价值，而最初似乎是，只有在这个**媒介**代表这些物的情况下这个媒介才有价值。最初关系的这种颠倒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这个媒介是私有财产的丧失了自身的、异化的**本质**，是在自身之外的、**外化的**私有财产，在人的生产与人的生产之间起**外化的中介作用**，是人的**外化的**类活动。因此，凡是人的这种类生产活动的属性，都可以转移给这个媒介。因此，这个媒介**富**到什么程度，作为人的人，即同这个媒介相脱离的人也就穷到什么程度。

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1844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19页。

……因为一切资产阶级关系都镀上了金或银,表现为货币关系,因而货币形式似乎具有一种无限多样的、对它本身说来是外来的内容。

只要理解了货币的根源在于商品本身,货币分析上的主要困难就克服了。在这个前提下,问题只在于清楚地理解货币所固有的形式规定性,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困难的,因为一切资产阶级关系都镀上了金或银,表现为货币关系,因而货币形式似乎具有一种无限多样的、对它本身说来是外来的内容。

马克思:《1859—1861年经济学著作和手稿》(1858年11月—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58页。

货币本身就是共同体,它不能容忍任何其他共同体凌驾于它之上。

这样,作为个别化的可以捉摸的对象,货币可以偶然地被寻求,被找到,被偷盗,被发现,因而一般财富能够在可以捉摸的形式上被单个的个人所占有。货币从它表现为单纯流通手段这样一种奴仆形象,一跃而成为商品世界中的统治者和上帝。货币代表商品的天上的存在,而商品代表货币的人间的存在。每种形式的自然财富,在它被交换价值取代以前,都以

个人对于对象的本质关系为前提，因此，个人在自己的某个方面把自身对象化在物品中，他对物品的占有同时就表现为他的个性的一定的发展；拥有羊群这种财富使个人发展为牧人，拥有谷物这种财富使个人发展为农民，等等。**与此相反，货币**是一般财富的**个体**，它本身是从流通中来的，它只代表一般，**仅仅是社会的结果**，它完全不以对自己占有者的任何个性关系为前提；占有货币不是占有者个性的某个本质方面的发展，倒不如说，这是占有没有个性的东西，因为这种社会[关系]同时作为一种可感觉的外在的对象而存在着，它可以机械地被占有，也可以同样丧失掉。

因此，货币对个人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纯粹偶然的关系，而这种对于同个人个性毫无联系的物品的关系，却由于这种物品的性质同时又赋予个人对于社会，对于整个享乐和劳动等等世界的普遍支配权。这种情形就如同我发现一块石头就使我占有全部科学，而同我的个性毫不相干一样。占有货币使我同财富（社会财富）发生的关系，就同哲人之石使我同科学发生的关系完全一样。

因此，货币不仅是致富欲望的**一个**对象，而且是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这种欲望本质上就是万恶的求金欲。致富欲望本身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欲望，也就是说，它不同于追求特殊财富的欲望，例如追求服装、武器、首饰、女人、美酒等等的欲望，它只有在一般财富即作为财富的财富个体化为一种特殊物品的时候，也就是说，只有在货币设定在它的第三种规定上的时候，才可能发生。因此，货币不仅是致富欲望的对象，同时也是致富欲望的源泉。贪欲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也是可能的；致富

欲望本身则是一定的社会发展的产物，而不是与**历史产物**相对立的**自然产物**。因此，古代人哀叹货币是万恶之源。一般形式的享受欲以及吝啬，是货币欲的两种特殊形式。抽象的享受欲要求有一个包含一切享受可能性的对象。货币在它作为**财富的物质代表**的规定上，使抽象的享受欲得到实现；货币在它单纯是同作为财富的特殊实体的商品相对立的一般形式的财富时，使吝啬得到实现。为了把货币本身保存下来，吝啬不得不牺牲掉对于特殊需要对象的一切关系，放弃这一切关系，以便满足货币欲本身的需要。货币欲或致富欲望必然导致古代共同体的没落。由此产生了对立物。货币本身就是**共同体**①，它不能容忍任何其他共同体凌驾于它之上。但是，这要以交换价值的充分发展，从而以相应的社会组织的充分发展为前提。

马克思：《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1857 年底—1858 年 5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73—175 页。

货币作为纯抽象财富——在这种财富形式上，任何特殊的使用价值都消失了，因而所有者和商品之间的任何个人关系也消失了——同样成为作为抽象人格的个人的权力，同他的个性发生完全异己的和外在的关系。但是货币同时赋予他作为他的私人权力的普遍权力。

货币作为纯抽象财富——在这种财富形式上，任何特殊的使用价值都消失了，因而所有者和商品之间的任何个人关系也消

① “共同体”原文是“Gemeinwesen”，俄文版译为“社会联系”。——编者注

失了——同样成为作为抽象人格的个人的权力,同他的个性发生完全异己的和外在的关系。但是货币同时赋予他作为他的私人权力的普遍权力。关于这种矛盾,例如莎士比亚曾这样描述过:

"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

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

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

吓!你们这些天神们啊,为什么要给我这东西呢?

嘿,这东西会把你们的祭司和仆人从你们的身旁拉走;

把健汉头颅底下的枕垫抽去;

这黄色的奴隶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

它可以使受咒诅的人得福,使害着灰白色的癞病的人为众人所敬爱;

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和元老们分庭抗礼;

它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

来,该死的土块,你这人尽可夫的娼妇……"

(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第4幕第3场])

那种可以献身于一切并且一切皆可为之献身的东西,表现为普遍的收买手段和普遍的卖淫手段。

"他们同心合意,把力量和权柄授予那只兽。凡没有这种印记即没有这个兽名或兽名的数字者,都不能买或卖。"(启示录)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57年底—1858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9—340页。

正是在利润的这种完全异化的形式上以及在利润的形式愈来愈掩盖自己的内核的情况下，资本愈来愈具有物的形态，愈来愈由一种关系转化为一种物，不过这种物是包含和吸收了社会关系的物……

正是在利润的这种完全异化的形式上以及在利润的形式愈来愈掩盖自己的内核的情况下，资本愈来愈具有物的形态，愈来愈由一种关系转化为一种物，不过这种物是包含和吸收了社会关系的物，是获得了虚假生命和独立性而与自身发生关系的物，是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存在物；而且在**资本和利润**的这种形式上，资本表面上是作为现成的前提出现的。这就是资本的现实性的形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资本的现实存在的形式。资本也正是以这种形式存在于其承担者即资本家的意识中，反映在他们的观念中。

马克思：《〈资本论〉第四卷第三册附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36页。

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角度来看，活动的这种物的躯体的创造是在同直接的劳动能力的对立中实现的，这个对象化过程实际上从劳动方面来说表现为劳动的外化过程，从资本方面来说，则表现为对他人劳动的占有过程……

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角度来看，活动的这种物的躯体的创造是在同直接的劳动能力的对立中实现的，这个对象化过程实际上从劳动方面来说表现为劳动的外化过程，从资本方面来说表现为对他人劳动的占有过程，——就这一点来说，这

种扭曲和颠倒是**真实的**，而不是**单纯想象的**，不是单纯存在于工人和资本家的观念中的。但是很明显，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但决不是生产的一种**绝对的**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和目的（内在的）是扬弃这个基础本身以及扬弃过程的这种形式。

马克思：《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1857 年底—1858 年 5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44 页。

资本越来越成为社会力量（只有资本家才是这个力量的执行者，而且这个力量同个人的劳动所创造或能够创造的东西毫无关系），然而是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力量，这个力量作为物并且通过这种物作为个别资本家的权力而同社会相对立。

资本的**积累**（从物质方面看）是两重的。一方面，它在于过去劳动的**增长的量**或劳动条件的现有量；在于新生产或再生产借以进行的物质前提，即现有的产品量和一定的工人人数。第二，它在于**积聚**，资本的数目减少，各个资本家手中的资本增多，简言之，在于资本、社会资本的某种新分配。因此，资本的权力本身增加。因此，资本家身上体现出来的社会生产条件在它们的真正创造者面前的独立化，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资本越来越成为**社会力量**（只有资本家才是这个力量的执行者，而且这个力量同个人的劳动所创造或能够创造的东西毫无关系），然而是**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力量**，这

个力量作为物并且通过这种物作为个别资本家的权力而同社会相对立。因而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个人]失去了生产条件，处于同生产条件的对立之中。资本转化成的**普遍社会力量**同**单个资本家**对于这些社会生产条件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触目惊心，并预示着这种关系的消灭，因为它同时包含着把物质生产条件改造成为普遍的，从而是公共的、社会的生产条件。

这种[矛盾的]发展是由生产力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决定的，也是由生产力实现这种发展的方式决定的。

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1861年8月—186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01页。

用资本的物的属性来偷换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这种做法在意识中已如此根深蒂固……

我们的能力是我们唯一的原始财富。所以，劳动能力不是财富。劳动生产其他一切财富；这就是说，劳动为自己以外的其他一切人生产财富，而它本身不是财富，只有它的产品才是财富。任何一种受到良好管理的劳动都是生产的；这就是说，任何一种生产劳动，任何一种给资本家带来利润的劳动，都是受到良好管理的。

用资本的物的属性来偷换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这种做法在意识中已如此根深蒂固，以致机器、科学的应用、发明等等的好处，在它们的这种**异化**形式中，就被看作是**必然的**形式，从而所有这一切都被看作是**资本的属性**。在这里，作

为基础的是，（1）这样一种形式，即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从而在受这种生产方式束缚的意识中，事情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2）这样一种历史事实，即这种发展首次以不同于从前生产方式的形式出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从而这种发展的**对立**性质也**好像**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册第六章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1863 年 7 月—1864 年 6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9 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20—121 页。

资本所以成为生产资本，是因为价值把形成价值的力量加在自己身上，是因为生产资料掌握了劳动力，而不是劳动力掌握了生产资料。

最后，资本在流通领域只改变自己的货币和商品形式以及自己的人格化，同样，资本家在对和他相同的其他买者或卖者的关系上只表现为卖者或买者，虽然在第一册里已经指出，作为买者的资本家和作为劳动力卖者的工人之间的**平等**是从流通过程中产生的**纯粹假象**。由于活劳动力加到劳动过程的物的要素上，**价值**即过去的、物化的**死劳动**变为“**资本**，变为**自行增殖的价值**，变为一个有灵性的怪物，它用‘好像害了相思病’的劲头开始去‘劳动’”（第 1 册第 161 页）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同时是剥削劳动力的过程。“**生产资本**”这个术语很好地反映了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劳动生产率变为劳动要素的生产率，创造价值的活动变为现有的、已存在的价值的主动性，

活劳动变为死劳动的血液。工人从属于劳动产品，创造价值的力量从属于这个价值本身，发挥职能的劳动力作为一部分预付资本价值借以存在和发挥职能的简单形式而存在，而另一部分预付资本价值由劳动的物的要素和现成的价值构成，——所有这一切是以资本家（资本的人格化）对工人的**强制和统治关系**（或在这方面的表现）为媒介的，正像货币转化为商品等等是以资本家的买或卖的行为为媒介一样。作为这样的关系，资本是**生产的**，因为它不仅总是把剩余劳动转入流动状态，而且还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殊形式，正是通过这些形式把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转入流动状态。至于生产资本，这里应当指出，资本价值在这一职能上拥有它在流通领域中所不能得到的潜力。除了资本价值从流通领域中获得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以外，资本价值在这里把不是劳动产品、因而不是价值的自然物和自然力加在自己身上，同样也把生产过程本身的组织中所产生的社会劳动生产力加在自己身上。

资本所以成为**生产资本**，是因为价值把形成价值的力量加在自己身上，是因为生产资料掌握了劳动力，而不是劳动力掌握了生产资料。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1868 年底—1870 年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50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5—26 页。

生息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要素……

就生息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要素来说，它和高利贷资本的区别，决不在于这种资本本身的性质或特征。区别只是在于，这种资本执行职能的条件已经变化，从而和货币贷出者相对立的借入者的面貌已经完全改变。即使得到贷款的产业家或商人是没有财产的人，那也是由于相信他会用借来的资本执行资本家的职能，占有无酬劳动。他是作为可能的资本家得到贷款的。一个没有财产但精明强干、稳重可靠、有能力和经营知识的人，通过这种方式也能成为资本家（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每一个人的商业价值总会得到或多或少正确的评价），这是经济学辩护士们所赞叹不已的事情，这种情况虽然不断地把一系列不受某些现有资本家欢迎的新的幸运骑士召唤到战场上来，但巩固了资本本身的统治，扩大了它的基础，使它能够从社会下层不断得到新的力量来补充自己。这和中世纪天主教会的情况完全一样，当时天主教会不分阶层，不分出身，不分财产，在人民中间挑选最好的人物来建立其教阶制度，以此作为巩固教会统治和压迫俗人的一个主要手段。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优秀的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三册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79页。

各种关系的硬化以及它们表现为人同具有一定社会性质的物的关系，在这里也以完全不同于商品的简单神秘化和货

币的已经比较复杂的神秘化的方式表达出来了。变体和拜物教在这里彻底完成了。

利息表示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这不过是在特殊名称下从利润中分出的一个份额，这个份额是给资本的单纯所有者的，是由他夺去的。但是这个单纯的**量的**分割转化成了**质的分割**，这种质的分割赋予两个部分一种转化形式，在这种转化形式上，它们的原始实质的痕迹已经看不见了。这种情况得以固定下来，首先是因为**利息**不是表现为同生产无关的、仅仅在产业家用别人的资本从事经营时才"偶然"发生的分割。即使产业家用自有的资本从事经营，他的利润也会分为**利息**和**产业利润**，因此，不管产业家是不是他的资本的所有者这种偶然情况，单纯量的分割已经固定化为**质的**分割，固定化为由资本本身和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性质产生的**质的**分割。这不仅是在不同的人之间进行分配的利润的两个部分，而且还是利润的两种特殊**范畴**，它们和资本有不同的关系，也就是说，和资本的不同规定性有关。利润的各部分以独立范畴出现的这种独立化，比较容易地固定下来，原因是（撇开以前已阐明的原因不谈）**生息资本**作为一种历史形式是出现在产业资本之前，并在它的旧形式上继续同产业资本并存，只是在产业资本的发展进程中才被产业资本作为它本身的一种**特殊形式**置于从属资本主义生产的地位。

……

这样，在这两种剩余价值形式上，剩余价值的性质、资本的实质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不仅完全消失了，而且转到了自己的反面。但是，由于物的主体化、主体的物化、因果的

颠倒、宗教般的概念混淆、资本的单纯形式 G—G′在这里被荒诞地、不经过任何中介过程地展示和表现出来，资本的性质和形态也就完成了。同样，各种关系的硬化以及它们表现为人同具有一定社会性质的物的关系，在这里也以完全不同于商品的简单神秘化和货币的已经比较复杂的神秘化的方式表达出来了。变体和拜物教在这里彻底完成了。

利息自身正好表现出，劳动条件作为**资本**而存在，同劳动处于社会对立中，并且转化为同劳动相对立并且支配着劳动的私人权力。利息概括了劳动条件对主体活动的关系上的**异化**性质。利息把资本的所有权，或者说单纯的资本所有权，表现为占有别人劳动产品的手段，表现为支配别人劳动的权力。但是，它是把资本的这种性质表现为某种在生产过程本身之外属于资本的东西，而不是表现为这个生产过程本身的独特的规定性的结果。它不是把资本的这种性质表现为同劳动对立，而是相反地同劳动无关，只是表现为一个资本家对另一个资本家的关系，也就是说，表现为一种存在于资本对劳动本身的关系之外的、与这种关系无关的规定性。利润在资本家之间的分配，与工人本身毫无关系。因此，在**利息**上，在利润的这个形态上，资本的**对立性质**固然得到了特殊的表现，但是表现成这样：这种对立在其中已经完全消失，而且明显地被抽掉了。利息除了表现货币、商品等等增殖自己价值的能力以外，还把剩余价值表现为从货币和商品中生长出来的某种东西，表现为它们的自然果实，也就是说，利息不过是资本的神秘化在最极端的形式上的表现，——只要它一般表现社会关系**本身**，它表现的就只是资本家之间的关系，而决不是资本与劳动

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这个**利息**形式又使利润的另一部分取得**产业利润这种质的形式**，即产业资本家——不是作为资本家而是作为**劳动者**（产业家）——的劳动工资形式。资本家作为资本家在劳动过程中所要完成的、恰好使他同工人相区别的特殊职能，被表现为单纯的劳动职能。他创造剩余价值，不是因为他**作为资本家**进行劳动，而是因为他，即资本家，也**进行劳动**。这好比一个国王，他作为国王在名义上指挥着军队，于是有人就说，不是因为他作为王位所有者**进行指挥**，起着统帅的作用，他才指挥军队，而是因为他**指挥**军队，执行统帅的职能，所以他才是国王。因此，如果说，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在利息的形式上完全同剥削过程相分离，那么另一部分在产业利润的形式上就表现为剥削过程的直接的对立面，即不是对别人劳动的占有，而是自己劳动的价值创造。因此，剩余价值的这一部分也就不再是剩余价值，而是一种和剩余价值相反的东西，是所完成的劳动的等价物。因为资本的**异化性质**，它同劳动的对立，处于剥削过程之外，处于**这种异化的现实行动**范围之外，所以一切对立性质也就从这个过程本身排除了。因此，**现实的**剥削，即实现并实际表现对立性质的东西，就表现为它的直接对立面，表现为一种在物质上是独特的、但是属于劳动的同一社会规定性的劳动，即雇佣劳动，即属于同一劳动**范畴**的劳动。在这里剥削的劳动和被剥削的劳动被等同起来了。

马克思：《〈资本论〉第四卷附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47—550页。

这种扬弃异化、人向自己因而也向别人复归，仅仅是一个假象；何况这是卑劣的和极端的自我异化，非人化，因为它的要素不再是商品、金属、纸币，而是道德的存在、社会的存在、人自己的内在生命，更可恶的是，在人对人的信任的假象下面隐藏着极端的不信任和完全的异化。

在**信用业**——它的完善的表现是**银行业**——中出现一种假象，似乎异己的物质力量的权力被打破了，自我异化的关系被扬弃了，人又重新处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被这种**假象**所迷惑的**圣西门主义者**把货币的发展、汇票、纸币、纸的货币代表、**信贷**、**银行业**看作是逐渐扬弃人同物、资本同劳动、私有财产同货币、货币同人的分离的各个阶段，看作是逐渐扬弃人同人的分离的各个阶段。因此，他们的理想是组织起来的**银行业**。但是，这种扬弃异化、人向自己因而也向别人**复归**，仅仅是一个**假象**；何况这是**卑劣的**和**极端的**自我异化，非人化，因为它的要素不再是商品、金属、纸币，而是**道德的**存在、**社会的**存在、人自己的**内在生命**，更可恶的是，在人对人的**信任**的假象下面隐藏着极端的**不信任**和完全的异化。

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1844 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1—22 页。

信贷不再把货币价值放在货币中，而把它放在人的肉体和人的心灵中。虚伪制度内的一切进步和不一贯全都是最大的倒退和始终一贯的卑鄙。

信贷是对一个人的**道德**作出的**国民经济学的**判断。在信贷中，人本身代替了金属或纸币，成为交换的媒介，但这里人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某种资本**和利息的**存在**。这样，交换的媒介物的确从它的物质形式返回和复归到人，不过这只是因为人把自己移到自身之外并成了某种外在的物质形式。在信贷关系中，不是货币被人取消，而是人本身变成**货币**，或者是货币和人**并为一体**。**人的个性**本身、人的**道德**本身既成了买卖的物品，又成了货币存在于其中的**物质**。构成**货币**灵魂的物质、躯体的，是我自己的个人存在、我的肉体和血液、我的社会美德和声誉，而不是货币、纸币。信贷不再把货币价值放在货币中，而把它放在人的肉体和人的心灵中。虚伪制度内的一切进步和不一贯全都是最大的倒退和始终一贯的卑鄙。

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1844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23页。

在信用业的范围内，信用业同人相异化的性质在国民经济学对人给予高度承认的假象下得到双重的证实。

在信用业的范围内，信用业同人相异化的性质在国民经济学对人给予高度承认的假象下得到双重的证实：(1)资本家同工人之间、大资本家同小资本家之间的对立越来越大，因为信贷只提供给已经富裕的人，并且使富人有进行积累的新机会。至于穷人，他认为富人对他的随意判决就是对他的整

个存在予以肯定或否定，因为他的整个存在完全取决于这种偶然性。(2)尔虞我诈和假仁假义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以致对一个得不到信贷的人，不仅简单地判决他是贫穷的，而且还在道德上判决他不配得到信任，不配得到承认，因而是社会的贱民，坏人。穷人除了自己的穷困还遭受这样的屈辱：他不得不低三下四地向富人**请求**贷款。(3)由于货币的这种纯**观念的**存在，**人伪造货币**可以不用任何别的材料，而只用他自己的人格就行了：人不得不把自己变成赝币，以狡诈、谎言等手段来骗取信用，这种信贷关系——不论对表示信任的人来说，还是对需要这种信任的人来说——成了买卖的对象，成了相互欺骗和相互滥用的对象。同时这里还十分清楚地暴露出，这种国民经济学上的信任的基础是**不信任**：疑惑不定地考虑应该还是不应该提供借贷；探察信贷寻求者的私生活的秘密等等；透露这个人的一时困境，使他的信用突然动摇，以便把对方整垮，等等。破产、虚假企业等等的整个体系……在**国家信贷**中，国家地位同上面说到的单个的人的地位完全一样……在公债券的买卖中暴露出国家怎样变成了商人的玩物，等等。

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1844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24页。

四、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与无产阶级领导权

（一）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解放运动

这个解放（人类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就已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身上**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就已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

……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10月中—12月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3—214页。

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作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任务已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预示出来了。

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作**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这个阶级,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在被唾弃的状况下对这种状况的**愤慨**,这个阶级之所以必然产生这种愤慨,是由于它的人类**本性**和它那种公开地、断然地、全面地否定这种本性的生活状况相矛盾。

……

由于在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由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人失去了自己,同时他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直接由于不可避免的、无法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必然性**的这种实际表

现——的逼迫，不得不愤怒地反对这种违反人性的现象，由于这一切，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但是，如果它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不是白白地经受了**劳动**那种严酷的但是能把人锻炼成钢铁的教育的。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作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任务已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预示出来了。英法两国的无产阶级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任务，并且不断地努力使这种意识达到完全明显的地步，关于这点在这里没有必要多谈了。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 年 9 月—1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44—45 页。

无产阶级执行着雇佣劳动因替别人生产财富、替自己生产贫困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同样地，它也执行着私有制因产生无产阶级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

私有制在自己的经济运动中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但是它只有通过不以它为转移的、不自觉的、同它的意志相违背的、为客观事物的本性所制约的发展，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这种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贫困的贫

困、这种意识到自己的非人性从而把自己消灭的非人性——的产生，才能做到这点。无产阶级执行着雇佣劳动因替别人生产财富、替自己生产贫困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同样地，它也执行着私有制因产生无产阶级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无产阶级在获得胜利之后，无论怎样都不会成为社会的绝对方面，因为它只有消灭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对立面才能获得胜利。随着无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本身以及制约着它的对立面——私有制都趋于消灭。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 年 9 月—1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44 页。

既然现状即普遍虚弱无能的根源在于缺少资本，那么同样，只有拥有资本，只有资本集中在一个阶级的手里，才能赋予这个阶级以必要的力量去消灭现状。

而无产者，即 vulgo〔一般所谓的〕工人阶级怎么样呢？我们很快就要详细地论述他们。这里我们只指出他们成分不一的情况。工人分成雇农、短工、帮工、工厂工人和流氓无产阶级，而且又散居在人口稀疏、中心城市少而不发达的广大地区上，这就使得他们不可能了解彼此利益的共同性，不能互相谅解并组成一个**团结一致的**阶级。由于他们成分不一，住地分散，所以他们只能看到自己最切身的日常利益，仅仅希望好好工作以后能得到合理的报酬。换句话说，这使得工人们的目光短浅到这样一种程度：在他们眼里，他们的利益和雇主的利益是一致的，因而工人的每一支队伍都成了雇用他们的那个

阶级的援军。雇农和短工维护贵族或雇用他们种地的农民的利益。帮工在思想和政治方面都以自己的师傅为转移。工厂工人听其厂主在要求保护关税的运动中利用自己。流氓为了两个塔勒就可以在资产阶级、贵族和警察彼此发生摩擦时替他们做打手。凡是在两个雇主阶级各自坚持对立的利益的地方,被他们雇用的工人之间也就进行着同样的斗争。

由此可见德国工人群众对夺取公共事务领导权是如何没有准备。

……

这种可悲的状况的出路何在呢?出路只有一条。应当有一个阶级强大到足以使全民族的提高依赖于它的提高,使所有其他阶级利益的发展依赖于它的利益的发展和演进。这一个阶级的利益在目前应该成为民族的利益,而这个阶级在目前则应该成为民族的代表者。从这时候起,在这个阶级以及跟着它走的全民族的大多数人,便同政治现状发生了矛盾。政治现状是与各个不同阶级的利益彼此冲突这种已不存在的情况相适应的。新的利益受到了束缚,并且就连本来是现状的服务对象的那些阶级中间,也有一部分人发觉现状不代表他们的利益了。这种情况的后果必然是消灭现状,不管是用和平的还是暴力的方法。代之而起的将是这样一个阶级的统治,这个阶级在目前是全民族大多数的代表者,它的统治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开始。

既然现状即普遍虚弱无能的根源在于缺少资本,那么同样,只有拥有资本,只有资本集中在一个阶级的手里,才能赋予这个阶级以必要的力量去消灭现状。

恩格斯:《德国的制宪问题》(1847年3月—4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7—59页。

革命是人民权利的法律根据;人民根据革命提出自己的强烈要求。

革命是人民权利的法律根据;人民根据革命提出自己的强烈要求。革命是人民转在资产阶级名下的一张期票。资产阶级由于革命而取得了政权。在它取得政权的那一天,这张期票的支付期限就满了。资产阶级必然要**拒付**这张期票。

革命——它在人民的口里的意思是:你们资产阶级在组织Comité du salut public,公安委员会,我们把权力交给这个委员会并不是为了让你们为自己的利益而去同王权**达成协议**,而是为了要你们**违背**王权的意志来捍卫我们的利益,人民的利益。

革命是人民对资产阶级同王权达成协议的抗议。因此,同王权达成协议的资产阶级**必然要抗议革命**。

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1848年12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30页。

只要时机一成熟,公开登上政治斗争舞台的将是三个强大的敌对阶级:第一个代表地产,第二个代表金钱,第三个代表劳动。第二个阶级正在战胜第一个阶级,同样,第二个阶级将来也不能不在政治和社会斗争舞台上让位于它的后继人。

不管这个社会斗争将来会采取哪种新形式,我们现在看

到的只是它的开端。看来,它注定会变成为全国规模的斗争,并且要经过历史上还不曾有过的一些阶级。应当指出,尽管工人阶级还可能遭到一些暂时的挫败,但是保证它取得最后胜利的伟大的社会的和经济的规律已经在发生作用了。工业的发展过去迫使资产阶级起来反对贵族阶级,而现在——移民现在和将来都在部分地促进这一点——它又在推动工人阶级去反对资产阶级。正像资产阶级正在打击贵族阶级一样,资产阶级也将受到工人阶级的打击。对这一事实的本能的理解已经约束了资产阶级反对贵族阶级的行动。工人阶级不久前在政治上的露面使资产阶级学会了仇恨公开的政治运动,并且害怕这种运动。用这个阶级的行话来说,"正派人是不参加公开的政治运动的,先生"。上层资产阶级像猢狲一样模仿着贵族阶级的生活方式并竭力去巴结它。因此,在英国,封建主义不会灭亡,而将在已经开始腐朽的资产阶级的庇护下保存下来。最后战胜封建主义的光荣将属于工人阶级。只要时机一成熟,公开登上政治斗争舞台的将是三个强大的敌对阶级:第一个代表地产,第二个代表金钱,第三个代表劳动。第二个阶级正在战胜第一个阶级,同样,第二个阶级将来也不能不在政治和社会斗争舞台上让位于它的后继人。

马克思:《英国资产阶级》(1854 年 8 月 1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687—688 页。

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

行动。

如果我们把**共产主义**本身——因为它是否定的否定——称为对人的本质的占有，而这种占有以否定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因而还不是**真正的**、从自身开始的肯定，而只可说是从私有财产开始的肯定，[……]可见，既然人的生命的现实的异化仍在发生，而且人们越意识到它是异化，它就越成为更大的异化；所以，它只有通过付诸实行的共产主义才能完成。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历史将会带来这种共产主义行动，而我们**在思想中**已经认识到的那正在进行自我扬弃的运动，在现实中实际上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必须把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一历史运动的局限性和目的，把意识到超越历史运动看作是现实的进步。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 年 5 月底 6 月初—8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47 页。

在革命时期千百万人民一个星期内学到的东西，比他们平常在一年糊涂生活中所学到的还要多。

一切革命都是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中的急剧转变。这种转变如果没有成熟，便不能发生真正的革命。每一个人生活上的任何转变，都会使他学到许多东西，使他体验和感受许多东西，革命也是一样，它能使全体人民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最有内容最宝贵的教训。

在革命时期千百万人民一个星期内学到的东西，比他们平常在一年糊涂生活中所学到的还要多。因为当全体人民的生活发生急剧转变时，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在人民中间什么阶级抱有什么目的，他们拥有多大的力量，他们采用什么手段进行活动。

列宁：《革命的教训》（1917年7月底），《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4页。

主人是什么样，仆人也是什么样。人数众多、强大、集中而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的演变，是与人数众多、富裕、集中而强有力的中间阶级的生存条件的发展同时进行的。

主人是什么样，仆人也是什么样。人数众多、强大、集中而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的演变，是与人数众多、富裕、集中而强有力的中间阶级的生存条件的发展同时进行的。在中间阶级的各个部分，尤其是其中最进步的部分即大工业家还没有获得政权并按照他们的需要改造国家以前，工人阶级运动本身就永远不会是独立的，永远不会具有纯粹无产阶级的性质。而在这以后，企业主与雇佣工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就会变得刻不容缓而再也不可能推迟；那时，工人阶级再也不可能被虚幻的希望和永不兑现的诺言所欺骗了；那时，19世纪的重大问题——消灭无产阶级的问题，就终于要十分明朗地毫无保留地提出来了。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页。

大不列颠的工人阶级最先具有足够能力并且最先负有使命来领导最终必然使劳动得到彻底解放的伟大运动。它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地位，自己在数量上的极大优势，自己过去的惨痛斗争和现在的道义力量。

在世界各国当中，大不列颠是资本专横和劳动被奴役达到了顶点的国家。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中，对于统帅整批产业大军的百万富翁和勉强度日的雇佣奴隶之间的中间阶层，都没有逐步地消灭得这样彻底。这里不再有大陆各国那样的几乎在同等程度上依靠自己的财产和自己的劳动的人数众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阶级。在大不列颠，财产同劳动已经完全分离。因此，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中，组成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战争都没有这样巨大的规模，没有这样清晰可见的轮廓。

正因为这样，大不列颠的工人阶级最先具有足够能力并且最先负有使命来领导最终必然使劳动得到彻底解放的伟大运动。它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地位，自己在数量上的极大优势，自己过去的惨痛斗争和现在的道义力量。

大不列颠的千百万工人第一个奠定了新社会的真实基础——把自然界的破坏力变成了人类的生产力的现代工业。英国工人阶级以不懈的毅力、流血流汗、绞尽脑汁，为使劳动本身成为高尚的事业并使劳动产品增加到能够实现普遍丰富的程度创造了物质手段。

英国工人阶级既然创造了现代工业的无穷无尽的生产力，也就实现了劳动解放的第一个条件。现在它应当实现劳

动解放的另一个条件。它应当把这些生产财富的力量从垄断组织的无耻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使它们受生产者共同监督,这些生产者直到今天还在听任自己亲手创造的产品本身转过来反对自己,统统变成镇压他们自己的工具。

工人阶级征服了自然,而现在它应当去征服人了。要胜利地完成这个事业,工人阶级并不缺少力量,而是需要把它的所有力量组织起来,在全国范围内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我认为这就是摆在工人议会面前的伟大而光荣的目标。

马克思:《给工人议会的信》(1854 年 3 月 9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33—134 页。

随着社会阶级矛盾的这种简化,资产阶级的力量日益增长起来,但是无产阶级的力量、它的阶级觉悟和取得胜利的能力也在更大程度上增长起来。

资产阶级恰恰相反,它只是把上面提到的现代社会的巨大生产力和交换手段加以全面地发展并提到最高的水平;通过自己的信贷组织把那些世世代代留传下来的生产资料,尤其是地产攫为己有;使用现代化手段发展一切生产部门;消灭封建生产和封建关系的一切残余,从而把整个社会归结为资本家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之间的单纯的对抗;除此之外,它根本没有任何其他历史任务。随着社会阶级矛盾的这种简化,资产阶级的力量日益增长起来,但是无产阶级的力量、它的阶级觉悟和取得胜利的能力也在更大程度上增长起来;正是由于资产阶级力量的这种增长,无产阶级才逐渐

成为国家中的多数、压倒的多数，英国就已经出现这种情形；但是德国的情形完全不是这样，在那里，农村中各种各样的农民，城市中的小业主、小商人等等，与无产阶级相比还占优势。

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1865 年 1 月 27 日—2 月 11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5—106 页。

而无产阶级越发展，越是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个阶级，并作为一个阶级行动起来，资产者就越是变得畏首畏尾。

在德国，资产阶级的这个转折点在 1848 年就已来到了。诚然，那时德国资产阶级与其说是害怕德国无产阶级，倒不如说是害怕法国无产阶级。1848 年巴黎的六月战斗已经向它表明什么前途在等着它；当时德国无产阶级所表现的激愤足以向它证明：在德国也已撒下可以得到同样收获的种子；从这时起，资产阶级政治行动的锋芒就被摧折了。它开始找寻同盟者，不计代价地把自己出卖给他们，——而直到今天它一步也没有前进。

所有这些同盟者都具有反动的本性。这就是拥有自己的军队和官僚机构的王权，这就是大的封建贵族，这就是小的土容克，最后，这就是神甫。资产阶级跟所有这些人都缔结了合同和协议，只求保全自己宝贵的性命，直到最后它无可典卖时为止。而无产阶级越发展，越是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个阶级，并作为一个阶级行动起来，资产者就越是变得畏首畏尾。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1870年2月11日前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7页。

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的反映。

自从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但是,正如从前工场手工业以及在它影响下进一步发展了的手工业同封建的行会桎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时就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限制它的框框发生冲突了。新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这种冲突,并不是像人的原罪和神的正义的冲突那样产生于人的头脑中,而是存在于事实中,客观地、在我们之外、甚至不依赖于引起这种冲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动而存在着。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的反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6页。

工人阶级有其本身的利益,既有社会的也有政治的。他们怎样维护他们认为是自己的社会利益的东西,可以从工联

的和缩短工作日的运动的历史中已经可以看到。

保守党人、自由党人、激进党人，都只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代表在大地主、资本家和零售商中占优势的各式各样的意见。如果他们真的来当工人阶级的代表，那他们肯定无疑当的是歪曲代表。工人阶级有其本身的利益，既有社会的也有政治的。他们怎样维护他们认为是自己的社会利益的东西，可以从工联的和缩短工作日的运动的历史中已经可以看到。但是，他们的政治利益，却几乎完全交给了托利党人、辉格党人和激进派这些上层阶级的人物。差不多有四分之一世纪，英国工人阶级好像是甘愿充当"伟大的自由党"的尾巴。

这种政治地位，是和欧洲组织得最好的工人阶级不相称的……

恩格斯：《工人政党》(1881 年 7 月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20 页。

当时德国资产阶级还刚刚开始建立自己的大工业，它既没有力量，也没有勇气，更没有迫切要求去争得在国家中的绝对统治地位；无产阶级也是同样不发展的，是在完全的精神奴役中成长起来的，没有组织起来，甚至还没有能力独立地进行组织，它只是模糊地感觉到自己的利益同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深刻对立。

巴黎的二月事变促使即将来临的德国革命匆忙上阵，从而改变了这个革命的性质。德国资产阶级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胜利，而是仰仗法国工人革命才取得了胜利。它还没有来

得及把自己那些旧的敌人即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官僚以及怯懦的小市民彻底打倒，就已经不得不转过来反对新的敌人即无产阶级了。但是这时，德国比法英两国落后得多的经济状况以及因此同样落后的阶级关系，立刻就发生作用了。

当时德国资产阶级还刚刚开始建立自己的大工业，它既没有力量，也没有勇气，更没有迫切要求去争得在国家中的绝对统治地位；无产阶级也是同样不发展的，是在完全的精神奴役中成长起来的，没有组织起来，甚至还没有能力独立地进行组织，它只是模糊地感觉到自己的利益同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深刻对立。因此，虽然它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危险敌人，但是另一方面它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附庸。资产阶级不是被德国无产阶级当时的样子所吓倒，而是被它势将变成而法国无产阶级已经变成的样子所吓倒，所以资产阶级认为唯一的生路就是去同君主制度和贵族进行任何的、甚至最懦弱的妥协；而无产阶级则由于还不知道它自己应该扮演的历史角色，所以它的绝大多数起初不得不充当资产阶级先进的极左翼的角色。当时德国工人应当首先争得那些为他们独立地组成阶级政党所必需的权利：新闻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自由——这些权利本来是资产阶级为了它自己的统治必须争得的，但是它现在由于害怕竟不赞成工人们享有这些权利。两三百个分散的同盟盟员消失在突然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中间了。因此，德国无产阶级最初是作为最极端的民主派登上政治舞台的。

恩格斯：《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48—1849年）》（1884年2月中—3月初），《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182页。

在欧洲各国，工人阶级经历了许多年才完全领悟到，他们已经构成现代社会的一个独特的阶级，在现存社会关系下的一个固定的阶级；又经历了好多年，这种阶级意识才引导他们把自己组织成一个特殊的政党，它不受统治阶级各派所组织的一切旧政党的支配，并且同这些政党相对立。

在欧洲各国，工人阶级经历了许多年才完全领悟到，他们已经构成现代社会的一个独特的阶级，在现存社会关系下的一个固定的阶级；又经历了好多年，这种阶级意识才引导他们把自己组织成一个特殊的政党，它不受统治阶级各派所组织的一切旧政党的支配，并且同这些政党相对立①。在美国这片得天独厚的土地上，没有中世纪的废墟挡路，有史以来就已经有了17世纪孕育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因素，在这10个月中工人阶级就经历了本身发展的这两个阶段。

但是，这一切还只是一个开始。工人群众感到他们有共同的苦难和共同的利益，必须作为一个与其他阶级对立的阶级团结起来；为了表达和实现这种感觉，要把每个自由国家为此目的而预备的政治机器开动起来，——这仅仅是第一步。下一步就是要寻找医治这些共同苦难的共同药物，并把它体现在新的工人政党的纲领中。运动中最重要、最困难的这一步，在美国尚待完成。

① 在德文版中不是“相对立”，而是“相敌对”。——编者注

恩格斯:《美国工人运动》(1887 年 1 月 26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89 页。

《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原则的最终胜利,马克思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共同行动和共同讨论必然会产生的工人阶级的精神的发展。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失败更甚于胜利——不能不使进行斗争的人们明白自己一向所崇奉的那些万应灵丹都不灵,并使他们的头脑更容易透彻地了解工人解放的真正的条件。

当欧洲工人阶级又强大到足以对统治阶级政权发动另一次进攻的时候,产生了国际工人协会。它的目的是要把欧美整个战斗的工人阶级联合成一支大军。因此,它不能从《宣言》中提出的那些原则出发。它应该有一个不致把英国工联,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普鲁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①拒之门外的纲领。这样一个纲领即国际章程绪论部分,是马克思起草的,其行文之巧妙是连巴枯宁和无政府派也不能不承认的。至于说到《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原则的最终胜利,马克思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共同行动和共同讨论必然会产生的工人阶级的精神的发展。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失败更甚于胜利,——不能不使进行斗争的人们

① 拉萨尔本人在我们面前总是自认为是马克思的"学生",他作为马克思的"学生"当然是站在《宣言》的立场上的。但是他的信徒却不是如此,他们始终没有超出他所主张的靠国家贷款建立生产合作社的要求,并且把整个工人阶级划分为国家帮助派和自助派。

明白自己一向所崇奉的那些万应灵丹都不灵，并使他们的头脑更容易透彻地了解工人解放的真正的条件。马克思是正确的。1874 年，当国际解散的时候，工人阶级已经全然不是 1864 年国际成立时的那个样子了。罗曼语族各国的普鲁东主义和德国特有的拉萨尔主义已经奄奄一息，甚至当时极端保守的英国工联也渐有进步，以致 1887 年在斯旺西，工联的代表大会主席能够用工联的名义声明说："大陆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再不可怕了。"而在 1887 年，大陆社会主义已经差不多完全是《宣言》中所宣布的那个理论了。因此，《宣言》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 1848 年以来现代工人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带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起到加利福尼亚的所有国家的千百万工人共同的纲领。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90 年德文版序言》(1890 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63—264 页。

自从 1848 年以来，时常为社会党人带来极大成就的策略就是《共产党宣言》的策略。

自从 1848 年以来，时常为社会党人带来极大成就的策略就是《**共产党宣言**》的策略。"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社会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社会党人[①]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

① 恩格斯在引证时把"共产党人"一词换成"社会党人"。——编者注

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

社会党人总是积极参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经历的每个发展阶段，而且，一时一刻也不忘记，这些阶段只不过是导致首要的伟大目的的阶梯。这个目的就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他们的位置是在为每一个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直接利益而斗争的战士的行列中；但是，他们只是把所有这些政治的或经济的利益看作**分期偿付的债款**。因此他们把每一个进步的或者革命的运动看作是沿着自己道路上前进的一步；他们的特殊任务是推动其他革命政党前进，如果其中的某一个政党获得胜利，他们就要去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这种永远不忽视伟大目标的策略，能够防止社会党人产生失望情绪，而这种情绪却是其他缺少远大目光的政党——不论是纯粹的共和主义者或感伤的社会主义者——无法避免的，因为他们把前进中的一个普通阶段看作是最终目的。

恩格斯：《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1894年1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3—454页。

问题不是在骗人的花言巧语，而是在实现绝大多数人本身的真正利益；诚然，这些利益当时还并没有为这绝大多数人所认识，但是在其实际实现的过程中，由于具有令人信服的明显性，一定很快就会为这绝大多数人所充分认识的。

以往的一切革命，都是归结于某一阶级的统治由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替换；但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

民群众而言,都只是区区少数。这样,一个统治的少数被推翻了,另一个少数又起而掌握国家政权并依照自己的利益改造国家制度。每次这都是在一定的经济发展状态下能够并且应该进行统治的少数集团,正因为如此,并且也只是因为如此,所以在变革发生时,被统治的多数或者是站在这个少数集团方面参加变革,或者是安然容忍这个变革。但是,如果把每一个别场合的具体内容撇开不谈,那么这一切革命的共同形态就在于:它们都是少数人的革命。多数人即使参加了,他们也只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行动的;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情形,或者甚至只是由于多数人采取消极态度,没有进行抵抗,就造成了一种假象,仿佛这个少数是代表全体人民的。

在第一次巨大的成功以后,胜利的少数照例发生分裂,其中一部分人满足于已经达到的成就,另一部分人则想继续前进,提出一些新的要求,这些要求至少有一部分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的或想象的利益的。在个别的场合,这些较激进的要求曾见诸实现,不过大部分都只是短时期的,因为较温和的一派重新占得上风,最近取得的成果便又全部或部分地化为乌有;于是战胜者就高叫有人叛变,或者把失败归咎于偶然。而实际上情形多半是这样:第一次胜利的成果,只是由于较激进的一派取得第二次胜利才会巩固下来;当这点一经达到,从而使当时必须实现的事情获得实现时,激进派及其成绩就又重新从舞台上消失了。

从17世纪英国大革命起的近代一切革命,都显示了这些似乎是与任何革命斗争分不开的特征。看来,无产阶级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也具有这些特征,何况恰好在1848年,稍微

懂得应该循哪个方向去求得这一解放的人还是屈指可数。甚至连巴黎的无产阶级群众本身,在获得胜利后也还完全不明了应该走哪一条路。然而运动终究是已经有了,这是本能的、自发的和不可抑止的运动。难道这不正是革命——虽然是由少数人所领导,但这一次已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多数人的真正利益进行的革命,——一定要获得成功的形势吗?既然在一切稍微长久的革命时期中,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样容易被那些拼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用骗人的花言巧语所诱惑,那么他们对于那些最确切地反映他们经济状况的思想,对于那些不外是明确而合理地表达他们自己虽还未理解到、但已经模糊感觉到的要求的思想,难道会更难接受吗?诚然,当幻想一消失而失望袭来的时候,人民群众的这种革命情绪就几乎总是,而且往往是很快地转为厌倦,或者甚至转到相反的方面去。但是,在这里,问题不是在骗人的花言巧语,而是在实现绝大多数人本身的真正利益;诚然,这些利益当时还并没有为这绝大多数人所认识,但是在其实际实现的过程中,由于具有令人信服的明显性,一定很快就会为这绝大多数人所充分认识的。并且,正如马克思在第三篇文章中所证明的,1848 年"社会"革命中所产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发展,到 1850 年春季已使实际统治集中于大资产阶级——而且是具有保皇主义倾向的大资产阶级手中,另一面,所有其他的社会阶级,农民和小资产者,则已团结到无产阶级周围,因而在共同胜利时和在共同胜利后,应该成为决定因素的不是他们,而是已经有经验教训的无产阶级。难道在这些条件下,还不可以完全期望少数人的革命变成多数人的革命吗?

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1895 年 3 月 6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595—597 页。

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

要获取明确的理论认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吃一堑,长一智"。而对于整整一个大的阶级来说,特别是对于像美国人这样一个如此重视实践而轻视理论的民族来说,别的道路是没有的。最主要的是使工人阶级作为阶级来行动;一旦做到了这一步,他们就会很快找到正确的方向,而一切进行阻挠的人,不论是亨·乔治还是鲍德利,都将同他们自己的小宗派一起被抛弃。因此,我也认为"劳动骑士"是运动中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不应当从外面冷眼看待它,而要从内部使之革命化,而且我认为,那里的许多德国人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面临一个强大而出色的、但不是由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运动时,竟企图把他们那一套从外国输入的、常常是没有弄懂的理论变成一种"唯一能救世的教条",并且和任何不接受这种教条的运动保持一个遥远的距离。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希望美国人一开始行动就完全了解在比较老的工业国家里制定出来的理论,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德国人所应当做的事情是,根据自己的理论去行动,——如果他们像我们在 1845 年和 1848 年那样懂得理论的

话——,参加工人阶级的一切真正的普遍的运动,接受运动的实际出发点,并通过下列办法逐步地把运动提到理论高度:指出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遭到的每一次失败都是原来纲领中的各种错误的理论观点的必然结果。用《共产党宣言》里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应当在当前的运动中代表运动的未来。可是,首先要让运动有巩固自己的时间,不要硬把别人在开始时还不能正确了解、但很快就会学会的一些东西灌输给别人,从而使初期不可避免的混乱现象变本加厉。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1886 年 12 月 28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79—680 页。

科学社会主义其实从未描绘过任何未来的远景,它仅限于分析现代资产阶级制度,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发展趋势……

谁都知道,科学社会主义其实从未描绘过任何未来的远景,它仅限于分析现代资产阶级制度,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发展趋势,如此而已。马克思早在1843 年就写道:"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斗争吧,你的全部斗争都是无谓之举',而是给它一个真正的斗争口号。我们只向世界指明它究竟为什么而斗争;而意识则是世界应该具备的东西,不管世界愿意与否",①并且马克思严格地执行了这个纲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418 页。——编者注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1894 年春夏),《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1 页。

……(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引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并肩地)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

当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领会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领会了关于俄国工人的历史使命的思想时,当这些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并在工人中间成立坚固的组织,把他们现时分散的经济战变成自觉的阶级斗争时,俄国工人就会起来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引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并肩地)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1894 年春夏),《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1 页。

工人在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中支持一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时,必须记住:有产阶级只能是他们暂时的同盟者,工人的利益和资本家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工人需要消灭政府的无限权力,只是为了公开地、广泛地进行反对资本家阶级的斗争。

资产阶级直接影响国家事务,比它现在通过一群卖身求荣、横行霸道的官吏来影响国家事务,对工人说来,是无比有利的。资产阶级公开地影响政治,比它现在通过似乎是万能

的、"独立的"政府来**隐蔽地**影响政治，对工人说来，也要有利得多，因为这个政府自命为"承受上帝恩典"，并把"自己的恩典"赐给受苦受难、爱好劳动的土地占有者和贫困不堪、受尽压迫的厂主。工人必须同资本家阶级进行**公开斗争**，以便让俄国全体无产阶级能够看到工人是为了哪些利益而斗争的，能够学会应该怎样进行斗争；以便让资产阶级的阴谋和企图不能隐藏在大公的外室里、参议员和大臣的客厅里、政府各部门绝对秘密的办公室里；以便让这些阴谋和企图暴露出来，使每个人都看清楚，究竟是谁在影响政府的政策，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追求的是什么。因此，必须清除一切掩盖资本家阶级现在的影响的东西。因此，必须支持一切**反对**官吏，**反对**官僚管理机构，**反对**不受限制的政府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但是社会民主党在宣布自己支持一切反对专制制度的社会运动的同时，承认自己并不脱离工人运动，因为工人阶级有自己的、与其他一切阶级的利益相对立的特殊利益。工人在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中支持一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时，必须记住：有产阶级只能是他们暂时的同盟者，工人的利益和资本家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工人需要消灭政府的无限权力，只是为了公开地、广泛地进行反对资本家阶级的斗争。

列宁：《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1895年和1896年），《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1—92页。

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不同工人斗争相结合，就只是一种空想……

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互不相关，使得两者都软弱无力，难以发展。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不同工人斗争相结合，就只是一种空想，一种善良的愿望，对实际生活不会发生影响；而工人运动则只会陷于零散状态，不会有政治意义，也不会得到当时先进科学的指导。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1899年底），《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3页。

资本世界和劳动世界之间的鸿沟将更为加深，工人的社会主义意识将更为明确。

在许多革命事件的影响下，俄国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任务和民主主义任务都显得无比突出、极其迫切了。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正上升到更高的阶段。资本家结成了一个个全俄的联合组织，同政府勾结得更紧，更频繁地采取最极端的经济斗争手段，直到举行大规模的同盟歇业，以便“制服”无产阶级。但是迫害只能吓倒那些垂死的阶级；资本家老爷们成功得愈快，无产阶级的人数就愈多，团结就愈紧。无产阶级的不可战胜是以俄国和全世界的经济发展来作保证的。资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第一次开始形成为一个阶级，形成为一支统一的和自觉的政治力量。这样，全俄国的工人也将更加顺利地组成为一个统一的阶级。资本世界和劳动世界之间的鸿沟将更为加深，工人的社会主义意识将更为明确。在无产阶级中进行的社会主义鼓动，从革命的种种试验中得到充实之后，将变得更加明确。

列宁:《革命与反革命》(1907 年 10 月 20 日〔11 月 2 日〕),《列宁全集》第 16 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16 页。

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开始,标志着 20 世纪初所开创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

世界资本主义和俄国 1905 年的运动终于唤醒了亚洲。几万万受压制的、由于处于中世纪的停滞状态而变得粗野的人民觉醒过来了,他们走向新生活,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

世界各先进国家的工人以关切、兴奋的心情注视着全球各地各种形式的世界解放运动的这种气势磅礴的发展。被工人运动的力量吓坏了的欧洲资产阶级,投到反动势力、军阀、僧侣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怀抱里去了。但是,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以及亚洲各国年轻的、对自己力量充满信心、对群众充满信任的民主派,正在起来代替这些气息尚存但已日趋腐朽的资产阶级。

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开始,标志着 20 世纪初所开创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

列宁:《亚洲的觉醒》(1913 年 5 月 7 日〔20 日〕),《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16 页。

觉悟工人的最重要任务,是认识本阶级的运动,认识运动的实质、目的和任务,以及运动的条件和实际形式。

觉悟工人的最重要任务,是认识本阶级的运动,认识运动

的实质、目的和任务，以及运动的条件和实际形式。这是因为工人运动的全部力量就在于它的觉悟性和群众性：资本主义每发展一步，都使无产者即雇佣工人的数量增加，并且团结他们，组织他们，教育他们，从而造成一支必然要奔向自己目标的阶级力量。

列宁：《表明工人运动中各派力量的一些客观材料》（1914年6月26日〔7月9日〕），《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23页。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被压迫阶级的即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解放运动。革命理论是不能臆造出来的，它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生长出来的。

但是，尽管果雷对马克思主义抱有偏见可以理解，“合乎人之常情”，尽管有许多过错不能归咎于他而应当归咎于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那个正在死亡的和已经死亡的派别（盖得派），他仍然是有过错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被压迫阶级的即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解放运动。革命理论是不能臆造出来的，它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生长出来的。这种理论在19世纪后半期形成。它叫作马克思主义。谁如果不尽力参加研究和运用这种理论，谁如果在我们这个时代不同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及其一伙歪曲这种理论的行为进行无情的斗争，谁就不能做一个社会主义者，做一个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

列宁:《一位法裔社会党人诚实的呼声》(1915年8月),《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6页。

只有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能够表现充分的自觉性、思想性、坚定性和忘我精神的情况下,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有保障。

相反,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因而也在我们于1917年10月25日所开始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它所领导的贫苦农民的主要任务,却是进行积极的或者说创造性的工作,就是要把对千百万人生存所必需的产品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这一极其复杂和精密的新的组织系统建立起来。这种革命,只有在人口的大多数首先是劳动群众的大多数进行独立的历史创造活动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实现。只有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能够表现充分的自觉性、思想性、坚定性和忘我精神的情况下,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有保障。我们建立了使被压迫劳动群众能够十分积极地参加独立建设新社会的新型的国家,即苏维埃类型的国家,这还只是解决了困难任务的一小部分。主要的困难是在经济方面: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最严格的普遍的计算和监督,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生产在**事实上社会化**。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4月),《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5—476页。

如果其他阶级出身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么首

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

第一，要对无产阶级运动有益处，这些人必须带来真正的教育因素。但是，参加运动的大多数德国资产者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的。无论《未来》杂志或《新社会》杂志，都没有带来任何能使运动前进一步的东西。这里绝对没有真正的实际教育材料或理论教育材料。相反，这里只有把领会得很肤浅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这些先生们从大学或其他什么地方搬来的各种理论观点调和起来的尝试；这些观点一个比一个更糊涂，这是因为德国哲学的残余现在正处于腐朽的过程。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不是自己首先钻研新的科学，而宁可按照搬来的观点把这一新的科学裁剪得适合于自己，匆促地为自己制造自己的私人科学并且狂妄地立即想把它教给别人。所以，在这些先生当中，几乎是有多少脑袋就有多少观点。他们什么也没有弄清楚，只是造成了极度的混乱——幸而几乎仅仅是在他们自己当中。这些教育者的首要原则就是拿自己没有学会的东西教给别人。党完全可以不要这种教育者。

第二，如果其他阶级出身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么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可是，正像已经证明的那样，这些先生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观念。在德国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国家中，这些观念无疑是有存在的理由的，然而这只能是在社会民主工党**以外**。如果这些先生组成社会民主小资产阶级党，那么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那时我们可以同他们进行谈判，视情况

甚至可以结成联盟等等。但是在工人党中，他们是冒牌分子。如果有理由暂时还容忍他们，那么我们就应当**仅限于**容忍他们，而不要让他们影响党的领导，并且要清楚地知道，和他们分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这个时间看来是已经到了。党怎么能够再容忍这篇文章的作者们留在自己队伍中，这是我们完全不能理解的。但是，既然连党的领导也或多或少地落到了这些人的手中，那党简直就是受了阉割，而不再有无产阶级的锐气了。

马克思、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1879 年 9 月 16 日—18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61—362 页。

谁要是像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

争论的问题完全是原则性的：是应当把斗争作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进行呢，还是应当像机会主义者（翻译成社会主义者的语言就是：可能派）那样，只要能获得更多的选票和更多的“支持者”，就可以把运动的阶级性和纲领都丢开不管？马隆和布鲁斯赞成后一种做法，从而牺牲了运动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并且使分裂成为不可避免的事。这也好。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而现在第一次建立工人政党的法国也不例外。在德国，我们已经走过了这种内部斗争（同拉萨尔派）的第一阶

段,其他阶段还摆在我们面前。在可能团结一致的时候,团结一致是很好的,但还有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谁要是像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

恩格斯:《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82年10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2—653页。

"思想家"所以配称为思想家,就是因为他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早地解决运动的"物质因素"自发地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

他们(经济主义及其拥护者)搞不清运动的"物质的"(用《工人事业》的话来说是自发的)因素和思想的(自觉的,"按计划"进行活动的)因素的相互关系问题。他们不懂得,"思想家"所以配称为思想家,就是因为他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早地解决运动的"物质因素"自发地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

列宁:《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1901年12月6日〔19日〕),《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6—327页。

所谓反对思想僵化等等的响亮词句,只不过是用来掩饰人们对理论思想发展的冷淡和无能。

所谓反对思想僵化等等的响亮词句，只不过是用来掩饰人们对理论思想发展的冷淡和无能。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例子非常明显地说明了全欧洲的普遍现象（这是德国马克思主义者也早已指出的现象）：臭名远扬的批评自由，并不是用一种理论来代替另一种理论，而是自由地抛弃任何完整的和周密的理论，是折中主义和无原则性。凡是稍微了解我国运动的实际情况的人，都不能不看到，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理论水平有了某种程度的降低。有不少理论修养很差甚至毫无理论修养的人，由于看见运动有实际意义和实际成效而加入了运动。由此可见，《工人事业》得意洋洋地提出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是多么不合时宜。在理论混乱的时代来重复这句话，就如同在看到人家送葬时高喊“但愿你们拉也拉不完！”一样。而且上面马克思的这句话，是从他评论哥达纲领的信里摘引来的，马克思在信里**严厉地斥责了**人们在说明原则时的折中主义态度。马克思写信给党的领袖们说，如果需要联合，那么为了达到运动的具体目标，可以缔结协定，但是决不能拿原则来做交易，决不要作理论上的“让步”。马克思的意思就是这样，而我们这里却有人假借马克思的名义来竭力贬低理论的意义！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同时鬈的机会主义说教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

列宁：《怎么办？》（1901 年秋—1902 年 1 月），《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10—311 页。

在革命时代对理论问题采取模棱两可或毫无原则的态度,就等于思想上完全破产……

多少有点头脑的社会主义者,都不能用模棱两可的托词,或者借口革命时期似乎不宜谈抽象理论问题,或者指出农民起义的事实足以说明地主已有防备来回避这个问题。恰恰在革命时代对理论问题采取模棱两可或毫无原则的态度,就等于思想上完全破产,因为正是现在需要有深思熟虑过的坚定世界观来使社会主义者控制事件,而不是使事件控制社会主义者。指出农民起义也不能说明什么,因为现在在政治上组织成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的土地占有者所通过的纲领,其内容是好几十年来整个自由派报刊和所有自由派活动家所表达的愿望。民粹派的纲领成了地主的纲领,这个事实对我们提出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政治性回答。在革命时代,关于社会问题的理论争论,是由各个阶级的公开行动来解决的。

列宁:《自由派的土地纲领》(1905 年 4 月 7 日〔20 日〕),《列宁全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3 页。

由于客观的社会力量的对比,维护工人阶级的特殊利益和训练工人阶级使它将来在资产阶级俄国发挥作用,必然沿着下面两条主要道路进行:或者跟着自由派走……或者不管自由派的动摇、背叛和路标主义,率领民主分子前进。

俄国的地主,从普利什凯维奇到多尔戈鲁科夫,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在用历史上还未曾有过的奴颜婢膝、因循守旧和害怕变化的心理培育我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俄国的农民在俄

国当前的经济和政治情况下，是一个资产阶级居民阶层；“冲突”的时代，资产阶级革命（就“革命”这个词的历史方法论的意义来说）的时代，在参与其中的工人发挥主导作用的情况下，正在把这个阶层培育成没有上述讨人喜欢的品质的资产阶级。能不能培育成那样呢？对这个问题只有到俄国资产阶级运动的时代结束时才能作出回答。在此以前，俄国政治思想界的一切进步派别必然分为两大基本类型：或是倾向于极力用对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无害的方式来改造、革新俄国的自由派掌握领导权，或是倾向于率领农民中的优秀分子前进的工人阶级掌握领导权。

我说“倾向于”，是因为还不能设想所有的进步派别都已经意识到也就是说理解到这种或那种政策的阶级根源。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没有找到这些根源，没有懂得下面这一点，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就是：由于客观的社会力量的对比，维护工人阶级的特殊利益和训练工人阶级使它将来在资产阶级俄国发挥作用，必然沿着下面两条主要道路进行：或者跟着自由派走（自由派是跟在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后面或是同他们站在一起的），或者不管自由派的动摇、背叛和路标主义，率领民主分子前进。

列宁：《选举运动的几个原则问题》（1911年12月和1912年1月），《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6页。

无产阶级一面进行阶级斗争，一面受到启发和教育，他们逐渐摆脱资产阶级社会的偏见……

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如何摆脱一切被压迫阶级至今深受其害的精神奴役的出路。只有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才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

在全世界，从美洲到日本，从瑞典到南非，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正在不断增加。无产阶级一面进行阶级斗争，一面受到启发和教育，他们逐渐摆脱资产阶级社会的偏见，日益紧密地团结起来并且学习怎样衡量自己的成绩，他们正在锻炼自己的力量并且在不可遏止地成长壮大。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 年 3 月），《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14 页。

马克思主义者总是第一个预见到革命时代的到来，还在那些庸人做着甘当顺民的奴才梦时，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唤醒人民，敲响警钟。

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总是**第一个**预见到革命时代的到来，还在那些庸人做着甘当顺民的奴才梦时，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唤醒人民，敲响警钟。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总是**第一个**走上直接革命斗争的道路，走向直接的搏斗，揭露社会上和政治上形形色色的中间分子的调和幻想。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最后一个**离开直接革命斗争的道路，只有当一切可能的办法都已用尽，当没有**一点**希望走比较短的道路，当发出准备群众罢工和起义等号召都显然失去基础的时候，才离开这条道路。

列宁:《孟什维主义的危机》(1906年12月7日〔20日〕),《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7—158页。

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出色地把以下两方面结合起来,既以完全科学的冷静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演进的客观进程,又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并建立起同某些阶级的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出色地把以下两方面结合起来:既以完全科学的冷静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演进的客观进程,又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并建立起同某些阶级的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从马克思的全部历史观点出发,必然会对人类发展的革命时期给予高度的评价,因为正是在这样的时期,所谓和平发展时期慢慢积累起来的许多矛盾才能够解决。正是在这样的时期,各个不同的阶级在确定社会生活形式方面的直接作用才得到最有力的表现,而后来长期以更新了的生产关系基础为依托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基本方面才得以建立。而且,马克思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不同,他并不认为这样的时期是脱离了"正常的"道路,是"社会病态"的表现,是过激和谬误的可悲的结果,他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历史中最有生气、最重要、最本质、最具有决定性的关头。

列宁:《反对抵制》(1907 年 6 月 26 日〔7 月 9 日〕),《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47—748 页。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我们的整个世界观以及我党的全部纲领和策略的"原则基础"现在被提到党的整个生活的首要地位,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我们的整个世界观以及我党的全部纲领和策略的"**原则基础**"现在被提到党的整个生活的首要地位,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在革命遭到挫折之后,社会的**所有**阶级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对整个世界观(直到宗教问题和哲学问题,直到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原则**)的深刻基础都发生了兴趣,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被革命卷入由策略问题引起的尖锐斗争中来的群众,在缺乏公开言论的时代,提出了对**一般理论**知识的要求,这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应当重新对这些群众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务又提到日程上来了。

列宁:《论党内状况》(不晚于 1910 年 12 月 15 日〔28 日〕),《列宁全集》第 20 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9—60 页。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

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前一时期的迫切任务是在国内生活的各方面实现直接改革,后一时期的迫切任务是总

结经验，使更广大的阶层掌握这种经验，使这种经验深入到所谓底层，深入到各阶级的落后群众中去。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反映就是深刻的瓦解、混乱、各种各样的动摇，总而言之，就是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极端严重的内部危机。坚决地反对这种瓦解，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基础而进行坚决顽强的斗争，又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了。在制定自己的任务时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那些阶级的最广大阶层，在前一时期极片面地、极反常地领会了马克思主义，死记硬背了某些“口号”和某些策略问题的答案，而并不理解这些答案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准则。在社会生活各方面“重新估价一切价值”，结果就引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哲学基本原理的“修正”。带着各种唯心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哲学的影响，表现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马赫主义的流行病上。重复那些背得烂熟、但并不理解、也没有经过思考的“口号”，结果就使得空谈盛行，这种空谈实际上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潮：如露骨的或者羞羞答答的“召回主义”，又如把召回主义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合理的色彩”。

列宁：《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1910年12月23日〔1911年1月5日〕），《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282页。

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实践的重要性决不次于理论，而且只有这种实践才能对我们的原则作出真正的检验。

使我们相信我们的策略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正确性的，首先是我们多年来对俄国工人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了解和参加这一运动的经验，以及我们的理论上的即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但是，我们坚持如下的看法：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实践的重要性决不次于理论，而且只有这种实践才能对我们的原则作出真正的检验。“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浮士德）。因此，在同取消派及其同盟者进行了两年半的斗争以后，五分之四的觉悟工人表示赞成“真理派”，这一事实使我们更加相信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使这种信念不可动摇。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布鲁塞尔会议上的报告和给出席该会议的中央代表团的指示》（1914 年 6 月 23—30 日〔7 月 6—13 日〕），《列宁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09—410 页。

在英国，工业和农业的工人阶级占人民的绝大多数，民主制恰恰意味着工人阶级的统治。

然而，在英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普遍地感到，老的政党注定要灭亡，老的套语变得没有意义了，老的口号已被推翻，老的万应灵丹已经失效了。各个阶级的有思想的人，开始看到必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只能是走向民主制的道路。但是在英国，工业和农业的工人阶级占人民的绝大

多数,民主制恰恰意味着工人阶级的统治。那么,就让英国工人阶级自己准备去担负它所面临的任务,去统治这个大帝国吧,让他们了解必然要落到他们肩上的责任吧。要做到这点,最好的方法是利用已经掌握在他们手里的力量,利用他们在王国各大城市中拥有的实际多数,把自己队伍中的人派到议会里去。

恩格斯:《工人政党》(1881 年 7 月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21 页。

任何民主的政党,无论在英国或在其他任何国家,除非具有明显的工人阶级的性质,否则就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就。抛弃这种性质,就只有宗派和欺骗了。

此外,在英国只有工人的政党才可能是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党。其他阶级的开明人士(那样的人在那些阶级里不像人们要我们相信的那么多)可以加入这个党,在表明自己的真诚以后,甚至可以在议会里代表这个党。这在各地都是如此。例如,在德国,工人的代表并不是在每一场合下都是真正的工人。但是,任何民主的政党,无论在英国或在其他任何国家,除非具有鲜明的工人阶级性质,否则就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就。抛弃这种性质,就只有宗派和欺骗了。

恩格斯:《工人政党》(1881 年 7 月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22 页。

英国无产阶级依靠着发展水平最先进的工业,而且享有

最大的政治活动自由。

许许多多观察了这次示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在离开时都已深信，充当伟大自由党的附属品和执票工具达四十年之久的英国无产阶级，已经终于觉醒过来，投入了新的独立的生活和活动。1890 年 5 月 4 日英国工人阶级加入了伟大的国际大军，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而这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英国无产阶级依靠着发展水平最先进的工业，而且享有最大的政治活动自由。它的漫长的冬眠——一方面是 1836—1850 年的宪章运动遭到失败的结果，另一方面是 1848—1880 年工业获得巨大发展的结果——终于打破了。老宪章派的后代加入了战斗队伍。八年以来，在广大群众中，风潮一直此伏彼起，有发生。出现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团体，但是没有一个超出宗派的水平之上；宣传鼓动家和所谓党的领袖——其中有的甚至是纯粹的投机分子和野心家——都是些没有士兵的指挥官。这差不多总是使我们想起 1849 年巴登运动中著名的罗伯特·勃鲁姆纵队：上校一名、军官十一名、号兵和列兵各一名。而这些各色各样的罗伯特·勃鲁姆纵队还为了争夺对未来无产阶级大军的领导而互相争吵，这种景象更是令人难以乐观。现在，所有这一切将很快像在德国、在奥地利那样停止下来。强大的群众运动将使所有这些宗派和团体不复存在，它将把士兵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而给指挥官指出他们应守的岗位。

恩格斯：《伦敦的 5 月 4 日》（1890 年 5 月 5 日和 21 日之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75 页。

(二)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阶级意识

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了同情,这种同情,它在官方科学那里是既没有寻找也没有期望过的。

随着1848年革命而来的是,"有教养的"德国抛弃了理论,转入了实践的领域。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小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已经为真正的大工业所代替;德国重新出现在世界市场上;新的小德意志帝国至少排除了由小邦割据、封建残余和官僚制度造成的阻碍这一发展的最显著的弊病。但是,思辨在多大程度上离开哲学家的书房而在证券交易所筑起自己的殿堂,有教养的德国也就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在德国最深沉的政治屈辱时代曾经是德国的光荣的伟大理论兴趣——那种不管所得成果在实践上是否能实现,不管它是否违反警章都照样致力于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诚然,德国的官方自然科学,特别是在专门研究的领域中仍然保持着时代的高度,但是,正如美国《科学》杂志已经公正地指出的,在研究单个事实之间的重大联系方面的决定性进步,即把这些联系概括为规律,现在更多地是出在英国,而不像从前那样出在德国。而在包括哲学在内的历史科学的领域内,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古典哲学完全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没有头脑的折衷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

的向上爬的思想。这种科学的官方代表都变成毫无掩饰的资产阶级的和现存国家的玄想家，但这已经是在资产阶级和现存国家同工人阶级公开敌对的时代了。

德国人的理论兴趣，只是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衰退，继续存在着。在这里，它是根除不了的。在这里，对职位、牟利，对上司的恩典，没有任何考虑。相反，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了同情，这种同情，它在官方科学那里是既没有寻找也没有期望过的。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258页。

工人比资产者偏见少得多，看问题清楚得多，不戴上自私的眼镜来看一切。因为缺少教育，所以他没有宗教偏见。

工人的仁慈也表现在其他各个方面，而且其表现形式也是令人愉快的。他们自己就是命途多舛的，所以他们能同情境况不好的人。在他们看来，每一个人都是人，而在资产者的眼光中，工人却不完全是人。所以工人是比较和气比较可亲的，虽然他们比有产阶级更迫切地需要钱，但他们并不那样贪财；对他们来说，金钱的价值只在于能用它来买东西，可是对资产者来说，金钱却具有一种为它本身所固有的特殊的价值，

即偶像的价值,这样,它就使资产者变成了卑鄙龌龊的"财迷"。完全没有这种金钱崇拜感的工人,并不像资产者那样贪婪,资产者为了多赚钱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认为生活的目的就是装满自己的钱袋。所以工人比资产者偏见少得多,看问题清楚得多,不戴上自私的眼镜来看一切。因为缺少教育,所以他没有宗教偏见。他不懂得这些事情,也不为这些事情伤脑筋,在他身上看不到支配着资产阶级的那种狂热。如果说他也有点宗教信仰的话,那也只是名义上的,甚至连理论上的都谈不到。实际上他只是为今生而活着,并力求在今生生活得更好一些。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 年 9 月—1845 年 3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411 页。

和生活条件本身一样,缺少宗教教育及其他教育,也使得工人比资产者客观,比资产者容易摆脱传统的陈腐的原则和先人之见的束缚。

和生活条件本身一样,缺少宗教教育及其他教育,也使得工人比资产者客观,比资产者容易摆脱传统的陈腐的原则和先人之见的束缚。资产者被自己的阶级偏见,被那些从小就灌输给他的原则一直淹没到耳朵,这种人是无可救药的。他即使在形式上是自由主义的,但实质上还是保守的;他的利益和现存的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在任何前进的运动中都是一具僵尸。他不再站在历史发展的前头,工人将要取而代之,——最初只是理应如此,以后就会在实际上做到这一点。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 年 9 月—1845 年 3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412 页。

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在实践中对一切阶级、阶层和居民集团的活动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出唯物主义分析和唯物主义评价时,工人群众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阶级意识的。

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对**各种各样**的专横和压迫、暴行和胡作非为(不管这些现象是针对**哪些阶级**的)作出反应,并且正是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而不是从其他什么观点来作出反应时,工人阶级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政治意识的。当工人还没有学会根据各种具体的、而且确实是大家关心的(迫切的)政治事实和政治事件来观察其他**每一个**社会阶级在思想、精神和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表现时,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在实践中对**一切**阶级、阶层和居民集团的活动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出唯物主义分析和唯物主义评价时,工人群众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阶级意识的。

列宁:《怎么办?》(1901 年秋—1902 年 2 月),《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54 页。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废除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具的特征。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

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①];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

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废除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具的特征。

……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 年 12 月—1848 年 1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85—286 页。

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 = 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 = 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① "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 1888 年英文版中是"最先进的和最坚决的部分,推动所有其他部分前进的部分"。——编者注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 年 5 月底 6 月初—8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97 页。

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①]和革命的”[②]。后一性质的确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因为这个理论公开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揭露**现代社会的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考察

① 请注意，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是唯物主义的批判，他认为只有这种批判才是科学的批判，这种批判就是政治、法律、社会和习俗等等方面的事实来同经济、生产关系体系，以及在一切对抗性社会关系基础上必然形成的各个阶级的利益加以对照。俄国的社会关系是对抗性的关系，这几乎是谁也不能怀疑的。可是还没有人试把这些关系当作根据来进行这种批判。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12 页。——编者注

它们的演变，证明它们的暂时性和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必然性，**因而也就帮助无产阶级尽可能迅速地、尽可能容易地消灭任何剥削**。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仅仅是因为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偶然地结合起来，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实际上，这里直接地提出理论的任务、科学的目的就是帮助被压迫阶级去进行他们已在实际进行的经济斗争。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1894 年春夏），《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2—83 页。

……他们（马克思和恩格斯）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

与这种害怕无产阶级发展的普遍心理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的不断增长上。无产者人数愈多，他们这一革命阶级的力量也就愈大，社会主义的实现也就愈是接近，愈有可能。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功绩，可以这样简单地来表达：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 年 9 月 7 日〔19 日〕以后），《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9 页。

马克思主义也指明了一个正确的立场，一方面反对夸大政治的意义，反对密谋主义（布朗基主义等等），另一方面又反对轻视政治，或者把政治缩小为对社会进行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的修补。

马克思主义也指明了一个正确的立场，一方面反对夸大政治的意义，反对密谋主义（布朗基主义等等），另一方面又反对轻视政治，或者把政治缩小为对社会进行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的修补（无政府主义，空想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教授社会主义等等）。无产阶级应该努力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党的主要目的应该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来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决不应该把其他阶级和政党看作“反动的一帮”①，恰恰相反，它应该参加整个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应该支持进步阶级和进步政党去反对反动阶级和反动政党，应该支持一切反对现存制度的革命运动，应该成为一切被压迫的民族或种族的保护者，成为一切被压制的宗教以及无权的女性等等的保护者。《信条》作者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议论，只是证明他们力图抹杀无产阶级斗争的阶级性质，用所谓空洞的“承认社会”来削弱这个斗争，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降低为一种庸俗的改良主义的思潮。我们深信，绝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会坚决摒弃这种曲解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的观点。

① 指拉萨尔派的一个论点：对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组成反动的一帮。这个论点写入了1875年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哥达纲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了这个论点（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308页）。——编者注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1899年8月),《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8页。

……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

现在德国工人是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事件究竟能让他们把这种光荣地位占据多久,这是不能预言的。但是,可以相信,只要他们还占据这个地位,他们就能很好地执行这个地位赋予他们的种种责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斗争和鼓动的各个方面都加倍努力。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愈来愈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愈来愈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词句的影响,而时刻牢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日益加强团结党组织和工会组织……

列宁:《怎么办?》(1901年秋—1902年2月),《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4页。

……社会主义理论比其他一切理论都更深刻更正确地指明了工人阶级受苦的原因,因此工人也就很容易领会这个理论,只要这个理论本身不屈服于自发性,只要这个理论使自发性受它的支配。

人们常常说: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在下述意义上说,这是完全正确的,就是社会主义理论比其他一切理论

都更深刻更正确地指明了工人阶级受苦的原因，因此工人也就很容易领会这个理论，只要这个理论本身不屈服于自发性，只要这个理论使自发性受它的支配。通常这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工人事业》恰恰忘记和曲解了这个不言而喻的道理。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然而最流行的（而且时刻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复活起来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却自发地而又最猖狂地使工人接受它。

列宁：《怎么办？》一文中的脚注（1901年秋—1902年2月），《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8页。

……（马克思主义）既以完全科学的冷静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演进的客观进程，又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出色地把以下两方面结合起来：既以完全科学的冷静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演进的客观进程，又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并建立起同某些阶级的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从马克思的全部历史观点出发，必然会对人类发展的革命时期给予高度的评价，因为正是在这样的时期，所谓和平发展时期慢慢积累起来的许多矛盾才能够解决。正是在这样的时期，各个不同的阶级在确定社会生活形式方面的直接作用才得到最有力的表现，而后来长期以更新了的生产关系基础为依托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基本方面才得以建立。而且，

马克思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不同，他并不认为这样的时期是脱离了“正常的”道路，是“社会病态”的表现，是过激和谬误的可悲的结果，他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历史中最有生气、最重要、最本质、最具有决定性的关头。

列宁：《反对抵制》（1907 年 6 月 26 日〔7 月 9 日〕），《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47—748 页。

……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

马克思学说在整个文明世界中引起全部资产阶级科学（官方科学和自由派科学）极大的仇视和憎恨，这种科学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某种“有害的宗派”。也不能期望有别的态度，因为建筑在阶级斗争上的社会是不可能有“公正的”社会科学的。全部官方的和自由派的科学都这样或那样地为雇佣奴隶制辩护，而马克思主义则对这种奴隶制宣布了无情的战争。期望在雇佣奴隶制的社会里有公正的科学，正像期望厂主在应不应该减少资本利润来增加工人工资的问题上会采取公正态度一样，是愚蠢可笑的。

不仅如此，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都十分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

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马克思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3月)，《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310页。

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

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而且把它贯彻到底，把它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过去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和随意性，被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如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例如从农奴制中生长出资本主义。

正如人的认识反映不依赖于它而存在的自然界即发展着的物质那样，人的**社会认识**(即哲学、宗教、政治等等的不同观点和学说)反映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设施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看到，例如现代欧洲各国的各种政治形式，都是为巩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服务的。

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3月),《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页。

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如何摆脱一切被压迫阶级至今深受其害的精神奴役的出路。只有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才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

只要人们还没有学会透过任何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诺言,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那他们始终是而且会永远是政治上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只要那些主张改良和改善的人还不懂得,任何一个旧设施,不管它怎样荒谬和腐败,都由某些统治阶级的势力在支撑着,那他们总是会受旧事物拥护者的愚弄。要粉碎这些阶级的反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必须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中找出一种力量,教育它和组织它去进行斗争,这种力量可以(而且按它的社会地位来说**应当**)成为能够除旧立新的力量。

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如何摆脱一切被压迫阶级至今深受其害的精神奴役的出路。只有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才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3月),《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4页。

……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

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已经实现了，但是实现得非常奇特，有许多十分重大的变异。关于这些变异，我将在以后的一封信中专门谈到。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

“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①

谁**按旧方式**提出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问题，谁就是为死教条而牺牲活的马克思主义。

列宁：《论策略书》（1917 年 4 月 8 日和 13 日〔21 日和 26 日〕之间），《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6—27 页。

只有布尔什维主义存在的整个时期的历史，才能令人满意地说明，为什么它能够建立为无产阶级胜利所必需的铁的纪律并能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住这种纪律。

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 1903 年开始的。只有布尔什维主义存在的**整个**时期的历史，才能令人满意地说明，为什么它能够建立为无产阶级胜利所必需的铁的纪律并能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住这种纪律。

这里首先发生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

① 见约·沃·歌德《浮士德》第 1 部第 4 场《浮士德的书斋》。——编者注

是靠什么来维持的？是靠什么来检验的？是靠什么来加强的？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和它对革命的忠诚，是靠它的坚韧不拔、自我牺牲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一个革命政党，要真正能够成为必将推翻资产阶级并改造整个社会的先进阶级的政党，没有上述条件，就不可能建立起纪律。没有这些条件，建立纪律的企图，就必然会成为空谈，成为漂亮话，成为装模作样。可是另一方面，这些条件又不能一下子就产生。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和艰苦的实践才能造成这些条件；正确的革命理论——而理论并不是教条——会使这些条件容易造成，但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些条件才能最终形成。

布尔什维主义所以能够建立并且在1917—1920年异常艰难的条件下顺利地实现极严格的集中和铁的纪律，其原因仅仅在于俄国有若干历史特点。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5—136页。

……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

现代历史的全部经验，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发表后半个

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都无可争辩地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

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的最后的斗争）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化》（1920 年 10 月 8 日），《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99 页。

……问题并不在于实现某种空想的体系，而在于要自觉地参加我们眼前发生的改造社会的历史过程。

至于“同盟”本身的秘密学说，它经历了法英两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它们的德国变种（例如魏特林的幻想）所经过的各种变化。从布伦奇里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从 1839 年以来，除了社会问题以外，宗教问题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德国哲学从 1839 年到 1846 年这一时期内所经历的各个不同阶段，都在这些工人团体内部受到了极其热心的关注。这个团体的秘密形式起源于巴黎。同盟的主要目的是在德国工人中间进行宣传，这种目的要求它在后来也保持这种形式。我第一次逗留巴黎期间，经常同那里的“同盟”领导人以及法国大多数工人秘密团体的领导人保持私人交往，但并没有加

入其中任何一个团体。在布鲁塞尔(是基佐把我放逐到那里去的),我同恩格斯、威·沃尔弗等人成立了一个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该协会至今还存在。同时,我们还出版了一系列抨击性小册子,有的是铅印的,有的是石印的;我们在这些小册子里,对构成当时"同盟"的秘密学说的那种法英两国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同德国哲学的混合物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为了代替这种混合物,我们提出把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结构的科学认识作为唯一牢靠的理论基础,最后并用通俗的形式说明:问题并不在于实现某种空想的体系,而在于要自觉地参加我们眼前发生的改造社会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福格特先生》(1860 年 2 月—1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37 页。

……甚至在直接为工人们写的《宣言》里,也抛弃了一切体系,而代之以"批判地了解实际社会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因此,泰霍夫就"设想"我编写了一本"无产者问答书"。他指的是《宣言》,其中批判了,如果泰霍夫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嘲笑了"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的和批判的空想主义。不过,这种"嘲笑"却不像他所"设想"的那样轻而易举,而是需要花一番力气的,这一点,他可以从我那部反对蒲鲁东的著作《哲学的贫困》(1847 年)里看出来。泰霍夫还"设想"我"剪裁了"一套"体系",哪儿的话,我甚至在直接为工人们写的《宣言》里,也抛弃了一切体系,而代之以"批判地了解实际社会运动的

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①。但是,这样一种"了解",既不能跟在别人后面死板地重复,也不能像做一条子弹带那样来"剪裁"。泰霍夫所"设想"的、并背地塞给我的对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相互关系的那种看法,是天真得出奇的。

马克思:《福格特先生》(1860 年 2 月—1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49 页。

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

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 年 4—5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0 页。

……起来代替乌托邦的,是对运动的历史条件的真正洞见以及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的日益积聚力量。

①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 2 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编者注

所有的社会主义宗派的创始人都属于那样一个时期，那时工人阶级自己一方面还没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进程中得到足够的锻炼并被充分地组织起来，以便作为历史动力登上世界舞台；另一方面，他们取得解放的物质条件在旧世界本身内部也还没有充分成熟起来。工人阶级的贫困状态是存在着的，但是他们开展自己的运动的条件尚未具备。各乌托邦宗派的创始人虽然在批判现存社会时明确地描述了社会运动的目的——废除雇佣劳动制度及其一切实行阶级统治的经济条件，但是他们既不能在社会本身中找到改造它的物质条件，也不能在工人阶级身上找到运动的有组织的力量和对运动的认识。他们企图用新社会的幻想图景和方案来弥补运动所缺乏的历史条件，并且认为宣传这些空想的图景和方案是真正的救世之道。从工人阶级运动成为现实运动的时刻起，各种幻想的乌托邦消逝了，——这不是因为工人阶级放弃了这些乌托邦主义者所追求的目的，而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实现这一目的的现实手段，——但是起来代替乌托邦的，是对运动的历史条件的真正洞见以及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的日益积聚力量。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1871 年 4—5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603—604 页。

只有当工人阶级不是带着有色的法学眼镜，而是如实地观察事物的时候，它才能亲自彻底认清自己的生活状况。

只有当工人阶级不是带着有色的法学眼镜，而是如实地观察事物的时候，它才能亲自彻底认清自己的生活状况。在

这方面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帮助了工人阶级，他证明：人们的一切法律、政治、哲学、宗教等等观念归根结蒂都是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从他们的生产方式和产品交换方式中引导出来的。由此便产生了适合于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和斗争条件的世界观；和工人无财产相适应的只能是他们头脑中无幻想。现在这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正在全球环行。

恩格斯：《〈法学家的社会主义〉附录》（1886年11月—12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48页。

下一个国际——在马克思的著作产生了多年的影响以后——将是纯粹共产主义的国际，而且将直截了当地树立起我们的原则……

它是属于第二帝国时期的东西，当时笼罩着整个欧洲的压迫，要求刚刚复苏的工人运动实现统一和抛开一切内部争论。当时是这样一个时期：无产阶级共同的世界性的利益能够提到首要地位了。德国、西班牙、意大利、丹麦刚刚加入了运动，或者正开始加入运动。在1864年，运动本身的理论性质在整个欧洲，即在群众中间，实际上还是很模糊的，德国共产主义还没有作为工人政党而存在，蒲鲁东主义很弱，还不能夸耀它的那一套特别的幻想，巴枯宁的那一套新的荒谬货色甚至在他自己的头脑里都还不存在，连英国工联的领袖们也认为可以按照章程的导言中所规定的纲领加入运动。第一个伟大的成就必然打破各个派别的这种幼稚的合作。这个成就就是巴黎公社，公社无疑是国际的精神产儿，尽管国际没有动

一个手指去促使它诞生;要国际在一定程度上对公社负责是完全合理的。当国际由于公社而在欧洲成为一种道义上的力量时,争吵马上就开始了。各个派别都想利用这个成就。不可避免的瓦解开始了。由于看到唯一真正打算按照广泛的旧纲领继续工作的人们——德国共产党人——的力量日益增长而产生的妒忌心,驱使比利时的蒲鲁东主义者投入了巴枯宁主义冒险家的怀抱。海牙代表大会实际上是一个终结,而且对于两派来说都是如此。还能够以国际的名义做出点事情的唯一的国家就是美国,因而出于健全的本能就把最高领导机关搬到那里去了。可是现在,国际在美国也没有威望了。任何想注入新生命的进一步的努力,都会是愚蠢而徒劳的。10年来,国际支配了欧洲历史的一个方面,即蕴藏着未来的一个方面,它能够自豪地回顾自己的工作。可是,它的旧形式已经过时了。要创立一个像旧国际那样的新国际,即世界各国各无产阶级政党的联盟,需要有对工人运动的普遍镇压,即像1849—1864年那样的情形。可是现在的无产阶级世界太大、太广了,要达到这一点已不可能了。我相信,下一个国际——在马克思的著作产生了多年的影响以后——将是纯粹共产主义的国际,而且将直截了当地树立起我们的原则……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874年9月12[—1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9—621页。

真正导致解放的措施,只有在经济变革促使广大工人群众意识到自身的地位,从而为他们取得政治统治开辟了道路

的时候,才有可能。

困难恰恰在于,只要政权在有产阶级手中,那么任何国有化都不是消灭剥削,而只是改变其形式;法兰西、美利坚和瑞士等共和国,同君主制的中欧和专制制度的东欧相比,情况并没有丝毫差别。为了把有产阶级赶下台,我们首先需要使工人群众的意识来一个转变,而这种转变尽管比较缓慢,但现在无疑正在进行;为了完成这种转变,需要生产方法更迅速的变革,机器用得更多,更多的工人被排挤,更多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破产,以及现代大工业的必然后果更加明显和更为普遍。

这种经济变革进行得愈迅速、愈彻底,一些措施也就愈快地成为必不可免,这些措施从表面看来只是为了缓和突然发展到深重的和难以忍受的程度的灾难,但事实上将导致现有生产方式自身基础的破坏;而工人群众将通过普选权迫使人们倾听他们的意见。到那时,首先需要的将是哪些措施,这要看当时当地的条件而定,——关于这一点,事前是无法概括地讲什么的。但是我认为,真正导致解放的措施,只有在经济变革促使广大工人群众意识到自身的地位,从而为他们取得政治统治开辟了道路的时候,才有可能。其他阶级只能干些修修补补或掩人耳目的事情。这种使工人思想明朗化的过程现在正日益迅速地向前发展,再过5至10年,形形色色的国会将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恩格斯:《恩格斯致麦克斯·奥本海姆》(1891年3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59页。

人民一旦开始独立思考,摆脱了旧的社会主义学派的传

统，很快就会找到一些社会主义的和革命的准则，同各种体系的创立者和夸夸其谈的领袖们为人民臆造出来的一切相比，这些准则能更明确地反映人民的需要和利益。

毫无疑问，巴黎人民犯了严重错误，他们没有利用废除普选权所提供的举行起义的时机。军队的情绪是好的，小生意人阶级不得不与人民一起前进，山岳党，甚至还有卡芬雅克派都懂得，在起义失败的情况下，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因此而受到损害，不管他们是否同人民站在一起。因此，一旦起义爆发，至少小生意人阶级及其议会代表山岳党在道义上的支持，在这次是有保证的，而这就可以粉碎相当一部分军队的反抗。但是，机会错过了：一方面这是由于议会领袖和报刊的怯懦，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巴黎人民现在的特殊情绪。

首都工人现在处于过渡状态。到目前为止他们中间讨论过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体系，已经不能再满足他们的要求，而且应该承认，把法国所有社会主义体系放在一起，也没有多少真正的革命性。另一方面，多次被自己的带头人蒙骗过的人民，对所有曾经充当过他们的领袖的人，都极不信任，连巴尔贝斯和布朗基也不例外，因此，他们决定不采取任何行动来使这些领袖中的任何人掌权。这样一来，整个工人阶级运动即将另有一番革命得多的景象了。人民一旦开始独立思考，摆脱了旧的社会主义学派的传统，很快就会找到一些社会主义的和革命的准则，同各种体系的创立者和夸夸其谈的领袖们为人民臆造出来的一切相比，这些准则能更明确地反映人民的需要和利益。人民会因此而成熟起来，到那时，他们会重新利用前领袖所具有的一切才能和勇敢，而不做这些领袖中任何人的尾

巴。巴黎群众的这种情绪，也就是人民对废除普选权漠不关心的原因所在。大搏斗要拖到国内两股竞争势力的一方或双方，即总统或国民议会试图推翻共和国的那天才开始。

恩格斯：《法国来信》（1850 年 6 月 22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45 页。

认识到产品是劳动能力自己的产品，并断定劳动同自己的实现条件的分离是不公平的、强制的，这是了不起的觉悟，这种觉悟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产物，而且也正是为这种生产方式送葬的丧钟……

认识到产品是劳动能力自己的产品，并断定劳动同自己的实现条件的分离是不公平的、强制的，这是了不起的觉悟，这种觉悟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产物，而且也正是为这种生产方式送葬的丧钟，就像当奴隶觉悟到他**不能作第三者的财产**，觉悟到他是一个人的时候，奴隶制度就只能人为地苟延残喘，而不能继续作为生产的基础一样。

如果我们反过来考察在货币进入价值自行增殖过程以前存在的原始关系，我们就会看到，历史上必须产生或者必须存在种种条件，才能使货币变成资本，使劳动变成设定资本即创造资本的劳动，变成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在这里是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我们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今后我们应该把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同短工等等其他劳动形式区别开来。雇佣劳动是设定资本即生产资本的劳动，也就是说，是这样的活劳动，它不但把它作为活动来实

现时所需要的那些对象条件，而且还把它作为劳动能力存在时所需要的那些客观要素，都作为同它自己相对立的异己的权力生产出来，作为自为存在的、不以它为转移的价值生产出来。）

马克思：《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1857 年底—1858 年 5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55—456 页。

因为经济斗争而忘掉政治斗争，那就是背弃了全世界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忘掉了全部工人运动史所教导我们的一切。

在俄国运用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共同的纲领时，究竟会产生哪些主要问题呢？我们已经说过，这个纲领的实质就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一斗争，而斗争的最终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分为经济斗争（反对个别资本家或个别资本家集团，争取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和政治斗争（反对政府，争取扩大民权，即争取民主和争取扩大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有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主办《工人思想报》①的那些人大概可以包

① 是俄国经济派的报纸，1897 年 10 月—1902 年 12 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等地出版，共出了 16 号。头几号由“独立工人小组”发行，从第 5 号起成为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机关报。参加该报编辑部的有尼·尼·洛霍夫-奥尔欣、康·米·塔赫塔廖夫、弗·巴·伊万申、阿·亚·雅库波娃等人。该报号召工人阶级为争取狭隘经济利益而斗争。它把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对立起来，认为政治斗争不在无产阶级任务之内，反对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主张成立工联主义的合法组织。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和《怎么办？》等著作中批判了《工人思想报》的观点。——编者注

括在内)认为经济斗争重要得多,而政治斗争则似乎可以推延到比较遥远的将来。这种见解是完全不正确的。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认为必须组织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到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即帮助工人去同厂主进行日常斗争,叫他们注意压迫的种种形式和事实,从而向他们说明联合起来的必要性。但是,因为经济斗争而忘掉政治斗争,那就是背弃了全世界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忘掉了全部工人运动史所教导我们的一切。资产阶级的忠实拥护者和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府的忠实拥护者,甚至不止一次地试图组织纯经济性的工会来引诱工人离开"政治",离开社会主义。俄国政府也很可能会采取某种类似的办法,因为它总是设法给人民小恩小惠,确切些说,假仁假义地施与人民小恩小惠,目的只是使人民不去考虑自己毫无权利和备受压迫的状况。如果工人不能像德国工人和欧洲其他一切国家(土耳其和俄国除外)工人那样享有自由集会、结社、办报纸、派代表参加人民的集会这些权利,那么任何经济斗争都不能给他们带来持久的改善,甚至不可能大规模地进行任何经济斗争。而要想获得这些权利,就必须进行**政治斗争**。在俄国,不但工人而且全体公民都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俄国是一个专制君主制即无限君主制的国家。沙皇独自颁布法律,任命官吏,监督官吏。因此,看来**好像**俄国沙皇和沙皇政府不从属于任何阶级,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但是**实际上**所有的官吏都来自有产者阶级,而且都受大资本家的支配。大资本家可以任意驱使各个大臣,可以为所欲为。俄国工人阶级受着双重压迫:他们受资本家和地主的抢劫和掠夺,为了使他们不能反抗,警

察还把他们的手脚束缚起来，把他们的嘴堵住，对一切试图维护民权的人进行迫害。每次反对资本家的罢工都会引起军警对工人的袭击。一切经济斗争都必然要变成政治斗争，所以社会民主党应该把这两种斗争紧紧地结合成**无产阶级统一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的首要目的应该是争取政治权利，**争取政治自由**。

列宁：《为〈工人报〉写的文章》（不早于1899年10月），《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276页。

社会主义是由思想家输送到在资本主义关系的基础上自发地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

“认为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这句话似乎是把社会主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划成等号。这样划等号**是完全不正确的**。正是在现在，当人们对“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非常普遍地理解得**极其狭隘**的时候，提出这样的公式简直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只有把“阶级利益”理解得**非常广泛**，才能勉强地承认这个公式。“阶级利益”迫使无产者联合起来，同资本家作斗争，考虑自己解放的条件。“阶级利益”使他们易于接受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思想体系，它服从思想体系的发生、发展和巩固的一般条件，就是说，社会主义以人类知识的一切材料为基础，以科学的高度发展为先决条件，要求科学的工作等等，等等。社会主义是由思想家**输送到**在资本主义关系的基础上自发地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

列宁:《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协会”的信》(1902年4月),《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1—352页。

……不能因为无产阶级参加完成当前的民主主义任务,就使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阶级特性模糊起来。

在起草土地纲领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关于资产阶级的和资本主义正在发展的俄国农村中的农奴制残余问题,是已经解决了的,只是由于社会革命党人毫无原则,他们才看不到,要进行**实质性**的批评,就应当针对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哪怕提出一种条理分明的完整的东西来。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任务就是要避免走两个极端:一方面不要犯有些人所犯的那种错误,即认为从无产阶级的观点来看,任何当前的临时性的非无产阶级的任务都和我们无关;另一方面,不能因为无产阶级参加完成当前的民主主义任务,就使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阶级特性模糊起来。

列宁:《答对我们纲领草案的批评》(1903年7月15日〔28日〕以前),《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0页。

……俄国无产阶级已经成熟了,它不仅能够同野蛮的暴力作斗争,而且能够同自由立宪的伪善作斗争。

什么是宪法?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真正承认这些权利的保证在哪里呢?在于人民中那些意识到并且善于争取这些权利的各阶级的**力量**。我们不会受空话的迷惑——只有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饶舌家们才会这样——我们一

分钟也不会忘记，**力量只能**以斗争的胜利来证明，而我们还远远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我们不会相信动听的词句：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一方面，公开的斗争正在进行，一切词句和一切诺言都立刻受到事实的检验；另一方面，有人正在用立宪的词句、宣言、许诺来愚弄人民，竭力削弱人民的力量，瓦解人民的队伍，促使人民解除武装。再没有什么比这一类诺言和词句更虚伪的了，而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俄国无产阶级已经成熟了，它不仅能够同野蛮的暴力作斗争，而且能够同自由立宪的伪善作斗争。证据就是国外报纸不久以前报道过的那份铁路员工的传单（可惜我们没有原件）。这份传单说，同志们，收集武器，组织起来，以十倍的毅力不懈地斗争吧。只有武装起来和团结自己的队伍，我们才能保卫住我们所取得的成果，才能完全实现我们的要求。在时机到来的时候，我们大家又会像一个人一样起来为完全的自由去进行新的更加顽强的斗争。

列宁：《两次会战之间》（1905 年 11 月 2 日〔15 日〕），《列宁全集》第 12 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0—51 页。

我们主要的和基本的任务是：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发展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组织。

我们主要的和基本的任务是：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发展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组织，因为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是唯一能够引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领袖。因此，在整个选举运动和整个杜马运动中，保持阶级

的独立性是我们最重要的总任务。这并不否定其他的局部任务，但是其他的局部任务始终应当服从这个总任务，适应这个总任务。这个总前提既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证实，也为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全部经验所证实，无疑应当成为我们的出发点。

列宁：《社会民主党和选举协议》（1906年11月），《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4页。

……提高群众的公民意识和阶级意识，组织群众去完成独立的斗争任务……

俄国革命的真正的根本的危险是农民群众不开展，他们在斗争中不坚定，他们不了解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全部空虚性和全部叛变性。向这种危险进行斗争吧，把全部真相公开地彻底地告诉全体人民群众吧。这样，你们将把人民群众从夸夸其谈的立宪民主党人那里引开而把他们吸引过来支持社会民主党。这样，也只有这样，你们才能消除真正的黑帮危险。任何参议院的说明，任何刑罚，任何逮捕，都阻挡不住我们在人民中进行**这样的**工作：提高群众的公民意识和阶级意识，组织群众去完成独立的斗争任务，而不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斗争任务。

列宁：《政治形势和工人阶级的任务》（1906年12月24日〔1907年1月6日〕），《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7页。

无产阶级除了提高群众的阶级意识加强群众的团结、用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育群众以外，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别的办

法来阻止小资产阶级的动摇。

孟什维克的背叛给我们的选举工作带来了困难，但是，**社会民主党的独立运动**的原则意义就**更加重要了**。无产阶级除了提高群众的阶级意识加强群众的团结、用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育群众以外，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别的办法来阻止小资产阶级的动摇。

列宁：《社会民主党和杜马选举》（1907 年 1 月 13—14 日〔26—27 日〕），《列宁全集》第 14 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67 页。

……要用各种办法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明确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他们的革命决心并增强他们在各方面的组织性。

从党团活动的内容来看，必须指出：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活动的目的与其他**一切**政党活动的目的根本不同。无产阶级政党所追求的不是同当权派勾勾搭搭，讨价还价，不是徒劳地对农奴主和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制度修修补补，而是要用各种办法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明确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他们的革命决心并增强他们在各方面的组织性。党团活动的每个步骤都应该服从这个根本目的。因此，应当更加重视在杜马讲坛上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应当尽力更经常地在杜马讲坛上发表演说，宣传社会主义的，而且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和目标。其次，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继续进行的情况下，极为重要的是要使杜马党团坚持经常同攻击‘解放运动’的反革命潮流作斗争，同斥责革命、诋毁革命

以及革命的目的和方法等等的各种思潮(公开的反动派、自由派,特别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思潮)作斗争。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党团应当高举革命的旗帜,高举领导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进阶级的旗帜。

列宁:《〈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文献》(1909 年 6—7 月),《列宁全集》第 19 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2—23 页。

谁要是想从俄国革命的伟大教训学到东西,谁就应当了解,只有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谁要是想从俄国革命的伟大教训学到东西,谁就应当了解,只有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只有把这个阶级组织起来,只有把无产阶级政党中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清洗出去,清除他们特有的无原则性、动摇性和软弱性,才能而且一定能重新引导人民去战胜罗曼诺夫王朝。

列宁:《俄国恐怖主义者飞黄腾达的一生》(1911 年 1 月 13 日〔26 日〕),《列宁全集》第 20 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99 页。

1848 年革命给了马克思以前的所有这些喧嚣一时、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形式以致命的打击。

在第一个时期的开头,马克思学说决不是占统治地位的。它不过是无数社会主义派别或思潮中的一个而已。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那些基本上同我国民粹主义相似的社会主义:它们不懂得历史运动的唯物主义原理,不能分别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阶级的作用和意义,并且用各种貌似社会主义的

关于“人民”、“正义”、“权利”等等的词句来掩盖各种民主变革的资产阶级实质。

1848年革命给了马克思以前的所有这些喧嚣一时、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形式以致命的打击。各国的革命使社会各阶级在行动中显露出自己的面目。共和派资产阶级在巴黎1848年6月的那些日子里枪杀工人,最终证明只有无产阶级具有社会主义本性。自由派资产阶级害怕这个阶级的独立行动,比害怕任何反动势力还要厉害百倍。怯懦的自由派在反动势力面前摇尾乞怜。农民以废除封建残余为满足,转而支持现存秩序,只是间或动摇于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自由派之间。一切关于非阶级的社会主义和非阶级的政治的学说,都是胡说八道。

巴黎公社(1871年)最终结束了资产阶级变革的这一发展过程;只是靠无产阶级的英勇,共和制这种最明显地表现出阶级关系的国家组织形式才得以巩固下来。

在欧洲所有的其他国家,比较错综复杂和不那么彻底的发展过程也导致同样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形成。到第一个时期(1848—1871年)即风暴和革命时期的末尾,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已奄奄一息。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第一国际(1864—1872年)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诞生了。

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1913年3月16日〔14日〕),《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306页。

工人们要想成为有觉悟的工人,应该阅读约·狄慈根的

著作但一刻也不要忘记，他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并不总是正确的，只有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才能学到哲学。

为了评价资产阶级哲学即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包括“马赫主义”）的一切追随者，记住这一点是必要的，因为这些人正想抓住约·狄慈根观点上的“**某种混乱**”。约·狄慈根本人是会嘲笑和唾弃这种崇拜者的。

工人们要想成为有觉悟的工人，应该阅读约·狄慈根的著作但一刻也**不要忘记**，他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并不总是正确的**，只有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才能**学到**哲学。

约·狄慈根是在简单化的、庸俗的**唯物主义**传播最广的时期从事写作的。所以，约·狄慈根特别强调唯物主义的历史演变，强调唯物主义的**辩证**性质，即强调必须从发展的观点出发，必须懂得人的每一种认识的相对性，必须懂得世界上一切现象的全面联系和相互依存，必须把自然历史唯物主义提高到唯物主义历史观。

列宁：《纪念约瑟夫·狄慈根逝世二十五周年》（1913年5月5日〔18日〕），《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2页。

社会主义者不能局限于一般民主主义的要求。社会主义者要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各种各样的表现作斗争，不管它是赤裸裸的还是精心打扮过的。

这个口号（俄国犹太民族主义的**一切资产阶级**政党都捍卫这个口号）是同社会民主党的**国际主义**相抵触的。我们作为民主主义者，决不容许对任何民族实行任何哪怕是极轻微

的压迫,决不容许任何一个民族享有任何特权。我们作为民主主义者,要求**政治意义上的**民族自决的自由(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即分离的自由。我们要求国内各民族绝对**平等**,并且要求无条件地保护一切少数民族的权利。我们要求广泛的自治并实行区域自治,自治区域也应当根据民族特征来划分。

所有这些要求是一切彻底的民主主义者特别是社会主义者所必须坚持的。

但是社会主义者不能局限于一般民主主义的要求。社会主义者要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各种各样的表现**作斗争**,不管它是赤裸裸的还是精心打扮过的。要**把同一**民族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而**把不同**民族的无产阶级**分裂开来的**"民族文化自治"口号,正是这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表现。

社会民主党人过去和现在都坚持**国际主义**的立场。我们不许农奴主和警察国家侵犯各民族的平等,但是我们所拥护的并不是"**民族文化**",而是**国际**文化,国际文化只包含每个民族文化中的一部分,即每个民族文化中具有彻底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内容的那一部分。

列宁:《向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纲领草案》(1913 年 5 月 25 日〔6 月 7 日〕以前),《列宁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14—215 页。

……促进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这是指不要仅仅局限于议会斗争手段,要使群众进一步意识到在战争必然引起危机

的时候必须采取革命的行动方式,最后,要使群众比较深切地意识到工人的国际团结,意识到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虚伪性。

根据这些条件才能选择斗争手段,同时这一斗争的目的不应当是(这是爱尔威思想的第三个误解或考虑欠周的地方)单纯以和平来代替战争,而应当是以社会主义来代替资本主义。问题的实质不在于仅仅防止战争的爆发,而在于利用战争所产生的危机加速推翻资产阶级。但是,在爱尔威思想中尽管充斥半无政府主义谬论,却也包含了一个实际上正确的内容:促进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这是指不要仅仅局限于议会斗争手段,要使群众进一步意识到在战争必然引起危机的时候必须采取革命的行动方式,最后,要使群众比较深切地意识到工人的国际团结,意识到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虚伪性。

列宁:《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1907 年 9 月和 10 月之间),《列宁全集》第 16 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84 页。

工人和旧社会之间从来没有一道万里长城。工人同样保留着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心理。

现在我们仅仅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不够了。工会必定要国家化,工会必定要和国家政权机关合并起来,建设大生产的任务必定要完全转到工会的手里。但是这一切还不够。

我们还应该考虑到我们的实际经验,以便确定下一个步骤。这才是我们今天工作的重点。决议案谈到下一步怎么办时说,假如工会现在就想擅自行动,担负起国家政权的职能,

那只会弄得一团糟。这种一团糟已经使我们吃尽苦头。我们同深深盘踞在工人意识中的万恶的资产阶级制度的余毒、同工人身上的小私有者的倾向(半是无政府主义倾向,半是利己主义倾向)已经作过不少的斗争。

工人和旧社会之间从来没有一道万里长城。工人同样保留着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心理。工人在建设新社会,但他还没有变成新人,没有清除掉旧世界的污泥,他还站在这种没膝的污泥里面。现在只能幻想把这种污泥清除掉。如果以为这可以马上办到,就是十足的空想,就是在实际上把社会主义世界移到半空中去的空想。

不,我们不是这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是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壤上进行建设的,是在同劳动者身上同样存在的、经常拖无产阶级后腿的一切弱点和缺点作斗争中进行建设的。在这场斗争中常常碰到小私有者那种各人顾各人的旧习惯、旧习气,"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旧口号仍然在作怪。这种情形在每个工会、每个工厂里真是太多了,它们往往只顾自己,至于别人,那就让上帝和首长去照顾吧。这种情况我们是看到了,亲身体验到了,它使我们犯过许多错误,犯过许多严重的错误。有鉴于此,我们要告诫同志们,在这方面万万不可擅自行动。我们认为,那样做将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是我们大家向资本主义的恶习屈服。

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 年 1 月 20 日),《列宁全集》第 35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38—439 页。

工人政党的荣誉要求它自己甚至在幻想被经验驳倒以前，就抛弃这种空中楼阁。工人阶级要不是革命的，就什么也不是。

“……社团以及由社团成长起来的工会，不仅作为组织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手段，是极其重要的——这种重要性，例如，表现在下面这件事实上：甚至有选举权和共和国的美国工人也还是少不了工会——，而且在普鲁士和整个德国，联合权除此而外还是警察统治和官僚制度的一个缺口，它可以摧毁奴仆规约和贵族对农村的控制，总之，这是使‘臣民’变为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进步党，也就是说普鲁士的任何资产阶级反对党，只要没有发疯，都会比普鲁士政府，尤其是比俾斯麦政府快一百倍地表示同意！与此相反，普鲁士王国政府对合作社的帮助——凡是了解普鲁士情况的人，都预料得到，帮助的规模必然是很小的——作为经济措施，完全等于零，同时这种帮助将会扩大监护制，收买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并使运动受到阉割。普鲁士的资产阶级政党由于深信随着‘新纪元’的到来政权会因摄政王的恩典而落在自己手里，才使自己出了丑并且落到了目前这步田地，同样，工人政党如果幻想在俾斯麦时代或任何其他普鲁士时代金苹果会因国王的恩典而落到自己嘴里，那就要出更大的丑。毫无疑问，拉萨尔关于普鲁士政府会实行‘社会主义’干涉的不幸幻想将使人大失所望。事物的逻辑必然如此。但是，工人政党的**荣誉**要求它自己甚至在幻想被经验驳倒以前，就抛弃这种空中楼阁。工人阶级要不是革命的，就什么也不是。”

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1865年2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7—78页。

……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同时毫的机会主义说教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而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来说,由于存在三种时常被人忘记的情况,理论的意义就显得更为重要了。这三种情况就是:第一,我们的党还刚刚在形成,刚刚在确定自己的面貌,同革命思想中有使运动离开正确道路危险的其他派别进行的清算还远没有结束。相反,正是在最近时期,非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别显得活跃起来了(这是阿克雪里罗得早就对"经济派"说过的)。在这种条件下,初看起来似乎并"不重要的"错误也可能引起极其可悲的后果;只有目光短浅的人,才会以为进行派别争论和严格区别各派色彩,是一种不适时的或者多余的事情。这种或那种"色彩"的加强,可能决定俄国社会民主党许多许多年的前途。

第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就其本质来说是国际性的运动。这不仅意味着我们应当反对民族沙文主义。这还意味着在年轻的国家里开始的运动,只有在运用别国的经验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发展。但是,要运用别国的经验,简单了解这种经验或简单抄袭别国最近的决议是不够的。为此必须善于用批判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经验,并且独立地加以检验。只要想一想现

代工人运动已经有了多么巨大的成长和扩展，就会懂得，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需要有多么雄厚的理论力量和多么丰富的政治经验（以及革命经验）。

第三，俄国社会民主党担负的民族任务是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党都不曾有过的。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把全体人民从专制制度压迫下解放出来这个任务所赋予我们的种种政治责任和组织责任。现在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就是**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读者如果想要稍微具体地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请回想一下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者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70年代的那一批杰出的革命家；就请想想俄国文学现在所获得的世界意义；就请……只要想想这些也就足够了！

列宁：《怎么办？》（1901年秋—1902年2月），《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312页。

（三）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领导权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这种**乌托邦，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想使全部运动都服从于运动的一个阶段，用个别学究的头脑活动来代替共同的社

会生产，而主要是幻想借助小小的花招和巨大的感伤情怀来消除阶级的革命斗争及其必要性；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实质上只是把现代社会理想化，描绘出一幅没有阴暗面的现代社会的图画，并且不顾这个社会的现实而力求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当无产阶级把这种社会主义让给小资产阶级，而各种社会主义首领之间的斗争又表明每个所谓体系都是特意强调社会变革中的一个过渡阶段以与其他各个阶段相对抗时，**无产阶级**就愈益团结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被资产阶级用**布朗基**来命名的**共产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49 年底—1850 年 3 月底和 1850 年 10 月—11 月 1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19—220 页。

……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能因为听信民主派小资产者的花言巧语而动摇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组织的信念。

但是，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终胜利，首先还必须靠他们自己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能因为听信民主派小资产者的花言巧语而动摇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组织的信念。他们的战斗

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 年 3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96 页。

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我们两人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中;我们已经在知识分子中间,特别在德国西部的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一些人的拥护,并且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建立了广泛联系。

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阶级划分,从而摆脱阶级斗争,就不能争得自身的解放。因此,共产主义现在已经不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

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我们两人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中;我们已经在知识分子中间,特别在德国西部的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一些人的拥护,并且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建立了广泛联系。我们有义务科学地论证我们的观点,但是,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争取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争取德国无产阶级拥护我们的信念。我们明确了这一点以后,就立即着手工作了。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1885 年 10 月 8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97 页。

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

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

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是无益的,甚至还要更坏。只要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还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 年德文第二版序言》(1892 年 7 月 21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23 页。

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没有教养,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必须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

至于我们,那么,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 40 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制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没有教养,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必须

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如果党的新机关报将采取符合这些先生们的观点的立场，即采取资产阶级的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立场，那么很遗憾，我们就没有别的路可走，而只好公开对此表示反对，并结束我们在同国外的关系方面一向代表德国党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和你们的团结一致。但愿事情不至于弄到这种地步。

马克思、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利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1879 年 9 月 16 日—18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62—363 页。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否认或不了解领导权思想的阶级就不是阶级，或者还不是阶级，而是行会，或者是各种行会的总和。

列维茨基先生把领导权同阶级政党对立起来，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仅仅这个对立就足以说明，《我们的曙光》杂志实际上所信奉的那个政党，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而是由自由主义者组成的。在全世界，只有自由派的理论家（只要回想一下桑巴特和布伦坦诺就行了）像列维茨基“理解”的那样来理解工人的阶级政党。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否认或不了解领导权思想的阶级就不是阶级，或者还不是阶级，而是行会，或者是各种行会的总和。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我们的曙光〉杂志》（1911 年 1 月 22 日〔2 月 4 日〕以后），《列宁全集》第 20 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11 页。

既然他们(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是带着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思想和愿望来的,那就不能忘记,无产阶级如果向这些思想和愿望做出让步,它就无法完成自己的历史的领导使命。

小资产者和农民的大批涌入的确证明,运动有了极大的成就,但是同时这对运动也是危险的,只要人们忘记,这些人是被迫而来的,他们来,仅仅是因为迫不得已。他们的加入表明,无产阶级已经确实成为领导阶级。但是,既然他们是带着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思想和愿望来的,那就不能忘记,无产阶级如果向这些思想和愿望作出让步,它就会丧失自己的历史的领导使命。

恩格斯:《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79年1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9—640页。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争取推翻资产阶级压迫的斗争的自觉代表,它的基本任务是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揭露资产阶级民主的欺骗和虚伪……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争取推翻资产阶级压迫的斗争的自觉代表,它的基本任务是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揭露资产阶级民主的欺骗和虚伪,因而在民族问题上也不应当把提出抽象的和形式上的原则当作主要之点,主要之点应当是:第一,准确地估计具体的历史情况,首先是经济情况;第二,把被压迫阶级、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同笼统说的民族利益这样一种意味着统治阶级利益的一般概念,明确地区分开来;第三,把被压迫的、附属的、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同压迫的、剥削的、享有充

分权利的民族也明确地加以区分。这同资产阶级民主的谎言是截然相反的,这种谎言掩盖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的时代所特有的现象,即为数无几的最富裕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大多数人实行殖民奴役和金融奴役。

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1920 年 6—7 月),《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16—217 页。

……工人政党应当对斗争的双方采取什么态度?这首先取决于工人政党,即工人阶级中已经意识到共同的阶级利益的那部分人,为了阶级的利益而力求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在旧的古老社会的残余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不论何处,迟早都会有斗争双方向无产阶级寻求支持的时候。这个时候通常也就是工人阶级自己开始进行行动的时候。正在衰亡的社会的封建和官僚代表号召工人同他们一起向吸血鬼即工人的唯一敌人资本家进攻;而资产者向工人指出,他们共同代表着新的社会时代,因此面对正在衰亡的旧社会形态,他们的利益无论如何是一致的。这时工人阶级也逐渐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特殊的阶级,有着特殊的利益和特殊的独立的未来;由此在英国、法国和德国都相继产生了一个问题:工人政党应当对斗争的双方采取什么态度?

这首先取决于工人政党,即工人阶级中已经意识到共同的阶级利益的那部分人,为了阶级的利益而力求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1865 年 1 月 27 日—2 月 11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04 页。

没有这些自由，工人政党自己就不能获得行动的自由；争取这些自由的斗争，同时也就是工人政党争取自己本身生存条件、争取自己呼吸所需空气的斗争。

我们认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新时代的两个产儿，它们在各自的社会活动中都力求清除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残渣。虽然它们彼此之间应当进行激烈的斗争，但是只有在它们彼此是单独地对立的时候，这一斗争才能进行到底。只有把旧的破烂东西抛出船外，“船才能做好战斗准备”，只不过这一次战斗不是在两只船之间展开，而是在同一条船上，在军官和水兵之间展开。

如果不同时把武器交给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就不能争得自己的政治统治，就不能通过宪法和法律体现出这种政治统治。它应当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人权来反对按出身划分的各种旧的等级，写上贸易自由和工业自由来反对行会制度，写上自由和自治来反对官僚监督。资产阶级应当干脆要求直接的普选权、新闻出版自由、结社和集会自由，要求废除针对居民中各个阶级的一切非常法。然而这一切也是无产阶级应当向资产阶级要求的。无产阶级不能要求资产阶级不再是资产阶级，但是完全可以要求资产阶级彻底贯彻自己的原则。这样无产阶级也就能得到为取得彻底胜利所必需的全部武器。它借助新闻出版自由、集会权和结社权可以为自己争得普选权，而借助直接的普选权，再加上上面所说的宣传鼓动手段，就可以争得其余的一切。

因此，**在资产阶级还自己忠于自己时**，支持它同一切反动分子进行斗争，对工人是有利的。资产阶级从反动派那里夺

来的每个成果,在这种条件下归根到底是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德国工人也有这种优秀的本能。他们在德国各邦到处都完全正确地投票支持那些有希望当选的最激进的候选人。

但是,如果资产阶级自己背叛自己,如果它出卖自己本身的阶级利益和由此而产生的原则,那该怎么办呢?

那时工人还有两条道路可走!

一条道路是违背资产阶级的意愿推动它向前进,尽可能地迫使它扩大选举权,保障新闻出版自由、结社和集会自由,从而为无产阶级创造取得行动自由和组织自由的条件。1832年改革法案以来的英国工人、1830年七月革命以来的法国工人都是这样做的,他们正是通过并且借助这一运动——它的最近目的具有纯资产阶级的性质——比通过其他途径更有成效地促进了自己的发展和组织。这种情况终究会发生,因为资产阶级在缺乏政治勇气的情况下随时随地都会背叛自己。

另一条道路是工人完全退出资产阶级运动,让资产阶级听天由命。1848—1850年欧洲工人运动失败后,这种情况在英国、法国和德国都发生过。这种情况只有在工人尽了巨大努力而在当时又没有收到效果、工人阶级需要一个喘息机会时才可能发生。在工人阶级处于正常的状况下,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要知道,这样做等于是在政治上完全弃权,而一个本性就是勇敢的阶级,一个没有什么可以丧失并应当获得一切的阶级,决不能长时间这样做。

即使在最严重的情况下,当资产阶级由于害怕工人而躲到反动派的背后,并且为了抵御工人而求救于它的敌对分子的时候,——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工人政党也只能丢开资产者,

继续进行资产者背弃了的争取资产阶级自由、新闻出版自由、集会权和结社权的宣传鼓动。没有这些自由，工人政党自己就不能获得行动的自由；争取这些自由的斗争，同时也就是工人政党争取自己本身生存条件、争取自己呼吸所需空气的斗争。

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1865年1月27日—2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114页。

要使工人摆脱旧政党的这种支配，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政党要有它自己的政策，这种政策将同其他政党的政策显然不同，因为它必须表现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

各地的经验都证明，要使工人摆脱旧政党的这种支配，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政党要有它自己的政策，这种政策将同其他政党的政策显然不同，因为它必须表现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这种政策的细节可以根据每一个国家的特殊情况而有所不同；但是，因为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基本关系到处都一样，有产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这一事实到处都存在，所以无产阶级政策的原则和目的就总是一样的，至少在一切西方国家中是这样。有产阶级，即土地贵族和资产者，使劳动人民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这不仅靠他们的财富的力量，不仅靠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而且还靠国家的力量，靠军队、官僚和法庭。如果放弃在政治领域中同我们的敌人的斗争，那就是放弃了一种最有力的行动手段，特别

是组织和宣传的手段。普选权赋予我们一种卓越的行动手段。

恩格斯:《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1871 年 2 月 13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304 页。

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

这里应该谈到的首先是纲领的策略部分。这一部分一般指出: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①

……

"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85 页。——编者注

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①

恩格斯：《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48—1849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0—181页。

只有最能理解我们眼前进行的阶级斗争的内在含义的人即共产党人，才会最少犯赞同或鼓励宗派主义的错误。

寄上给昂·韦累先生的全权委托书。让他不要给正在筹建的新支部起任何**宗派主义的“名称”**，不管是“共产主义的”还是任何别的名称。在国际协会中必须避免宗派主义的**“标签”**。工人阶级的共同愿望和意向是从它所处的现实条件中产生的。正因为如此，这种愿望和意向为整个阶级所共有，尽管在工人的意识中运动以极其多样的形式反映出来，有的幻想性较多，有的幻想性较少，有的较多符合于这些现实条件，有的较少符合于这些现实条件。因此，只有最能理解我们眼前进行的阶级斗争的内在含义的人即共产党人，才会最少犯赞同或鼓励宗派主义的错误。

马克思：《马克思致保·拉法格》（1870年4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58—659页。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页。——编者注

……建立这个党(无产阶级的党)就是为了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为了捍卫和实现一种明确的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无产阶级的党是一个自由的联盟,建立这个党就是为了同资产阶级"思想"(应读作:意识形态)作斗争,为了捍卫和实现一种明确的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这是起码的常识。

列宁:《论"前进派分子"的派别组织》(1910年8月30日〔9月12日〕),《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9页。

为了实现这个任务,必须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保持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

必须使全体城乡劳动群众以及军队认清目前政府的真面目和它对待迫切问题的真实态度。必须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并把工人武装起来;必须使无产阶级组织也在军队(新政府也答应给军队政治权利)和农村中建立起来;尤其必须成立农业雇佣工人的单独的阶级组织。

只有使最广大的居民群众了解真相并把他们组织起来,才能保证革命下一阶段的完全胜利,才能保证工人政府夺得政权。

这个任务在革命时期和在战争的沉痛教训的影响下,能够在比平常短得多的时间内为人民所理解。为了实现这个任务,必须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保持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这个政党始终忠于国际主义,不听信资产阶级用来欺骗人民

的谎话，即关于在目前这场帝国主义掠夺性战争中“保卫祖国”的种种言论。

列宁：《1917年3月4日（17日）的提纲草稿》（1917年3月4日〔17日〕），《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问题不在于走得多快，而在于往哪里走。

问题不在于走得多快，而在于往哪里走。

问题不在于工人是否经过训练，而在于**怎样**训练他们和**为什么**训练他们。

工人代表苏维埃关于战争等等的宣言和号召书，不过是麻醉人民的极其空洞和虚伪的小资产阶级谰言，因此我们的任务，正像我已经说过的，首先是启发群众，使群众摆脱齐赫泽、斯切克洛夫、策列铁里之流的**资产阶级**影响。

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即齐赫泽、策列铁里、斯切克洛夫等人的“革命护国主义”是极端有害的（因为是用甜言蜜语掩盖起来的）沙文主义思潮，它**企图**使群众容忍临时革命政府。

愚钝的，不觉悟的，被齐赫泽、策列铁里、斯切克洛夫之流的先生们欺骗的群众，不理解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不理解战争是由**各国政府**进行的。

必须讲清楚，只有改变政府的**阶级性质**，“人民”才能停止战争或改变战争的性质。

列宁：《为论证四月提纲写的要点》（1917年4月4日和12日〔17日和25日〕之间），《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页。

启发群众的觉悟，揭露用革命誓言欺骗群众的行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分析这一革命中究竟发生了和发生着怎样的阶级变动。

任何革命，只要是真正的革命，都可以归结为阶级变动。因此，启发群众的觉悟，揭露用革命誓言欺骗群众的行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分析这一革命中究竟发生了和发生着怎样的阶级变动。

在1904—1916年，即沙皇制度最后十几年，俄国的阶级对比关系表现得特别鲜明。以尼古拉二世为首的一小撮农奴主—地主掌握了政权，他们同那些获得欧洲闻所未闻的暴利并且签订对自己有利的掠夺性外交条约的金融资本巨头结成了最紧密的联盟。

以立宪民主党人为首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处于反对派的地位。它害怕人民比害怕反动势力还要厉害，通过同君主制的妥协逐步接近于取得政权。

人民，即工人和农民，连同被迫转入地下的领导者是革命的，是无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派”。

1917年2月27日的革命扫除了君主制，使自由派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自由派资产阶级直接同英法帝国主义者达成协议，曾经想搞一个小小的宫廷政变。它决不想超越有选举资格限制的立宪君主制。当革命真正发展到要彻底消灭君主制并建立苏维埃（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时候，自由派资产阶级就完全成了反革命的阶级。

列宁：《阶级变动》（1917年6月27日〔7月10日〕），《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8页。

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却把工人的党教育成为一群脱离群众而代表工资优厚的工人的人物，只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苟且偷安”，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自己的长子权，也就是放弃那领导人民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作用。

无产阶级需要国家政权，中央集权的强力组织，暴力组织，既是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是为了领导广大民众即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者来“调整”社会主义经济。

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的党，也就是教育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指导并组织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剥削劳动者在不要资产阶级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反之，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却把工人的党教育成为一群脱离群众而代表工资优厚的工人的人物，只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苟且偷安”，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自己的长子权，也就是放弃那领导人民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作用。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132页。

共产党人要竭尽全力来指导工人运动以及整个社会发展沿着最直最快的道路走向苏维埃政权在全世界的胜利，走向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然而，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来像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误。

共产党人要竭尽全力来指导工人运动以及整个社会发展沿着最直最快的道路走向苏维埃政权在全世界的胜利，走向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然而，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来像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误。只要像德国和英国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那样，说我们只承认一条道路，一条笔直的道路，说我们不容许机动、通融和妥协，这就犯了错误，这种错误会使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最严重的危害，而且共产主义运动部分地已经受到或正在受到这种危害。右倾学理主义固执地只承认旧形式，而不顾新内容，结果彻底破产了。左倾学理主义则固执地绝对否定某些旧形式，看不见新内容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不知道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就是要掌握一切形式，学会以最快的速度用一种形式去补充另一种形式，用一种形式去代替另一种形式，使我们的策略适应并非由我们的阶级或我们的努力所引起的任何一种形式的更替。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0—211页。

不仅要争取和引导整个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绝大多数，而且要争取和引导全体受资本剥削的劳动者跟着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共产党走。

要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第一阶级）战胜资本主义，必须由无产阶级这一唯一真正革命的阶级完成下面三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推翻剥削者，首先是推翻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

上的主要代表——资产阶级;彻底粉碎他们;镇压他们的反抗;使他们恢复资本压迫和雇佣奴隶制的任何尝试都不能得逞。第二个任务是:不仅要争取和引导整个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绝大多数,而且要争取和引导全体受资本剥削的劳动者跟着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共产党走;要在反对剥削者的英勇忘我、坚决无情的斗争的进程中,启发他们,组织他们,教育他们,培养他们的纪律性;要使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绝大多数人摆脱对资产阶级的依赖,使他们根据实际经验相信无产阶级和它的革命先锋队的领导作用。第三个任务是:使几乎在一切先进国家里人数还相当多的(虽然只占人口的少数)必然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资产阶级民主和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农业、工业和商业中的小业主阶级以及和这个阶级地位相当的知识分子、职员等阶层保持中立,或者使他们不起有害的作用。

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1920 年 6—7 月),《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35—236 页。

人们的缺点多半是同人们的优点相联系的。许多担任领导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缺点就是如此。

老早就有人指出过:人们的缺点多半是同人们的优点相联系的。许多担任领导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缺点就是如此。我们几十年来从事伟大的事业,宣传推翻资产阶级,教导大家不要相信资产阶级专家,揭露这些专家,从他们手中夺取权力,镇压他们的反抗。我们所进行的事业是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

的伟大的事业。然而，只要稍微一夸大，就会证实一条真理：从伟大到可笑只有一步之差。我们已经说服了俄国，我们已经为劳动者从剥削者手里夺回了俄国，我们已经把剥削者镇压下去，现在我们应当学会管理俄国。为此就必须学会谦虚，学会尊重那些“科学和技术专家”的切实工作，为此就必须学会切实仔细地分析我们的许多实际错误，并且学会一步一步地坚持不懈地改正这些错误。少来一些知识分子的和官僚主义者的自负，多研究些我们在中央和地方的实际经验所提供的东西以及科学已经向我们提供的东西吧。

列宁：《论统一的经济计划》（1921 年 2 月 21 日），《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42—443 页。

……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即共产党，才能团结、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

马克思主义教导说——这一教导不仅已经由整个共产国际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 年）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的决议中正式加以肯定，而且也已经为我国革命的实践所证实——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即共产党，才能团结、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而只有这个先锋队才能抵制这些群众中不可避免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抵制无产阶级中不可避免的种种行业狭隘性或行业偏见的传统和恶习的复发，并领导全体无产阶级的一切联合行动，也就是说在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并且通过无产阶级领导全体劳动群众。不这样，便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文献》(1921年3月),《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4页。

……我们的党有一天不得不出来执政,而归根结蒂是去实行那些并不直接符合我们的利益,而是直接符合一般革命的利益、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东西。

……我们的党有一天不得不出来执政,而归根结蒂是去实行那些并不直接符合我们的利益,而是直接符合一般革命的利益、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大众的压力下,由于被我们自己所发表的、或多或少地已被曲解的、而且在党派斗争中多少带着激昂情绪提出来的声明和计划所约束,我们将不得不进行共产主义的实验,并实行跳跃,但这样做还不是时候,这一点我们自己知道得非常清楚。

恩格斯:《恩格斯致约·魏德迈》(1852年4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87页。

我们的人在理论方面比拉萨尔派的领袖高明一百倍,而在政治机警性方面却差一百倍;"诚实的人"又一次受到了不诚实的人的极大的欺骗。

我们的党在理论方面,即在对纲领有决定意义的方面,**绝对没有什么要向拉萨尔派学习的**,而拉萨尔派倒是应当向我们的党学习;合并的第一个条件是,他们不再做宗派主义者,不再做拉萨尔派,也就是说他们首先即使不完全放弃国家帮

助这剂救世灵药，也要承认它同其他许多可能采取的措施一样是个附属的过渡措施。纲领草案证明，我们的人在理论方面比拉萨尔派的领袖高明一百倍，而在政治机警性方面却差一百倍；“诚实的人”①又一次受到了不诚实的人的极大的欺骗。

恩格斯：《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75年3月18—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9—120页。

暂时处于少数——在组织上——而有正确的纲领，总比没有纲领而只是表面上拥有一大批虚假的拥护者要强得多。我们一辈子都处于少数，我们觉得这样也非常好。

至于工团，那么，如果把每一个同英国工联一样，只为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而斗争，根本不关心运动的罢工协会，——如果把所有这些协会都列入工人政党，那么实际上会组成一个维护雇佣劳动，而不是消灭雇佣劳动的党。正如马克思告诉我的，巴黎的这些工团多数甚至比英国工联更次。为了迎合这些人而放弃任何党纲，是不能带领他们前进的。真是闻所未闻：一个没有纲领的党，一个这样的党，根据它的含含糊糊的绪论（完全是按照也相信共产主义可以在五百年以后实现的“共产主义者”米凯尔的精神制订的）势必得出结论，每一个小组都可以制造它自己的纲领！

……

① 人们把爱森纳赫派称为“诚实的人”。——编者注

巴枯宁主义者也是这样做的。据拉法格说,可能派只是在蒙马特尔才真正有些势力,并且在那里也组织得很好。

暂时处于少数——在组织上——而有正确的纲领,总比没有纲领而只是表面上拥有一大批虚假的拥护者要强得多。我们一辈子都处于少数,我们觉得这样也非常好。巴黎的组织数量不多(果真如此,我还不理解可能派为什么不敢出席罗昂派关于两个代表大会的辩论会),这可以由于报刊的影响而一倍或两倍地得到弥补。

在这样的情况下,您的巴黎记者们怎能认为圣亚田派是"真正的工人政党",我真是无法理解。首先,这帮人根本不是什么党,更不是什么工人政党,就像此地的工人一样。但是他们在一开始就像此地的工人一样完全变成了**激进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把他们联在一起的唯一的东西,就是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工人的纲领。那些为激进派搜罗一批工人选民的工人领袖的行为,在我看来,是**直接的背叛**。

恩格斯:《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2年11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01—403页。

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

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党人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维护这个具有起码理解力的人都认为是正确的理论,反对毫无根据

的攻击，反对败坏这个理论的企图，这决不等于敌视任何批评。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

列宁：《我们的纲领》（不早于1899年10月），《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

……没有思想上的统一，组织上的统一是没有意义的。

……没有思想上的统一，组织上的统一是没有意义的；这种组织上的统一我们从来没有寻求过，而且也不可能去寻求。在《工人事业》第10期第32页和第33页上，文章作者不满意在国际社会民主党内提出山岳派同吉伦特派的对立。请看一下日内瓦代表会议，难道这次会议不就是山岳派同吉伦特派的一次交锋吗？难道《火星报》不就是山岳派吗？难道《火星报》编辑部在它的第一篇声明中没有说过它不希望在思想上还没有划清界限以前实现任何组织上的统一吗？《工人事业》第10期说：甚至最坏的伯恩施坦分子也是站在阶级利益的立场上的。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文献》（1901年9月21日〔10月4日〕），《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7页。

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俄国社会民主党担负的民族任务是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党都不曾有过的。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把全体人民从专制制度压迫下解放出来这个任务所赋予我们的种种政治责任和组织责任。现在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就是**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读者如果想要稍微具体地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请回想一下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者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70年代的那一批杰出的革命家；就请想想俄国文学现在所获得的世界意义；就请……只要想想这些也就足够了！

列宁：《怎么办？》（1901年秋—1902年2月），《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2页。

在我们看来，没有理论，革命派别就会失去生存的权利，而且不可避免地迟早注定要在政治上遭到破产。

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的危机应当使稍微严肃一点的社会主义者都加倍注意理论，更坚决地采取严肃坚定的立场，更果断地同动摇分子和不可靠分子划清界限。在社会革命党人看来，既然“连德国人”也在分崩离析，那上帝也会让我们俄国人为自己不知道蹭到哪里去而感到骄傲。在我们看来，没有理论，革命派别就会失去生存的权利，而且不可避免地迟早注定要在政治上遭到破产。在社会革命党人看来，没有理论却是一件大好事，是一件“对联合”特别便利的事情。可见，我们和他们是谈不拢的，因为我们没有共同的语言。

列宁:《革命冒险主义》(1902 年 8 月 1 日和 9 月 1 日〔8 月 14 日和 9 月 14 日〕),《列宁全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67 页。

我们应当坚决地同一切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作斗争,不管它披着怎样时髦而华丽的外衣。

社会民主运动的阶级性质不应当反映在把我们的任务局限于"纯粹工人"运动的直接和最近的需要上,而应当反映在对无产阶级这个现代社会唯一的真正革命阶级的伟大解放斗争的一切方面和一切表现的领导上。社会民主党应当始终坚持不懈地扩大工人运动对现代社会的一切社会生活领域和政治生活领域的影响。它不仅应当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而且应当领导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它应当时刻不忘我们的最终目的,随时进行宣传,保卫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不被歪曲,并使之继续发展。我们应当坚决地同一切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作斗争,不管它披着怎样时髦而华丽的外衣。

列宁:《政治鼓动和"阶级观点"》(1902 年 2 月 1 日〔14 日〕),《列宁全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51 页。

没有思想的组织性是毫无意义的,它实际上会把工人变成掌权的资产阶级的可怜仆从。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从原则上明确地谈了我们对工人政党的纪律的意义和纪律的概念的看法。**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这就是我们明确的看法。只有这样的纪律才是先进

阶级民主主义政党所应有的纪律。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于组织。不组织群众,无产阶级就一事无成。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就无所不能。组织性就是行动一致,就是实际活动一致。当然,任何行动和任何活动,只有它们是在前进而不是在后退,是从思想上团结无产阶级,提高无产阶级,而不是降低、腐蚀、削弱无产阶级,它们才是有价值的。没有思想的组织性是毫无意义的,它实际上会把工人变成掌权的资产阶级的可怜仆从。因此,没有讨论和批评的自由,无产阶级就不承认行动的一致。因此,觉悟工人始终不应当忘记,对原则的严重违反必定会使一切组织关系遭到破坏。

列宁:《同立宪民主党化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和党的纪律》(1906 年 11 月 23 日〔12 月 6 日〕),《列宁全集》第 14 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21—122 页。

工人的阶级意识的觉醒在这种情况下意味着什么,是十分明显的。

如果说德国现在已经不是亨利希·海涅笔下的那个"虔诚的育儿所",那么现在的英国也已经不是柔顺的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的那个模范国家,已经不是勇敢的工联和合法改良派不遗余力地要使"社会主义幻想"在那里无立足之地的国家。所有这一切现在都一去不复返了。英国工人阶级在经过宪章运动时代以失败告终的光荣战斗以后,过了很长时间才重新行动起来。而它现在无疑地已经行动起来了。谈到这里的社会主义组织,不久以前它们还只不过是些宗派集团,同

它们相比，旧工联倒真能算得是一支巨大的力量了。所以德国大学的乖孩子们相信，英国工人所竭力要做的不是把雇佣劳动制度消灭，而只是加以“改良”。而现在的情况怎样呢？工人群众越来越认清，他们的出路，与其说在于靠同个别企业主作斗争以争得较高的工资和较短的工作日，不如说，首先是在于组织成为独立政党的工人阶级争得政治权利，争得议会①。这在1892年大选中第一次显示出来。工人们在同两个老党的斗争中把自己的3名候选人送进了议会，而且还在二十多个选区里向这两个党有力地显示了他们至今还没有使用过的力量。这就使工人们的自信心空前地加强了。

在英国，即使在现行的有限制的选举制度下，工人也至少在150个选区里占了选民的绝对多数。如果政府提出的选举改革草案被通过，他们就将在200个选区里占多数。不仅如此，在大多数选区里，工人的选票现在就已经能决定选举的结果了。工人的阶级意识的觉醒在这种情况下意味着什么，是十分明显的。工人只要有愿望，——英国就不能违反他们的意志来治理。

阶级意识的这种觉醒也表现于今年五一节的准备活动。预备性商谈第一次顺利地进行，没有发生争吵和无谓的竞争，参加者齐心一致，积极热情。更重要的是：领导权属于社会主义者，这个节日活动将第一次具有无可争辩的社会民主主义性质。

---

① 在手稿中不是“争得政治权利，争得议会”，而是“争得议会，争得政权”。——编者注

恩格斯:《1893年五一节致德国工人》(1893年3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68—469页。

只要把社会民主主义的种子撒到这些工人当中去,鼓舞他们和团结他们去坚持自己的权利,容克的统治也就会完结。

只要把社会民主主义的种子撒到这些工人当中去,鼓舞他们和团结他们去坚持自己的权利,容克的统治也就会完结。这一对于德国犹如俄国沙皇制度对于整个欧洲一样是野蛮的侵略成分代表的巨大反动势力,就会像刺破了的肥皂泡一样完全瓦解。普鲁士军队的"劲旅"就会变成社会民主主义的劲旅,那时在力量对比上便会发生那孕育着彻底变革的变动。但是正因为如此,争取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村无产者比争取德国西部的小农或者甚至比争取德国南部的中农都重要得多。这里,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正是我们决战的战场,所以政府和容克将采取一切措施来阻挡我们到这里来。如果像他们威胁我们的那样,将重新采用强制措施来制止我们党的扩展,那么这首先将是为了阻碍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村无产阶级接受我们的宣传。这对我们反正一样。我们终究会将他们争取过来。

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1894年11月15日—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5页。

在工人阶级在组织上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对统治阶级的集体权力即政治权力进行决定性攻击的地方,工人阶级无论如何必须不断地进行反对统治阶级政策的鼓动(并对这种政策

采取敌对态度),从而使自己在这方面受到训练。否则,工人阶级仍将是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

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自然是以为自身夺得政权作为最终目的,为此当然需要一个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在经济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的预先的组织。

但是另一方面,任何运动,只要工人阶级在其中作为**一个阶级**与统治阶级相对抗,并试图从外部用压力对统治阶级实行强制,就都是政治运动。例如,在某个工厂中,甚至在某个行业中试图用罢工等等来迫使个别资本家限制工时,这是纯粹的经济运动;而强迫颁布八小时工作日等等**法律的**运动则是**政治**运动。这样,到处都从工人的零散的经济运动中产生出**政治**运动,即目的在于用一种普遍的形式,一种具有普遍的社会强制力量的形式来实现本阶级利益的**阶级**运动。如果说这种运动以某种预先的组织为前提,那么它们本身也同样是这种组织发展的手段。

在工人阶级在组织上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对统治阶级的集体权力即政治权力进行决定性攻击的地方,工人阶级无论如何必须不断地进行反对统治阶级政策的鼓动(并对这种政策采取敌对态度),从而使自己在这方面受到训练。否则,工人阶级仍将是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法国的九月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格莱斯顿先生及其同伙在英国直到今天还能够耍把戏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

马克思:《马克思致弗·波尔特》(1871 年 11 月 23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03—604 页。

觉悟的工人现在肩负的伟大而重要的任务，就是帮助这个民主派克服自由主义偏见的影响。

说得恰如其分，很正确，不过不应当忘记，不论旧平民知识分子或“农民出身的”新平民知识分子即民主派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他们都是与贵族-农奴主不同的资产阶级。

但是资产阶级有各种不同的阶层，这些阶层各有自己不同的历史机遇。上层资产阶级和富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律师、教授、记者和杜马代表等等，几乎总是本能地倾向于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结成联盟。**这个**资产阶级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经济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相反，农民资产阶级和“农民出身的”新知识分子却同无权的被践踏的、愚昧的、挨饿的农民**群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出于自己的一切生活条件，同**任何**普利什凯维奇主义以及它缔结的任何联盟都是不共戴天的。

这个人数更多、更接近千百万人的生活的新民主派，正在迅速地学习，巩固，发展起来。新民主派中的大部分人都具有模糊的反对派情绪，他们把自由主义糟粕当作精神食粮。觉悟的工人现在肩负的伟大而重要的任务，就是帮助这个民主派克服自由主义偏见的影响。只有克服这种偏见，抛弃贫乏的自由主义幻想，同自由派决裂，同工人携起手来，俄国的新民主派才能为自由事业作出重大的贡献。

列宁：《新民主派》（1913年1月19日〔2月1日〕），《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4—325页。

工人决不允许用民族文化或“民族文化自治”这样的甜言蜜语来分化工人队伍。

觉悟的工人主张在所有一切教育组织、工会组织、政治组织或其他工人组织内，各民族的工人都应当**完全统一**。让立宪民主党的先生们去否认或者贬低乌克兰人的平等权利而自取其辱吧。让各民族的资产阶级拿民族文化、民族任务等等的骗人的空话去自我安慰吧。

工人决不允许用民族文化或“民族文化自治”这样的甜言蜜语来分化工人队伍。各民族的工人必须在共同的组织内，同心协力地去维护完全的自由和完全的平等，——这才是真正的文化的保证。

工人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创造自己的国际主义文化，这种文化早已由宣传自由的人们和对压迫进行反抗的人们作了准备。工人正在建设一个各民族劳动者团结一致的新世界，一个不容许有任何特权，不容许有任何人压迫人的现象的世界，来代替充满民族压迫、民族纷争或民族隔绝的旧世界。

列宁：《工人阶级和民族问题》（1913 年 5 月 3 日〔16 日〕），《列宁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40 页。

工人阶级不是用言语而是用行动，用实例来教育他们，而且不是用个别英雄的冒险行动作例子，而是用把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结合起来的群众性的革命行动作例子来教育他们。

工业无产阶级现在所发挥的作用正是一个真正先进、真正发动群众起来革命、真正能够拯救俄国免于腐朽的阶级的

作用。工业无产阶级用自己革命的罢工来实现的正是这一任务。这些为自由派所仇视和为取消派所不理解的罢工，是（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月决议的话来说）“克服农业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冷漠、绝望情绪和涣散状态，**吸引他们**参加尽可能齐心协力、步调一致、声势浩大的**革命行动**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①。

工人阶级正在吸引被剥夺了最起码权利并且陷于绝望境地的被剥削劳动群众参加革命行动。工人阶级教导他们进行革命斗争，培养他们从事革命活动，告诉他们出路和生路何在。工人阶级不是用言语而是用行动，用实例来教育他们，而且不是用个别英雄的冒险行动作例子，而是用把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结合起来的**群众性的**革命行动作例子来教育他们。

列宁：《革命无产阶级的五一游行示威》（1913年6月15日〔28日〕），《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5页。

先进工人的任务是，通过自己的宣传教育工作使无产阶级在当前的革命口号下尽快联合起来。同时只有在这个条件下，先进的工人也才能完成自己所肩负的唤醒农民民主派和城市民主派的任务。

工人阶级仍然是争取全国解放的革命斗争的领导者。群众性的革命罢工继续发展。工人阶级的先进队伍正在革命的口号下进行实际斗争。

---

① 见《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7页。——编者注

群众性的经济运动，开始往往提出一些最初步的要求，后来在整个斗争形势的影响下逐渐和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汇合。

先进工人的任务是，通过自己的宣传教育工作使无产阶级在当前的革命口号下尽快联合起来。同时只有在这个条件下，先进的工人也才能完成自己所肩负的唤醒农民民主派和城市民主派的任务。

……

工人阶级在革命口号下进行的斗争，迫使一部分企业主和自由主义十月党人资产阶级也开始大谈其改良的必要性来了，特别是大谈其打了折扣的结社自由的必要性来了。资产阶级一方面狂热地组织各种企业主联合会来防止罢工，并且要求政府有步骤地镇压工人运动，另一方面又建议工人**不要**提革命要求而只提结社自由之类的个别立宪改革。工人阶级应当利用政府一切可能产生的动摇，利用资产阶级和反动阵营之间存在的分歧，以加强自己在经济斗争领域和政治斗争领域的冲击。但是，工人阶级正是为了卓有成效地利用形势，应当坚持不打折扣的革命口号。

列宁：《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3年夏季会议的决议》（1913年9月），《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53页。

思想一旦掌握群众，就变成力量。

知识分子和那些根据他们“洞悉”经济唯物主义的“奥

妙”这个堂皇的理由而喜欢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坏蛋们说:正义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词。

思想一旦掌握群众,就变成力量。正是在目前,布尔什维克即革命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代表,以自己的政策体现了那种在全世界推动广大劳动群众的思想。

单是正义,单是群众对剥削愤慨的感情,永远也不会把他们引上通往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但是,当大银行、辛迪加、铁路等物质机构依靠着资本主义而发展起来的时候,当先进国家极其丰富的经验积累了奇妙的技术,而资本主义却**妨碍**这些技术的运用的时候,当觉悟的工人团结成一个有25万党员的党,以便在全体被剥削劳动者支持下有计划地掌握这种机构并使它运转起来的时候,——当这些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如果布尔什维克不让别人吓倒**而能夺得政权,那么,地球上就没有一种力量能阻挡他们把政权一直保持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列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1917年9底—10月1日〔14日〕),《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1页。

工人们所具备的一个成功因素就是人数众多;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众多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

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工人们似乎已经了解到这一点,因为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都同时活跃起来了,并且同时都在努力从政治上改组工人政党。

工人们所具备的一个成功因素就是人数众多;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众多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过去的经验证明: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当存在的兄弟团结,忽视那应该鼓励他们在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们受到惩罚,——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这种认识促使1864年9月28日在圣马丁堂出席公开大会的各国工人创立了国际协会。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1864年10月21—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国际工人协会并不是某一个宗派或某一种理论的温室的产物。它是无产阶级运动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无产阶级运动又是由现代社会自然的和不可抗拒的趋势所产生的。

一国范围内的工人阶级的组织甚至也容易由于其他国家工人阶级的缺乏组织性而遭到失败,因为所有的国家都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竞争,从而彼此互相影响。只有工人阶级的国际性联盟才能保证工人阶级获得最终胜利。正是由于这种需要,才产生了国际工人协会。国际工人协会并不是某一个宗派或某一种理论的温室的产物。它是无产阶级运动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无产阶级运动又是由现代社会自然的和不可抗拒的趋势所产生的。国际工人协会深知自己所负使命的伟大意义,它既不容许别人恫吓自己,也不容许别人把自己引入歧途。今后,它的命运将同孕育着人类新生的那个阶级的历史发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第四年度报告》(1868年9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66页。

如果工人们能显示出政治远见、能保有耐心和坚毅精神、能团结一致和遵守纪律、能发扬这一切已经使他们取得这样多辉煌成就的品质,那么,最后胜利保证是属于他们的。

今年,党代表大会要完成几项特别重要的任务。在奥地利,问题是要争得普选权,即争得那种在有阶级觉悟的工人手里要比受过机械训练的士兵所掌握的小口径连发枪射得更远、打得更准的武器。统治阶级——不论是封建贵族,还是资产阶级——正在千方百计地反对把这种武器交给工人。斗争将是长期的和激烈的。但是,如果工人们能显示出政治远见、能保有耐心和坚毅精神、能团结一致和遵守纪律、能发扬这一切已经使他们取得这样多辉煌成就的品质,那么,最后胜利保证是属于他们的。历史的必然性,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都完全在他们一边起作用。虽然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不可能一下子就争到手,但是我们现在就已经可以为奥地利帝国议会中未来的无产阶级代表高呼"万岁!"了。

恩格斯:《致奥地利党第四次代表大会》(1894年3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20页。

工人阶级在争取改善生活条件的同时,在精神上、思想意识上、政治上也成长起来了,变得更具有实现自己伟大的解放目的的能力了。

在政治罢工的时候，工人阶级是作为全民的先进阶级出现的，无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不单纯起着资产阶级社会里的一个阶级作用，而且起着领导者、先驱者、领袖的作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政治思想具有全民的性质，也就是说触及到全国政治生活的根本的最深刻的条件。正如所有对 1905—1907 年这个时期进行科学研究的人所指出的，政治罢工的这种性质，使得所有的阶级，当然特别是居民中最广大的、人数众多的民主阶层即农民等等卷到运动中来。

另一方面，如果不提出经济要求，不直接而迅速地改善劳动群众的状况，劳动群众是永远也不会同意去考虑什么全国的共同“进步”的。只有在改善劳动者的经济状况的条件下，群众才会投入运动，积极参加运动，高度重视运动，发扬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坚定不移的精神，并对伟大事业忠心耿耿。事情只能是这样的，因为工人的生活条件“平”时艰苦到了极点。工人阶级在争取改善生活条件的同时，在精神上、思想意识上、政治上也成长起来了，变得更具有实现自己伟大的解放目的的能力了。

列宁：《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1912 年 5 月 31 日〔6 月 13 日〕），《列宁全集》第 21 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25 页。

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也需要民主的形式，然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种形式和一切政治形式一样，只是一种手段。

照我的意见，应当这样说：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也需要民主的形式，然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种形式和一切政治形

式一样，只是一种手段。但是，如果在今天，有人要把民主看成**目的**，那他就必然要依靠农民和小资产者，也就是要依靠那些正在灭亡的阶级，而这些阶级只要想人为地保全自己，那他们对无产阶级说来就是**反动的**。其次，不应该忘记，资产阶级统治的**彻底的**形式正是民主共和国，虽然这种共和国由于无产阶级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而面临严重的危险，但是，像在法国和美国所表明的，它作为单纯的资产阶级统治，总还是可能的。可见，自由主义的“原则”作为“一定的、历史地形成的”东西，实际上不过是一种不彻底的东西。自由主义的立宪君主政体是资产阶级统治的适当形式，那是(1)在初期，当资产阶级还没有和专制君主政体彻底决裂的时候，(2)在后期，当无产阶级已经使民主共和国面临严重的危险的时候。不过无论如何，民主共和国毕竟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后**形式：资产阶级统治将在这种形式下走向灭亡。

恩格斯：《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4年3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2页。

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

从异化劳动对私有财产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

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

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重新发现，每一个范畴，例如买卖、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 年 5 月底 6 月初—8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78—279 页。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一切阶级统治；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为达到工人阶级的总解放的一切努力之所以至今没有收到效果，是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不够团结。”

马克思：《〈芝加哥论坛报〉发表的卡尔·马克思访问记》（1878 年 12 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41—642 页。

工人成了贫苦农民的先进的领袖，并不就成了圣人。他领导人民前进，可是他也染上了小资产阶级的涣散毛病。

工人成了贫苦农民的先进的领袖，并不就成了圣人。他领导人民前进，可是他也染上了小资产阶级的涣散毛病。工人队伍中最有组织、最有觉悟、最守纪律和最坚决的工人愈少，这些队伍就愈容易涣散，代表过去的小私有者自发势力战胜代表未来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觉悟的情况也就愈多。

工人阶级开创了共产主义革命，并不能一下子就丢掉自己身上的弱点和毛病。这些东西都是从地主资本家社会，从剥削者和土豪的社会，从少数人卑鄙地钻营财富而多数人遭受贫困的社会继承下来的。可是工人阶级能够战胜**并且归根到底肯定必然会战胜**旧世界，能够战胜它的毛病和弱点，只要不断有一批又一批人数更多、经验更丰富、在困难斗争中受到更多锻炼的工人队伍去同敌人作斗争就能做到这一点。

列宁：《论饥荒》（1918 年 5 月 22 日），《列宁全集》第 34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40—341 页。

那些革命吵吵嚷嚷、模模糊糊地宣布了无产阶级解放是 19 世纪的秘密，本世纪革命的秘密。

那些所谓的 1848 年革命，只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事件，是欧洲社会干硬外壳上的一些细小的裂口和缝隙。但是它们却暴露出了外壳下面的一个无底深渊。在看来似乎坚硬的外表下面，现出了一片汪洋大海，只要它动荡起来，就能把由坚硬岩石构成的大陆撞得粉碎。那些革命吵吵嚷嚷、模模糊糊地宣布了无产阶级解放这个 19 世纪的秘密，本世纪革命的秘密。

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1856年4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4页。

……生产者阶级把生产和分配的领导权从迄今为止掌握这种领导权但现在已经无力领导的那个阶级手中夺过来,而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人类的生产在一定的阶段上会达到这样的高度:能够不仅生产生活必需品,而且生产奢侈品,即使最初只是为少数人生产。这样,生存斗争——我们暂时假定这个范畴在这里是有效的——就变成为享受而斗争,不再是单纯为生存资料斗争,而是为发展资料,为社会地生产出来的发展资料而斗争,对于这个阶段,从动物界来的范畴就不再适用了。但是,像目前这样,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所生产出来的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远比资本主义社会所能消费的多得多,那是因为这种生产人为地使广大真正的生产者同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相隔绝;如果这个社会由于它自身的生存规律而不得不继续扩大对它来说已经过大的生产,并从而周期性地每隔十年不仅毁灭大批产品,而且毁灭生产力本身,那么,"生存斗争"的空谈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呢?于是生存斗争的含义只能是,生产者阶级把生产和分配的领导权从迄今为止掌握这种领导权但现在已经无力领导的那个阶级手中夺过来,而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顺便提一下,只要把迄今的历史视作一系列的阶级斗争,就足以看出,把这种历史理解为"生存斗争"的稍加改变的翻

版，是如何肤浅。因此，我是决不会使这些冒牌的自然研究家称心如意的。

恩格斯：《恩格斯致彼·拉·拉甫罗夫》（1875年11月12—1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3—624页。

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旧社会的生活条件已经被消灭了。无产者是没有财产的；他们和妻子儿女的关系同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再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了；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

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

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 年 12 月—1848 年 1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83 页。

在所有的文明国家，民主主义的必然结果都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又是实行一切共产主义措施的首要前提。

在目前条件下，共产主义者根本不想同民主主义者进行无益的争论，相反，目前在党的一切实际问题上，他们自己都是以民主主义者的身份出现的。在所有的文明国家，民主主义的必然结果都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又是实行一切共产主义措施的首要前提。因此在民主主义还未实现以前，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就要并肩战斗，民主主义者的利益也就是共产主义者的利益。在此以前，两派的分歧是纯理论性质的，完全可以从理论上进行讨论，而决不会使共同行动因此受到任何影响。人们甚至可以对民主主义实现以后应当立即为一向受压迫的阶级采取的一些措施取得一致意见，如大工业和铁路交给国家管理，所有儿童的教育费用由国家负担等等。

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1847 年 10 月 3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05 页。

实行普选权的必然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

我们终于要来谈谈**宪章派**这个英国工人阶级的具有政治

积极性的部分。他们所要求的宪章六条，无非是要求**普选权**，以及使普选权不致成为劳动阶级的空想的那些条件，这就是：无记名投票、给议员支薪、每年改选议会等等。但是**普选权**就等于英国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因为在英国，工人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同资本家进行的长期的虽然是隐蔽的内战过程中，工人阶级已经逐渐具有了明确的阶级意识，甚至在郡里也不再有农民，而只有地主、产业资本家（农场主）和雇佣工人。因此，在英国，**普选权**的实行是大陆上任何标有社会主义这一光荣称号的其他措施所不可比拟的重大社会主义措施。

在这里，实行普选权的必然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

马克思：《〈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和〈宪章派〉两篇文章的德文手稿片断》（1852 年 7 月 25 日—8 月 2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11 页。

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我们要消灭阶级。用什么手段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因为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都在从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并且对于我们说来，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工人的党作为政党已经在大多数国家存在着。鼓吹放弃政治去破坏它的不应该是我们。现实生活的经验，现存政府为了政治的和社会的目的对工人施加的政治压迫，无论工人愿意与否，都迫使他们从事政治。向工人鼓吹放弃政治，就等于把他们推入

资产阶级政治的怀抱。特别是在巴黎公社已经把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提到日程上来以后,放弃政治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们要消灭阶级。用什么手段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当大家都承认这一点的时候,竟有人要我们不干预政治!所有鼓吹放弃政治的人都自诩为革命家,甚至是杰出的革命家。但是,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谁要想革命,谁就要有准备革命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的手段,即政治行动,没有政治行动,工人总是在战斗后的第二天就会受到法夫尔和皮阿之流的愚弄。应当从事的政治是工人的政治;工人的政党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治。

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1871年9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124页。

那些似乎是全民的、全民族的、普遍的、超阶级的民主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的口号,不过是为剥削者的利益服务……

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前,为了从政治上教育和组织工人群众,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制特别是议会制曾经是(必需的)必要的,而现在,当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在苏维埃共和国实现了更高类型的民主制的情况下,任何退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步骤都是为剥削者即为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效劳的绝对反动的行为。那些似乎是全民的、全民族的、普遍的、超阶级的民主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的口

号,不过是为剥削者的利益服务,只要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仍然存在,最民主的共和国都必然是资产阶级专政,是一小撮资本家镇压占大多数的劳动者的机器。

……

苏维埃国家组织使那一部分最集中、最团结、最觉醒、在社会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整个发展阶段的斗争中经受锻炼最多的劳动群众,即城市工业无产阶级,具有某种实际的优越地位。应当始终不渝地利用这种优越地位来消除资本主义为了把工人分裂成互相竞争的集团而在他们中间培养起来的那种狭隘行会利益和狭隘职业利益,使最落后最散漫的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群众同先进工人更紧密地联合起来,使他们摆脱农村富农和农村资产阶级的影响,组织和教育他们进行共产主义建设。

列宁:《俄共(布)纲领草案》(1919 年 2 月),《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21—722 页。

(四)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宣传教育

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

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

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 年 12 月—1848 年 1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06 页。

目前对广大工农群众的鼓动工作是做得极少的。因此,不能局限在旧框框内,无论如何不能因现时有苏维埃国家机构来进行这一工作而产生依赖思想。

当然,我们现在已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我们党还在受迫害时或为夺取政权而斗争时所采用的鼓动方法。国家政权使我们有了巨大的国家机构,依靠这种国家机构,我们的鼓动工作走上了新的轨道。一年半以来,鼓动工作有了另一种规模,然而,在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并为国内战争加重了的经济破坏的状况下,在俄国许多省份遭到侵略的极端困难条件下,我们的鼓动工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要求。与从前相比,它创造了奇迹,但它还做得不够,还做得不彻底。目前对广大工农群众的鼓动工作是做得极少的。因此,不能局限在旧框框内,无论如何不能因现时有苏维埃国家机构来进行这一工作而产生依赖思想。如果我们有这种依赖思想,我们就完成不了任务。在这方面应当想想过去,应当更注意发挥个人主动性,应当说,只要大大发挥这种个人主动性,我们一定会比从前做更多的工作,因为现在虽然大多数工人已经感到疲倦,但是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本能抓住了任务的根本点。甚至那些从政治思想上看就根本不愿意把情况搞清楚、用铁甲遮住自己而不了解现实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已明白,这是全世界旧

的资产阶级制度和新的苏维埃制度之间的斗争。自从德国革命显露出真面目以后，自从它的政府在大多数社会爱国主义者的支持下刚刚屠杀了无产阶级的优秀领袖以后，自从苏维埃政权在欧洲几个国家取得了胜利以后，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问题是这样摆着的：或者是苏维埃政权，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旧制度。这实际上已在历史过程中得到了解决。工人的本能解决了问题，必须把这种本能化为巨大的鼓动力量。

列宁：《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全会上关于工会在支援东线的动员工作中的任务的报告》（1919年4月11日），《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3—274页。

宗派在开始出现时曾经是运动的杠杆，而当它们一旦被这个运动所超过，就会变成一种障碍；那时宗派就成为反动的了。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第一阶段，带有宗派运动的性质。这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发展到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的时期是有其理由的。有些思想家在批判社会矛盾的时候，提出了一些解决这些矛盾的幻想的办法，而工人群众则只有接受、宣传和实现这些办法。这些倡导者建立的宗派，按本质来说是弃权论的，即厌弃任何实际活动、政治、罢工、结社——总而言之，厌弃任何集体的运动。无产阶级绝大多数对它们的宣传始终是漠不关心的，甚至是敌视的。巴黎和里昂的工人不愿意理睬圣西门派、傅立叶派和伊加利亚派，就像英国的宪章派和工联派不承认欧文派一样。宗派在开始出现时曾经是

运动的杠杆，而当它们一旦被这个运动所超过，就会变成一种障碍；那时宗派就成为反动的了。法国和英国的宗派，以及目前德国的拉萨尔派都证明了这一点。拉萨尔派多年来一直是组织无产阶级的绊脚石，而最终成了警察手中的简单工具。总之，这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童年，正像占星术和炼金术是科学的童年一样。在国际的建立成为可能以前，无产阶级必须跨过这个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1872年1月中—3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5—36页。

在这种宣传中，工人阶级得到了一个有效的办法来相互了解，认清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利益，把自己组织起来，懂得自己力量之所在。

第一，多年来为宣传十小时工作日法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虽然没有得到什么直接的结果，但是也并没白费。在这种宣传中，工人阶级得到了一个有效的办法来相互了解，认清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利益，把自己组织起来，懂得自己力量之所在。工人经过了这种宣传，就和从前不一样了；整个工人阶级经过了这种宣传，就在力量、知识和组织方面比起初强过百倍。工人阶级从前是互不相识和没有任何共同联系的单个人的聚集；现在它是知道自己强壮的、充满力量的机体，这个机体已经被认为是“第四等级”，而且很快就会成为第一。

第二，工人阶级根据自己的经验认识到，**他们要获得任何**

持久的利益，不能够依靠别人，而应当亲自争取，首先应当采取的办法是夺取政权。工人现在应当懂得，**他们要保障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唯有通过普选权，**普选权能使他们形成下院中的**工人多数。**因此十小时工作日法的破坏会给民主运动带来很大的好处。

恩格斯：《十小时工作日问题》（1850 年 2 月 9 日—大约 20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86 页。

……揭露某个落后的“行业”或某个被人遗忘的家庭手工业部门的种种丑恶现象，可以成为唤起阶级意识、开展工会斗争和传播社会主义的起点。

经济方面的（工厂方面的）揭露，过去和现在都是经济斗争的重要杠杆。只要还存在着必然会使工人起来自卫的资本主义，这方面的揭露将始终保持这种意义。即使在最先进的欧洲各国，现在也还可以看到，揭露某个落后的“行业”或某个被人遗忘的家庭手工业部门的种种丑恶现象，可以成为唤起阶级意识、开展工会斗争和传播社会主义的起点。

列宁：《怎么办？》（1901 年秋—1902 年 2 月），《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41 页。

“提高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在我们不局限于“在经济基础上的政治鼓动”这个条件下才能够做到。

其实，“提高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在我们不局限于

“在经济基础上的政治鼓动”这个条件下才能够做到。而把政治鼓动扩大到必要程度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组织**全面的**政治揭露。不进行这样的揭露，**就不能**培养群众的政治意识和革命积极性。因此，这一类活动是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因为就是政治自由也丝毫不会取消这种揭露，而只会稍微改变一下揭露的方面。例如，德国党正是由于毫不松懈地致力于政治揭露运动，才特别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扩大了自己的影响。

列宁：《怎么办?》（1901 年秋—1902 年 2 月），《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54 页。

统一只能靠统一的组织来实现，而统一的组织的决议又是靠全体觉悟工人自觉自愿地去贯彻的。

工人阶级需要统一。但是，统一只能靠统一的组织来实现，而统一的组织的决议又是靠全体觉悟工人自觉自愿地去贯彻的。探讨问题，发表和倾听各种意见，了解**多数**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在他们缺席时作出的决定中反映这种观点，认真负责地执行这项决定，——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一切明白人都把这些做法称为**统一**。而这样的统一对于工人阶级则是无限宝贵无限重要的。一盘散沙的工人一事无成，联合起来的工人无所不能。

列宁：《谈谈工人的统一》（1913 年 12 月 3 日〔16 日〕），《列宁全集》第 24 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01—202 页。

上千个工人团体公开地团结在马克思主义报纸的周围，这是真正的统一形成和发展的生动证明。

上千个工人团体公开地团结在马克思主义报纸的周围，这是真正的统一形成和发展的生动证明。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者早在六三时期初期就制定的思想基础之上的这种统一，能够比任何人都有效百倍地利用一切合法机会，而且在利用合法机会时能贯彻如下的精神：同谴责“鼓吹秘密报刊”、同情“公开的党”、放弃领导权、把“鲸鱼”放到次要地位等等主张进行无情的斗争。

只有这样的统一，也只有在这种思想基础上的统一，才能给俄国工人阶级指明正确的道路。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的结束语》（1914 年 4 月），《列宁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30—131 页。

我们很少用现实生活各个方面存在的生动具体的事例和典型来教育群众，而这正是报刊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

在战争问题上也是这样。我们是否抨击过那些胆小如鼠的将领和敷衍塞责的家伙呢？我们是否在全俄国面前揭露过那些不中用的部队的丑态呢？有一些人毫不中用、玩忽职守、延误军机，本来应该大张旗鼓地把他们清除出军队，我们是否“抓住了”足够数量的这样的坏典型呢？我们没有同干坏事的具体人进行切实的、无情的、真正革命的斗争。我们很少用现实生活各个方面存在的生动具体的事例和典型来教育群

众,而这正是报刊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我们很少注意工厂、农村和连队的日常生活,这里创造的新事物最多,这里最需要关心、报道和公众的批评,最需要抨击坏人坏事,号召学习好人好事。

少来一些政治空谈。少发一些书生的议论。多深入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创造新事物**。**多检查检查**,看这些新事物中有多少**共产主义成分**。

列宁:《论我们报纸的性质》(1918 年 9 月 18 日或 19 日),《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73 页。

老式的宣传方法是讲解或举例说明什么是共产主义。但这种老式的宣传已毫无用处,因为我们需要在实践中说明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整个宣传工作应该建立在经济建设的政治经验之上。

但是如何理解政治呢?要是用旧观点来理解政治,就要犯很大的严重的错误。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无产阶级为争取解放而与世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关系。但是我们的斗争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粉碎资产阶级制度遗留下来的东西,粉碎整个资产阶级一再想消灭苏维埃政权的尝试。到目前为止,这个任务吸引了我们最大的注意力,妨碍了我们转向另一方面的任务——建设任务。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概念中,政治似乎是脱离经济的。资产阶级说:农民们,你们想活下去,就要工作;工人们,你们想在市场上得到一切必需品,生活下去,就要工作,而经济方面的政治有你们的主

人来管。其实不然，政治应该是人民的事，应该是无产阶级的事。我们必须强调指出，现在我们工作中有十分之九的时间用在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我们昨天看到了对弗兰格尔作战获胜的消息，这个消息你们今天或许明天就会看到，这些胜利表明，斗争的一个阶段将要结束，我们争得了同一系列西方国家的和平，而军事战线上的每一个胜利都能使我们腾出手来从事对内斗争，从事国家建设的政治。我们走向战胜白卫分子的每一步都会使斗争的重心逐渐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老式的宣传方法是讲解或举例说明什么是共产主义。但这种老式的宣传已毫无用处，因为我们需要在实践中说明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整个宣传工作应该建立在经济建设的政治经验之上。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任务，谁要是对宣传仍作旧的理解，那他就落后了，就不能担负起对工农群众的宣传工作。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开采更多的煤炭，解决更恰当地利用这些粮食和煤炭的问题，消除饥荒，这就是我们的政治。正应当根据这些来安排整个鼓动工作和宣传工作。应当少说空话，因为空话满足不了劳动人民的需要。一旦战争使我们有可能不把重心放在同资产阶级、弗兰格尔、白卫分子的斗争上，我们就将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那时，鼓动工作和宣传工作就将发挥更加重大的作用。

列宁：《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20 年 11 月 3 日），《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08—309 页。

……这一支阶级力量(工人阶级)总是能够正确地找到自己的道路,能够坚持并更广泛、更深入地向群众传播自己的革命世界观和未来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到来的思想。

在几乎整整半个世纪之前,您,一个青年车工,开始了从事工人运动的活动,先是作为爱国者,而后成为在工人启蒙团体中热忱工作的民主主义者。您以自己的成长表明,整个国际无产阶级在这一时期已经向前跨进了一步。在这一时期开头,多数觉悟的工人,或者是跟着资产阶级政党走,或者至多也只是在社会主义的或无政府主义的各个派别中从这一派走向另一派,寻找自己的、本阶级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现在,文明世界的绝大多数觉悟工人已经成为社会民主党人,而且正是在德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已经最深入、最广泛地传播到无产阶级群众之中,以灿烂的光辉照耀着无产阶级为彻底推翻资本主义而进行的斗争。

我们向您这位工人领袖表示祝贺,您以自己的榜样表明,工人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德国的觉悟工人,依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比别国的工人更能使自己的运动避免犯机会主义的和无政府主义的错误,更能建立强大的群众组织——工会组织和政治组织,更能团结成一支统一的阶级力量。因而在各个历史转折关头,无论在民族沙文主义浪潮不断高涨的时候,还是在封建君主主义和教权主义的反动势力日益增强,向各种社会主义组织宣布歼灭性战争的时候,这一支阶级力量总是能够正确地找到自己的道路,能够坚持并更广泛、更深入地向群众传播自己的革命世界观和未来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到来的思想。

列宁:《给奥·倍倍尔的贺信》(1910年2月22日),《列宁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88—389页。

为了对罢工和联合作正确的评价,我们不能被它们经济成果不大这一表面现象迷惑,而要首先看到它们精神上和政治上的成果。

我认为,工资时而提高时而降低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厂主和工人间经常不断的冲突,在当前的工业组织下,乃是一种必要的手段,它可以激发劳动阶级斗志,把他们团结到一个用来抵御统治阶级侵害的统一的大联盟中,使他们不致变成一些冷漠的、没有思想的、可以马马虎虎吃饱肚子的生产工具。在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状态下,如果我们想不仅口头上,而且实际上阻止奴役,我们就必须接受战斗。为了对罢工和联合作正确的评价,我们不能被它们经济成果不大这一表面现象迷惑,而要首先看到它们精神上和政治上的成果。如果现代工业不是周期性地、循环反复地经过停滞、繁荣、狂热发展、危机和灾难这样一些交替出现的大阶段,如果工资不是因此而有高有低,如果厂主和工人之间不是进行着经常的、与工资和利润的这种波动密切联系着的战争,那么,大不列颠和全欧洲的工人阶级就会成为精神萎靡、意志薄弱、内心空虚、任人宰割的群众,这样的群众,正如古希腊罗马的奴隶一样,是不可能自我解放的。我们不应该忘记,农奴的罢工和联合曾是中世纪乡镇的温床,而中世纪的乡镇又是现在当权的资产阶级的生命之源。

马克思:《俄国对土耳其的政策。——宪章运动》(1853 年 7 月 1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85—186 页。

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日益加强团结党组织和工会组织。

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言辞的影响,而时时刻刻地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日益加强团结党组织和工会组织。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70 年第二版序言的补充》(1874 年 7 月 1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36 页。

在每一个党、特别是工人党的生活中,第一张日报的出版总是意味着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这是它至少在报刊方面能够以同等的武器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的第一个阵地。

在每一个党、特别是工人党的生活中,第一张日报的出版总是意味着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这是它至少在报刊方面能够以同等的武器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的第一个阵地。这个阵地你们已经为自己占领了;现在的问题是要占领第二个阵地:选举权、议会。如果你们能以最近十五个月内所显示的那种才能来利用日益有利于你们的政治形势,如果你们善于及时地采取坚决行动,可是又同样及时地(这常常是必要的)等

待时机，也就是使情况对你们有利，那么在这方面你们也能保证取得胜利。

恩格斯：《就〈工人报〉改为日报一事给奥地利工人的贺信》（1894 年 12 月 27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590 页。

如果我们在这两三年里能像 1848 年以前所作的那样，用各种书籍进行扎实的科学宣传，我们的事业会要好得多。

至于吸收新人，我认为，当我们回到德国，我们会在那里找到相当多的有才能的年青人，他们在这期间已不无成效地尝到了禁果的滋味。如果我们在这两三年里能像 1848 年以前所作的那样，用各种书籍进行扎实的科学宣传，我们的事业会要好得多。但是这一点没有做到，而现在暴风雨即将来临。你应当结束你的《政治经济学》了，往后我们只要有了报纸，可以把它每星期刊登一篇，人民有不懂的地方，拥护者们就可以作解释，虽然不那么理想，但总不是没有好处的。那时这会给我们随后恢复起来的全部组织提供讨论的基础。

恩格斯：《恩格斯致马克思》（1853 年 3 月 11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8 卷，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230 页。

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工人组织起来，在他们中间进行宣传和鼓动……

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工人组织起来，在他们中间进行宣传和鼓动，从而把他们反对压迫者的自发斗争变成整个

阶级的斗争，变成一定的政党争取实现一定的政治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的斗争。

列宁：《为〈工人报〉写的文章》（不早于1899年10月），《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6页。

对未来的革命的行动纲领作纯学理的、必然是幻想的预测，只会转移对当前斗争的注意力。

法国资产阶级在1789年以前所提出的一般要求，除了必要的改变之外，大体上同无产阶级当前提出的最基本的直接要求一样明确，而无产阶级的这些要求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一切国家里大致相同。但是，在18世纪有哪一个法国人曾经事先、先验地哪怕是极模糊地意识到用什么方式实现法国资产阶级的要求呢？对未来的革命的行动纲领作纯学理的、必然是幻想的预测，只会转移对当前斗争的注意力。世界末日日益临近的幻梦曾经煽起原始基督徒反对罗马大帝国的火焰，并且给了他们取得胜利的信心。对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所必然发生而且经常在我们眼前发生着的解体过程的科学认识，被旧时代幽灵的化身即各国政府日甚一日地折磨得狂怒起来的群众，同时生产资料大踏步向前的积极发展——所有这些就足以保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一旦爆发，革命的直接的下一步的行动方式的种种条件（虽然绝不会是田园诗式的）也就具备了。

我确信，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关键性的形势还不具备；因此，我认为，任何工人代表大会或社会党人代表大

会,只要它们不和这个或那个国家当前的直接的条件联系起来,那就不仅是无用的,而且是有害的。它们只能在没完没了的翻来覆去的陈词滥调之中化为乌有。

马克思:《马克思致斐·多·纽文胡斯》(1881年2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3—644页。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自己的活动和工人的实际日常生活问题结合起来,帮助工人理解这些问题……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主义工作,就是在工人中间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使工人正确了解现代社会经济制度及其基础与发展,了解俄国社会各个阶级及其相互关系,了解这些阶级相互的斗争,了解工人阶级在这个斗争中的作用,了解工人阶级对于正在没落的阶级和正在发展的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的过去和将来所应采取的态度,了解各国社会民主党和俄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同宣传工作紧密相联的,就是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工作,这个鼓动工作在俄国目前的政治条件和工人群众的发展水平下,自然成为首要的工作。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工作,这就是说社会民主党人要参加工人阶级的一切自发斗争,参加工人为工作日、工资、劳动条件等等问题而和资本家发生的一切冲突。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自己的活动和工人的实际日常生活问题结合起来,帮助工人理解这些问题,使工人注意到各种极严重的舞弊行为,帮助他们把他们向厂主提出的要求表述得更明确、更切实,提高工人对自身团结的认识,提高作为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作为全世界无

产阶级大军的一部分的全体俄国工人对自己共同利益和共同事业的认识。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1897 年底),《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40—141 页。

无论经济鼓动或政治鼓动,都是为发展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所必需的……

无论经济鼓动或政治鼓动,都是为发展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所必需的;无论经济鼓动或政治鼓动,都是为领导俄国工人的阶级斗争所必需的,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无论前一种鼓动或后一种鼓动,都能唤起工人觉悟,组织他们,使他们遵守纪律,教育他们进行一致活动并为社会民主主义理想而斗争,因而也就使工人有可能在解决迫切问题和迫切需要方面试验自己的力量,使工人们有可能从敌人方面争得局部的让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使资本家不能不考虑有组织的工人的力量,使政府不能不扩大工人的权利和接受工人的要求,使政府在怀有敌对情绪并由坚强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所领导的工人群众面前经常胆战心惊。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1897 年底),《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44 页。

共产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领导非党的工人群众,启发、训练、教育、培养这些群众(共产主义的"学校"),先是工人,然后是农民,以便使他们能够做到并且确实

做到把全部国民经济的管理集中在自己手中。

共产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领导非党的工人群众,启发、训练、教育、培养这些群众(共产主义的"学校"),先是工人,然后是农民,以便使他们能够做到并且确实做到把全部国民经济的管理集中在自己手中。

工团主义则把各工业部门的管理("总管理局和中央管理局")交给按生产部门划分的非党工人群众,这就抹杀了党的存在的必要性,就不会进行长期的工作来培养群众,来把全部国民经济的管理真正集中在他们手中。

列宁:《党内危机》(不晚于1921年1月19日),《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9页。

工人阶级中比较先进的那部分人则完全懂得,他们阶级的未来,因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新一代工人的成长。

如果资产阶级和贵族忽视它们对自己后代应尽的责任,那是他们自己的过错。分享这些阶级的特权的孩子们注定要受他们的偏见的毒害。

工人阶级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工人不是能自由行动的人。极其常见的情况是,他们甚至十分无知,以致不懂得自己孩子的真正利益或人类发展的正常条件。但是工人阶级中比较先进的那部分人则完全懂得,他们阶级的未来,因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新一代工人的成长。他们知道,首先必须使工作的儿童和少年免受现存制度之害。这只有通过变社

会理性为社会力量才能做到，而在目前条件下，除通过由国家政权施行的**普遍法律**外没有其他办法。工人阶级并不是通过这种法律的施行来巩固政府的权力。相反，他们是把目前被用来压迫他们的政权变为自己的武器。他们是通过共同的行动做到靠众多分散的个人努力所无法做到的事情。

马克思：《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指示》（1866 年 8 月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70 页。

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

我们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俄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

列宁：《怎么办？》（1901 年秋—1902 年 2 月），《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17—318 页。

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

为了补充我们以上所说的话，我们还要引用卡·考茨基谈到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草案时所说的下面一段十分正确而重要的话：

"……草案上写道：'资本主义的发展愈是使无产阶级的人数增加，无产阶级也就愈是不得不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并且也愈有可能来进行这个斗争。无产阶级就会意识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样一来，社会主义意识就成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必然的直接的结果。但这种观点是完全不正确的。当然，社会主义这种学说，也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样，根源于现代经济关系，也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样，是从反对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群众的贫穷和困苦的斗争中产生的，但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是并列地产生的，而不是一个从另一个中产生出来，它们是在不同的前提下产生的。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其实，现代的经济科学，也像现代的技术（举例来说）一样，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而无产阶级尽管有极其强烈的愿望，却不能创造出现代的经济科学，也不能创造出现代的技术；这两种东西都是从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但科学的代表人物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黑体是卡·考·用的〉；现代社会主义也就是从这一阶层的个别人物的头脑中产生的，他们把这个学说传授给才智出众的无产者，后者又在条件许可的地方把它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

列宁:《怎么办?》(1901 年秋—1902 年 2 月),《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25—326 页。

我们如果想忠于社会主义,现在就应当对群众进行国际主义教育,但是在压迫民族中不宣传被压迫民族有分离的自由,就不能进行这种教育。

我们所有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都确信,考茨基在 1914 年离开马克思主义转到维护沙文主义以前也曾经确信,社会主义革命完全可能**在最近的**将来发生,正如同一个考茨基有一次所说的那样,就在"旦夕之间"。民族的恶感不会很快消失;被压迫民族对压迫民族的憎恨(也是完全正当的)暂时还会**存在**;只有社会主义胜利**以后**,在各民族间彻底确立了完全的民主关系**以后**,它才会消散。我们如果想忠于社会主义,现在就应当对群众进行国际主义教育,但是在压迫民族中不宣传被压迫民族有分离的自由,就不能进行这种教育。

列宁:《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1916 年 7 月),《列宁全集》第 28 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0 页。

……学校不仅应当传播一般共产主义原则,而且应当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者和非无产者阶层传播无产阶级在思想、组织、教育等方面的影响,以培养能够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代人。

在国民教育方面,俄共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 1917 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即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

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即为使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成为可能而准备条件的时期,学校不仅应当传播一般共产主义原则,而且应当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者和非无产者阶层传播无产阶级在思想、组织、教育等方面的影响,以培养能够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代人。

列宁:《俄共(布)纲领草案》(1919 年 2 月),《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25—726 页。

无产阶级,通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和所有无产阶级组织,应当作为最积极最主要的力量参与整个国民教育事业。

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整个教育事业,无论在一般的政治教育方面或者具体的艺术方面,都必须贯彻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精神,这一斗争是为了顺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即推翻资产阶级、消灭阶级、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

因此,无产阶级,通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和所有无产阶级组织,应当作为最积极最主要的力量参与整个国民教育事业。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化》(1920 年 10 月 8 日),《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98—299 页。

工人阶级所承担的伟大任务是要启发一切民主群众的革命意识,在斗争中教育他们,领导他们进行猛烈的冲击……

系统地估计 1912 年的经验是社会民主党的最重要的任

务，因为这一年是俄国工人运动发生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转变的一年。仅仅说活跃正在代替低潮和涣散，是不够的。工人阶级已经转入资本家和沙皇君主制的大规模进攻。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的浪大大高涨，使俄国在罢工方面又走在世界各国，甚至走在最发达国家的前面。

当然，这个事实不会使任何一个觉悟的工人忘记，自由国的无产者在群众的组织和群众的阶级教育方面是远远超过我们的。但是这个事实表明，俄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革命的高涨时期。

工人阶级所承担的伟大任务是要启发一切民主群众的革命意识，在斗争中教育他们，领导他们进行猛烈的冲击，以便推翻罗曼诺夫王朝，使俄国得到自由和建立共和国。全面支持群众的公开的革命斗争，组织这种斗争，扩大、加深和加强这种斗争，——这就是当前的基本任务。谁意识不到这个任务，谁不在某一个促进革命事业发展的秘密组织、小组或支部中工作，谁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

列宁：《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克拉科夫会议的通报和决议》（1912年底—1913年初），《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0页。

利用资产阶级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工作人员这样一个任务，不仅要求我们取得暴力的胜利，还要求我们在群众中进行组织工作……

有人会说，列宁不主张使用暴力，而主张使用精神影响！

可是,有一种愚蠢的看法,以为单凭暴力就能解决共产主义社会建设事业中组织新的科学和技术的问题。这是胡说!我们,作为一个党,作为在一年来的苏维埃工作中学到了一些东西的人们,不会再这样愚蠢,并将告诫群众不要有这种愚蠢的想法。利用资产阶级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工作人员这样一个任务,不仅要求我们取得暴力的胜利,还要求我们在群众中进行组织工作,建立纪律,即同志纪律,扩大无产阶级对其他所有的人的影响,造成新的群众环境,使资产阶级专家看到,他已别无出路,要回到旧社会已不可能,只有同共产党人一起才能进行工作,这些共产党人就在身旁,领导着群众,得到群众的绝对信任,并在努力使资产阶级的科学技术的成果,几千年来文明发展的成果,不被一小撮人用来发迹致富,而为全体劳动者所普遍享有。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1919年3—4月),《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0页。

我们正在进行反对野蛮行为和反对贪污受贿这类毛病的宣传,我希望你们进行这项工作,但是,政治教育并不限于这种宣传,它意味着实际的结果,意味着教会人民怎样取得实际结果,并且不是以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身份而是以普通公民的身份给人们示范。

我们将把一二十万人清除出党,这是一件有益的事情,但这只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的极小一部分。应当使政治教育委员会的全部工作都适应这个目的。文盲固然应当扫除,但仅

仅识字还不够，还要有能教人们同拖拉作风和贪污受贿行为作斗争的文化素养。拖拉作风和贪污受贿行为是任何军事胜利和政治改革都无法治好的毛病。说实在的，这种毛病靠军事胜利和政治改革是治不好的，只有用提高文化的办法才能治好。这项任务就落在政治教育委员会的肩上了。

应当使政治教育工作者不用官僚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任务。但有一种情况却常常可以看到，比如有人问，可否把省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代表也吸收进省经济会议。对不住，不必把你们编进什么机关去，你们要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来完成自己的任务。你们一进什么机关就会官僚化。如果你们同人们打交道，从政治上教育他们，经验就会告诉你们，政治上有教养的人是不会贪污受贿的，但是在我们这里，这种行为却处处可见。人们会问你们：怎样才能消灭贪污受贿现象，防止执行委员会里有人贪污受贿呢？请你们教我们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政治教育工作者回答说："这事不归我们管"，"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出了小册子和布告"，那么人们就会对你们说："你们是坏党员。这事固然不归你们管，有工农检查院来管，可是你们也是共产党员呀！"你们给自己取了"政治教育"这个名称。当你们取这个名称时，就曾提醒你们，名称不要搞得太显眼，还是用一个普通一点的好。可是你们要用"政治教育"这个名称，而这个名称含义很广。你们没有把自己称为教人民识字的人，而用了政治教育这个名称。于是人们可以对你们说："很好，你们教人民读书写字，搞经济运动，这些都很好。但是这些并不是政治教育，因为政治教育是要使一切事情都有结果。"

我们正在进行反对野蛮行为和反对贪污受贿这类毛病的宣传,我希望你们进行这项工作,但是,政治教育并不限于这种宣传,它意味着实际的结果,意味着教会人民怎样取得实际结果,并且不是以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身份而是以普通公民的身份给人们示范。政治教育工作者由于在政治上比别人有修养,不仅会责骂一切拖拉现象(这在我们这里非常风行),并且能以行动表明怎样克服这一弊病。这是一种很难掌握的艺术。不普遍提高文化水平,不使工农群众比现在更有文化,就不能掌握这种艺术!我希望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特别注意这项任务。

列宁:《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1921 年 10 月 17 日),《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88—589 页。

这些官僚可以遣散,但决不能一下子把他们改造过来。在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首先是组织任务、文化任务和教育任务。

其他管理部门中的职员是更加守旧的官僚。在这里,任务比较困难。没有这样一批人是不行的,一切管理部门都需要这样一批人。在这里,我们苦于俄国资本主义的不够发达。在德国,大概这种痛苦要轻一些,因为德国的官僚机构受过充分的训练,它把官僚们弄得精疲力竭但是在迫使他们做事情,而不像我国办公室里的一些人那样,坐在安乐椅上安闲度日。我们已经把这种旧官僚主义分子赶走,加以清查,然后再把他们安插到新的位置。沙皇时代的官僚渐渐转入苏维埃机关,

实行官僚主义，装成共产主义者，并且为了更便于往上爬而设法取得俄国共产党的党证。结果，把他们赶出门外，他们又从窗口飞进来。这里主要是由于有文化的人才不够。这些官僚可以遣散，但决不能一下子把他们改造过来。在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首先是组织任务、文化任务和教育任务。

列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1919年3月），《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9—770页。

教育工作者和共产党这个斗争的先锋队的基本任务，就是帮助培养和教育劳动群众，使他们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旧习惯、旧风气，那些在群众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者的习惯和风气。

教育工作者和共产党这个斗争的先锋队的基本任务，就是帮助培养和教育劳动群众，使他们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旧习惯、旧风气，那些在群众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者的习惯和风气。在考虑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十分注意的那些局部问题的时候，决不能忽视这个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至于如何建立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使它如何同其他机关沟通，如何不仅同中央而且还要和地方机关联系等等问题，那就要由在这方面经验丰富、有专门研究的更在行的同志来回答了。我只想在原则方面强调指出几个要点。与过去那些谎言不同，我们不能不公开提出问题，公开承认教育不能不联系政治。

列宁：《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11月3日），《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页。

政治文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使他们有本领战胜谎言和偏见……

因为要同旧习惯、旧风气、旧思想决裂，在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面前就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对这个任务应该特别重视。的确，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难题：如何使大部分是旧人员的教师能同共产党员建立起联系？这是一个极端困难的问题，必须多加思索。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怎样才能把这些如此不相同的人从组织上联系起来。从原则上说，对于应该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我们不能有任何怀疑。因此政治文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使他们有本领战胜谎言和偏见，能够帮助劳动群众战胜旧秩序，建设一个没有资本家、没有剥削者、没有地主的国家。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只有掌握教师从资产阶级那里继承来的一切知识，才能做到。否则，共产主义就不可能有任何技术成就，在这方面的一切理想就要落空。可是这些工作人员都不习惯于联系政治，特别是联系对我们有用的政治，即共产主义所必需的政治来进行工作，因此就出现一个问题，如何使他们从组织上联系起来。

列宁：《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20 年 11 月 3 日），《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05—306 页。

所谓教育“不问政治”，教育“不讲政治”，都是资产阶级的伪善说法……

要使同志们和我们共同参加文教工作，关键在于教育同我们的政治的联系问题。如果有必要，名称是能够规定某种内容的，因为在各方面的教育工作中，我们都不能抱着教育不问政治的旧观点，不能让教育工作不联系政治。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这种思想一贯占着统治地位。所谓教育“不问政治”，教育“不讲政治”，都是资产阶级的伪善说法，无非是对99%受教会控制和私有制等等压迫的群众的欺骗。现在还在统治着一切资产阶级国家的资产阶级，正是这样欺骗群众的。

在那里，机构愈重要就愈不能摆脱资本和资本的政治。

列宁：《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11月3日），《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1—302页。

……学校不脱离政治的原则，但是不能简单生硬地把政治灌输给尚未准备好接受政治的正在成长的年青一代。

资产阶级虚伪立场的表现之一，就是硬说学校可以脱离政治。你们都很清楚这种说法多么虚伪。就连提出这个论点的资产阶级自己也把贯彻资产阶级政治作为办学的重点，竭力通过办学替资产阶级训练机灵听话的奴才，甚至在全国上下竭力利用普遍教育替资产阶级训练这样的奴仆，教他们去执行资本的意志，听从资本的使唤。他们从来不考虑怎样使学校成为培养人的品格的工具。现在大家都很清楚，只有同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有密切联系、真心实意地拥护苏维埃的

社会主义学校，才能做到这一点。

当然，改造学校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当然，在这方面过去和现在都有一些错误，都有一些人肆意歪曲学校不脱离政治的原则，简单生硬地把政治灌输给尚未准备好接受政治的正在成长的年青一代。毫无疑问，我们将坚持不懈地同这种随心所欲地运用基本原则的行为作斗争。但是现在，拥护国际、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这部分教师的主要任务，是要设法建立一个更广泛的、尽可能包括一切教师的教师联合会。

列宁：《在全俄国际主义者教师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9 年 1 月 18 日），《列宁全集》第 35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21—422 页。

……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

在国民教育方面，俄共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 1917 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即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就是说，不仅应当传播一般共产主义原则，而且应当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者和非无产者的阶层传播无产阶级在思想、组织、教育等方面的影响，以利于彻底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和实现共产主义制度。

列宁：《俄共（布）纲领草案》（1919 年 2 月），《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44 页。

（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必须旗帜鲜明

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种宗教和政治。

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种宗教和政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彼此是这样地不相同，就好像他们是属于不同的种族一样。在欧洲大陆上，到现时为止我们还只认得这两种人中的一种，即资产阶级。可是对英国的未来更加重要得多的，恰好是另一种人，即由无产者所组成的那一种人。①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 年 9 月—1845 年 3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410 页。

正如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者阶级的理论家。

正如**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者阶级的理论家。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带政治性以前，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

① 大家知道，迪斯累里在他的长篇小说《神巫，或两种民族》（《Sybil，or the Two Nations》）中，几乎和我同时说出了大工业把英国人分为两种不同民族的见解。——恩格斯在 1892 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要,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他们就不再需要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当他们还在探寻科学和只是创立体系的时候,当他们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节选)(1847 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55 页。

非党性是资产阶级思想。党性是社会主义思想。这个原理总的来说适用于整个资产阶级社会。

在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势必变成政治斗争。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严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非党性就是对各政党的斗争漠不关心。但是,这种漠不关心并不等于保持中立,也不等于拒绝斗争,因为在阶级斗争中不可能有中立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能"拒绝"参加产品或劳动力的交换。而交换必然产生经济斗争,随之而来的就是政治斗争。因此,对斗争漠不关心,实际上决不是回避斗争,拒绝斗争或

者保持中立。漠不关心是默默地支持强者。支持统治者。在十月革命时期,在俄国的专制政府垮台以前,谁对专制政府漠不关心,谁就是默默地支持专制政府。在现代的欧洲,谁对资产阶级的统治漠不关心,谁就是默默地支持资产阶级。谁对争取自由的斗争具有资产阶级性质这一观点漠不关心,谁就是默默地支持资产阶级在这个斗争中的统治地位,支持资产阶级在正在诞生的自由俄国中的统治地位。政治上的冷淡态度就是政治上的满足……

非党性是资产阶级思想。党性是社会主义思想。这个原理总的来说适用于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当然必须善于把这个普遍原理运用于个别的具体问题和具体场合。但是,在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都起来反对农奴制和专制制度的时候,忘记这个真理就等于实际上根本拒绝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批判。

列宁:《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1905 年 11 月 26 日和 12 月 2 日〔12 月 9 日和 15 日〕),《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76 页。

……应该特别注意划清无产阶级政党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场的界限……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选举中的总的策略路线应该是:党应当对沙皇君主制和支持它的地主资本家政党进行无情斗争,同时坚决揭露资产阶级自由派(以立宪民主党为首)的反革命观点和它们的假民主。

在竞选斗争中，应该特别注意划清无产阶级政党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场的界限，阐明民主派（主要是劳动派、民粹派、社会革命党）的假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实质，以及由于它们在彻底的群众性的革命斗争问题上的动摇而给民主事业带来的危害。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文献》（1912 年 1 月），《列宁全集》第 21 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48 页。

最主要的是，要彻底同旧的、反动透顶的世界观决裂，深刻领会关于“被奴役者”的学说，这个学说保证的不是沉沉酣梦，而是朝气蓬勃的生活。

马克思主义者向来认为自己在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中的任务是，摧毁马尼洛夫精神①、甜言蜜语、多愁善感的超阶级观点，摧毁对法国任何一个善于见风使舵、投机取巧的“激进社会党人”也很合适的庸俗的“人民”社会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向来认为，取出民粹主义观点中的**民主主义**核心也是自己义不容辞的任务。民粹派社会主义，是腐烂发臭的尸体。如果克留柯夫文章中的那个甜言蜜语的小神父对俄国农民民主派的描述合乎实际情况，那么俄国农民民主派就是一支有生气的力量。在普利什凯维奇之流还在横行霸道的时候，在还有 3000 万人挨饿的时候，它也不可能不是一支有生气的力量。

① 意为耽于幻想，无所作为。马尼洛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他生性怠惰，终日想入非非，崇尚空谈，刻意地讲究虚伪客套。——编者注

有人对我们说什么“不分青红皂白的仇恨”。首先，这说得不完全正确。看不见“青红皂白”的是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是官僚是好心肠的知识分子。其次，要知道，就是在俄国工人运动刚开始的时候也出现过一定的“不分青红皂白的仇恨”的因素，例如19世纪60—80年代罢工时破坏机器的现象。这种现象很快就消失了。这不是主要的。要求在当时的情况下已经失去耐心的人“带着白手套行动”是卑鄙的。

最主要的是，要彻底同旧的、反动透顶的世界观决裂，深刻领会关于“被奴役者”的学说，这个学说保证的不是沉沉酣梦，而是朝气蓬勃的生活。

民粹派社会主义，包括最左的民粹派社会主义，都完全腐烂了。在自觉地同“博爱”、“忍耐”等等说教决裂的基础上，净化、启发、唤醒、团结民主派，则是一项朝气蓬勃的、有生命力的任务。甜言蜜语的小神父感到忧心忡忡。我们则有充分理由为规模宏大的朝气蓬勃的工作而兴高采烈。

列宁：《民粹派内部的情况怎样？农村中的情况又怎样？》（1913年2月），《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3—424页。

问题就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专政是用立宪会议、各种选举原则、民主以及资产阶级的其他骗局掩盖起来的。

问题就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专政是用立宪会议、各种选举原则、民主以及资产阶级的其他骗局掩盖起来的。这些东西

都是用来迷惑傻瓜的，只有彻底成为和完全成为马克思主义叛徒、社会主义叛徒的人，现在才会把它们奉为至宝，用它们向人夸耀。无产阶级专政则要用铁拳镇压那个唆使最不觉悟的分子去反对世界无产阶级优秀领袖的资产阶级。这个专政是无产阶级为镇压资产阶级而取得的胜利。现在资产阶级愈是清楚地看到群众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愈是疯狂地拼命反抗无产阶级。因为在此以前，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认为工人的不满和愤慨不过是一时的表现。在此以前，一些资本家，例如最长于对工人进行政治欺骗、最有政治修养、最有组织的英国资本家，也往往这样看问题，认为战争引起不满是当然的事，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地引起工潮，但他们还没有说，现在的问题已经是由谁来领导国家，由谁来掌握国家政权，资本家老爷是否还能保留自己的财产。然而种种事件表明，不仅在俄国，而且在许多西欧国家，甚至不仅在参战国，而且在瑞士、荷兰这样一些较少经受战祸的中立国，正是这个问题已经明显地提到日程上来了。

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年1月20日），《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9页。

必须用武器的批判来代替批判的武器。

这些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人从来没有思索过马克思所说的必须用武器的批判来代替批判的武器的话①。他们盗用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编者注

马克思的名义，其实，他们在草拟策略决议的时候完全是在模仿法兰克福的资产阶级空谈家，这些空谈家自由地批判专制制度，加深民主意识，但是不懂得革命时期，是行动的时期，是既从上面又从下面行动的时候。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空洞的说教，于是就把最坚定、最积极的先进革命阶级的思想变成了这个阶级中最落后的阶层的思想，即那些逃避困难的革命民主主义任务而把这些任务交给司徒卢威先生们去执行的最落后阶层的思想。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 年 6—7 月），《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02 页。

俄国的落后使我国出现异常多的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派别，而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影响和各国合法的社会民主党在战前的巩固，则使我国一些典型的自由派几乎完全拜倒在“合理的”、“欧洲式的”（非革命的）、“合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民主党的脚下。

俄国社会民主党是在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5 年）前产生，并在这次革命和尔后的反革命时期壮大起来的。俄国的落后使我国出现异常多的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派别，而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影响和各国合法的社会民主党在战前的巩固，则使我国一些典型的自由派几乎完全拜倒在“合理的”、“欧洲式的”（非革命的）、“合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民主党的脚下。俄国工人阶级不得不在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 30 年的坚决斗争中形成自己的政党。

世界大战的过程使欧洲的机会主义遭到了可耻的破产，而使我们的民族主义自由派和社会沙文主义取消派的联盟得到了巩固；这使我们更加确信，我们党在今后也必须沿着我们原来的彻底革命的道路前进。

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1915年7—8月），《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0页。

他们（机会主义流派）不论在肉体上或在政治上都不会死亡，但是工人们一定会同他们决裂，把他们抛到资产阶级奴才的阴沟里去……

果雷说得很对，“不调和就是力量”，他要求“必将复兴的社会主义”是不调和的社会主义。但是，无产阶级是**直接**同资产阶级调和，还是通过工人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的拥护者、维护者和代理人即机会主义者**间接**同资产阶级调和，这对资产阶级来说不是一样吗？后一种方式对资产阶级甚至**更有利**，因为它保证资产阶级能够对工人发生更经久稳固的影响！

果雷说，现在有正在死亡的社会主义和必将复兴的社会主义，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这种死亡和这种复兴就是要同机会主义流派进行无情的斗争，不仅要进行思想斗争，而且还要把这个丑陋的瘤子从工人政党的身上割掉，把某些代表这种同无产阶级格格不入的策略的人物从组织中清除出去，同他们彻底决裂。他们不论在肉体上或在政治上都不会死亡，但是工人们一定会同他们决裂，把他们抛到资产阶级奴才的阴

沟里去，并用他们腐化的例子来教育新的一代，说得确切一些，就是教育那些能够发动起义的新的无产阶级大军。

列宁：《一位法裔社会党人诚实的呼声》（1915年8月），《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18页。

被打死的资本主义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污染空气，毒化我们的生活，用陈旧的、腐败的、死亡的东西的密网死死缠住新鲜的、年轻的、生气勃勃的东西。

让卖身投靠的资产阶级报刊向全世界大肆宣扬我国革命所犯的每一个错误吧。我们不怕有错误。人们并不因为发生了革命而变成圣人。劳动阶级多少世纪来一直受压迫，受折磨，被迫处于贫穷、愚昧、粗野的境地，他们干革命是不可能不犯错误的。而资产阶级社会的尸体，正如我有一次说过的，又不能装进棺材，埋到地下。被打死的资本主义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污染空气，毒化我们的生活，用陈旧的、腐败的、死亡的东西的密网死死缠住新鲜的、年轻的、生气勃勃的东西。

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其中包括我国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向全世界大肆宣扬我们所犯的错误，可是我们每犯一百个错误就有一万个伟大的英勇的行动，这些行动是平凡的，不起眼的，是淹没在工厂区或偏僻乡村的日常生活中间的，是由不习惯（也没有可能）向全世界大肆宣扬自己每一个成就的人们做出来的，因此，也就更加伟大，更加英勇。

列宁:《给美国工人的信》(1918 年 8 月 20 日),《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66—567 页。

要使无产阶级作好夺取胜利的准备,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和无情的斗争,去反对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社会沙文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资产阶级影响和思潮。

要使无产阶级作好夺取胜利的准备,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和无情的斗争,去反对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社会沙文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资产阶级影响和思潮。这些影响和思潮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产阶级是在资本主义环境中行动的。不进行这种斗争,不预先完全战胜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就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如果布尔什维主义没有在 1903—1917 年预先学会战胜孟什维克,即战胜机会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并把他们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中毫不留情地驱逐出去,那么它就不能在 1917—1919 年战胜资产阶级。

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1919 年 12 月 16 日),《列宁全集》第 38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5 页。

共产党和领导文化教育工作的苏维埃机关以及工会中的全体共产党员,都应当更加重视同工会中的小资产阶级的影响、思潮和倾向进行思想斗争,尤其是在新经济政策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加强资本主义的时候。

工会只有把极广大的非党工人群众联合起来,才算是真

正的工会。这样一来，作为资本主义残余和小生产的上层建筑的政治影响，必然会在工会中相当稳固地存在，在一个农民占极大优势的国家里尤其如此。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也就是说，一方面是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各党在俄国的变种）的影响，一方面是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只有在这些流派中还有那么一些人不是出于自私的阶级动机而是在思想上维护资本主义，继续相信他们所鼓吹的一般的“民主”、“平等”和“自由”具有超阶级的含义。

正是应当用上述社会经济原因而不是用个别集团的作用，更不是用个别人物的作用，来解释为什么我们工会中还存在着现在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有时甚至是复苏）。因此，共产党和领导文化教育工作的苏维埃机关以及工会中的全体共产党员，都应当更加重视同工会中的小资产阶级的影响、思潮和倾向进行思想斗争，尤其是在新经济政策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加强资本主义的时候。为了对抗资本主义的加强，加紧抵制小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列宁：《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1921 年 12 月 30 日—1922 年 1 月 4 日），《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29 页。

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

既然谈不到由工人群众在其运动进程中自己创立的独立的思想体系①，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人们经常谈论自发性。但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恰恰导致运动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恰恰是按照**《信条》这一**纲领进行**的，因为自发的工人运动就是工联主义的、也就是纯粹工会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因此，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势，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

列宁：《怎么办？》（1901 年秋—1902 年 2 月），《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26—327 页。

① 这当然不是说工人不参加创立思想体系的工作。但他们不是以工人的身份来参加，而是以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身份、以蒲鲁东和魏特林一类人的身份来参加的，换句话说，只有当他们能在相应的程度上掌握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并把它向前推进的时候，他们才能在相应的程度上参加这一工作。为了使工人能**更多地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尽量设法提高全体工人的觉悟水平，就必须使他们不要自己局限于阅读被人为地缩小了的“**工人读物**”，而要学习愈来愈多地领会**一般读物**。更正确些说，不是“自己局限于”，而是被局限于，因为工人自己是阅读并且也愿意去阅读那些写给知识分子看的读物的，而只有某些（坏的）知识分子，才认为“对于工人”只要讲讲有关工厂中的情况，反复地咀嚼一些大家早已知道的东西就够了。

轻视理论,对待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躲躲闪闪、摇摆不定,就必然有利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

因为社会革命党轻视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想一视同仁地既依靠知识分子,又依靠无产阶级,又依靠农民,这就必然(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使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受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奴役。轻视理论,对待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躲躲闪闪、摇摆不定,就必然有利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

列宁:《为什么社会民主党应当坚决无情地向社会革命党人宣战?》(1902年6月底—7月),《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2页。

我们要努力把"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准则渗透到群众的意识中去,渗透到他们的习惯中去,渗透到他们的生活常规中去,要逐步地却又坚持不懈地推行共产主义纪律和共产主义劳动。

现在,我们也不会被巨大的困难和极艰巨的事业开始时难免会犯的错误所吓倒,因为改变一切劳动习惯和劳动风气是几十年的事情。我们要互相提出庄严而坚决的保证:我们准备作出任何牺牲,我们将在这场反对习惯势力的最艰难的斗争中昂首挺立,坚持到底,我们将为此坚持不懈地工作几年以至几十年。我们将努力消灭"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个可诅咒的准则,克服那种认为劳动只是一种差事,凡是劳动都理应按一定标准付给报酬的习惯看法。我们要努力把"大

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准则渗透到群众的意识中去,渗透到他们的习惯中去,渗透到他们的生活常规中去,要逐步地却又坚持不懈地推行共产主义纪律和共产主义劳动。

列宁:《从莫斯科—喀山铁路第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到五一节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1920年5月2日),《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0页。

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

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这包括两个意思:(1)无产阶级如果不通过争取民主的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2)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因此,说自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多余的,正像说民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多余的一样,是十分荒谬、十分糊涂的。

自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并不比一般民主更加不可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果说它是多余的,则一般民主也同样是多余的。

经济变革为消灭各种政治压迫创造必要的前提。正因为如此,当提出的问题是怎样消灭民族压迫时,拿经济变革来支吾搪塞,这是不合逻辑的,不正确的。不实现经济变革,就不能消灭民族压迫。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如果仅仅限于这一点,那就意味着陷入了可笑而又可怜的"帝国主义经济主

义”。

列宁:《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916 年 8—9 月),《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82 页。

人民这个大多数享有民主,对人民的剥削者、压迫者实行强力镇压,即把他们排斥于民主之外,——这就是民主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改变了的形态。

读者总还记得,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很好地阐明了这一点,他说:“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①

人民这个大多数享有民主,对人民的剥削者、压迫者实行强力镇压,即把他们排斥于民主之外,——这就是民主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改变了的形态。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当资本家的反抗已经彻底粉碎,当资本家已经消失,当阶级已经不存在(即社会各个成员在同社会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已经没有差别)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国家才会消失,才有可能谈自由”。只有在那个时候,真正完全的、真正没有任何例外的民主才有可能,才会实现。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民主才开始消亡,道理很简单:人们既然摆脱了资本主义奴隶制,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制所造成的无数残暴、野蛮、荒谬和丑恶的现象,也就会逐渐习惯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24 页。——编者注

于遵守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的、千百年来在一切行为守则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而不需要暴力，不需要强制，不需要服从，不需要所谓国家这种实行强制的特殊机构。

"国家消亡"这个说法选得非常恰当，因为它既表明了过程的渐进性，又表明了过程的自发性。只有习惯才能够发生而且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作用，因为我们在自己的周围千百万次地看到，如果没有剥削，如果根本没有令人气愤、引起抗议和起义而使镇压成为必要的现象，那么人们是多么容易习惯于遵守他们所必需的公共生活规则。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0—191页。

五、意识形态与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

(一)工业、大机器和资本的统治

……现代大工业以这种集中的力量到处破坏民族的藩篱,逐渐消除生产、社会关系、每个民族的民族性方面的地方性特点。

这个博览会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集中起来的力量的意义,现代大工业以这种集中的力量到处打破民族的藩篱,逐渐消除生产、社会关系、每个民族的民族性方面的地方性特点。正当现代资产阶级关系已经在各方面遭到破坏的时候,博览会在一个不大的空间密密麻麻地展出现代工业积累起来的全部生产力,这同时也就是展示在这动荡不定的社会的深层已经创造了的和正在一天天创造出来的建设新社会的物质。世界资产阶级以这个博览会在现代的罗马建立起自己的百神庙供一切神的寺庙,洋洋自得地把它自己创造的众神供奉在这里。这样一来它就在实践上证明,德国思想家年年反复说的"公民的无力和不满",只不过是这些先生自己对理解现代运动的无力,自己对这种无力的不满。资产阶级庆祝它的这个无比盛大的节日的时候,正是它的整个威严面临垮台的时候,这

次垮台将比以往更加明显地向它证明，它所创造的力量已经如何摆脱它的控制。或许将来在一次博览会上，资产者不再作为这种生产力的所有者出现，而仅仅作为这种生产力的导游者出现。

马克思、恩格斯：《时评。1850 年 5—10 月》（1850 年 10 月—11 月 1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85—586 页。

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个人的全部精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它尽可能地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在它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

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个人的全部精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它尽可能地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在它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质的最后一点假象。它把自然形成的性质一概消灭掉，只要在劳动的范围内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它并且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它建立了现代的大工业城市——它们的出现如雨后春笋——来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凡是它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在现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

不论是机器的改进①,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的殖民地的开辟,向外移民,扩大市场,自由贸易,或者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在现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这在欧洲一切国家里,现在对于每一个没有偏见的人都已成了十分明显的真理,只有那些一心想使别人沉湎于痴人乐园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在这种"令人陶醉的"经济进步时代,在不列颠帝国的首都,饿死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常规。这个时代在世界编年史上留下的标志,就是被称为工商业危机的社会瘟疫日益频繁地重复发生,规模日益扩大,后果日益带有致命性。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1864年10月21日—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1页。

工业社会制度对于资产者是最好的世界,是发展他作为资产者的"能力"以及剥削人和开发自然的能力的最适宜的

① 在德文版中加有"化学上的发现"。——编者注

制度……

英国工业对世界的专制，就是工业对世界的统治。英国所以能统治我们，是因为工业统治了我们。我们自己只有在国内摆脱了工业的统治，才能在外部事务中摆脱英国的统治。我们只有在国内克服了竞争，才能结束英国在竞争领域里的统治。英国之所以控制我们，是因为我们使工业成为控制我们的力量。

工业社会制度对于资产者是最好的世界，是发展他作为资产者的“能力”以及剥削人和开发自然的能力的最适宜的制度，谁会对这种**同义反复**表示怀疑呢？凡是现在被称为“善”的东西——个人的或社会的善的东西——都有利于资产者，谁会对这一点表示怀疑呢？政权是他致富的一种手段，甚至科学和精神娱乐也是他的奴隶，谁会对这一点表示怀疑呢？对他来说，一切都是美好的……谁会对此表示怀疑呢？在他看来，一切都变成致富的手段，变成“致富的生产力”，谁会对这些表示怀疑呢？

马克思：《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5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0页。

科学通过机器的构造驱使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肢体有目的地作为自动机来运转，这种科学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识中，而是作为异己的力量，作为机器本身的力量，通过机器对工人发生作用。

机器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表现为单个工人的劳动资料。机器的特征决不是像[单个工人的]劳动资料那样,在工人的活动作用于[劳动]对象方面起中介作用;相反地,工人的活动表现为:它只是在机器的运转,机器作用于原材料方面起中介作用——看管机器,防止它发生故障,这和对待工具的情形不一样。工人把工具当作器官,通过自己的技能和活动赋予它以灵魂,因此,掌握工具的能力取决于工人的技艺。相反,机器则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它为了自身不断运转而消费煤炭、机油等等(辅助材料),就像工人消费食物一样。只限于一种单纯的抽象活动的工人活动,从一切方面来说都是由机器的运转来决定和调节的,而不是相反。科学通过机器的构造驱使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肢体有目的地作为自动机来运转,这种科学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识中,而是作为异己的力量,作为机器本身的力量,通过机器对工人发生作用。

马克思:《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1857 年底—1858 年 5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90—91 页。

……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

在工场手工业中,也和在协作中一样,执行职能的劳动体是**资本的**一种**存在形式**。因此,由各种劳动的结合所产生的生产力也是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协作大体上没有改变个人

的劳动方式，而工场手工业却使它发生了革命，使工人畸形发展；工人不能生产独立的产品，他只是资本家工场的**附属物**。劳动的智力在许多方面消失了，而在一个方面扩大了它的规模。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一个产物，就是劳动过程的智力**作为他人的财产和统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这个分离过程在协作中开始，在工场手工业中得到发展，在大工业中完成，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

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提要》（1868年春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12页。

妨碍德国资产者追求工业财富的一个巨大障碍（干扰），是他迄今信守的唯心主义。这个“精神”民族怎么突然想到要在布匹、纱线、自动走锭精纺机、大量的工厂奴隶、机器的唯物主义、工厂主先生满满的钱袋中寻找人类的至善呢？

妨碍德国资产者追求工业财富的一个巨大障碍（干扰），是他迄今信守的**唯心主义**。这个“**精神**”民族怎么突然想到要在布匹、纱线、自动走锭精纺机、大量的工厂奴隶、机器的唯物主义、工厂主先生满满的钱袋中寻找人类的至善呢？德国资产者空虚的、浅薄的、伤感的唯心主义，包藏着最卑鄙、最龌龊的市侩精神，隐含着最怯懦的灵魂。这种唯心主义已经进入了使德国资产者必然不得不泄露其秘密的时代。但他又是以真正德国人的矫揉造作的方式、以唯心主义的基督教徒羞怯心理来泄露其秘密。他追求财富而又否认财富。他把无精

神的唯物主义装扮成完全唯心主义的东西，然后才敢去猎取它。

马克思：《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5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9—240页。

使用机器的资本家不必懂得机器。但是，在机器上实现了的科学，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

工人的劳动的**社会**性质作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化的**东西同工人相对立（例如，在机器生产部门，劳动的可见产品表现为劳动的统治者），在这个过程中，各种自然力和科学——历史发展总过程的产物，它抽象地表现了这一发展总过程的精华——自然也发生同样的情况：它们作为资本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科学及其应用，事实上同单个工人的技能和知识分离了，虽然它们——从它们的源泉来看——又是劳动的产品，然而在它们进入劳动过程的一切地方，它们都表现为**被并入**资本的东西。使用机器的资本家不必懂得机器（见尤尔的著作）。但是，**在机器上**实现了的科学，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而事实上，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所有这些对科学、自然力和大量劳动产品的应用本身，只表现为**剥削**劳动的**手段**，表现为占有剩余劳动的手段，因而，表现为属于资本而同劳动对立的**力量**。资本使用这一切手段，当然只是为了剥削劳动，但是为了剥削劳动，资本必然要在生产过程中使用这些手段。所以，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这个发展的条件就表现为**资**

本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仅是不管单个工人的意志如何而完成的,而且是直接反对单个工人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册第六章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1863 年 7 月—1864 年 6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9 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17—118 页。

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有些党派可能为此痛哭流涕;另一些党派可能为了要摆脱现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现代技术;还有一些党派可能以为工业上如此巨大的进步要以政治上同样巨大的倒退来补充。可是我们不会认错那个经常

在这一切矛盾中出现的狡狯的精灵。我们知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工人也同机器本身一样，是现代的产物。在那些使资产阶级、贵族和可怜的倒退预言家惊慌失措的现象当中，我们认出了我们的勇敢的朋友、好人儿罗宾，这个会迅速刨土的老田鼠、光荣的工兵——革命。英国工人是现代工业的头一个产儿。他们在支援这种工业所引起的社会革命方面肯定是不会落在最后的，这种革命意味着他们的本阶级在全世界的解放，这种革命同资本的统治和雇佣奴役制具有同样的普遍性质。我知道英国工人阶级从上一世纪中叶以来进行了多么英勇的斗争，这些斗争只是因为资产阶级历史家把它们掩盖起来和隐瞒不说才不为世人所熟悉。为了报复统治阶级的罪行，在中世纪的德国曾有过一种叫作“菲默法庭”的秘密法庭。如果某一所房子画上了一个红十字，大家就知道，这所房子的主人受到了“菲默法庭”的判决。现在，欧洲所有的房子都画上了神秘的红十字。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

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1856 年 4 月 14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75—776 页。

在现代制度下，如果弯腰驼背，四肢畸形，某些肌肉的片面发展和加强等，使你更有生产能力（更有劳动能力），那么你的弯腰驼背，你的四肢畸形，你的片面的肌肉运动，就是一种生产力。

生产力表现为一种无限高于交换价值的本质。这种力量要求具有内在本质的地位,交换价值要求具有暂时现象的地位。这种力量表现为无限的,交换价值表现为有限的;前者表现为非物质的,后者表现为物质的;我们在李斯特先生那里看到了所有这些对立。因此,力量的超感觉世界便代替了交换价值的物质世界。如果说国家为交换价值而牺牲、人为物而牺牲的卑鄙性十分明显,那么与此相反,力量则表现为独立的精神本质——幽灵,表现为纯粹的人格化,即上帝,人们也就完全有理由要求德国人为幽灵牺牲恶的交换价值!交换价值、货币,似乎总是外在目的;可是生产力似乎是由我自己的本性中产生的目的,即目的本身。因此,我以交换价值的形式牺牲了的东西,是某种外在于我的东西,我以生产力的形式赢得的东西,是我的自我获得物。——**看来**是这样的:有人以词句为满足,或者像一个理想化的德国人那样,不为隐藏在夸张词句后面的肮脏现实而烦恼。

为了破除美化"生产力"的神秘灵光,只要翻一下任何一本统计材料也就够了。那里谈到水力、蒸汽力、人力、马力。所有这些都是"生产力"。人同马、蒸汽、水全都充当"力量"的角色,这难道是对人的高度赞扬吗?

在现代制度下,如果弯腰驼背,四肢畸形,某些肌肉的片面发展和加强等,使你更有生产能力(更有劳动能力),那么你的弯腰驼背,你的四肢畸形,你的片面的肌肉运动,就是一种生产力。如果你精神空虚比你充沛的精神活动更富有生产能力,那么你的精神空虚就是一种生产力,等等,等等。如果一种职业的单调使你更有能力从事这项职业,那么单调就是

一种生产力。

马克思:《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5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1—262页。

……科学在生产过程中的上述应用和在这一过程中压制任何智力的发展,这两者是一致的。

在这里,机器的特征是"主人的机器",而机器职能的特征是**生产过程**中("生产事务"中)**主人的**职能,同样,体现在这些机器中或生产方法中,化学过程等等中的**科学**,也是如此。科学对于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而科学的应用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经验、观察和通过实验方法得到的职业秘方的集中,另一方面表现为把它们发展为科学(用以分析生产过程);科学的这种应用,即自然科学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同样是建立在这一过程的智力同个别工人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相分离的基础上的,正像生产的[物质]条件的集中和发展以及这些条件转化为资本是建立在使工人丧失这些条件,使工人同这些条件相分离的基础上的一样。况且,工厂劳动使工人只能获得某些操作方法的知识;因此,随着工厂劳动的推广,学徒法废除了;而国家等为争取童工至少学会写字和阅读的斗争表明,科学在生产过程中的上述应用和在这一过程中压制任何智力的发展,这两者是一致的。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会造就一小批具有较高熟练程度的工人,但是,他们的人数决不能同"被剥夺了知识的"大量工

人相比。

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1861年8月至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71—572页。

(二)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的应用

和所有以往的形式相比,只有大工业是革命的。但是,它作为资本主义的形式,仍然使工人保持固定化的分工。

大工业消灭了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的秘诀和传统的固定化,它把生产过程变为对自然力的有意识的应用。因此,和所有以往的形式相比,只有大工业是革命的。但是,它作为资本主义的形式,仍然使工人保持固定化的分工。因为它每天变革着分工的基础,所以工人因此而毁灭。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同一个工人有更换职业的必要。所以就要求他尽可能多方面发展,并且有了社会革命的可能。

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提要》(1868年春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22页。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绝不否认,在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中也出现短暂的不便;但是哪个徽章没有反面呢!对他们说来,机器除了资本主义的利用以外不可能有别的利用。

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机器本身对于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机器使它所占领的那个部门的产品便宜,产量增加,而且最初也没有使其他工业部门生产

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发生变化。因此,完全撇开年产品中被非劳动者挥霍掉的巨大部分不说,在应用机器以后,社会拥有的可供被解雇的工人用的生活资料同以前一样多,或者更多。而这正是经济学辩护论的主要点!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如此等等,所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简单地宣称,对机器本身的考察确切地证明,所有这些显而易见的矛盾都不过是平凡现实的假象,而就这些矛盾本身来说,因而从理论上来说,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于是,他们就用不着再动脑筋了,并且还指责他们的反对者愚蠢,说这些人不是反对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而是反对机器本身。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决不否认,在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中也出现短暂的不便;但是哪个徽章没有反面呢!对他们说来,机器除了资本主义的利用以外不可能有别的利用。因此,在他们看来,机器使用工人和工人使用机器是一回事。所以,谁要是揭露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真相,谁就是根本不愿意有机器的应用,就是社会进步的敌人!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册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08—509页。

它（铁路）给资本的积聚以一种从未预料到的推动力，而且也加速了和大大扩大了借贷资本的世界性活动，从而使整个世界陷入财政欺骗和相互借贷——资本主义形式的“国际”博爱——的罗网之中。

铁路首先是作为“实业之冠”出现在那些**现代化工业最发达**的国家英国、美国、比利时、法国等地。我把它叫作“实业之冠”，不仅是因为它终于（同远洋轮船和电报一起）成了和现代生产资料相适应的**交通联络工具**，而且也因为它给巨大的股份公司提供了基础，同时形成了从股份银行开始的**其他各种**股份公司的一个新的起点。总之，它给**资本的积聚**以一种从未预料到的推动力，而且也加速了和大大扩大了**借贷资本的世界性活动**，从而使整个世界陷入财政欺骗和相互**借贷**——资本主义形式的“国际”博爱——的罗网之中。

另一方面，铁路网在居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现，促使甚至迫使那些资本主义还局限在社会的少数点面上的国家在最短期间建立起它们的资本主义的**上部结构**，并把这种上部结构扩大到同主要生产仍以传统方式进行的社会机体的躯干完全不相称的地步。因此，毫无疑问，铁路的敷设在这些国家里加速了社会的和政治的解体，就像在比较先进的国家中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发展，从而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彻底变革一样。在一切国家中（英国除外），政府都让铁路公司依靠国库发财和发展。在美国，铁路公司除了盈利外，还无偿地得到大量国有土地，其中不仅有敷设铁路所必需的

土地，而且还包括线路两旁许多英里之内布满森林等等的土地。这样，它们就变成了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因为，移民中的小农场主当然优先选择这种为他们的产品提供现成的运输工具的土地。

马克思：《马克思致尼·弗·丹尼尔逊》（1879年4月1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5—636页。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7页。

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

自然因素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自然因素被列入资本的组成部分——是同**科学**作为生产过程的独立因素的发展相一致的。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每一项发现都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的基础。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

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

只有在这种生产方式下，才第一次产生了只有用科学方法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只有现在，实验和观察——以及生产过程本身的迫切需要——才第一次达到使科学的应用成为可能和必要的那样一种规模。现在，**科学**，人类理论的进步，得到了**利用**。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这样一来，**科学**作为**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同时就和**直接劳动**相**分离**，而在以前的生产阶段上，范围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是同劳动本身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并没有发展成为同劳动相分离的独立的力量，因而整个说来从未超出制作方法的积累的范围，这种积累是一代代加以充实的，并且是很缓慢地、一点一点地扩大的。（凭经验掌握每一种手艺的秘密。）手和脑还没有相互分离。

马克思：《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1861 年 8 月—1863 年 7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570 页。

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

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自然史理论触犯了神学的陈腐偏见，引起了并且直到现在还在引起最激烈的斗争。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

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现代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也就不足为奇了。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08 年 4 月 3 日〔16 日〕以前），《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 页。

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的反映。

正如从前工场手工业以及在它影响下进一步发展了的手工业同封建的行会桎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时就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限制它的框框发生冲突了。新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这种冲突，并不是像人的原罪和神的正义的冲突那样产生于人的头脑中，而是存在于事实中，客观地、在我们之外、甚至不依赖于引起这种冲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动而存在着。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的反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 年 1 月—3 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96 页。

正因为现代自然科学经历着急剧的变革，所以往往会产生一些大大小小的反动的哲学学派和流派。

必须记住,正因为现代自然科学经历着急剧的变革,所以往往会产生一些大大小小的反动的哲学学派和流派。因此,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注意自然科学领域最新的革命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并吸收自然科学家参加哲学杂志所进行的这一工作,不解决这个任务,战斗唯物主义决不可能是战斗的,也决不可能是唯物主义。

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2 年 3 月 12 日),《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51 页。

在英国只存在着工业资本家还是工业工人占统治地位的问题,而且正是在英国,存在着能够使现代形式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的土壤……

只有在英国,工业才达到了囊括整个民族利益和各阶级全部生活条件的规模。工业一方面是工业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工业无产阶级,而民族的所有其他组成部分都日益集结在这两个相互对立的阶级的周围。所以,在英国只存在着工业**资本家**还是工业**工人**占统治地位的问题,而且正是在英国,存在着能够使现代形式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的土壤,在这种土壤上工业无产阶级一方面具有夺取政权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具有使它能够进行全面的社会革命和彻底地消灭阶级对立的物质手段,即生产力。

恩格斯:《英国》(1852 年 1 月 23—30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46 页。

资产阶级在法国和英国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

资产阶级在法国和英国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甚至以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为首的反谷物法同盟抛出的强迫人接受的小册子，由于对地主贵族展开了论战，即使没有科学的意义，毕竟也有历史的意义。但是罗伯特·皮尔爵士执政以来的自由贸易的立法，也把庸俗经济学的最后这根刺拔掉了。

1848 年大陆的革命也在英国产生了反应。那些还要求有科学地位、不愿单纯充当统治阶级的诡辩家和献媚者的人，力图使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于是，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为最著名代表的平淡无味的混合主义产生了。这宣告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破产，关于这一点，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尼·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中已作了出色的说明。

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在法国和英国通过历史斗争而明显地暴露出来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在德国成熟起来，同时，德国无产阶级比德国资产阶级在理论上

已经有了更明确的阶级意识。因此,当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看来在德国有可能产生的时候,它又成为不可能了。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8页。

它破坏一切还部分地掩盖着资本统治的陈旧的过渡的形式,而代之以直接的、无掩饰的资本统治。

如果说,作为工人阶级的身体和精神的保护手段的工厂立法的普遍化已经不可避免,那么,另一方面,正如前面讲到的,这种普遍化使小规模的分散的劳动过程向大的社会规模的结合的劳动过程的转化也普遍化和加速起来,从而使资本的积聚和工厂制度的独占统治也普遍化和加速起来。它破坏一切还部分地掩盖着资本统治的陈旧的过渡的形式,而代之以直接的、无掩饰的资本统治。这样,它也就使反对这种统治的直接斗争普遍化。它迫使单个的工场实行划一性、规则性、秩序和节约,同时,它又通过对工作日的限制和规定所造成的对技术的巨大刺激而加重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灾难,提高劳动强度并扩大机器与工人的竞争。它在消灭小生产和家庭劳动的领域的同时,也消灭了"过剩人口"的最后避难所,从而消灭了整个社会机制的迄今为止的安全阀。它在使生产过程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结合成熟的同时,也使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矛盾和对抗成熟起来,因此也同时使新社会的形成要素和旧社会的变革要素成熟起来。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册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76—577页。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从事采煤的千百万矿工的劳动的"解放"必将造成工人大批失业,贫困现象大大加重,工人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

这一发明在工业中所引起的变革将是巨大的。

但是这一变革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整个社会生活的影响,与这一发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能产生的影响是大不相同的。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从事采煤的千百万矿工的劳动的"解放",必将造成工人大批失业,贫困现象大大加重,工人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而这一伟大发明所带来的利润,则将流入摩根、洛克菲勒、里亚布申斯基、莫罗佐夫家族以及他们的随从如律师、经理、教授和其他资本奴仆的腰包。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采用拉姆赛的这种能"解放"千百万矿工及其他工人的劳动的方法,就能立刻缩短**一切工人**的工作时间,例如从8小时缩短到7小时,甚至更少些。所有工厂和铁路的"电气化",一定能使劳动的卫生条件更好,使千百万工人免受烟雾、灰尘和泥垢之苦,使肮脏的、令人厌恶的工作间尽快变成清洁明亮的适合人们工作的实验室。家家户户有电力照明和电力取暖设备,就一定能使千百万"家庭女奴"不再把一生中四分之三的时光消磨在乌烟瘴气的厨房里。

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将愈来愈**超越**那些必然使劳动者

处于雇佣奴隶地位的社会条件。

列宁:《一个伟大的技术胜利》(1913年4月21日〔5月4日〕),《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4页。

(三)无产阶级是现代大生产的主人

这种技术,照我们的观点看来,也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被奴役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等等。

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因此,这里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这种技术,照我们的观点看来,也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被奴役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等等。此外,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

恩格斯:《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1页。

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

旧社会内部的所有冲突在许多方面都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发展。资产阶级处于不断的斗争中:最初反对贵族;后来反对同工业进步有利害冲突的那部分资产阶级;经常反对一切外国的资产阶级。在这一切斗争中,资产阶级都不得不向无产阶级呼吁,要求无产阶级援助,这样就把无产阶级卷进了政治运动。于是,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自己的教育因素①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

其次,我们已经看到,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的整批成员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②

最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 年 12

① "教育因素"在 1888 年英文版中是"政治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因素"。——编者注

② "大量的教育因素"在 1888 年英文版中是"启蒙和进步的新因素"。——编者注

月—1848 年 1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82 页。

马克思已经从理论上总结了英国和法国的实践和理论发展史的成果,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本质,从而也揭示了它的最终历史命运。这就给德国无产阶级提供了它的先驱者英国人和法国人从来没有过的纲领。

……你看看多有趣。正是德国的工业落后,给我们事业的进展帮了大忙。英国和法国向大工业的过渡大体已经完成。无产阶级所处的境况现在已经稳定;农业区和工业区,大工业和家庭工业已经分离,并且按现代工业所能容许的程度固定下来了。甚至每隔十年一次的周期性危机引起的波动,也已经成了习以为常的生存条件。工业变革时期出现的政治运动或直接社会主义运动(那时还不成熟)遭到了失败,遗留下来的与其说是鼓舞,不如说是沮丧;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证明自己比革命的反抗更有力量;再要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就需要新的更强大的推动力,例如,英国失去它目前在世界市场上的统治地位或者法国发生某种特别的革命事件。

相反,德国大工业的发展在 1848 年才开始,这是那一年最可观的遗产。工业变革仍然在继续,而且是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继续着。以小块自由地产或租佃地产支撑的家庭工业,仍然在同机器和蒸汽抗争;濒于毁灭的小农抓住家庭工业作为最后的救命稻草;但是,刚刚被卷入工业,它又被机器和蒸汽压下去。农业的辅助收入,自己种的马铃薯,成为资本家压低工资最有力的工具;资本家现在把全部正常的剩余价值

赠送给外国买主，只靠这种办法才在世界市场上保持住竞争能力，他自己的全部利润则通过降低正常工资来榨取。同时，由于大工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工业中心的整个生活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样，整个德国（也许只有容克的东北地区除外）都卷入社会革命，小农被拉入工业，最守旧的地区也被卷进这个运动，因而整个德国的革命化比英国或法国彻底得多。而这场最终导致剥夺小农和手工业者的社会革命，又是发生在这样的时候：恰好一个德国人——马克思已经从理论上总结了英国和法国的实践和理论发展史的成果，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本质，从而也揭示了它的最终历史命运。这就给德国无产阶级提供了它的先驱者英国人和法国人从来没有过的纲领。一方面是更加深刻的社会变革，另一方面是人们更加心明眼亮，——这就是德国工人运动势不可挡地发展的奥秘……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84年11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8—669页。

工人阶级不会在斗争中灭亡，而会在斗争中成长，巩固，壮大，团结起来，受到教育和锻炼。

这也就是农民、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即一切小资产者的心理同无产者的心理的根本不同之处。小资产者看到和感觉到自己要完蛋了，日子愈来愈难过了，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愈来愈残酷无情了，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愈来愈没有出路了。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小资产者对这种情况也表示抗议。

但是他们是**怎样**表示抗议的呢?

他们是作为必遭灭亡的、对于自己的将来感到绝望的、受压抑的和怯懦的阶级的代表来表示抗议的。于是没有办法,只好少生孩子,免得也像我们那样受苦受难,也像我们那样受穷受屈辱,——这就是小资产者的叫喊。

觉悟的工人远不是这种观点。不管这种叫喊多么恳切动人,他们是不会因此而模糊自己的意识的。是的,不论我们工人,还是小业主群众,都过着充满难以忍受的压迫和苦难的生活。我们这一代比我们的父辈更艰难。但是有一个方面我们要比我们的父辈幸运得多。我们**已经学会斗争并且学得很快**,而且我们不像我们父辈中的优秀人物那样单枪匹马地斗争,也不是为了资产阶级雄辩家提出的在思想内容上与我们格格不入的口号而斗争,我们是为了自己的口号,为了自己阶级的口号而斗争。我们比我们的父辈斗争得出色。我们的子女将比我们斗争得更出色,而且**他们一定会取得胜利**。

工人阶级不会在斗争中灭亡,而会在斗争中成长,巩固,壮大,团结起来,受到教育和锻炼。对于农奴制、资本主义和小生产,我们是悲观论者,但是对于工人运动及其目的,我们是竭诚的乐观论者。我们已经在为新的大厦奠定基础,我们的子女将把它建成。

列宁:《工人阶级和新马尔萨斯主义》(1913年6月6日〔19日〕),《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66—267页。

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

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对于印度这样一个和欧洲一样大的、幅员15000万英亩的国家，英国工业的破坏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是令人吃惊的。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这种作用只是整个现存的生产制度所产生的有机的结果。这个生产建立在资本的绝对统治上面。资本的集中是资本作为独立力量而存在所十分必需的。这种集中对于世界市场的破坏性影响，不过是在广大范围内显示目前正在每个文明城市起着作用的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内在规律罢了。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1853年7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1—252页。

(社会主义)运动是在出身于资产阶级的一些"有教养的人"中间发展着,他们在某些地方正试图同群众发生接触,有时也不无成就。这些人在精神上和理性上是大不相同的,因此要过一段时间,他们才会显出差别,情况才会明朗。

我最近也多少研究过这个问题,如果有时间,准备就这方面给《社会民主党人报》写点东西。市侩们真奇怪,竟不理解:如此令人悲痛的"流浪生活这个灾祸",是大工业在德国既有的农业和手工业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必然产物;正是这种大工业——因为德国处处落后——只有经常在恶劣的经济状况的压力下才能发展起来。因为德国人只有依靠极其微薄的低工资,只有对作为工厂工业陪衬的家庭工业进行越来越重的剥削,才能经得起竞争。由手工业变成家庭工业,由家庭工业——只要合算就行——逐渐变成工厂工业和机器工业,这就是在德国的发展过程。我国目前还只是在钢铁工业方面有了真正的大工业,而在纺织工业方面还是手织机占优势,这是由于纺织工人的工资微薄和他们有种马铃薯的菜园子的缘故。

在英国,工业就具有另外一种性质了。从1870年起,由于美国和德国的竞争,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已经开始进入尾声。看来,从那个时候起,十年的周期被打破了。从1868年起,在一些基本部门中,由于生产增长缓慢,受抑压的状况占了优势,而现在美国和英国似乎都面临新危机的威胁,在英国这里,新危机到来之前,已经没有繁荣期作为前导了。这就是在这里突然地(虽然近三年来缓慢地酝酿着,但是现在却突然地)爆发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秘密所在。有组织的工

人(工联)直到现在仍然置身运动之外;运动是在出身于资产阶级的一些"有教养的人"中间发展着,他们在某些地方正试图同群众发生接触,有时也不无成就。这些人在精神上和理性上是大不相同的,因此要过一段时间,他们才会显出差别,情况才会明朗。但是,这一运动现在未必又会完全停止下来。亨利·乔治和他的土地国有化,大概会起一颗流星的作用,因为在这里,在大地产具有巨大规模的情况下,这个问题既有传统的意义,又有现实的意义。但是,在世界第一个工业国里,事情不会长时间地局限于此。

恩格斯:《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84 年 1 月 18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89—90 页。

日益发展的工业使一切传统的关系革命化,而这种革命化又促使头脑革命化。

……在这里,在古老的欧洲,比你们那个还没有很好地摆脱少年时代的"年轻的"国家,倒是更活跃一些。在这样一个从未经历过封建主义、一开始就在资产阶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年轻的国家里,资产阶级偏见在工人阶级中也那样根深蒂固,这是令人惊奇的,然而也是十分自然的。美国工人正因为同还披着封建外衣的宗主国相比较,便也以为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天然就是,而且任何时候都是先进的、优越的、无与伦比的。这同新英格兰的情况完全一样,在那里,清教主义这一整个殖民地产生的根源,正因为如此变成了传统的遗产,而且同它的地方观念几乎不能分开。无论美国人多么神气和执

拗，也不能把他们那个确实宏伟的未来像期票一样贴现；他们必须等到支付日期，正因为未来是如此远大，他们的现在主要是为这个未来作准备工作；这一工作正如在每一个年轻的国家里那样，主要是物质性质的，它会造成人们思想上某种程度的落后，使人们留恋同新民族的形成相联系的传统。盎格鲁撒克逊种族——这些可恶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人，马克思总是这样称呼他们——本来就脑筋迟钝，而他们在欧洲和美洲的历史（经济上的成就和政治上的主要是和平的发展），使他们的这一特点更加突出。在这里，只有发生重大事变，才能有所帮助；国有土地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转为私人占有，如果现在还能在不太狂暴的关税政策下扩展工业，并夺取国外市场，那么，你们那里的事情也就好办了。阶级斗争在英国这里也是在大工业的发展时期比较剧烈，而恰好是在英国工业无可争辩地在世界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沉寂下去的。在德国，1850 年以来的大工业的发展也是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同时出现的，美国的情况大概也不会有什么两样。日益发展的工业使一切传统的关系革命化，而这种革命化又促使头脑革命化。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892 年 12 月 31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16—717 页。

一旦人们不再把工业看作买卖利益而是看作人的发展，就会把人而不是把买卖利益当作原则，并向工业中只有同工业本身相矛盾才能发展的东西提供与应该发展的东西相适应

的基础。

当然，也可以从与肮脏的买卖利益的观点——现今不仅单个的商人，单个的工厂主，而且工业和商业的国家，也是从肮脏的买卖利益来看待工业的——完全不同的观点来看待工业。工业可以被看作是大作坊，在这里人第一次占有他自己的和自然的力量，使自己对象化，为自己创造人的生活的条件。如果这样看待工业，那就撇开了当前工业从事活动的、工业作为工业所处的环境；那就不是处身于工业时代之中，而是在它之上；那就不是按照工业目前对人来说是什么，而是按照现在的人对人类历史来说是什么，即历史地说他是什么来看待工业；所认识的就不是工业本身，不是它现在的存在，倒不如说是工业意识不到的并违反工业的意志而存在于工业中的力量，这种力量消灭工业并为人的生存奠定基础。（主张每个民族自身都经历这种发展，正像主张每个民族都必须经历法国的政治发展或德国的哲学发展一样，是荒谬的观点。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主要的方面）。因此，在英国的工业，法国的政治和德国的哲学制定出来之后，它们就是为全世界制定的了，而它们的世界历史意义，也像这些民族的世界历史意义一样，便以此而告结束。）

对工业的这种估价同时也就是承认废除工业的时刻已经到了，或者说，消除人类不得不作为奴隶来发展自己能力的那种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时刻已经到了。因为一旦人们不再

把工业看作买卖利益而是看作人的发展，就会把人而不是把买卖利益当作原则，并向工业中只有同工业本身相矛盾才能发展的东西提供与应该发展的东西相适应的基础。

马克思：《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5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7—258页。

圣西门学派狂热赞美工业的生产力。它把工业唤起的力量同工业本身即同工业给这种力量所提供的目前的生存条件混为一谈了。

圣西门学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富有教益的例子，说明人们如果把工业违反自己意志而无意识地创造的**生产力**归功于现代工业，把二者即把**工业**同工业无意识地并违反自己意志而造成的、一旦废除了工业就能成为人类的力量、人的威力的那种**力量**混淆起来，将会造成怎样的结果。这样做，正像资产者想把**他的**工业创造出无产阶级，创造出由无产阶级所体现的新的社会制度的力量归功于自己一样，是荒谬的。工业用符咒招引出来（唤起）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对工业的关系，同无产阶级对工业的关系完全一样。今天，这些力量仍然是资产者的奴隶，资产者无非把它们看作是实现他的自私的（肮脏的）利润欲的工具（承担者）；明天，它们将砸碎自身的锁链，表明自己是会把资产者连同只有肮脏外壳（资产者把这个外壳看成是工业的本质）的工业一起炸毁的人类发展的承担者，这时人类的核心也就赢得了足够的力量来炸毁这个

外壳并以它自己的形式表现出来。明天,这些力量将炸毁资产者用以把它们同人分开并因此把它们从一种真正的社会联系变为(歪曲为)社会桎梏的那种锁链。

圣西门学派狂热赞美工业的生产力。它把工业唤起的力量同工业本身即同工业给这种力量所提供的目前的生存条件混为一谈了。当然,我们决不能把圣西门主义者同李斯特这个人或德国庸人等量齐观。打破工业的羁绊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摆脱工业力量现在借以活动的那种条件、那种金钱的锁链,并考察这种力量本身。这是向人发出的第一个号召:把他们的工业从买卖中解放出来,把目前的工业理解为一个过渡时期。圣西门主义者并没有停留于这种解释,他们继续前进,向交换价值、当前的社会组织、私有制进攻。他们提出以联合代替竞争。但是,他们原先的错误惩罚了他们。上述那种混淆不仅使他们陷入幻想,把卑鄙龌龊的资产者看作牧师,而且也使他们在最初的外部斗争之后又回到旧的幻想(旧的混淆)之中,不过现在是虚伪的,因为他们所混淆的两种力量的对立恰好在斗争中表面化了。他们对工业生产力的赞美成了对资产阶级的赞美。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迪韦里埃先生、杜诺瓦耶先生使自己和资产阶级在整个欧洲面前受辱——后来,历史抛到他们面前的臭蛋被资产阶级魔术变成了金蛋——,因为三个人中的第一个人仍然保留旧的词句,不过赋予它们以现代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容,第二个人本身就是从事批发生意的,并且经售法国报刊,而第三个人则成为对现状的最狂热的辩护士,其无耻程度(无人性)超过了所有以前的英国的和法国的经济学家。——德国资产者和李斯特先生以虚

伪、欺骗和卖弄辞藻开始，而圣西门学派则以此告终。

马克思：《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5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8—260页。

社会劳动一旦摆脱资本的奴役，工人委员会就一定能在工会组织的协助下实行这些原则，合理地分配社会劳动。

资本组织和调整工厂内的劳动，以便进一步压榨工人，增加自己的利润。但是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混乱现象依然存在并且日益增长，以致引起危机，这时积累起来的财富找不到买主，而千百万人却找不到工作，忍饥挨饿，死于非命。

泰罗制——出乎它的创始人的意料，并且违背了他们的本意——正在酝酿着这样一个时代的来临：无产阶级将把全部社会生产掌握在自己手中，指派工人自己的委员会对整个社会劳动进行合理的分配和调整。大生产、机器、铁路、电话——有了这一切就有充分的可能把组织起来的工人的工作时间缩短3/4，保证他们享受的福利为现在的四倍。

社会劳动一旦摆脱资本的奴役，工人委员会就一定能在工会组织的协助下实行这些原则，合理地分配社会劳动。

列宁：《泰罗制就是用机器奴役人》（1914年3月13日〔26日〕），《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99—400页。

六、意识形态与宗教

(一)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力量的宗教

随着真正的合作制和公有制的消失,荒诞的宗教成分就成了氏族的最主要因素;香火的气味倒是保留下来了。

[这是只有"观念的"、亦即蛰居式的书斋学者才能干出来的事情。由于**血族联系**(尤其是专偶婚制发生后)已经湮远,而过去的现实看来是反映在**神话的幻想**中,于是老实的庸人们便作出了而且还在继续作着一种结论,即**幻想的系谱**创造了现实的氏族!]很多氏族成员都能够远远追溯他们的世系,而其余的成员在有实际需要时也以**他们具有的氏族名称**作为共同世系的充分证据。**希腊人的氏族多是小团体**;一个氏族有 30 个家庭,家长之妻不计算在内,**平均一个氏族有 120 人**。

希腊人的宗教活动发源于**氏族**,后来扩展到胞族,最后就发展为所有部落共同举行的定期节日活动。(**德·库朗日**)

随着**真正的合作制**和**公有制**的消失,荒诞的**宗教**成分就成了氏族的最主要因素;香火的气味倒是保留下来了。

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1880 年底—1881 年 3 月初),《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04页。

一定的工业关系和交往关系如何必然地和一定的社会形式，从而和一定的国家形式以及一定的宗教意识形式相联系。

那种使人们满足于这类诸精神史的观点，本身就是宗教的观点，因为人们抱着这种观点，就会安于宗教，就会认为宗教是causa sui〔自身原因〕（因为"**自我意识**"和"**人**"也还是宗教的），而不去从经验条件解释宗教，不去说明：一定的工业关系和交往关系如何必然地和一定的社会形式，从而和一定的国家形式以及一定的宗教意识形式相联系。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1845年秋—大约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62页。

只有根据宗教借以产生和取得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去说明它的起源和发展，才能解决问题。

从中世纪的自由思想者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者，这期间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一切宗教，包括基督教在内，都是骗子手的捏造。但是，自从黑格尔向哲学提出了说明世界历史中的理性发展的任务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之后，上述观点便再也不能令人满意了。

事情很清楚，自发的宗教，如黑人对物神的膜拜或雅利安人共有的原始宗教，在它产生的时候，并没有欺骗的成分，但在以后的发展中，僧侣的欺诈很快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至

于人为的宗教，虽然充满着虔诚的狂热，但在其创立的时候，便少不了欺骗和伪造历史，而基督教，正如鲍威尔在考证新约时所指出的，也一开始就在这方面做出了可观的成绩。但这只是指出了一般现象，并没有说明这里所要谈的具体情况。

对于一种征服罗马世界帝国、统治文明人类的绝大多数达1800年之久的宗教，简单地说它是骗子凑集而成的无稽之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根据宗教借以产生和取得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去说明它的起源和发展，才能解决问题。对基督教更是这样。

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1882年4月下半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49—550页。

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

国家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社会创立一个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这种机关就是国家政权。它刚一产生，对社会来说就是独立的，而且它越是成为某个阶级的机关，越是直接地实现这一阶级的统治，它就越独立。被压迫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必然要变成政治的斗争，变成首先是反对这一阶级的政治统治的斗争；对这一政治斗争同它的经济基础的联系的认识，就日益模糊起来，并且会完全消失。即使在斗争参加者那里情况不完全是这样，但是在历史编纂学家那里差不多总是这样的。在关于罗马共和国内部斗争的古代史料中，

只有阿庇安一人清楚而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一斗争归根到底是为什么进行的，即为土地所有权进行的。

但是，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来说是独立的力量，马上就产生了另外的意识形态。这就是说，在职业政治家那里，在公法理论家和私法法学家那里，同经济事实的联系就完全消失了。因为经济事实要以法律的形式获得确认，必须在每一个别场合都采取法律动机的形式，而且，因为在这里，不言而喻地要考虑到现行的整个法的体系，所以，现在法律形式就是一切，而经济内容则什么也不是。公法和私法被看作两个独立的领域，它们各有自己的独立的历史发展，它们本身都可以系统地加以说明，并需要通过彻底根除一切内部矛盾来作出这种说明。

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越来越错综复杂，越来越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但是这一联系是存在着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 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53—254 页。

宗教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因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

路易十四的暴力措施只是使法国的资产阶级更便于以唯一同已经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相适应的、非宗教的、纯粹政治

的形式进行自己的革命。出席国民议会的不是新教徒，而是自由思想家了。由此可见，基督教进入了它的最后阶段。此后，它已不能成为任何进步阶级的意向的意识形态外衣了；它越来越变成统治阶级专有的东西，统治阶级只把它当作使下层阶级就范的统治手段。同时，每个不同的阶级都利用它自己认为适合的宗教：占有土地的容克利用天主教的耶稣会派或新教的正统派，自由的和激进的资产者则利用理性主义，至于这些先生们自己相信还是不相信他们各自的宗教，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

这样，我们看到，宗教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因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但是，这些材料所发生的变化是由造成这种变化的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引起的。在这里只说这一点就够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 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56—257 页。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就是说，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但是，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

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要，它的具有通俗形式的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Point d'honneur]，它的狂热，它的道德约束，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求得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因此，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宗教是它的**神圣光环**——**的批判的胚芽**。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10月中—12月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9—200页。

……因为宗教教导人们为了升入所谓的天堂而“毫无怨言地”忍受尘世间的地狱之苦。

正教的圣物之所以宝贵，就是由于它教导人们“毫无怨言地”忍受痛苦！的确，这是多么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圣物啊！既然社会制度使得极少数人有钱有势，而群众经常忍受“困

苦”并且承担着“艰巨的义务”，那么剥削者同情宗教是十分自然的，因为宗教教导人们为了升入所谓的天堂而“毫无怨言地”忍受尘世间的地狱之苦。

列宁：《政治鼓动和“阶级观点”》（1902年2月1日〔14日〕），《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7页。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是一种精神上的劣质酒，资本的奴隶饮了这种酒就毁坏了自己做人的形象，不再要求多少过一点人样的生活。

宗教是一生为他人干活而又深受穷困和孤独之苦的人民群众所普遍遭受的种种精神压迫之一。被剥削阶级由于没有力量同剥削者进行斗争，必然会产生对死后的幸福生活的憧憬，正如野蛮人由于没有力量同大自然搏斗而产生对上帝、魔鬼、奇迹等的信仰一样。对于辛劳一生贫困一生的人，宗教教导他们在人间要顺从和忍耐，劝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恩赐上。对于依靠他人劳动而过活的人，宗教教导他们要在人间行善，廉价地为他们的整个剥削生活辩护，向他们廉价出售进入天国享福的门票。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是一种精神上的劣质酒，资本的奴隶饮了这种酒就毁坏了自己做人的形象，不再要求多少过一点人样的生活。

列宁：《社会主义和宗教》（1905年12月3日〔16日〕），《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页。

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

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

现在我们再简略地谈谈宗教,因为宗教离开物质生活最远,而且好像是同物质生活最不相干。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他们本身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界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但是,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作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存在的东西来对待了。人们头脑中发生的这一思想过程,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这一事实,对这些人来说必然是没有意识到的,否则,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因此,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对于完全由宗教培育起来的群众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市民阶级从最初起就给自己制造了一种由无财产的、不属于任何公认的等级的城市平民、短工和各种仆役所组成的附属品,即后来的无产阶级的前身,同样,宗教异端也早就分成了两派:市民温和派和甚至也为市民异教徒所憎恶的平民革命派。

新教异端的不可根绝是同正在兴起的市民阶级的不可战胜相适应的;当这个市民阶级已经充分强大的时候,他们从前同封建贵族进行的主要是地方性的斗争便开始采取全国性的规模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发生在德国,这就是所谓的宗教改革。那时市民阶级既不够强大又不够发展,不足以把其

他的反叛等级——城市平民、下级贵族和乡村农民——联合在自己的旗帜之下。贵族首先被击败;农民举行了起义,形成了这次整个革命运动的顶点;城市背弃了农民,革命被各邦君主的军队镇压下去了,这些君主攫取了革命的全部果实。从那时起,德国有整整三个世纪从那些能独立地干预历史的国家的行列中消失了。但是除德国人路德外,还出现了法国人加尔文,他以真正法国式的尖锐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使教会共和化和民主化。当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国已经蜕化并把德国引向灭亡的时候,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却成了日内瓦、荷兰和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使荷兰摆脱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并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在这里,加尔文教显示出它是当时资产阶级利益的真正的宗教外衣,因此,在1689年革命由于一部分贵族同资产阶级间的妥协而结束以后,它也没有得到完全的承认。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256页。

……一般的历史运动带有宗教的色彩……

仅仅在这些多少是人工造成的世界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里,我们才发现比较一般的历史运动带有宗教的色彩,甚至在基督教传播的范围内,具有真正普遍意义的革命也只有在资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最初阶段即从13世纪到17

世纪，才带有这种宗教色彩；而且，这种色彩不能像费尔巴哈所想的那样，用人的心灵和人的宗教需要来解释，而要用以往的整个中世纪的历史来解释，中世纪的历史只知道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但是到了18世纪，资产阶级已经强大得足以建立他们自己的、同他们的阶级地位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了，这时他们才进行了他们的伟大而彻底的革命——法国革命，而且仅仅诉诸法律的和政治的观念，只是在宗教挡住他们的道路时，他们才理会宗教；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要用某种新的宗教来代替旧的宗教；大家知道，罗伯斯比尔在这方面曾遭受了怎样的失败。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页。

仅仅用嘲笑和攻击是不可能消灭像基督教这样的宗教的，还应该从科学方面来克服它……

此外**德国新教——这是基督教的唯一值得批判的现代形式**。天主教在18世纪已经**受了批判**，已经成了**论战**的对象（可见老天主教徒毕竟是多么愚蠢啊！）；分裂为无数教派的英国新教没有神学发展的历史，即使有，那也只是每一阶段都集中表现为创立一个新的教派。只有德国人掌握了神学，并且由于这个缘故而拥有批判对象——历史学的、语文学的和哲学的批判对象。**这种批判是德国的产物**，如果没有德国的新教，这种批判是不可能的，然而它是绝对必要的。**仅仅**用嘲笑和攻击是不可能消灭像基督教这样的宗教的，还应该**从科**

学方面来克服它，也就是说**从历史上来说明它**，而这一任务甚至连自然科学也是无力完成的。

恩格斯：《关于德国的札记》（1873 年底—1874 年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74—175 页。

（二）现代国家与宗教

当国家从国教中解放出来，就是说，当国家作为一个国家，不信奉任何宗教，确切地说，信奉作为国家的自身时，国家才以自己的形式，以自己本质所固有的方式，作为一个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

犹太教徒、基督徒、一般宗教信徒的**政治**解放，是**国家**从犹太教、基督教和一般**宗教中解放出来**。当国家从**国教**中解放出来，就是说，当国家作为**一个国家**，不信奉任何宗教，确切地说，信奉作为国家的自身时，国家才以自己的形式，以自己本质所固有的方式，作为**一个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摆脱了宗教的**政治**解放，不是彻头彻尾、没有矛盾地摆脱了宗教的解放，因为政治解放不是彻头彻尾、没有矛盾的**人的**解放方式。

政治解放的限度一开始就表现在：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即使人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为**自由国家**①。

① 德文原文是“Freistaat”，本意指“共和国”，字面的意思是“自由国家”。——编者注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1843 年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70 页。

当国家摆脱了国教并且让宗教在市民社会范围内存在时,国家就从宗教下解放出来了……

当国家摆脱了**国教**并且让宗教在市民社会范围内存在时,国家就从宗教下解放出来了,同样,当单个的人已经不再把宗教当作**公事**而当作自己的**私事**来对待时,他**在政治上**也就从宗教下解放出来了。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 年 9 月—1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43 页。

在我们的时代唯一能替神帮点忙的事情,就是把无神论宣布为强制性的信仰象征,并以禁止一切宗教来超越俾斯麦的文化斗争中的反教会法令。

而这个要求,即遵照穆夫提的吩咐[①]使人们成为无神论者,是由两位公社委员签署的,而他们一定已有充分的机会体验到:首先,在纸上可以随便写多少条命令,而用不着去实际执行;其次,取缔手段是巩固不良信念的最好手段! 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在我们的时代唯一能替神帮点忙的事情,就是把无神论宣布为强制性的信仰象征,并以禁止一切宗教来超越俾斯麦的文化斗争中的反教会法令。

① 意即根据上面的命令;穆夫提是伊斯兰教教法说明官。——编者注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1874 年 5 月—1875 年 4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47 页。

16 世纪的所谓宗教战争首先也是为着十分实际的物质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

16 世纪的所谓宗教战争首先也是为着十分实际的物质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这些战争同后来英国和法国的国内冲突完全一样,都是阶级斗争。如果说这些阶级斗争当时是在宗教的标志下进行的,如果说各阶级的利益、需要和要求都还隐蔽在宗教外衣之下,那么,这并没有改变事情的实质,而且也不难用时代条件来加以解释。

弗·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50 年夏—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82 页。

在资产阶级经济学没有用编造神话的办法把自己同过去的经济完全等同起来时,它对于以前的经济,特别是它曾经还不得不与之直接斗争的封建经济的批判,是与基督教对异教的批判或者新教对旧教的批判相似的。

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只是发展的一种对立的形式,所以,那些早期形式的各种关系,在它里面常常只以十分萎缩的或者完全歪曲的形式出现。公社所有制就是个例子。因此,如果说资产阶级经济的范畴适用于一切其他社会形式这种说法是对的,那么,这也只能在一定意义上来理解。这些范畴可以在发展了的、萎缩了的、漫画式的种种形式上,总是在有本

质区别的形式上,包含着这些社会形式。所说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在可能范围内完成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在资产阶级经济学没有用编造神话的办法把自己同过去的经济完全等同起来时,它对于以前的经济,特别是它曾经还不得不与之直接斗争的封建经济的批判,是与基督教对异教的批判或者新教对旧教的批判相似的。

马克思:《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1857 年 8 月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7 页。

只有在劳动条件和实际生活条件,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明白而合理的关系时,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

宗教世界只是现实世界的反映。对于劳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因而生产者之间的最普遍的关系在于比较他们的产品的价值并在这种物的外壳下把他们的私人劳动作为等同的人类劳动加以比较的社会来说,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它的资产阶级的类型,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

宗教补充。在古亚细亚的，一般说来，古代世界的生产方式下，产品变为商品，只起从属的作用，但是随着共同体接近于解体，这种作用越来越重要。真正的商业民族只存在于古代世界的空隙中，就像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这些古老的社会机体在生产方面比资产阶级社会简单明了得多；但它们或者以个人——可以说历史尚未割断把他同原始部落的天然共同体联系在一起的脐带——尚未成熟为基础，或者以专制制度和奴隶制度的条件为基础。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是这些古老的社会机体的特征，因而也给整个物质生活领域打上了自己的印记，决定了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的狭隘性。生产力的这一低级发展阶段观念地反映在古代各民族的宗教中。总之，只有在劳动条件和实际生活条件，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明白而合理的关系时，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物质生产和它所包含的关系是社会生活的基础，这种社会生活只有在它一旦表现为自由结合、自觉活动并且控制自己的社会运动的人们的产物时，它才会把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在社会上有一系列的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只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的产物。

马克思：《著者亲自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片断》（1872 年 9 月—1875 年 1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9 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94—195 页。

……波拿巴主义毕竟是现代资产阶级的真正的宗教。

可见,俾斯麦虽然没有他的拉萨尔,还是玩弄了普选权的把戏。看来,德国的资产者在作过某些反抗以后是会同意的,因为波拿巴主义毕竟是现代资产阶级的真正的宗教。我愈来愈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没有自己直接进行统治的能力,因此,在没有一个英国那样的寡头政治为了得到优厚报酬而替资产阶级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地方,波拿巴式的半专政就成了正常的形式;这种专政维护资产阶级的巨大的物质利益,甚至达到违反资产阶级的意志的程度,但是,它不让资产阶级亲自参加统治。另一方面,这种专政本身又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把资产阶级的这些物质利益宣布为自己的利益。俾斯麦先生现在就这样接受了民族联盟的纲领。是否实行当然完全是另一回事,但是俾斯麦是很难由于德国资产者而遭受失败的。一个刚回到这里的德国人说,他看到许多人已经吞下了这一钓饵;据路透社报道,卡尔斯卢厄人已经赞同这件事情,《科伦日报》在这件事情上的张皇失措清楚地表明了即将到来的转变。

恩格斯:《恩格斯致马克思》(1866 年 4 月 13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09 页。

英国资产阶级这时也参与镇压"下层等级",镇压全国广大的生产者大众了,为此所用的手段之一就是宗教的影响。

从这时起,资产阶级就成了英国统治阶级中的卑微的但却是公认的组成部分了。在压迫国内广大劳动群众方面,它

同统治阶级的其他部分有共同的利益。商人或工厂主，对自己的伙计、工人和仆役来说，是站在主人的地位，或者像不久前人们所说的那样，站在“天然首长”的地位。他的利益是要从他们身上尽可能取得尽量多和尽量好的劳动；为此目的，就必须把他们训练得驯服顺从。他本身是信仰宗教的，他曾打着宗教的旗帜战胜了国王和贵族；不久他又发现可以用宗教来操纵他的天然下属的灵魂，使他们服从由上帝安置在他们头上的那些主人的命令。简言之，英国资产阶级这时也参与镇压“下层等级”，镇压全国广大的生产者大众了，为此所用的手段之一就是宗教的影响。

还有另一种情况也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宗教倾向。这就是唯物主义在英国的兴起。这个新的①学说，不仅震撼了中间阶级的宗教情感，还自称是一种只适合世上有学问的和有教养的人们的哲学，完全不同于缺乏教养的群众以及资产阶级所感到尽善尽美的宗教。它随同霍布斯起而维护至高无上的王权，呼吁专制君主制镇压强壮而心怀恶意的小伙子，即人民。同样地，在霍布斯的后继者博林布罗克、舍夫茨别利等人那里，唯物主义的新的自然神论形式，仍然是一种贵族的秘传的学说，因此，唯物主义遭受中间阶级仇视，既是由于它是宗教的异端，也是由于它具有反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系。所以，同贵族的唯物主义和自然神论相反，过去曾经为反对斯图亚特王朝的斗争提供旗帜和战士的新教教派，继续提供了进步的中间阶级的主要战斗力量，并且至今还是“伟大的自由党”的

① 在德译文中，在“新的”的后面加有“无神论的”。——编者注

骨干。

这时,唯物主义从英国传到法国,它在那里与另一个唯物主义哲学学派,即笛卡儿学派的一个支派相遇,并与之汇合。在法国,唯物主义最初也完全是贵族的学说。但是不久,它的革命性就显露出来。法国的唯物主义者并不是只批判宗教信仰问题;他们批判了当时的每一个科学传统或政治体制;为了证明他们的学说可以普遍应用,他们选择了最简便的方法:在他们由以得名的巨著《百科全书》中,他们大胆地把这一学说应用于所有的知识对象。这样,唯物主义就以其两种形式的这种或那种形式——公开的唯物主义或自然神论,成为法国一切有教养的青年信奉的教义。它的影响很大,在大革命爆发时,这个由英国保皇党孕育的学说,竟给予法国共和党人和恐怖主义者一面理论旗帜,并且为《人权宣言》提供了底本。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 年英文版导言》(1892 年 4 月 20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09—710 页。

可见,唯物主义既然成为法国革命的信条,敬畏上帝的英国资产者就更要紧紧地抓住宗教了。

可见,唯物主义既然成为法国革命的信条,敬畏上帝的英国资产者就更要紧紧地抓住宗教了。难道巴黎的恐怖时代没有证明,群众一旦失去宗教信仰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唯物主义越是从法国传播到邻近国家,越是得到各种类似的理论思潮、特别是德国哲学的支持,唯物主义和自由思想越是在大陆

上普遍地真正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英国的中间阶级就越是要顽固地坚守各种各样的宗教信条。这些信条可以各不相同，但全都是地道的宗教信条，基督教信条。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 年英文版导言》（1892 年 4 月 20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11 页。

德国资产者甚至在他是工业家的时候，也是信仰宗教的。

德国资产者甚至在他是工业家的时候，也是信仰宗教的。他害怕谈他所渴求的恶的交换价值，而谈生产力；他害怕谈竞争，而谈国家生产力的国家联合；他害怕谈他的私利，而谈国家利益。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通过他们最初的（至少是在他们统治初期的）国民经济学的学术代言人，把财富奉为神明，并在学术上也无情地把一切献给财富，献给这个摩洛赫。如果人们看到的，一方面是这种坦率的古典的犬儒主义，另一方面是这个在经济学中鄙视“正当人”的财富和了解高尚目的的李斯特先生把事物理想化、玩弄辞藻、夸夸其谈的手法，那么一定会发现“同样使人发愁的”是：现在已不再是发财的日子了。

马克思：《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5 年 3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40—241 页。

……俄国资产阶级为了反革命的目的，需要复活宗教，唤

起对宗教的需求，制造宗教，向人民灌输宗教或用新的方法在人民中间巩固宗教。

有一伙著作家，他们靠几个资产阶级出版社的帮助在我国合法的书刊上经常大肆宣扬造神说。这伙人当中就有马克西莫夫。这种宣扬恰恰是在最近一年半以来经常化起来的，在这个期间，俄国资产阶级为了反革命的目的，需要复活宗教，唤起对宗教的需求，制造宗教，向人民灌输宗教或用新的方法在人民中间巩固宗教。因此宣扬造神说就具有了社会性和政治性。

列宁：《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1909年9月11日〔24日〕），《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9页。

我们的一切反动派，特别是自由派的（路标派的，立宪民主党的）反动派，“求助于”宗教并非偶然，而是出于必然。单靠棍棒和鞭子是不够的；棍棒毕竟已被折裂。

我们的一切反动派，特别是自由派的（路标派的，立宪民主党的）反动派，“求助于”宗教并非偶然，而是出于**必然**。单靠棍棒和鞭子是不够的；棍棒毕竟已被折裂。**路标派**帮助先进的资产阶级搞到一种最新式的思想棍棒即精神棍棒。马赫主义这个唯心主义的变种在**客观上**是反动派的工具，反动派的宣传手段。因此，在1908—1910年这个历史时期，既然我们看到“在上面”不仅有十月党人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拜神杜马”，而且还有拜神的立宪民主党人、拜神的自由派资产阶级，那么“在下面”进行反对马赫主义的斗争就不是偶然

的，而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我们的取消派》（1911 年 1—2 月），《列宁全集》第 20 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30 页。

只要受资本主义苦役制度压迫、受资本主义的捉摸不定的破坏势力摆布的群众自己还没有学会团结一致地、有组织地、有计划地、自觉地反对宗教的这种根源，反对任何形式的资本统治，那么无论什么启蒙书籍都不能使这些群众不信仰宗教。

为什么宗教在城市无产阶级的落后阶层中，在广大的半无产阶级阶层中，以及在农民群众中能够保持它的影响呢？资产阶级进步派、激进派或资产阶级唯物主义者回答说，这是由于人民的愚昧无知。由此得出结论说：打倒宗教，无神论万岁，传播无神论观点是我们的主要任务。马克思主义者说：这话不对。这是一种肤浅的、资产阶级狭隘的文化主义观点。这种观点不够深刻，不是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是用唯心主义的观点来说明宗教的根源。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种根源主要是**社会的**根源。劳动群众受到社会的压制，面对时时刻刻给普通劳动人民带来最可怕的灾难、最残酷的折磨的资本主义（比战争、地震等任何非常事件带来的灾难和折磨多一千倍）捉摸不定的力量，他们觉得似乎毫无办法，——这就是目前宗教最深刻的根源。“恐惧创造神”。现代宗教的根源就是对资本的捉摸不定的力量的恐惧，而这种力量确实是捉摸不定的，因为人民群众不能预见到它，它使无产者和小业

主在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到，而且正在遭到“突如其来的”、“出人意料的”、“偶然发生的”破产和毁灭，使他们变成乞丐，变成穷光蛋，变成娼妓，甚至活活饿死。凡是不愿一直留在预备班的唯物主义者，都应当首先而且特别注意这种**根源**。只要受资本主义苦役制度压迫、受资本主义的捉摸不定的破坏势力摆布的群众自己还没有学会团结一致地、有组织地、有计划地、自觉地反对宗教的这种**根源**，反对任何形式的**资本统治**，那么无论什么启蒙书籍都不能使这些群众不信仰宗教。

列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1909 年 5 月 13 日〔26 日〕），《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50—251 页。

按照圣西门的意见，应当是科学和工业，它们两者由一种新的宗教纽带结合起来，而这种纽带必然是神秘的和等级森严的“新基督教”，其使命就是恢复从宗教改革时起被破坏了的各种宗教观点的统一。

在圣西门的头脑中，第三等级和特权等级之间的对立就采取了“劳动者”和“游手好闲者”之间的对立的形式。游手好闲者不仅是指旧时的特权分子，而且也包括一切不参加生产和贸易而靠租息为生的人。而“劳动者”不仅是指雇佣工人，而且也包括厂主、商人和银行家。游手好闲者失去了精神领导和政治统治的能力，这已经是确定无疑的，而且由革命最终证实了。至于无财产者没有这种能力，在圣西门看来，这已由恐怖时代的经验所证明。那么，应当是谁来领导和统治呢？

按照圣西门的意见，应当是科学和工业，它们两者由一种新的宗教纽带结合起来，而这种纽带必然是神秘的和等级森严的“新基督教”，其使命就是恢复从宗教改革时起被破坏了的各种宗教观点的统一。可是，科学就是学者，而工业首先就是积极活动的资产者：厂主、商人、银行家。这些资产者固然应当成为一种公众的官吏、社会的受托人，但是对工人据说应当保持发号施令的和享有经济特权的地位。特别是银行家应当担负起通过调节信用来调节整个社会生产的使命。这样的见解完全适应法国刚刚产生大工业以及随之产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的那个时代。但是，圣西门特别强调的是：他随时随地都首先关心“人数最多和最贫穷的阶级”（la classe la plus nombreuse et la plus pauvre）的命运。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7—378页。

就像每一个说自己的口袋里装有能为群众医治百病的万应灵丹的人一样，他一开始就使自己的鼓动带有宗教的、宗派的性质。其实，任何宗派都有宗教性质。

……首先，关于拉萨尔的联合会，它是在一个反动时期成立的。在德国工人运动沉寂了15年之后，拉萨尔又唤醒了这个运动，这是他的不朽的功绩。但是，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他

① 在1883年德文第一版中没有“圣西门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的命运。”这一整段文字。——编者注

受直接的时代条件的影响太深了。他把一个小小的出发点——他同舒尔采-德里奇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的对立——当作自己的鼓动的中心点:以国家帮助反对自助。这样,他不过是重新提出了**天主教**社会主义的首领**毕舍**为反对法国的真正的工人运动而于1843年和以后几年提出的口号。拉萨尔是够聪明的,当然认为这个口号是权宜之计,所以他只能以这个口号(据说!)可以直接实现为理由来为之辩护。为了这个目的,他不得不断言这个口号在**最近的**将来就会实现。因此,**这种**"国家"就变成了普鲁士国家。这样一来,他就不得不向普鲁士君主制、向普鲁士反动派(封建党派)、甚至向教权派让步。他把宪章派的普选权口号同毕舍的国家对协作社的帮助结合起来。他忽略了德国和英国的条件是不同的。他忽略了没落帝国在法国普选权问题上的教训。其次,就像每一个说自己的口袋里装有能为群众医治百病的万应灵丹的人一样,他一开始就使自己的鼓动带有宗教的、宗派的性质。其实,任何宗派都有宗教性质。再次,正因为他是一个宗派的创始人,所以他否认同德国和外国以前的运动有任何天然的联系。他陷入了蒲鲁东的错误之中,他不是从阶级运动的实际因素中去寻找自己的鼓动的现实基础,而是想根据某种教条式的处方来规定这一运动的进程。

马克思:《马克思致约·巴·施韦泽》(1868年10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2页。

(三)无产阶级国家与宗教

随着财富的发展,因而也就是随着新的力量和不断扩大的个人交往的发展,那些成为共同体的基础的经济条件,那些与共同体相适应的共同体各不同组成部分的政治关系,以理想的方式来对共同体进行直观的宗教(这二者又都是建立在对自然界的一定关系上的,而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个人的性格、观点等等,也都解体了。

这里表现出了资本的那种使它不同于以往一切生产阶段的全面趋势。尽管按照资本的本性来说,它本身是狭隘的,但它力求全面地发展生产力,这样就成为新的生产方式的前提,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不是为了再生产一定的状态或者最多是扩大这种状态而发展生产力,相反,在这里生产力的自由的、无阻碍的、不断进步的和全面的发展本身就是社会的前提,因而是社会再生产的前提;在这里唯一的前提是超越出发点。这种趋势是资本所具有的,但同时又是同资本这种狭隘的生产形式相矛盾的,因而把资本推向解体,这种趋势使资本同以往的一切生产方式区别开来,同时意味着,资本不过表现为过渡点。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都由于财富的发展,或者同样可以说,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没落了。因此,在意识到这一点的古代人那里,财富被直接当作使共同体解体的东西加以抨击。封建制度也由于城市工业、商业、现代农业(甚至由于个别的发明,如火药和印刷机)而没落了。

随着财富的发展,因而也就是随着新的力量和不断扩大

的个人交往的发展，那些成为共同体的基础的经济条件，那些与共同体相适应的共同体各不同组成部分的政治关系，以理想的方式来对共同体进行直观的宗教（这二者又都是建立在对自然界的一定关系上的，而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个人的性格、观点等等，也都解体了。**单是科学**——即财富的最可靠的形式，既是财富的产物，又是财富的生产者——**的发展**，就足以使这些共同体解体。但是，**科学**这种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的发展**，只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即财富的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

马克思：《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1857 年底—1858 年 5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39 页。

如果忘记，宗教对人类的压迫只不过是社会内部经济压迫的产物和反映，那就是受了资产阶级观点的束缚。

可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当因此而“从理性出发”，离开阶级斗争去抽象地、唯心地来提宗教问题，——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派常常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如果认为，在一个以无休止的压迫和折磨劳动群众为基础的社会里，可以用纯粹说教的方法消除宗教偏见，那是愚蠢可笑的。如果忘记，宗教对人类的压迫只不过是社会内部经济压迫的产物和反映，那就是受了资产阶级观点的束缚。如果无产阶级本身的反对资本主义黑暗势力的斗争没有启发无产阶级，那么任何书本、任何说教都是无济于事的。在我们看来，被压迫阶级为创立人间的天堂而进行的这种真正革命斗争的一致，要比无产者对虚

幻的天堂的看法上的一致更为重要。

列宁:《社会主义和宗教》(1905 年 12 月 3 日〔16 日〕),《列宁全集》第 12 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34 页。

只有在群众的所有社会经济活动中实现了计划性和自觉性,才能随之完全消除宗教偏见。

在对待宗教方面,俄共并不满足于已经颁布了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即不满足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在自己纲领中提出的、但由于资本同宗教宣传有多种多样的实际联系而在世界任何地方也没有彻底实行过的那些措施。

俄共所遵循的信念是:只有在群众的所有社会经济活动中实现了计划性和自觉性,才能随之完全消除宗教偏见。党力求彻底摧毁剥削阶级和宗教宣传组织之间的联系,使劳动群众真正从宗教偏见中解放出来,并组织最广泛的科学教育和反宗教的宣传工作。同时必须注意避免对信教者的感情有丝毫伤害,因为这种伤害只会加剧宗教狂。

列宁:《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纲领》(1919 年 3 月 18—23 日),《列宁全集》第 36 卷附录,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13—414 页。

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因此,人们的宗教观念也发生变革。

显然,随着每一次社会秩序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因此,人们的宗教观念也发生变革。但

是,现在的变革和过去一切变革不同的地方恰恰在于:人们最终识破了这种历史变革过程的秘密,抛弃一切宗教,而不再以新宗教的狂热形式把这种实际的"外在的"过程奉为神明。

马克思、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上发表的书评》(1850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页。

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宗教将消逝。宗教的消逝必须由社会发展来促成,而教育又必须在社会发展中起重要作用。

对宗教采取暴力措施是没有意义的,但我们有一种看法,这就是: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宗教将消逝。宗教的消逝必须由社会发展来促成,而教育又必须在社会发展中起重要作用。

马克思:《〈芝加哥论坛报〉发表的卡尔·马克思访问记》(1878年12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49页。

无产阶级专政应当坚持不懈地使劳动群众真正从宗教偏见中解放出来,为此就要进行宣传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同时注意避免对信教者的感情有丝毫伤害,避免加剧宗教狂。

在宗教政策方面,无产阶级专政(俄共)的任务是不满足于已经颁布了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即不满足于资产阶级民主制许诺过、但由于资本同宗教宣传有多种多样的实际联系而在世界任何地方也没有彻底实行过的那些措施。无产阶级专政应当把剥削阶级(地主和资本家)和

助长群众愚昧的宗教宣传的组织之间的联系彻底摧毁。无产阶级专政应当坚持不懈地使劳动群众真正从宗教偏见中解放出来，为此就要进行宣传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同时注意避免对信教者的感情有丝毫伤害，避免加剧宗教狂。

列宁：《俄共（布）纲领草案》（1919 年 2 月），《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25 页。

我们永远要宣传科学的世界观，我们必须跟某些“基督教徒”的不彻底性进行斗争。

我们永远要宣传科学的世界观，我们必须跟某些“基督教徒”的不彻底性进行斗争。但是这决不是说，应当把宗教问题提到它所不应有的首要地位，决不是说，为了反对那些很快就会失去任何政治意义、很快就会被经济发展进程本身抛到垃圾箱里去的次要的意见或呓语，而分散真正革命斗争的、经济斗争的和政治斗争的力量。

列宁：《社会主义和宗教》（1905 年 12 月 3 日〔16 日〕），《列宁全集》第 12 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35 页。

同宗教偏见作斗争，必须特别慎重；在这场斗争中伤害宗教感情，会带来许多害处。应当通过宣传、通过教育来进行斗争。

同宗教偏见作斗争，必须特别慎重；在这场斗争中伤害宗教感情，会带来许多害处。应当通过宣传、通过教育来进行斗争。斗争过激会引起群众的愤恨；这样进行斗争会加深群众

因宗教信仰而造成的分裂,而我们的力量在于团结。宗教偏见的最深刻的根源是穷困和愚昧;我们正是应当同这个祸害作斗争。

列宁:《在全俄女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11月19日),《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1页。

……战斗唯物主义刊物的杂志必须不倦地进行无神论的宣传和斗争……

这个杂志应该是一个战斗的无神论的刊物。我们有些部门,至少有些国家机关是主管这个工作的。但是,这个工作做得非常软弱无力,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看来是受到了我们真正俄罗斯式的(尽管是苏维埃式的)官僚主义这种一般环境的压抑。因此,为了弥补有关国家机关工作的不足,为了改进和活跃这一工作,这个要办成战斗唯物主义刊物的杂志必须不倦地进行无神论的宣传和斗争,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要密切注意用各种文字出版的一切有关文献,把这方面一切多少有些价值的东西翻译出来,或者至少摘要介绍。

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2年3月12日),《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此认为,被整个现代社会置于愚昧无知和囿于偏见这种境地的亿万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只有通过纯粹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条直路,才能摆

脱愚昧状态，那就是最大的而且是最坏的错误。

恩格斯早就嘱咐过现代无产阶级的领导者，要把18世纪末战斗的无神论的文献翻译出来，在人民中间广泛传播。[①]我们惭愧的是，直到今天还没有做这件事（这是证明在革命时代夺取政权要比正确地运用这个政权容易得多的许多例子之一）。有时人们用各种“动听的”理由来为我们这种软弱无力、无所作为和笨拙无能进行辩护，例如说18世纪无神论的旧文献已经过时、不科学、很幼稚等等。这种不是掩盖学究气就是掩盖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的冒充博学的诡辩，是再坏不过了。当然，在18世纪革命家的无神论著作中有不少不科学的和幼稚的地方。但是，谁也不会阻止出版者把这些作品加以删节和附以短跋，指出人类从18世纪末以来对宗教的科学批判所取得的进步，指出有关的最新著作等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此认为，被整个现代社会置于愚昧无知和囿于偏见这种境地的亿万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只有通过纯粹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条直路，才能摆脱愚昧状态，那就是最大的而且是最坏的错误。应该向他们提供各种无神论的宣传材料，告诉他们实际生活各个方面的事实，用各种办法接近他们，以引起他们的兴趣，唤醒他们的宗教迷梦，用种种方法从各方面使他们振作起来，如此等等。

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2年3月12日），《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8—649页。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6—247页。——编者注

最重要的事情,也是我们那些貌似马克思主义、实则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往往忽视的事情,就是要善于唤起最落后的群众自觉地对待宗教问题,自觉地批判宗教。

18世纪老无神论者所写的那些泼辣的、生动的、有才华的政论,机智地公开地抨击了当时盛行的僧侣主义,这些政论在唤醒人们的宗教迷梦方面,往往要比那些文字枯燥无味,几乎完全没有选择适当的事实来加以说明,而仅仅是转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要合适千百倍,此类转述充斥我们的出版物,并且常常歪曲(这是毋庸讳言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比较重要的著作我们都有了译本。担心在我国人们不会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修正意见来补充旧无神论和旧唯物主义,那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最重要的事情,也是我们那些貌似马克思主义、实则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往往忽视的事情,就是要善于唤起最落后的群众自觉地对待宗教问题,自觉地批判宗教。

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2年3月12日),《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9页。

社会主义吸引科学来驱散宗教的迷雾,把工人团结起来为美好的人间生活作真正的斗争,从而使他们摆脱对死后生活的迷信。

现代的觉悟工人,受到了大工厂工业的教育和城市生活的启发,轻蔑地抛弃了宗教偏见,把天堂生活让给僧侣和资产阶级伪善者去享受,为自己去争取人间的美好生活。现代无

产阶级正在站到社会主义方面来。社会主义吸引科学来驱散宗教的迷雾,把工人团结起来为美好的人间生活作真正的斗争,从而使他们摆脱对死后生活的迷信。

列宁:《社会主义和宗教》(1905 年 12 月 3 日〔16 日〕),《列宁全集》第 12 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32 页。

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是唯物主义者,即宗教的敌人,但是他们应当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就是说,他们不应当抽象地对待反宗教斗争问题,他们进行这一斗争不应当立足于抽象的、纯粹理论的、始终不变的宣传,而应当具体地、立足于当前实际上所进行的、对广大群众教育最大最有效的阶级斗争。

这种反对意见也是一种流行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见,这证明反驳者完全不懂得马克思的辩证法。使这种反驳者感到不安的矛盾,是实际生活中的实际矛盾,即辩证的矛盾,而不是字面上的、臆造出来的矛盾。谁认为在理论上宣传无神论,即破除某些无产阶级群众的宗教信仰,同这些群众阶级斗争的成效、进程和条件之间有一种绝对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那他就不是辩证地看问题,就是把可以变动的、相对的界限看作绝对的界限,就是硬把活的现实中的不可分割的东西加以分割。举个例子来说吧。假定某个地方和某个工业部门的无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先进的,是相当觉悟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当然是无神论者,另一部分则是相当落后的,他们同农村和农民还保持着联系,他们信仰上帝,常到教堂里去,甚至直接受本地某一个建立基督教工会的司祭的影响。再假

定这个地方的经济斗争引起了罢工。马克思主义者应该首先考虑使罢工运动得到成功，应当坚决反对在这场斗争中把工人分成无神论者和基督教徒，应当坚决反对这样的划分。在这种情况下，宣传无神论就是多余的和有害的，这倒并不是出于不要把落后群众吓跑，不要在选举时落选等庸俗考虑，而是从实际推进阶级斗争这一点出发的，因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环境中，阶级斗争能把信基督教的工人吸引到社会民主党和无神论这方面来，而且比枯燥地宣传无神论还要有效一百倍。在这样的时候和这样的环境中，宣传无神论，就只能有利于神父，因为他们恰恰最愿意用信不信上帝这一标准来划分工人，以代替是否参加罢工这一标准。无政府主义者鼓吹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对上帝开战，实际上是帮助了神父和资产阶级（正如无政府主义者实际上始终在帮助资产阶级一样）。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是唯物主义者，即宗教的敌人，但是他们应当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就是说，他们不应当抽象地对待反宗教斗争问题，他们进行这一斗争不应当立足于抽象的、纯粹理论的、始终不变的宣传，而应当具体地、立足于当前实际上所进行的、对广大群众教育最大最有效的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善于估计整个具体情况，随时看清无政府主义同机会主义的界限（这个界限是相对的，是可以移动、可以改变的，但它确实是存在的），既不陷入无政府主义者那种抽象的、口头上的、其实是空洞的“革命主义”，也不陷入小资产者或自由派知识分子那种庸俗观念和机会主义，不要像他们那样害怕同宗教作斗争，忘记自己的这种任务，容忍对上帝的信仰，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出发，而是打小算盘：不得罪人，不排斥

人,不吓唬人,遵循聪明绝顶的处世之道:“你活,也让别人活”,如此等等。

列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1909年5月13日〔26日〕),《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253页。

七、意识形态与社会理想

(一)理想与社会现实

这些流于幻想的空谈家、这些伤感的狂热者把他们的理想同日常的现实的任何接触都看成是亵渎神明。

我们也不能否认辩论人的言论有**相对的**正确性。如果把新闻出版**仅仅**看成一种行业，那么，它作为头脑的行业，应当比手脚的行业有更多的自由。正是由于头脑的解放，手脚的解放对人才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大家知道，手脚只是由于它们所服务的对象——头脑——才成为人的手脚。

因此，无论辩论人的观点乍一看来是多么独特，我们仍然应当无条件地承认，这种观点比德国自由派那种毫无根据、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议论来得高明，这些自由派以为，把自由从现实的坚实土地上移到幻想的太空就是尊重自由。这些流于幻想的空谈家、这些伤感的狂热者把他们的理想同日常的现实的任何接触都看成是亵渎神明。对我们德国人说来，自由之所以直到现在仍然只是一种幻想和伤感的愿望，一部分责任是要由他们来负的。

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

篇论文)》(1842 年 3 月 26 日—4 月 26 日)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88—189 页。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虽然看到了生产在资本关系中是怎样进行的,但是他们看不到这种关系本身是怎样被生产的,同时看不到在这种关系中又怎样同时创造出瓦解这种关系的物质条件,从而看不到这种关系作为经济发展的、社会财富生产的必要形式的历史根据是怎样消除的。

资本主义关系本身的出现,必须以一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生产形式为前提。在过去的生产方式中,必然发展起那些超出旧生产关系并迫使旧生产关系转化为资本关系的交往手段、生产资料和需要。但是,它们只需要发展到使劳动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的程度。然而,在这种已经改变了的关系的基础上,会发展起一种发生了特殊变化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一方面创造出新的物质生产力,另一方面它只有在这种新的物质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从而在实际上给自己创造出新的现实的条件。由此就会出现彻底的经济革命,这种革命一方面为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创造并完成它的现实条件,为它提供一种相应的形式,另一方面,在这个革命与工人相对立中发展起来的劳动生产力、生产条件与交往关系中,这个革命又为一个新生产方式,即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对立形式的新生产方式创造出现实条件,因而为一种新形成的社会生活过程,从而为新的社会形态创造出物质基础。

这是与那些被资本主义观念本身所束缚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根本不同的一种观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虽然看

到了生产在资本关系中是怎样进行的，但是他们看不到这种关系本身是怎样被生产的，同时看不到在这种关系中又怎样同时创造出瓦解这种关系的物质条件，从而看不到这种关系作为经济发展的、社会财富生产的必要形式的历史根据是怎样消除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册第六章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1863 年 7 月—1864 年 6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9 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26 页。

现在也还有不少人，站在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立场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

正如人的胚胎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还要再现出我们的祖先鱼类的鳃弧一样，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古典哲学起源的痕迹。例如本书，特别是在末尾，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是无益的，甚至还要更坏。只要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还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1789 年的法国资产者也曾宣称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

但是贵族和僧侣不肯同意，这一论断——虽然当时它对封建主义来说是一个无可辩驳的抽象的历史真理——很快就变成了一句纯粹是自作多情的空话而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烟消云散了。现在也还有不少人，站在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立场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 年德文第二版序言》（1892 年 7 月 21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23—424 页。

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平等的王国，这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为根据的片面的法国看法，这种看法作为一定的发展阶段在当地曾经是正确的……

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平等的王国，这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为根据的片面的法国看法，这种看法作为一定的发展阶段在当地曾经是正确的，但是，像以前的各个社会主义学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样，它现在也应当被克服，因为它只能引起思想混乱，而且因为已经有了阐述这一问题的更精确的方法。

恩格斯：《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1875 年 3 月 18—28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8 页。

政治上的乌托邦就是一种无论现在和将来都决不能实现

的愿望，是一种不以社会力量为依托，也不以阶级政治力量的成长和发展为支撑的愿望。

政治上的乌托邦就是一种无论现在和将来都决不能实现的愿望，是一种不以社会力量为依托，也不以阶级政治力量的成长和发展为支撑的愿望。

一个国家的自由愈少，公开的阶级斗争愈弱，群众的文化程度愈低，政治上的乌托邦通常也愈容易产生，而且保持的时间也愈久。

在现代俄国，有两种政治乌托邦最根深蒂固，并且由于具有诱惑力而对群众发生了相当的影响。这就是自由派的乌托邦和民粹派的乌托邦。

自由派的乌托邦，就是妄想用和平的、和谐的办法，不得罪任何人，不赶走普利什凯维奇之流，不经过激烈的彻底的阶级斗争，就能够在俄国，在俄国的政治自由方面，在广大劳动人民的地位方面，得到某些重大的改善。这是一个自由的俄国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和睦相处的乌托邦。

列宁：《两种乌托邦》（1912年10月5日〔18日〕以前），《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7页。

民粹派和劳动派的乌托邦，是处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小业主的一种试图不通过阶级斗争而消灭雇佣奴隶制的幻想。

这两种乌托邦是怎样产生的呢？为什么在现代俄国相当根深蒂固呢？

这两种乌托邦的产生反映了这样一些阶级的利益，它们进行反对旧制度、反对农奴制、反对政治压迫，一句话，“反对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斗争，而在这种斗争中，它们又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乌托邦、幻想，就是这种不独立性，这种软弱性的产物。沉迷于幻想是弱者的命运。

自由派资产阶级，尤其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能不追求自由和法制，因为没有自由和法制，资产阶级的统治就不彻底，不完整，没有保证。但是资产阶级害怕群众运动甚于害怕反动势力。因此，自由派在政治上就表现出惊人的、不可思议的软弱和十足的无能。因此，自由派的全部政策永远是模棱两可、虚伪不堪、假仁假义、躲躲闪闪的，他们必须玩弄民主的把戏才能把群众争取过去，同时他们又极端反对民主，极端仇视群众运动，仇视群众的创举和首倡精神，仇视他们那种如马克思形容19世纪欧洲一次群众运动时所说的“冲天”的气魄①。

自由派的乌托邦是俄国政治解放事业中的软弱无能的乌托邦，是那些唯利是图，想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和平”分享特权并把这种高贵的愿望诡称为俄国民主派“和平”胜利论的富豪们的乌托邦。自由派的乌托邦是这样一种幻想，既要战胜普利什凯维奇之流而又不使他们遭受伤害，既要摧毁他们而又不使他们感到痛苦。很明显，这种乌托邦之所以有害，不仅由于它是乌托邦，而且由于它腐蚀群众的民主主义意识。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0页。——编者注

相信这种乌托邦的群众，永远也不会争得自由；这样的群众不配享受自由；这样的群众完全应该受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嘲弄。

民粹派和劳动派的乌托邦，是处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小业主的一种试图不通过阶级斗争而消灭雇佣奴隶制的幻想。当经济解放问题也如现时政治解放问题这样成为俄国当前的迫切问题的时候，民粹派的乌托邦的害处就不亚于自由派的乌托邦的了。

列宁：《两种乌托邦》（1912年10月5日〔18日〕以前），《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8—299页。

（二）理想不是美化现实的词句

这些好心的玄想家从不放过机会，从道德、人性和同情心的角度反对赖以完成这种社会变革过程的残酷无情和肆无忌惮，而提出已经气息奄奄的宗法制度的稳定、安适和礼仪作为社会的理想，来与社会变革相对抗。

该委员会完全由工人和工厂监工组成。但是，这些工人都是意志消沉、被劳动摧残得精疲力竭的人，他们沉默寡言、笃信上帝、老实正派，他们对宪章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抱有敬畏的心理，对国王和宗教表现出相当的尊敬；他们对工业资产阶级的仇恨显得软弱无力，他们只会在贵族面前卑躬屈膝，因为至少承蒙贵族还屈尊体恤他们的疾苦。这帮十小时工作日拥护者的工人保守主义反映了工人最初对工业进步所持的反对

立场:他们试图恢复旧日的宗法状态,他们在采取最激烈的行动时也不过是破坏机器。主张十小时工作日的资产阶级和贵族的首脑们同这些工人一样,也是反动的。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感伤主义的托利党人,大多数是入迷的玄想家,他们非常怀念被消灭了的宗法制的隐蔽剥削,怀念伴随这种剥削而来的笃信宗教、依恋家庭、崇尚美德和恪守陈规,怀念那种固定不变的世代相传的状况。这些目光短浅的人一看到产业革命的漩涡,就头晕目眩。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的情感由于面对新的像魔术一般突然增长起来的生产力而感到惶惑,因为这种生产力在几年之内就清除了以前社会中那些最受尊崇、最不可侵犯和最重要的阶级,而为一些新的、没有听说过的阶级所代替,它们的利益、情感、整个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都是同英国旧社会制度相矛盾的。这些好心的玄想家从不放过机会,从道德、人性和同情心的角度反对赖以完成这种社会变革过程的残酷无情和肆无忌惮,而提出已经气息奄奄的宗法制度的稳定、安适和礼仪作为社会的理想,来与社会变革相对抗。

恩格斯:《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1850 年 3 月中—4 月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00—301 页。

它的道德理想就是把自己的一部分工资存入储蓄所的工人,而且它甚至为了它喜爱的这个想法发明了一种奴才的艺术。

国民经济学这门关于**财富**的科学,同时又是关于克制、穷困和**节约**的科学,而实际上它甚至要人们**节约**对新鲜**空气**或

身体运动的需要。这门关于惊人的勤劳的科学,同时也是关于禁欲的科学,而它的真正理想是禁欲的却又进行重利盘剥的吝啬鬼和禁欲的却又进行生产的奴隶。它的道德理想就是把自己的一部分工资存入储蓄所的工人,而且它甚至为了它喜爱的这个想法发明了一种奴才的艺术。人们怀着感伤的情绪把这些搬上了舞台。因此,国民经济学,尽管它具有世俗的和纵欲的外表,却是真正道德的科学,最最道德的科学。它的基本教条是:自我克制,克制生活和克制人的一切需要。你越少吃,少喝,少买书,少去剧院,少赴舞会,少上餐馆,越少想,少爱,少谈理论,少唱,少画,少击剑,等等,你积攒的就越[多],你的既不会被虫蛀也不会被贼偷的财宝①,即你的资本,也就会越大。你的存在越微不足道,你表现自己的生命越少,你拥有的就越多,你的外化的生命就越大,你的异化本质也积累得越多。国民经济学家把从你的生命和人性中夺去的一切,全用货币和财富补偿给你。你自己不能办到的一切,你的货币都能办到:它能吃,能喝,能赴舞会,能去剧院,它能获得艺术、学识、历史珍品、政治权力,它能旅行,它能为你占有这一切;它能购买这一切;它是真正的能力。但是,货币尽管是这一切,它除了自身以外不愿创造任何东西,除了自身以外不愿购买任何东西,因为其余一切都是它的奴仆,而当我占有了主人,我就占有了奴仆,我也就不需要去追求他的奴仆了。因此,一切情欲和一切活动都必然湮没在贪财欲之中。工人只能拥有他想活下去所必需的那么一点,而且只是为了拥有

①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6章第19—20节。——编者注

这么一点，他才想活下去。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 年 5 月底 6 月初—8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42—343 页。

李斯特体系的整个［……］理论部分，不过是以理想的词句掩盖坦率的经济学的工业唯物主义。他到处使事物维持原状，而对事物的表达却理想化了。

李斯特体系的整个［……］理论部分，不过是以理想的词句掩盖坦率的经济学的工业唯物主义。他到处使事物维持原状，而对事物的表达却理想化了。我们将详细地考察这一点。正是这种空洞的唯心主义词句，使他能够无视那些阻止他的虔诚愿望实现的真实障碍，而沉溺于最荒谬的幻想之中（如果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首先乞求上层贵族、达官以及宗室同意赋予“工业以法律效力”，那么他们的情况会怎样呢？）

马克思：《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5 年 3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40 页。

这些人只注意国家的政治形式，而不能理解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基础的社会组织的意义。他们以其虚伪的理想主义自豪，认为研究经济现实有损自己的尊严。

马志尼先生最近给法国皇帝写了一封信，从文学的观点来看，这封信大概在他的著作中要占首屈一指的地位。马志

尼的许多作品所固有的那种假装热情、一味夸大、冗长噜嚏和故弄玄虚的现象(这可以说是他所创立的那个意大利文学派别的特征),在这封信里只能看到少许的痕迹。同时可以看到,他的视野已变得较为广阔。到现在为止,他一直是欧洲共和派形式主义者的领袖。这些人只注意国家的政治形式,而不能理解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基础的社会组织的意义。他们以其虚伪的理想主义自豪,认为研究经济现实有损自己的尊严。代别人去做个理想主义者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肚子胀得饱饱的人很容易嘲笑饿着肚子的人们不要崇高思想而要普通面包的实际主义……

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杜罗·德·拉·马尔以探究古罗马土地所有制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为了解这个曾经征服过世界的城市的命运提供了一把钥匙,——与此相较,孟德斯鸠关于罗马盛衰的论述差不多就像是小学生的作业。年高德劭的列列韦尔由于细心研究了使波兰农民从自由民变为农奴的经济条件,在阐明他的祖国被奴役的原因方面比一大群全部货色仅仅是诅咒俄国的著作家做出了远为更大的贡献。现在马志尼先生也不认为注意社会实际、注意不同阶级的利益、注意出口和进口、注意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房租以及诸如此类的庸俗东西有损自己的尊严了,这也许是由于他亲眼看到了使第二帝国遭到强大的、甚至是致命的打击的,不是各民主委员会的宣言,而是那由纽约开始之后波及到全世界的经济震荡。

马克思:《马志尼和拿破仑》(1858 年 3 月 30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50—451页。

(三)开辟通向未来的道路

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即便明天就实行这种变革(指逐步地实行),我根本不认为有任何困难。我国工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已经由他们的许多个生产和分配合作社所证明,在那些没有遭到警察蓄意破坏的地方,这种合作社同资产阶级的股份公司相比,管理得一样好,而且廉洁得多。我国工人在反对反社会党人法的胜利斗争中出色地证明了自己政治上的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您还谈论德国群众的无知,我是难以理解的。我觉得,我国所谓有教养的人那种好为人师的狂妄自大倒是更严重得多的障碍。当然,我们还缺乏技术员、农艺师、工程师、化学家、建筑师等等,但是在万不得已时我们也能像资本家所做的那样收买这些人来为自己服务,如果再对几个叛徒——在这伙人中间一定会有叛徒的——给以严厉的惩罚以儆效尤,那么他们就会懂得,就是为自己的利害着想,也不能再盗窃我

们的东西了。但是除了这些专家(我把教员也包括在内)以外,我们没有其他"有教养的人"也是完全过得去的,而且,比方说,目前著作家和大学生大量涌进党内,如果不把这些先生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还会带来种种的危害。

恩格斯:《恩格斯致奥·伯尼克》(1890 年 8 月 21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93—694 页。

……社会主义是直接从资本主义生长出来的社会,是新社会的初级形式。共产主义则是更高的社会形式,只有在社会主义完全巩固的时候才能得到发展。

如果我们问一下自己,共产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区别是什么,那么我们应当说,社会主义是直接从资本主义生长出来的社会,是新社会的初级形式。共产主义则是更高的社会形式,只有在社会主义完全巩固的时候才能得到发展。社会主义的前提是在没有资本家帮助的情况下进行工作,是在劳动者的有组织的先锋队即先进部分施行最严格的计算、监督和监察下进行社会劳动;同时还应该规定劳动量和劳动报酬。这种规定所以必要,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给我们留下了诸如分散的劳动、对公共经济的不信任、小业主的各种旧习惯这样一些遗迹和习惯,这些在所有农民国家中都是最常见的。这一切都是同真正共产主义经济背道而驰的。所谓共产主义,是指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习惯于履行社会义务而不需要特殊的强制机构,不拿报酬地为公共利益工作成为普遍现象。自然,在那些为彻底战胜资本主义正在采取最初步骤

的人看来,“共产主义”的概念是很遥远的。

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报告》(1919 年 12 月 20 日),《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1—92 页。

如果你不善于把理想与经济斗争参加者的利益密切结合起来,与该阶级的“公平的劳动报酬”这类“狭隘”琐碎的生活问题,即自命不凡的民粹主义者不屑理睬的问题结合起来,那么,最崇高的理想也是一文不值的。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任务就是要打破这种好心善意的谎话。想探寻“使人类走向幸福的途径”的人,他的首要职责就是不要欺骗自己,要有坦白承认事实的勇气。

当劳动阶级的思想家理解到并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就会承认:所谓“理想”不应当去开辟最好的和最简捷的途径,而应当为我国资本主义社会中眼前进行着的“各社会阶级间的严酷斗争”规定任务和目标;衡量自己的意图是否取得成效,不是看为“社会”和“国家”拟定的建议,而是看这些理想在一定社会阶级中传播的程度;如果你不善于把理想与经济斗争参加者的利益密切结合起来,与该阶级的“公平的劳动报酬”这类“狭隘”琐碎的生活问题,即自命不凡的民粹主义者不屑理睬的问题结合起来,那么,最崇高的理想也是一文不值的。

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1894 年底—1895 年初),《列宁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53 页。

社会主义不是将赐恩于人类的现成制度。

社会主义不是将赐恩于人类的现成制度。社会主义是现在的无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根本目标而进行的阶级斗争，是从今天的目标走向明天的目标从而日益接近根本目标的斗争。今天，在这个称为俄国的国家里，社会主义正经历着一个阶段，即觉悟的工人不顾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杜马的社会民主党知识分子”对工人政党的建设进行种种破坏而由自己完成这一建设的阶段。

列宁：《一次谈话》(1913 年 3—4 月)，《列宁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4 页。

……他们(资产阶级)不再把立宪的代议制国家看作国家的理想，不再认为争得立宪的代议制国家就是致力于挽救世界和达到全人类的目的，相反地，他们把这个国家看作自己的排他的权力的官方表现，看作自己的特殊利益的政治上的确认。

如果说，自由资产阶级在拿破仑时代再一次遇到了革命的恐怖主义，那么在波旁王朝即复辟时代则再一次遇到了反革命。1830 年自由资产阶级终于实现了它在 1789 年的愿望，所不同的只是他们的政治启蒙运动现在已经完成，他们不再把立宪的代议制国家看作国家的理想，不再认为争得立宪的代议制国家就是致力于挽救世界和达到全人类的目的，相反地，他们把这个国家看作自己的排他的权力的官方表现，看作自己的特殊利益的政治上的确认。

从 1789 年开始的法国革命的生命史，到 1830 年这次革命的一个要素获得胜利的时候还没有终止，现在这个要素增

添了自己在社会上很重要这样一种意识。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 年 9 月—1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58 页。

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务,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

资产阶级社会完全埋头于财富的创造与和平竞争,竟忘记了古罗马的幽灵曾经守护过它的摇篮。但是,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需要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间战斗的。在罗马共和国的高度严格的传统中,资产阶级社会的斗士们找到了理想和艺术形式,找到了他们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内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自我欺骗。例如,在 100 年前,在另一发展阶段上,克伦威尔和英国人民为了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借用过旧约全书中的语言、热情和幻想。当真正的目的已经达到,当英国社会的资产阶级改造已经实现时,洛克就排挤了哈巴谷。

由此可见,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务,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1851 年 12 月中—1852 年 3 月 25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86 页。

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

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此外,许许多多人**仅仅**依靠自己劳动为生——大量的劳力与资本隔绝或甚至连有限地满足自己的需要的可能性都被剥夺,——从而由于竞争,他们不再是暂时失去作为有保障的生活来源的工作,他们陷于绝境,这种状况是以**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前提的。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1845 年秋—大约 1846 年 5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7 页。

八、意识形态的类型

(一)自由主义

……两者(自由派议员和自由派法学家)都只是以自由主义的词句为掩饰来顽强地维护自己的狭隘利益。

大家都知道,莱茵的法学家们(少数可嘉者例外)认为普鲁士协商派议会的当务之急不外乎是帮助政府祛除它那陈腐的偏见和根深蒂固的仇恨。他们用事实向协商派议会证明,他们以往的反对派立场和1789年以前的法国议会的反对派立场未必有多少区别:两者都只是以自由主义的词句为掩饰来顽强地维护自己的**狭隘利益**。无论是1789年法国国民议会中的自由派议员,或是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中的莱茵省自由派法学家,都是一群奴颜婢膝的**勇敢者中最勇敢的人**。

马克思:《普鲁士反革命和普鲁士法官》(1848年12月23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63页。

他们一向遵循把原则放在一边而大捞眼前利益的商业习惯。

但是,曼彻斯特派是否会履行他们的誓言呢?这是很值

得怀疑的。他们一向遵循把原则放在一边而大捞眼前利益的商业习惯。而格莱斯顿先生的预算所提供的眼前利益也决非区区之数。曼彻斯特派的报刊在所得税问题上德语调已经变得非常温和、非常调和了。他们开始用格莱斯顿先生所许诺的"整个所得税将在七年之内终止"的前景来安慰自己,而恰恰在这时忘记了,已故的罗伯特·皮尔爵士在1842年施行这种税的时候就曾经答应在1845年把它取消;他们也忘记了,把一种税扩大到更大的范围对于将来取消这种税是一个大成问题的办法。

马克思:《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预算》(1853年4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2—83页。

曼彻斯特自由派终于抛掉披在自己身上的狮皮。他们现在力求做到的就是:让资本来统治,让劳动受奴役。

现在已经不能再像在1831年时那样用议会改革来愚弄群众了;议会改革运动为中等阶级赢得的对立法的影响已经完全被利用来对付工人阶级;与此同时,工人阶级也产生了自己的政治运动——宪章运动。现在已经不能把工业体系中发生的一切反常现象和这个体系内部产生的那些致命的冲突都归罪于贵族保护关税派了,因为自由贸易已经存在了八年左右,实行自由贸易的条件非常有利,还出现了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这两个仿佛是被现代造物主的灵感突然创造出来的埋藏着黄金的世界。工业资产阶级就这样一个一个地、一步一

步地、亲手扫除了它精心培育出来的一切幻想，而在过去，它可以在危急时刻利用这些幻想把工人阶级的激愤从他们真正的对头身上引开，而引向工业巨头的对头，即土地贵族。在1853年，厂主的虚伪的欺骗已经行不通了，工人的糊涂的幻想也被打破了。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战争已成为不可缓和的、不可掩盖的、公开承认的和人人清楚的事了。厂主们在自己最近的一个宣言中大叫："现在已经不是**工资**问题，而是**应当由谁来统治**的问题了。"这样，曼彻斯特自由派终于抛掉披在自己身上的狮皮。他们现在力求做到的就是：让资本来统治，让劳动受奴役。

马克思：《战争。——罢工。——缺粮》（1853年11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10—511页。

泰霍夫先生从我的秘密理论中抽出来的最本质的东西，不就是最平庸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吗！

自由资产阶级从1688年到1848年向无产阶级发出的号召，除了"剪裁体系和词句"，以便通过**无产阶级的**力量来剥夺贵族的统治，还做了什么呢？因此，泰霍夫先生从我的"秘密"理论中剥离出来的最本质的东西，不就是**最平庸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吗**！为一个煎鸡蛋吵吵嚷嚷！但是另一方面，既然泰霍夫知道，"马克思"不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得到一种印象：马克思的全部活动的目的，是建立**他的**个人统治"。"我的全部活动"，——把我同泰霍夫先生的唯一一次谈话说得多么客气啊！

马克思:《福格特先生》(1860年2月—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页。

这种世界主义的自由主义否认民族差别,致力于缔造一个伟大的、自由的、联合的人类。它同宗教理性主义是一致的,并且同出一源,即出于上一世纪的博爱主义……

德意志狂的这个对立面就是南德意志等级会议的世界主义的自由主义。这种世界主义的自由主义否认民族差别,致力于缔造一个伟大的、自由的、联合的人类。它同宗教理性主义是一致的,并且同出一源,即出于上一世纪的博爱主义,而德意志狂则最后导致神学上的正统教义,它几乎所有的信徒(阿伦特、斯特芬斯、门采尔)都逐渐走向这样的归宿。世界主义自由思想的片面性常常被它的对手所揭露——当然这种揭露本身也有其片面性,因此,我才有可能扼要地谈谈这种倾向。

恩格斯:《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1840年12月初—12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1页。

"民主派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都被经济关系碰得粉碎了。

旧欧洲"**在短时间内**将要毁灭",美国第二天就会登上宝座之类的话,都只是泰霍夫先生说的。我当时对美国最近的将来认识得如何清楚,可以从同一《时评》的下面一段看出来:"这里不久就会发生**疯狂的投机**,即使英国资本大量投

人……**纽约**这一次仍然会成为整个这种投机的中心，而像1836年一样会首先遭到破产。”（《时评》1850年5—10月合刊第149页）[①]我在1850年给美国作的这种预测，已由1857年的商业大危机完全证实了。关于“旧欧洲”，我描绘了它在经济上的蓬勃发展以后，倒是这样写的：“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大陆秩序党内各个集团的代表目前争吵不休，并使对方丢丑，这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社会关系的基础**目前**是那么巩固，并且——这一点反动派并不清楚，——是那么明显地具有**资产阶级的特征**。一切想阻止资产阶级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派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同上，第153页）[②]

事实上，欧洲的历史只是从1857—1858年的危机以后才又带有一种紧迫的、也可以说是革命的性质。事实上，恰好是在1849年至1859年这一反动时期，工商业在大陆上得到了空前大发展，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物质基础也随之加强了。事实上，在那个时期，“民主派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

①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时评。1850年5—10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92页。着重号是后加的。——编者注

②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时评。1850年5—10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96页。着重号是后加的。——编者注

宣言”都被经济关系碰得粉碎了。

马克思:《福格特先生》(1860 年 2 月—1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52—153 页。

假如事情由小资产阶级来决定的话,那么未必会抛弃处处以法律为依据来进行合法、平和而又规规矩矩的斗争的这种立场,未必会以火枪和石块来代替所谓的精神武器。

假如事情由小资产阶级来决定的话,那么未必会抛弃处处以法律为依据来进行合法、平和而又规规矩矩的斗争的这种立场,未必会以火枪和石块来代替所谓的精神武器。自 1830 年起德国以及法国、英国的一切政治运动的历史向我们表明,这个阶级在它还没有觉察出任何危险的时候,总是吹牛,讲漂亮话,有时甚至在口头上坚持最极端的立场;可是一旦面临小小的危险,它便胆小如鼠、谨小慎微、躲躲闪闪,一旦其他的阶级响应并郑重其事地参加由它发起的运动,它就惊恐万状、顾虑重重、摇摆不定;一旦事情发展到手执武器进行斗争的地步,它为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就预备出卖整个运动;最后,由于它不坚决,一旦反动的政党取得胜利,它总是倍受欺骗和凌辱。

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1849 年 8 月中—1850 年 2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 页。

在自由竞争中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只要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还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所必需的、因而是最适

当的形式，个人在资本的纯粹条件范围内的运动，就表现为个人的自由……

……一种更荒谬的看法，就是把竞争看成是摆脱了束缚的、仅仅受自身利益制约的个人之间的冲突，看成是自由的个人之间的相互排除和吸引，从而看成是自由的个性在生产和交换领域内的绝对存在形式。再也没有比这种看法更错误的了……**自由竞争**是资本同作为另一个资本的它自身的关系，即资本作为资本的现实行为。只有随着自由竞争的发展，资本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在资本发展的历史准备阶段上仅仅表现为一些倾向——才确立为规律，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才以它的最适当的形式确立起来。因为自由竞争就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自由发展，就是资本的条件和资本这一不断再生产着这些条件的过程的自由发展。

在自由竞争中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只要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还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所必需的、因而是最适当的形式，个人在资本的纯粹条件范围内的运动，就表现为个人的自由，然而，人们又通过不断回顾被自由竞争所摧毁的那些限制来把这种自由教条地宣扬为自由。自由竞争是资本的现实发展。它使符合资本本性，符合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符合资本概念的东西，表现为单个资本的外在必然性。各资本在竞争中相互之间施加的、以及资本对劳动等等施加的那种相互强制（工人之间的竞争仅仅是各资本竞争的另一种形式），就是财富作为资本取得的**自由的**同时也是**现实的**发展。这甚至使最深刻的经济思想家们，例如李嘉图，都**把**自由竞争的绝对统治**作为前提**，以便有可能研究和表述资本的那

些适当的规律,这些规律同时表现为统治着资本的生死攸关的趋势。

但是,自由竞争是资本生产过程的相适应的形式。自由竞争越发展,资本运动的形式就表现得越纯粹。例如,李嘉图以自由竞争的绝对统治为前提,实际上就是不由自主地承认了资本的**历史本性**和自由竞争的局限性,而自由竞争恰恰只不过是各资本的自由运动,也就是说,资本已不是在属于解体了的准备阶段的条件中运动,而是资本本身的条件中运动。资本的统治是自由竞争的前提,就像罗马的皇帝专制政体是自由的罗马"私法"的前提一样。

马克思:《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1857 年底—1858 年 5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1—43 页。

断言自由竞争等于生产力发展的终极形式,因而也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形式,这无非是说中产阶级的统治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结——对前天的暴发户们来说这当然是一个愉快的想法。

只要资本的力量还薄弱,它本身就还要在以往的或随着资本的出现而正在消逝的生产方式中寻求拐杖。而一旦资本感到自己强大起来,它就抛开这种拐杖,按它自己的规律运动。当资本开始感到并且意识到自身成为发展的限制时,它就在这样一些形式中寻找避难所,这些形式虽然看来使资本的统治完成,同时由于束缚自由竞争同时却预告了资本的解体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解体。包含在资本本性里面

的东西，只有通过竞争才作为外在的必然性现实地表现出来，而竞争无非是许多资本把资本的内在规定互相强加给对方并强加给自己。因此，任何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范畴，即使是最最初的范畴——例如价值规定——要成为实际的东西，都不能不通过自由竞争，也就是说，不能不通过资本的实际过程，这种过程表现为各资本以及其他一切由资本决定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相互作用。

另一方面，由此也产生一种荒谬的看法，把自由竞争看成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发展，认为否定自由竞争就等于否定个人自由，等于否定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生产。但这不过是在有局限性的基础上，即在资本统治的基础上的自由发展。因此，这种个人自由同时也是最彻底地取消任何个人自由，而使个性完全屈从于这样的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采取物的权力的形式，而且是极其强大的物，离开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本身而独立的物。

揭示什么是自由竞争，这是对于中产阶级先知们赞美自由竞争或对于社会主义者们诅咒自由竞争所作的唯一合理的回答。如果说，在自由竞争的范围内，个人通过单纯追求他们的私人利益而实现公共的利益，或更确切些说，实现普遍的利益，那么，这只无非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他们相互压榨，因而他们的相互冲突本身也只不过是这种相互作用所依据的条件的再创造。不过，一旦把竞争看作自由个性的所谓绝对形式这种错觉消失了，那么这种情况就证明，竞争的条件，即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条件，已经被人们当作限制而感觉到和考虑到了，因而这些条件已经成为而且越来越成为

这样的限制了。断言自由竞争等于生产力发展的终极形式，因而也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形式，这无非是说中产阶级的统治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结——对前天的暴发户们来说这当然是一个愉快的想法。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57年底—1858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3—44页。

自由主义的华丽外衣掉下来了，可恶至极的专制制度已赤裸裸地呈现在全世界面前。

目前我正在荷兰旅行。根据这里的和法国的报纸来判断，德国已深深地陷入泥潭，而且会越陷越深。我向您保证，连丝毫没有民族自尊心的人也会感到这种民族耻辱，即使是在荷兰也是如此。一个最平凡的荷兰人与一个最伟大的德国人相比，仍然是一个公民。请听听外国人对普鲁士政府的评论吧！在这方面意见是惊人地一致，再也没有人会相信普鲁士制度及其明显的本质了。可见新学派还是有点用处的。自由主义的华丽外衣掉下来了，可恶至极的专制制度已赤裸裸地呈现在全世界面前。

马克思：《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1843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4—55页。

这就是用自由主义伪造马克思主义，以自由派的观点偷换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阶级斗争观点的问题。

叶尔曼斯基先生破口大骂，并且一再回顾以前对他的

“侮辱”(包括对1907年在圣彼得堡分裂社会民主党组织遭到失败的唐恩先生及其同伙的“侮辱”在内),力图以此来掩盖问题的真正实质。

但是我们仍然不允许叶尔曼斯基先生以回顾取消派不该受到的侮辱和失败来掩盖目前争论的实质,因为目前的争论涉及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问题。这个问题经常被人们用各种不同的理由一再提出来。

这就是用自由主义伪造马克思主义,以自由派的观点偷换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阶级斗争观点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者与取消派分子进行的全部争论的思想基础,我们将不厌其烦地阐述清楚。

列宁:《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1913年5月),《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6页。

“经济派”就这样逐渐变成了自由主义的工人政治家。“经济派”就这样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阶级斗争概念。

阶级斗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因此,正是应该详细地谈谈阶级斗争概念。

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① 大家知道,对马克思的这句深刻的话,那些受自由主义思想奴役的机会主义者作了错误的理解,并且竭力作出歪曲的解释。例如,取消派的老大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页。——编者注

哥们“经济派”就是属于机会主义之列。“经济派”认为,阶级之间的任何冲突都是政治斗争。因此“经济派”承认为争取每个卢布增加5戈比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却不愿看到更高级的、更发达的、全民族的为政治而进行的阶级斗争。因此,“经济派”只承认萌芽状态的阶级斗争,而不承认更发达的阶级斗争。换句话说,“经济派”只承认阶级斗争中那些从自由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最能容忍的东西,而拒绝比自由派更进一步,拒绝承认更高级的、自由派不能接受的阶级斗争。“经济派”就这样逐渐变成了自由主义的工人政治家。“经济派”就这样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阶级斗争概念。

列宁:《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1913年5月),《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8—249页。

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永远要求深刻的、而不是肤浅的“评价”,永远要揭露自由派的歪曲,半吞半吐,胆怯的掩饰的贫乏。

18世纪末的阶级斗争向我们表明,它是怎样变成政治性的斗争的,它是怎样达到真正“全民族的”形式的。从那时起,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都有了巨大的发展。旧时期的“死板公式”并没有阻止任何人去研究比如我在上面已经部分地提到的新的斗争形式。

但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总是要求深刻的而不是肤浅的“评价”,总是要揭露自由派的歪曲、闪烁其词、胆怯的掩饰等等的贫乏。

我们向阿·叶尔曼斯基先生致意，因为他以忘我的精神十分精彩地说明，取消派由于丧失了用革命观点观察社会现象的能力，是怎样以自由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偷换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的。

列宁：《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1913 年 5 月），《列宁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52 页。

（二）改良主义

历史科学告诉我们，一般说来，某一政治制度的改良主义的变革和非改良主义的变革的差别在于：实行前一种变革，政权仍然留在原先的统治阶级手中，实行后一种变革，政权从原先的阶级手中转到新的阶级手中。

这里阐述的策略的实质可以用这样一个词来表达：改良主义。

历史科学告诉我们，一般说来，某一政治制度的改良主义的变革和非改良主义的变革的差别在于：实行前一种变革，政权仍然留在原先的统治阶级手中，实行后一种变革，政权从原先的阶级手中转到新的阶级手中。立宪民主党人不懂得历史变革的阶级基础。从理论的角度来看，立宪民主党人的基本错误就在这里。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上述理论上的差别可以归结为：是局部的东西有所改变而总的和基本的东西毫无改变，还是总的和基本的东西也改变了。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国家内,有过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但也有过不满足于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工人阶级从不认为通过改良就能够实现根本的变革,但是也决不拒绝在一定条件下提出改良式的当前要求。

列宁:《日益扩大的矛盾》(1913年2月6—9日〔19—22日〕),《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96页。

任何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都包含着两个基本方面,这就是用改良的诺言来欺骗群众的资产阶级的首领和政客,以及那些感到再也不能按老样子生活下去而上了许愿最多的骗子手的当的群众。

我们已经在《真理报》上指出,美国共和党的分裂和罗斯福的"进步"党的成立有多么巨大的意义。

现在选举结束了。"民主派"取得了胜利,社会党人所预料的一切后果立刻开始出现了。罗斯福的进步党以及该党获得450万张选票,是广泛存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以美国式的规模登上舞台的一个例证。

这一思潮的兴衰之所以引起普遍的关注,是因为**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有这种思潮,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任何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都包含着两个基本方面,这就是用改良的诺言来欺骗群众的资产阶级的首领和政客,以及那些感到再也不能按老样子生活下去而上了许愿最多的骗子手的当的群众。所以,在美国,刚刚成立的进步党在选举后的第二天,就四分五裂了。

列宁:《美国在选举以后》(1912 年 11 月 25 日〔12 月 8 日〕以前),《列宁全集》第 22 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30 页。

口号的意义不是由提出口号的人的意图来决定的,而是由国内各个阶级力量的对比来决定的。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取消派至今还在《光线报》和《我们的曙光》杂志上表示拥护的那个口号:建立"公开的工人政党"或"为公开的党而斗争"。

这个口号究竟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口号呢,还是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口号?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应从取消派或其他集团的情绪和计划中去找,而应从对现代俄国社会力量的对比的分析中去找。口号的意义不是由提出口号的人的意图来决定的,而是由国内各个阶级力量的对比来决定的。

农奴主—地主和他们的"官僚",对于有利于政治自由的一切变更都抱敌视态度。这是可以理解的。资产阶级由于它在半农奴制的落后国家内所处的经济地位,不能不追求自由。但是资产阶级害怕人民的积极性甚于害怕反动势力。1905 年特别明显地证明了这个真理;工人阶级非常清楚地领会了这个真理;只有机会主义的和半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才没有领会这个真理。

资产阶级是自由主义的和反革命的。因此就产生了它的那种软弱而可怜得好笑的**改良主义**。幻想改良,但又害怕同农奴主认真算账,而农奴主是不但不准许改良,甚至要把已经

实行的改良重新收回去的。鼓吹改良，但又害怕人民运动。想要排挤农奴主，但又害怕失去他们的帮助，害怕失去自己的特权。使农奴主拥有无限权力而使资产阶级享有种种特权的六三体制，就是建筑在这种阶级关系基础上的。

列宁：《几个争论的问题》（1913 年 4—6 月），《列宁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7 页。

改良主义者对工人影响愈厉害，工人就愈软弱无力，就愈依附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就愈容易利用各种诡计把改良化为乌有。

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者，承认争取改良的斗争，即承认争取改善劳动者境况的斗争，尽管这种改善仍然不触动统治阶级手中的政权。但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者又最坚决地反对改良主义者，反对他们直接或间接地用改良来限制工人阶级的意向和活动。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欺骗，只要存在着资本的统治，尽管有某些改善，工人总还是雇佣奴隶。

自由派资产阶级总是一只手搞改良，另一只手又收回这些改良，使之化为乌有，利用这些改良来奴役工人，把工人分成一个个集团，使劳动者永远当雇佣奴隶。因此，改良主义，即使是非常真诚的改良主义，实际上变成了资产阶级腐蚀和削弱工人的工具。各国经验证明，工人相信改良主义者，总是上当受骗。

相反，如果工人掌握了马克思的学说，即认识到只要资本的统治地位保持不变，雇佣奴隶制就不可避免，那么他们就不会上资产阶级任何改良的当。工人们懂得了在保持资本主义

的条件下改良既不可能是牢靠的，也不可能是认真的，他们就会为争取改善自己的状况而斗争，并且利用这种改善来继续为反对雇佣奴隶制进行更加顽强的斗争。改良主义者竭力用小恩小惠来分化和欺骗工人，使他们放弃他们的阶级斗争。工人们认识了改良主义的欺骗性，就会利用改良来发展和扩大自己的阶级斗争。

改良主义者对工人影响愈厉害，工人就愈软弱无力，就愈依附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就愈容易利用各种诡计把改良化为乌有。工人运动愈独立愈深入，目标愈广泛，愈摆脱改良主义狭隘性的束缚，工人巩固和利用某些改善就愈有成效。

列宁：《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1913 年 9 月 12 日〔25 日〕），《列宁全集》第 24 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2 页。

改良主义者各国都有，因为资产阶级到处都在想方设法腐蚀工人，使他们甘心当奴隶，不想消灭奴隶制。

改良主义者各国都有，因为资产阶级到处都在想方设法腐蚀工人，使他们甘心当奴隶，不想消灭奴隶制。在俄国，改良主义者就是取消派，他们否定我们的过去，以便用关于新的、公开的、合法的党的幻想来麻痹工人。不久前，迫于《北方真理报》的压力，彼得堡的取消派不得不出来为他们搞改良主义作辩解。为了把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弄个一清二楚，应该把他们的议论仔细剖析一下。

彼得堡的取消派写到：我们不是改良主义者，因为我们没有说过改良就是一切，最终目的微不足道这样的话；我们是

说,运动在朝着最终目的发展;我们是说,通过争取改良的斗争完全实现提出的任务。

列宁:《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1913 年 9 月 12 日〔25 日〕),《列宁全集》第 24 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 页。

马克思主义者不倦地进行工作,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争取改良和利用改良,同时,无论在宣传、鼓动,还是在群众经济活动等等方面,任何超出改良主义范围的做法他们都不横加指责,而是予以支持,关切地加以发展。

马克思主义者不倦地进行工作,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争取改良和利用改良,同时,无论在宣传、鼓动,还是在群众经济活动等等方面,任何超出改良主义范围的做法他们都不横加指责,而是予以支持,关切地加以发展。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取消派,却攻击马克思主义者整体的存在,破坏马克思主义的纪律,宣扬改良主义,宣扬自由派的工人政策,这只能瓦解工人运动。

此外,不要忘记,在俄国,改良主义还有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就是把现代俄国和现代欧洲的政治形势的根本条件混为一谈。在自由派看来,这样做是合理的,因为自由派相信并宣扬"谢天谢地,我们立宪了"。自由派反映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坚决认为 10 月 17 日以后,任何超出改良主义范围的民主措施,都是丧失理智、犯罪、作恶的行为,等等。

但是,我国取消派实际上坚持的正是这些资产阶级阶级观点,他们不断系统地把"公开的党"和"争取合法性的斗争"

等等“搬到”(以书面形式)俄国。换句话说,他们同自由派一样,也鼓吹把欧洲立宪制搬到俄国而**不经过**那条曾经使西欧确立宪制并使之经过几代人有时甚至经过几个世纪得到巩固的独特道路。取消派和自由派就像俗话所说的,又想洗毛皮,又不让毛皮下水。

在欧洲,改良主义实际上就是不要马克思主义,用资产阶级的“社会政策”取代马克思主义。我国取消派的改良主义不仅有这种表现,它还破坏马克思主义的组织,拒绝实现工人阶级的民主任务而代之以自由派的工人政策。

列宁:《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1913 年 9 月 12 日〔25 日〕),《列宁全集》第 24 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4 页。

(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

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

法国和英国的贵族,按照他们的历史地位所负的使命,就是写一些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品。在法国的 1830 年七月革命和英国的改革运动中,他们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从此就再谈不上严重的政治斗争了。他们还能进行的只是文字斗争。但是,即使在文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弹复辟时期[①]的老调了。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作样,似

① 恩格斯在 1888 年英文版加了一个注:“这里所指的不是 1660—1689 年英国的复辟时期,而是 1814—1830 年法国的复辟时期”。——编者注

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去写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书。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

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

他们责备资产阶级，与其说是因为它产生了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因为它产生了革命的无产阶级。

因此，在政治实践中，他们参与对工人阶级采取的一切暴力措施，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违背自己的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词，屈尊拾取金苹果①，不顾信义、仁爱和名誉去做羊毛、甜菜和烧酒的买卖。②

正如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一样，僧侣的社会主义

---

① “金苹果”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工业树上掉下来的金苹果”。——编者注

② 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这里主要是指德国，那里的土地贵族和容克通过自行经营自己的很大一部分土地，他们还开设大规模的甜菜厂和土豆酒厂。较富有的英国贵族还没有落到这种地步；但是，他们也知道怎样让人家以他们的名义创办颇为可疑的股份公司，以补偿地租的下降。”——编者注

也总是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 年 12 月—1848 年 1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95—296 页。

这种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按其实际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

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例如在法国,那些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的。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西斯蒙第不仅对法国而且对英国来说都是这类著作家的首领。

这种社会主义非常透彻地分析了现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它揭穿了经济学家的虚伪的粉饰。它确凿地证明了机器和分工的破坏作用、资本和地产的积聚、生产过剩、危机、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必然没落、无产阶级的贫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财富分配的极不平均、各民族之间的毁灭性的工业战争,以及旧风尚、旧家庭关系和旧民族性的解体。

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按其实际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

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 年 12 月—1848 年 1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97—298 页。

激进小资产者之所以带有社会主义情绪，只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自己即将灭亡，看到自己即将加入无产阶级的行列。他们不是作为小资产者、小量资本的所有者，而是作为未来的无产者在幻想劳动组织，幻想资本和劳动之间关系的变革。

激进小资产者之所以带有社会主义情绪，只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自己即将灭亡，看到自己即将加入无产阶级的行列。他们不是作为小资产者、小量资本的所有者，而是作为未来的无产者在幻想劳动组织，幻想资本和劳动之间关系的变革。只要他们获得政权，他们很快就会忘掉劳动组织。因为政权，至少是在最初一些日子的陶醉中，会使他们看到有获得资本和从威胁他们的灭亡中得救的前景。只有当武装的无产者端着刺刀为他们作后盾的时候，他们才会想起自己昨天的同盟者。他们在 2 月和 3 月间就是这样行动的，而他们的领袖赖德律—洛兰就是第一个这样行动的人。如果现在他们的幻想已经消失，难道这能改变工人们对他们的态度吗？如果他们回过头来，愿意痛改前非，他们是否有权要求工人们现在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又重入圈套呢？

恩格斯：《法国工人阶级和总统选举》（1848

年12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65页。

普鲁东不同于其余的经济学家,他不是把私有制的这种或那种个别形式、而是把整个私有制十分透彻地描述为经济关系的伪造者。

普鲁东永远结束了这种不自觉的状态。他认真地对待经济关系的**合乎人性的**外观,并把它和经济关系的**违反人性的现实**尖锐地对立起来。他迫使这些关系真正符合于它们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或者更确切些说,他迫使这些关系抛弃关于自身的这种看法而承认自己是真正违反人性的。因此,普鲁东不同于其余的经济学家,他不是把私有制的这种或那种个别形式、而是把整个私有制十分透彻地描述为经济关系的伪造者。从政治经济学观点出发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时所能做的一切,他都已经做了。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月—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0页。

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还受着政治经济学的前提的支配,因此,普鲁东仍以政治经济学的占有形式来表现实物世界的重新争得。

普鲁东想消灭不拥有和拥有的旧形式的愿望,和他想消灭人对自己的**实物本质**的实际异化关系、想消灭人的自我异化的**政治经济**表现的愿望是完全同一的。但是,由于他对政

治经济学的批判还受着政治经济学的前提的支配，因此，普鲁东仍以政治经济学的占有形式来表现实物世界的重新争得。

……

普鲁东未能用恰当的话来表达自己的这个思想。“平等占有”是政治经济的观念，因而还是下面这个事实的异化表现：**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普鲁东在政治经济的异化范围内来克服政治经济的异化。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 年 9 月—1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52 页。

蒲鲁东先生从社会的角度进行的考察，把那些恰恰表示着一定的社会关系或经济的形式规定性的区别忽略掉，抽象掉了。

他把一定的社会形式称为主观的东西，而把主观的抽象称为社会。产品本身属于任何劳动方式，而不论劳动方式的一定的社会形式如何。产品只有在它表示一定的、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时才成为资本。蒲鲁东先生从社会的角度进行的考察，把那些恰恰表示着一定的社会关系或经济的形式规定性的区别忽略掉，抽象掉了。这就像有人说：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并不存在奴隶和公民；两者都是人。其实正相反，在社会之外他们才是人。是奴隶或是公民，这是 A 这个人和 B 这个人的一定的社会存在方式。A 这个人本身并不是奴隶，他在他所隶属的社会里并通过社会才成为奴隶。成为奴

隶和成为公民，这是社会的规定，是 A 和 B 这两个人的关系。蒲鲁东先生在这里就资本和产品所说的话，意思指的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不存在区别；其实恰恰只有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才存在着这种区别。值得注意的是，蒲鲁东用高谈阔论来掩饰他没有能力从商品范畴（概念）转到资本范畴。

马克思：《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1861 年 8 月—1862 年 3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75—176 页。

蒲鲁东的似乎深奥莫测的经济怪论，一般说来不过如此。这个怪论就在于：蒲鲁东把经济现象在他头脑中所造成的混乱说成是这种现象的规律。

蒲鲁东的似乎深奥莫测的经济怪论，一般说来不过如此。这个怪论就在于：蒲鲁东把经济现象在他头脑中所造成的混乱说成是这种现象的规律。

（实际上他的论点还要糟糕，因为它包含下述假定：商品的真正价格等于包含在商品中的工资，等于包含在商品中的有酬劳动，而剩余价值，利息等等则只是超过商品的这个真正价格的任意附加。）

但更糟糕的是庸俗经济学对蒲鲁东的批判。例如，福尔卡德先生（在这里要引用这个地方）不仅指出，蒲鲁东的观点一方面证明得太过分了，因为按照这种观点，工人阶级根本不能生活；而且指出，另一方面，蒲鲁东在这个怪论的表述上又作得远远不够，因为工人所购买的商品的价格，除

了工资加上利息等以外，还包括原料等等（简单地说就是：不变资本的价格要素）。福尔卡德完全正确。但下一步呢？福尔卡德指出，这个问题实际上比蒲鲁东所提出的问题还更加困难，——这就是福尔卡德甚至不能在蒲鲁东提出这个问题的范围内解决这个问题而只是以空洞的废话回避它的理由。

实际上，这是蒲鲁东手法的好的方法：蒲鲁东带着诡辩的自负同庸俗经济学家们相反公开地说出经济现象的混乱；而这些庸俗经济学家则力图抹杀这种混乱，但他们没有能力理解它，从而把自己理论上的贫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例如，威·修昔的底斯·罗雪尔先生就把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一书说成是“混乱的东西和引起混乱的东西。”“引起混乱的东西”一语表示出庸俗经济学在这种混乱面前无能为力的情绪。庸俗经济学甚至没有能力以蒲鲁东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矛盾的那种混乱的、浮浅的与诡辩的形式（蒲鲁东以这种形式弄昏了庸俗经济学的头脑）来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矛盾。庸俗经济学只好撇开它在理论上不能克服的诡辩，求助于“普通的”常识，说什么事情总是有它的道理的。这对于所谓的“理论家”倒是一个很好的安慰。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册第六章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1863 年 7 月—1864 年 6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9 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0—32 页。

蒲鲁东先生的特点是利用一整套虚伪的形而上学，先把

最普通的基本观念作为资本搬到他的“生产基金”里去，然后高谈阔论地把它作为“产品”兜售给公众。

蒲鲁东先生的特点是利用一整套虚伪的形而上学，先把最普通的基本观念作为资本搬到他的“生产基金”里去，然后高谈阔论地把它作为“产品”兜售给公众。**产品**如何转化为**资本**这个问题本身是毫无意义的，而回答却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实际上蒲鲁东先生只告诉了我们两件众所周知的事实：第一，产品有时要作为原料被加工，第二，**产品**同时就是**商品**，就是说，产品具有**价值**，而这个价值在其实现以前必须经过买者卖者之间的激烈的讨价还价。这位“哲学家”指出：

“对社会来说，资本和产品之间的区别是不存在的。这种区别完全是个人的主观想象。”

他把抽象的社会形式称为“主观的”，而把他自己的主观抽象称为“社会”。

如果经济学家在单纯从**劳动过程**的观点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把资本只是说成**物**，原料，工具等等；那么他然后就会忽然想起，生产过程毕竟也是价值增殖过程，而且就价值增殖过程来看，这些物只能作为**价值**来考察。

“同一资本有时以货币额的形式存在，有时以原料、工具、完成的商品的形式存在。这些物本身不是**资本**；资本存在于物所具有的**价值**中。”

既然这种价值

“自我保持着，不会再消失，自行增殖……与创造这种价值的商品无关，像一种形而上学的和没有实体的质，永远掌握在同一个生产者（即资本家）手里”，

那么刚刚还认为是物的东西，现在却被宣布为一种“商业的观念”。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产物既不是单纯的**产品**（使用价值），也不是单纯的**商品**即具有交换价值的产品，相反，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殊产物**是**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产物是这样一些**商品**，它们具有更多的交换价值，就是说，它们代表的劳动比为了生产这些商品而以货币形式或商品形式预付的劳动更多。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过程**只表现为**手段**，**价值增殖过程**或**剩余价值的生产**才表现为目的。当经济学家想到这一点的时候，资本就又被说成是为了造出“利润”而在生产中使用的财富。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册第六章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1863 年 7 月—1864 年 6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9 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9—60 页。

既然“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这样成了这些政府对付德国资产阶级的武器，那么它也就直接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利益，即德国小市民的利益。

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美文学家，贪婪地抓住了这种文献，不过他们忘记了：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它必然表现为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

德国著作家的唯一工作，就是把新的法国的思想同他们的旧的哲学信仰调和起来，或者毋宁说，就是从他们的哲学观点出发去掌握法国的思想。

……

这种社会主义是这些政府用来镇压德国工人起义的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

既然“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这样成了这些政府对付德国资产阶级的武器，那么它也就直接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利益，即德国小市民的利益。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 年 12 月—1848 年 1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98—300 页。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把这种安慰人心的观念制成半套或整套的体系。

我们可以举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作为例子。

社会主义的资产者愿意要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是不要由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愿意要现存的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瓦解的因素。他们愿意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看来，它所统治的世界自然是最美好的世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把这种安慰人心的观念制成半套或整套的体系。它要求无产阶级实现它的体系，走进新的耶路撒冷，其实它不过是要求无产阶级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但是要抛弃他们关于这个社会的可恶的观念。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 年 12 月—1848 年 1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01—302 页。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个论断:资产者之为资产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

这一部分人包括:经济学家、博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劳动阶级状况改善派、慈善事业组织者、动物保护协会会员、戒酒协会发起人以及形形色色的小改良家。这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甚至被制成一些完整的体系。

……

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所理解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绝对不是只有通过革命的途径才能实现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废除,而是一些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的行政上的改良,因而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至多只能减少资产阶级的统治费用和简化它的财政管理。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只有在它变成纯粹的演说辞令的时候,才获得自己的适当的表现。

自由贸易!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保护关税!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单身牢房!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才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唯一认真说出的最后的话。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个论断:资产者之为资产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 年 12 月—1848 年 1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01—302 页。

马克思了解古代奴隶主,中世纪封建主等等的历史必然性,因而了解他们的历史正当性,承认他们在一定限度的历史时期内是人类发展的杠杆;因而马克思也承认剥削,即占有他人劳动产品的暂时的历史正当性;但他同时证明,这种历史的正当性现在不仅消失了,而且剥削不论以什么形式继续保持下去,已经日益愈来愈妨碍而不是促进社会的发展,并使之卷入愈来愈激烈的冲突中。

我们丝毫无意于使固执己见的法学家明白,**马克思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提出过"十足劳动收入权"的要求**,他在他的理论著作中根本没有提出过任何形式的法权要求。连我们的法学家在责难马克思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彻底论述十足劳动收入权"的时候,也逐渐模糊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中,对法权(它始终只是某一特定社会的经济条件的反映)的考察是完全次要的;相反地,对特定时代的一定制度、占有方式、社会阶级产生的历史正当性的探讨占着首要地位。任何一个人,只要把历史看作一个有联系的,尽管常常有矛盾的发展过程,而不是看作仅仅是愚蠢和残暴的杂乱堆积,像 18 世纪人们所做的那样,首先会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感兴趣。马克思了解古代奴隶主,中世纪封建主等等的历史必然性,因而了解他们的历史正当性,承认他们在一定限度的历史时期内是人类发展的杠杆;因而马克思也承

认剥削，即占有他人劳动产品的暂时的历史正当性；但他同时证明，这种历史的正当性现在不仅消失了，而且剥削不论以什么形式继续保持下去，已经日益愈来愈妨碍而不是促进社会的发展，并使之卷入愈来愈激烈的冲突中。而门格尔把这些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研究拖上他的狭小的法学的普罗科拉斯提斯之床的企图，仅仅证明他自己完全不能理解超出狭隘的法学眼界以外的事物。他这样表达的第一号基本权利在马克思那里是绝对不存在的。

恩格斯：《法学家的社会主义》（1886 年 11 月—12 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附录，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557—558 页。

他（门格尔）想通过把社会主义作为法权体系来阐述的办法实现这个改革。

对当代许多其他社会改革家说来是合适的，对门格尔先生说来也合适，那就是说大话而实际结果（如果一般有实际结果的话）微不足道。本来说要证明马克思是剽窃者，而证明的确是，“剩余价值”这个名词在马克思之前已经有人使用了，虽然含义有所不同！

门格尔先生的法学家的社会主义也是这样。门格尔先生序言中宣称，他认为

“社会主义的法学改造，是当代哲学最重要的任务。这一任务的正确解决，将对通过和平改革来实现我们的法律程序的不可避免的变更做出重大贡献。只有当社会主义思想变成清醒的法学概念的时候，实际政治家才能认识到，可以在多

大程度上改革现行法律程序以利于苦难的人民大众”。

他想通过把社会主义作为法权体系来阐述的办法实现这个改革。

恩格斯:《法学家的社会主义》(1886 年 11 月—12 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附录,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565—566 页。

两种观点都脱离了它们赖以存在的历史背景;双方都诉诸感情;一方诉诸正义感,另一方人性感。双方都给自己的要求披上虔诚愿望的外衣,至于这些要求为什么恰恰应当在现在而不是在一千年以前或一千年以后实现,那是无法说的。

要适当表现和全面概括工人阶级因其经济状况而产生的求解放的愿望,上面两种见解都同样是不恰当的。平等的要求也好,十足劳动收入的要求也好,当需要从法学上来具体表述它们的时候,都会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而且问题的实质,即生产方式的改造,则多少没有被触及。伟大的空想主义者放弃了政治斗争同时就是放弃了阶级斗争,也就是放弃了他们捍卫其利益的那个阶级的唯一可能的活动方式。两种观点都脱离了它们赖以存在的历史背景;双方都诉诸感情;一方诉诸正义感,另一方人性感。双方都给自己的要求披上虔诚愿望的外衣,至于这些要求为什么恰恰应当在现在而不是在一千年以前或一千年以后实现,那是无法说的。

工人阶级由于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任何所有权,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机制而一代传一代地处于这种毫无财产的状态,他

们是不能在资产阶级的法学幻影中充分表达自己生活状况的。只有当工人阶级不是带着有色的法学眼睛,而是如实地观察事物的时候,它才能亲自彻底认清自己的生活状况。在这方面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帮助了工人阶级,他证明:人们的一切法律、政治、哲学、宗教等等观念归根结蒂都是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从他们的生产方式和产品交换方式中引导出来的。由此便产生了适合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和斗争条件的世界观;和工人无财产相适应的只能是他们头脑中无幻想。现在这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正在全球环行。

恩格斯:《法学家的社会主义》(1886 年 11 月—12 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附录,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547—548 页。

这个新的上升的阶级反对封建主和当时保护他们的君主专制的斗争,像一切阶级斗争那样,应当是政治斗争,是争取占有国家的斗争,应当为了法权要求而进行,——就是这一事实,促进了法学世界观的确立。

到 17 世纪时宗教的旗帜最后一次在英国飘扬,过了不到 50 年,新的世界观就不带任何掩饰地在法国出现了,这就是**法学世界观**,它应当成为资产阶级的经典世界观。

它是神学世界观的世俗化。它代替教条和神权的是人权,代替教会的是国家。以前,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是由教会批准的,因此曾被认为是教会和教条所创造的。由于达到社会规模并且得到充分发展的商品交换产生了(尤其是由于预付和信贷制度)复杂的契约关系,从而要求只能由社会提供

的公认的规章亦即国家规定的法律准则，于是人们认为，这些法律准则不是从经济事实中产生的，而是由国家正式规定的。由于竞争——这个自由商品生产者的基本交往形式——是平等化的最大创造者，因此法律面前的平等便成为了资产阶级的决战口号。这个新的上升的阶级反对封建主和当时保护他们的君主专制的斗争，像一切阶级斗争那样，应当是政治斗争，是争取占有国家的斗争，应当为了**法权要求**而进行，——就是这一事实，促进了法学世界观的确立。

恩格斯：《法学家的社会主义》（1886 年 11 月—12 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附录，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546 页。

……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单纯停留在法学的“权利基础”上，就不能消除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特别是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灾难，这就使他们完全抛开法学政治领域，并宣称一切政治斗争都是无益的。

无产阶级的第一批政党组织，以及它们的理论代表都是完全站在法学的“权利基础”之上的，只不过他们为自己奠立的“权利基础”和资产阶级的“权利基础”不同而已。一方面，就法律平等必须用社会平等做补充这一点而言，平等的要求是扩大了；另一方面，从亚当·斯密的论点——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但劳动产品必须从劳动者手中分给地主和资本家共享——中得出了一个结论：这种分配是不正义的，必须彻底铲除，或者至少把它改变得有利于劳动者。但是早期社会主义者中最杰出的思想家——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就已

感觉到,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单纯停留在法学的"权利基础"上,就不能消除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特别是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灾难,这就使他们完全抛开法学政治领域,并宣称一切政治斗争都是无益的。

恩格斯:《法学家的社会主义》(1886年11月—12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附录,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46—547页。

由于依照门格尔先生的假定,法学观念是历史的动力,因此他在这里向罗马的法学家们提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要求:他们不应该提供当时的罗马社会的法权体系,而应提供恰恰相反的东西,即"鲜明的,不带任何夸张的"关于幻想的社会状况的"图画"。

衰落的罗马帝国的法学家们如此巧妙地搞出的一套东西,不是封建法,而是罗马法,即商品生产者的社会的法律。由于依照门格尔先生的假定,法学观念是历史的动力,因此他在这里向罗马的法学家们提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要求:他们不应该提供当时的罗马社会的法权体系,而应提供恰恰相反的东西,即"鲜明的,不带任何夸张的"关于幻想的社会状况的"图画"。这就是应用于罗马法的门格尔法哲学!然而门格尔断言经济条件还从来没有像罗马历代皇帝时代那样对社会主义有利,这种说法简单荒诞极了。门格尔想驳倒的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胜利的保证在于生产本身的发展中,一方面由于工农业中机械化大企业的发展,生产日益社会化,而劳动生产率也大大提高了。这就迫使人们要消灭阶级差别以

及把私人企业的商品生产转化成直接由社会来进行并且为了社会而进行的生产。另一方面，现代生产方式产生了一个愈来愈有力量关心使这个发展变成现实的阶级，这个阶级就是自由的劳动无产阶级。

恩格斯：《法学家的社会主义》（1886 年 11 月—12 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附录，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550—551 页。

每个正在进行斗争的阶级都必须在纲领中用法权要求的形式来表述自己的要求。但是每个阶级的要求在社会和政治的改造进程中不断变化，在每个国家中，由于各自的特点和社会发展的水平，这些要求是不同的。

然而，不管这些东西在“有权势的人物”当中受到怎样的欢迎，无论如何我们相信可以担保，现在的和未来的社会主义者都会把门格尔先生的全部基本权利奉还给他，或者放弃同他争他的这个“十足劳动收入权”的任何企图。

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这拒绝提出**一定的法权要求**。一个积极的社会主义政党，如同一般任何政党那样，不提出这样的要求是不可能的。从某一阶级的共同利益中产生的要求，只有通过下述办法才能实现，即由这一阶级夺取政权，并用法律的形式赋予这些要求以普遍的效力。因此每个正在进行斗争的阶级都必须在纲领中用**法权要求**的形式来表述自己的要求。但是每个阶级的要求在社会和政治的改造进程中不断变化，在每个国家中，由于各自的特点和社会发展的水平，这些要求是不同的。因此，各个政党提出的法权要求，尽管最

终目的完全一样，但是在各个时代和各个民族中并不完全相同。它们是可变因素，并且有时重新修改，这种情况在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那里可以得到。在进行这种修改时考虑到的是**实际关系**；相反，在现存的社会主义政党中还没有一个政党想到从自己的纲领中造出一个新的法哲学来，就是将来也不会想到这样做。至少门格尔先生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可以作为前车之鉴。

恩格斯：《法学家的社会主义》（1886 年 11 月—12 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附录，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567—568 页。

德国很快就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学派，这一学派的特点与其说是思想新颖不如说是思想含混。

中间阶级知道，它正处在革命的前夜，而且它已准备进行革命。它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争取城市的工人阶级和农业地区的农民的支持，而且大家知道，1847 年底，在资产阶级中间几乎没有一个出名的政治人物不冒充“社会主义者”以取得无产阶级的同情，下面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这些“社会主义者”的实际行动。

起领导作用的资产阶级急于至少是用社会主义来装点门面，是因为德国工人阶级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从 1840 年起，一部分曾到过法国和瑞士的德国工人多少都受到了一些当时法国工人中间流行的粗浅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思想的熏染。1840 年以来，这些思想在法国越来越引人注意，这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德国也成了时髦的东西，而且从

1843 年起,所有的报纸都絮絮不休地讨论起社会问题来了。德国很快就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学派,这一学派的特点与其说是思想新颖不如说是思想含混。它的主要工作是把傅立叶派、圣西门派和其他派别的学说,从法文翻译成晦涩的德国哲学的语言。与这一宗派完全不同的德国共产主义学派,大致也在这个时候形成了。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 年 8 月 17 日—1852 年 9 月 23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1—22 页。

……在无产阶级运动的压力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几乎一无例外地都涂上一层讲坛社会主义的博爱主义色彩,而且到处盛行着无批判的、善意的折衷主义,那是一种柔软的、可塑的、黏质状的动物胶……

今天,在世界上所有的大学里,没有一门科学比经济学被糟蹋得更厉害。任何地方都没有人讲授李嘉图及其学派的那种老的古典经济学,不仅如此,甚至很难找到有人原原本本地讲授庸俗的自由贸易理论,即所谓巴师夏式的曼彻斯特主义。在英国和美国,同在法国和德国一样,在无产阶级运动的压力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几乎一无例外地都涂上一层讲坛社会主义的博爱主义色彩,而且到处盛行着无批判的、善意的折衷主义,那是一种柔软的、可塑的、粘质状的动物胶,可以捏成任何一种形状,也正因为如此,它是培养钻营之徒的极好培养基,如同真正的动物胶繁殖细菌一模一样。这种使人萎靡不

振、动摇不定、糊里糊涂的思想方式的影响，至少在德国和一部分在美国的德国人中间，甚至在我们党内，都感觉得到，在我们党的周围极为流行。

恩格斯：《恩格斯致格·亨·福尔马尔》（1884年8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99—200页。

因为这些激进派精通流行于法国的用路·勃朗、普鲁东等人的思想拼凑起来的折衷社会主义，要是让他们有机会在实践中使自己的空谈遭到破产，那对我们有巨大的意义。

我们的运动进展得如此之好，情况到处如此有利于运动，最后，我们如此需要再有几年平静的发展，以便有可能巩固起来，以致我们决不能希望发生大的政治灾难。它会使我们的运动退居次要地位好多年，然后我们大概又得像1850年以后那样耽误很久，一切又要从头开始。

另一方面，战争可能在巴黎引起革命，这以后会间接地给欧洲其他地方的运动以强大的推动；可是那时，法国人就会成为领袖（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肯定会有极端沙文主义情绪），而以他们的理论成熟程度来说，他们担任这个角色最不适宜。1871年以来，法国人以他们特有的不自觉的合乎逻辑的一贯性，在政治上有了很好的发展，恰恰对这样的法国人来说，能有几年激进派的平静的统治倒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因为这些激进派精通流行于法国的用路·勃朗、普鲁东等人的思想拼凑起来的折衷社会主义，要是让他们有机会在实践中使自己的空谈遭到破产，那对我们有巨大的意义。

恩格斯:《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85年11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81页。

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

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6—377页。

这种(空想社会主义)对未来社会的幻想的描绘,在无产阶级还很不发展、因而对本身的地位的认识还基于幻想的时候,是同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相适应的。

无产阶级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在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最初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够发展,由于无产阶级解放

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随着这些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

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体系，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体系，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关于这个时期，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了（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诚然，这些体系的发明家看到了阶级的对立，以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本身中的瓦解因素的作用。但是，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

由于阶级对立的发展是同工业的发展步调一致的，所以这些发明家也不可能看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于是他们就去探求某种社会科学、社会规律，以便创造这些条件。

社会的活动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逐步组织成为阶级要由一种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

诚然，他们也意识到，他们的计划主要是代表工人阶级这一受苦最深的阶级的利益。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

但是，由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由于他们本身的生活状况，他们就以为自己是高高超乎这种阶级对立之上的。他们要改善社会一切成员的生活状况，甚至生活最优裕的成员也包括

在内。因此,他们总是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呼吁,而且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他们以为,人们只要理解他们的体系,就会承认这种体系是最美好的社会的最美好的计划。

因此,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一切革命行动;他们想通过和平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企图通过一些小型的、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

这种对未来社会的幻想的描绘,在无产阶级还很不发展、因而对本身的地位的认识还基于幻想的时候,是同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相适应的。①

但是,这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也含有批判的成分。这些著作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因此,它们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例如消灭城乡对立②,消灭家庭,消灭私人营利,消灭雇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所有这些主张都只是表明要消灭阶级对立,而这种阶级对立在当时刚刚开始发展,它们所知道的只是这种对立的早期的、不明显的、不确定的形式。因此,这些主张本身还带有纯粹空想的性质。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 年 12

① 这段话在 1872 年、1883 年和 1890 年德文版中是:"这种对未来社会的幻想的描绘,是在无产阶级还不很发展,因而对本身的地位的认识还基于幻想的时候,从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通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中产生的"。——编者注

② "城乡对立"在 1888 年英文版中是"城乡差别"。——编者注

月—1848 年 1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03—304 页。

他们(空想社会主义者)逐渐地堕落到上述反动的或保守的社会主义者的一伙中去了,所不同的只是他们更加系统地卖弄学问,狂热地迷信自己那一套社会科学的奇功异效。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阶级斗争越发展和越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所以,虽然这些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这些信徒无视无产阶级的历史进展,还是死守着老师们的旧观点。因此,他们一贯企图削弱阶级斗争,调和对立。他们还总是梦想用试验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空想,创办单个的法伦斯泰尔,建立国内移民区,创立小伊加利亚即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而为了建造这一切空中楼阁,他们就不得不呼吁资产阶级发善心和慷慨解囊。他们逐渐地堕落到上述反动的或保守的社会主义者的一伙中去了,所不同的只是他们更加系统地卖弄学问,狂热地迷信自己那一套社会科学的奇功异效。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 年 12 月—1848 年 1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04—305 页。

这是一种还没有很好加工的、只是出于本能的、往往有些

粗糙的共产主义;但它已经强大到足以形成两种空想的共产主义体系:在法国有卡贝的"伊加利亚"共产主义,在德国有魏特林的共产主义。

可是,当《宣言》出版的时候,我们不能把它叫作**社会主义**宣言。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是指两种人。一方面是那些信奉各种空想主义体系的信徒,特别是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这两个流派当时都已经缩小成逐渐走向灭亡的纯粹的宗派。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他们想用各种万应灵丹和各种补缀办法来消除社会弊病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至于当确信单纯政治变革还不够而要求根本改造社会的那一部分工人,他们把自己叫作**共产主义者**。这是一种还没有很好加工的、只是出于本能的、往往有些粗糙的共产主义;但它已经强大到足以形成两种空想的共产主义体系:在法国有卡贝的"伊加利亚"共产主义,在德国有魏特林的共产主义。在1847年,社会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则意味着工人的运动。这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当时已经十分坚决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刻也不怀疑究竟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42年前我们在巴黎革命即无产阶级带着自己的要求参加的第一次革命的前夜向世界上发出这个号召时,响应者还是寥寥无几。可是,1864

年9月28日，大多数西欧国家中的无产者已经联合成为流芳百世的国际工人协会了。固然，国际本身只存在了9年，但它所创立的全世界无产者永久的联合依然存在，并且比先前任何时候更加强固，而今天这个日子就是最好的证明。因为今天我写这个序言的候，欧美无产阶级正在检阅自己第一次动员起来的战斗力量，他们动员起来，组成一支大军，在一个旗帜下，为了一个最近的目的，即早已由国际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宣布、后来又由1889年巴黎工人代表大会再度宣布的在法律上确立八小时正常工作日。今天的情景定会使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地主看到：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已经真正联合起来了。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1890年5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4—265页。

这些思想家就成为折衷主义者或成为现有社会主义体系即空论的社会主义的行家，这种社会主义只有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为自己那个自由历史运动的时候，才是无产阶级的理论表现。

在**无政府派**的声调大致相同的**一般**社会主义词句下面，隐藏着《国民报》、《新闻报》和《世纪报》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大体上一贯要求推翻金融贵族的统治而使工业和交易摆脱历来的束缚。这是工业、商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这三者的利益由于同秩序党中工业、商业和农业巨头的私人垄断不再相符而被这些巨头摒弃了。这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也和

任何一种社会主义的变种一样，自然也吸引了一部分工人和小资产者。跟这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不同的是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即**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地道的社会主义。资本主要以**债权人**的身份来迫害这个阶级，所以这个阶级要求设立**信贷机关**；资本以**竞争**来扼杀它，所以它要求设立由国家维持的**协作社**；资本以**集中**来战胜它，所以它要求征收**累进税**、限制继承权并由国家承办大型工程以及采取其他各种**强力抑止资本增长**的措施。既然它梦想和平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哪怕再来一次短促的二月革命也行，——那么它自然就把未来的历史进程想象为正在或已经由社会思想家协力或单独设计的种种**体系的实现**。于是这些思想家就成为折衷主义者或成为现有社会主义**体系**即**空论的社会主义**的行家，这种社会主义只有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为自己那个自由历史运动的时候，才是无产阶级的理论表现。

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49 年底—1850 年 3 月和 1850 年 10 月—11 月 1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19 页。

这些密谋家并不满足于一般地组织革命的无产阶级。他们要做的事情恰恰是要超越革命发展的进程，人为地制造革命危机，使革命成为毫不具备革命条件的即兴之作。

当然，这些密谋家并不满足于一般地组织革命的无产阶级。他们要做的事情恰恰是要超越革命发展的进程，人为地制造革命危机，使革命成为毫不具备革命条件的即兴之作。

在他们看来,革命的唯一条件就是他们很好地组织密谋活动。他们是革命的炼金术士,完全继承了昔日炼金术士固定观念中那些混乱思想和偏见。他们醉心于发明能创造革命奇迹的东西:如燃烧弹,具有魔力的破坏性器械,以及越缺乏合理根据就越神奇惊人的骚乱等。他们搞这些阴谋计划,只有一个最近的目标,就是推翻现政府;他们极端轻视对工人进行更富理论性的关于阶级利益的教育。这说明他们对黑色燕尾服,即代表运动这一方面的多少有些教养的人的憎恶并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平民的;但是,因为后者是党的正式代表,所以密谋家们始终不能完全不依赖他们。黑色燕尾服有时也会成为他们获取金钱的来源。因此非常明显,密谋家们不管愿意与否都必须追随革命党派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上发表的书评》(1850年3月中—4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3—334页。

各乌托邦宗派的创始人虽然在批判现存社会时明确地描述了社会运动的目的——废除雇佣劳动制度及其一切实行阶级统治的经济条件,但是他们既不能在社会本身中找到改造它的物质条件,也不能在工人阶级身上找到运动的有组织的力量和对运动的认识。

所有的社会主义宗派的创始人都属于那样一个时期,那时工人阶级自己一方面还没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进程中得到足够的锻炼并被充分地组织起来,以便作为历史动

力登上世界舞台;另一方面,他们取得解放的物质条件在旧世界本身内部也还没有充分成熟起来。工人阶级的贫困状态是存在着的,但是他们开展自己的运动的条件尚未具备。各乌托邦宗派的创始人虽然在批判现存社会时明确地描述了社会运动的目的——废除雇佣劳动制度及其一切实行阶级统治的经济条件,但是他们既不能在社会本身中找到改造它的物质条件,也不能在工人阶级身上找到运动的有组织的力量和对运动的认识。他们企图用新社会的幻想图景和方案来弥补运动所缺乏的历史条件,并且认为宣传这些空想的图景和方案是真正的救世之道。从工人阶级运动成为现实运动的时刻起,各种幻想的乌托邦消逝了,——这不是因为工人阶级放弃了这些乌托邦主义者所追求的目的,而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实现这一目的的现实手段,——但是起来代替乌托邦的,是对运动的历史条件的真正洞见以及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的日益积聚力量。但是,乌托邦主义者宣布的运动的两个最后目的,也是巴黎革命和国际所宣布的最后目的。只是手段不同了,运动的现实条件也不再淹没在乌托邦寓言的云雾之中了。因此,无产阶级的这些以保护人自居的朋友们之百般曲解这次革命所响亮地宣布的社会主义趋向,只不过是受自己无知的欺骗而已。如果这些人认为工人运动的先知们的那些乌托邦创造仍然是"**社会革命**",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认为社会革命仍然是"乌托邦的",那么过错并不在巴黎无产阶级身上。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草稿》(1871 年 4—5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603—604 页。

……(空想社会主义)不理解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的形态和观念的形态之间必然存在的差别,因而愿意做那种徒劳无益的事情,希望重新实现观念的表现本身,而观念的表现实际上只是这种现实的映象。

另一方面,这里恰好也暴露了社会主义者的愚蠢(特别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愚蠢,他们想要证明,社会主义就是实现由法国革命所宣告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理想),他们论证说,交换、交换价值等等最初(在时间上)或者按其概念(在其最适当的形式上)是普遍自由和平等的制度,但是被货币、资本等等歪曲了。或者他们论证说,历史迄今为止企图以适合自由和平等的真实性质的方式来实现自由和平等的一切尝试都失败了,而现在他们,例如蒲鲁东,发现了用这些关系的真正历史来代替它们的虚假历史的真正秘诀。对于这些社会主义者必须这样回答:交换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货币制度,事实上是平等和自由的制度,而在这个制度更进一步的发展中对平等和自由起干扰作用的,是这个制度所固有的干扰,这正好是平等和自由的实现,这种平等和自由证明本身就是不平等和不自由。认为交换价值不会发展成为资本,或者说,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不会发展成为雇佣劳动,这是一种虔诚而愚蠢的愿望。这些先生不同于资产阶级辩护论者的地方就是:一方面他们觉察到这种制度所包含的矛盾,另一方面抱有空想主义,不理解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的形态和观念的形态之间必然存在的差别,因而愿意做那种徒劳无益的事情,希望重新实现观念的表现本身,而观念的表现实际上只是这种现实的映象。

马克思:《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1857 年底—1858 年 5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03—204 页。

第一批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欧文、圣西门等人)由于当时的社会关系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工人阶级组织成为一个战斗的阶级,所以他们必然仅仅去幻想未来的模范社会,并谴责工人阶级旨在稍稍改善他们的状况的一切尝试……

这些人是如此愚蠢,或者说,如此幼稚,竟然禁止工人阶级使用一切现实的斗争手段,因为这种斗争手段必须从现代社会中索取,因为这个斗争的命中注定的条件可惜并不符合这些**社会科学**博士们在**自由、自治、无政府状态**的名义下加以神化的唯心主义幻想。然而工人阶级的运动现在已经十分强大,这些慈善的宗派主义者在经济斗争方面已经不敢再重复他们在政治斗争方面所不断宣扬的那些**伟大真理**。他们过于胆怯,不敢把这些真理应用到罢工、同盟、工会、关于女工和童工的法律、关于限制工作日的法律等等方面去。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他们诉诸优良的旧传统、端庄、诚挚和永恒原则究竟能走多远。

第一批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欧文、圣西门等人)由于当时的社会关系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工人阶级组织成为一个战斗的阶级,所以他们必然仅仅去幻想未来的**模范社会**,并谴责工人阶级旨在稍稍改善他们的状况的一切尝试,例如罢工、组织同盟和参与政治活动。虽然我们不应该否定这些社会主义的鼻祖,正如现代化学家不能否定他们的祖先炼金术士一样,

但是我们应该努力避免重犯他们的错误，因为我们犯这样的错误将是不可饶恕的。

马克思：《政治冷淡主义》（1873 年 1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29—230 页。

他们（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

除了封建贵族和作为社会所有其余部分的代表出现的[①]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还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游手好闲的富人和从事劳动的穷人之间的普遍的对立。正是由于这种情形，资产阶级的代表才能标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的阶级的代表，而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不仅如此，资产阶级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有自己的对立物同它缠在一起：资本家没有雇佣工人就不能存在，而且，随着中世纪的行会师傅发展成为现代的资产者，行会帮工和行会外的短工便相应地发展成为无产者。虽然总的说来，资产阶级在同贵族斗争时有理由认为自己同时代表当时的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但是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发展程度不同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再洗礼派和托马斯·闵采尔[②]，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

① 在 1883 年德文第 1 版中没有“作为社会所有其余部分的代表出现的”这个短语。——编者注

② 在 1883 年德文第 1 版中“再洗礼派和托马斯·闵采尔”是“托马斯·闵采尔派。”——编者注

派,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伴随着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的这些革命发动,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表现;在16世纪和17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而在18世纪已经有了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应当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必须加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特权,而且是阶级差别本身。禁欲主义的、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这种新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后来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在圣西门那里,除无产阶级的倾向外,资产阶级的倾向还有一定的影响。欧文在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国家里,在这种生产所造成的种种对立的影响下,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出发,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消除阶级差别的方案。

所有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但是他们的王国和启蒙学者的王国是有天壤之别的。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理性的和非正义的,所以也应该像封建制度和一切更早的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500年前也同样可能

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500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2—374页。

他(欧文)的社会主义虽然在实质上要超越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但在形式上仍然以极宽容的态度对待资产阶级,同时在许多方面都对无产阶级很不公道。

英国社会主义的创始者是厂主**欧文**。所以他的社会主义虽然在实质上要超越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但在形式上仍然以极宽容的态度对待资产阶级,同时在许多方面都对无产阶级很不公道。社会主义者十分驯顺温和;不管现存的制度如何坏,他们还是承认它,因为他们除争取社会舆论外,对改变现存制度的其他一切途径是一概否定的。然而他们的原则又这么抽象,如果他们的原则保持现在的形式,他们是永远也不能争得社会舆论的。此外,社会主义者还经常抱怨下层阶级道德堕落,他们看不见社会制度的这种瓦解中的进步成分,看不见只会追求私利的伪善的有产阶级更严重的道德堕落。他们不承认历史的发展,所以他们打算一下子就把国家置于共产主义的境界,而不是进一步开展政治斗争以达到国家自行消灭[sich selbst auföst]的目的①。他们固然了

① 在1887年和1892年的英译本中,这句话后半句改为:"而不是通过国家的合乎规律的进一步的政治发展,直到这一过渡成为可能的和必要的。"——编者注

解工人为什么痛恨资产者，但是，他们认为这个唯一能够引导工人前进的愤怒并没有什么用处，并宣扬对英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更加没有什么用处的慈善和博爱。他们只承认心理的发展，只承认和过去毫无联系的抽象的人的发展。可是整个世界，包括每一个单独的人在内，都是从过去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太学究气、太形而上学了，他们是做不出什么大事来的。他们之中一部分人是来自工人阶级的，但是工人阶级中倾向于他们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虽然这一部分人是最有教养的和最坚强的。社会主义在其现有的形式下决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公共财产，因此，它必须降低自己的水平，暂时回到宪章主义的观点上来。但是，经过宪章运动的考验并清除了资产阶级成分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许多社会主义者和宪章运动的领袖（他们几乎全是社会主义者①）那里形成起来，它很快就会在英国人民的历史发展中起突出的作用。比法国共产主义的基础宽广得多、但是在发展②方面却落后于法国共产主义的英国社会主义，应当暂时回到法国的观点上来，以便将来再超过它。固然，到那时法国人也会更加向前发展了。社会主义同时又是工人不信仰宗教的坚定不移的表现，这种表现是这样地坚决，使那些**不自觉地**纯粹为了实际原因而不信仰宗教的工人也往往被这种尖锐性所吓退。但是在这里，也是穷困将使工人抛弃信仰，他们会愈来愈相

① 自然是广义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狭义的欧文主义者。——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② 在1887年和1892年的英译本中，“发展”一词前有“理论上的”字样。——编者注

信,这种信仰只能使他们俯首帖耳地听从自己命运的支配,顺从地听任有产阶级榨取他们的脂膏。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 年 9 月—1845 年 3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525—526 页。

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直到今天还统治着法国和英国大多数社会主义工人的头脑,它是由各学派创始人的比较不会引起反感的批判性言论、经济学原理和关于未来社会的观念组成的色调极为复杂的混合物……

空想主义者的见解曾经长期支配着 19 世纪的社会主义观点,而且现在还部分地支配着这种观点。法国和英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不久前都还信奉这种见解①,包括魏特林在内的先前的德国共产主义也是这样。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同时,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又是各不相同的;而因为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独特形式又是由他们的主观知性、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思维训练水平所决定的,所以,解决各种绝对真理的这种冲突的办法就只

① 在 1883 年德文第 1 版中这句话是:"现在英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正热中于这种观察方式,在不久前法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就曾热衷于这种观察方式。"——编者注

能是它们互相磨损。由此只能得出一种折衷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直到今天还统治着法国和英国大多数社会主义工人的头脑，它是由各学派创始人的比较不会引起反感的批判性言论、经济学原理和关于未来社会的观念组成的色调极为复杂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的各个组成部分，在辩论的激流中越是磨光其锋利的棱角，就像溪流中圆圆的石子一样，这种混合物就越加容易构成。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84—385页。

他（闵采尔）所幻想的那种社会变革，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还缺乏基础，这些物质条件甚至正在孕育产生一种同他所梦想的社会制度恰恰相反的社会制度。

然而闵采尔作为米尔豪森永久市政会首脑所处的地位，要比任何一个现代革命执政者所处的地位面临更大的风险。不仅当时的运动，就连他所生活的整个世纪也都没有达到成熟的地步，都不可能实现他自己刚刚开始隐约意识到的那些思想。他所代表的阶级刚刚处于形成阶段，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也远远没有具备征服和改造整个社会的能力。他所幻想的那种社会变革，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还缺乏基础，这些物质条件甚至正在孕育产生一种同他所梦想的社会制度恰恰相反的社会制度。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夏—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52—553页。

受到他(蒲鲁东)对空想主义者的假批判和假对立的迷惑和毒害的,首先是"优秀的青年"、大学生,其次是工人,尤其是从事奢侈品生产的巴黎工人,他们不自觉地强烈地倾向于这堆陈腐的垃圾。

我故意把纲领局限于这样几点,这几点使工人能够直接达成协议和采取共同行动,而对阶级斗争和把工人组织成为阶级的需要则给以直接的滋养和推动。巴黎的先生们满脑袋都是蒲鲁东的空洞词句。他们高谈科学,但什么也不懂。他们轻视一切**革命的**、即产生于阶级斗争本身的行动,轻视一切集中的、社会的、因而也是可以通过**政治手段**(例如,**从法律上**缩短工作日)来实现的运动;在**自由**和反政府主义或反权威的个人主义的**幌子**下,这些先生们——他们16年来一直泰然自若地忍受并且现在还忍受着最可耻的专制制度!——实际上在宣扬庸俗的资产阶级的生意经,只不过按蒲鲁东的精神把它理想化了!蒲鲁东造成了很大的祸害。受到他对空想主义者的假批判和假对立的迷惑和毒害的(他自己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空想主义者,而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乌托邦里却有对新世界的预测和幻想的描述),首先是"优秀的青年"、大学生,其次是工人,尤其是从事奢侈品生产的巴黎工人,他们不自觉地强烈地倾向于这堆陈腐的垃圾。

马克思:《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6年10

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3页。

……所有这些社会主义者,每一个人都说自己有一种特定的万应灵药,而每一个人又都完全站在真正的工人运动之外,他们把任何形式的真正的运动,从而把同盟和罢工,都看成一种歧途,它引导群众离开唯一可以得救的真正信仰的道路。

在第104号上给马克思的《反蒲鲁东》中的一句话——社会主义者同经济学家完全一样地给同盟定罪——加了一个不可理解的注释,说这是指"蒲鲁东一类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对此非常不满。第一,当时除蒲鲁东本人外根本不存在蒲鲁东一类的社会主义者。第二,马克思的论断适用于所有那时已经出现的以**罗伯特·欧文**为首的社会主义者(我们两人是例外,我们当时在法国还不为人所知),只要他们谈到同盟!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欧文主义者和卡贝这样的法国人。因为法国没有联合权,所以在那里这个问题也就很少涉及到。但是,因为在马克思以前只有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或空想的社会主义或者由这种种成分混合而成的社会主义,所以很明显,所有这些社会主义者,每一个人都说自己有一种特定的万应灵药,而每一个人又都完全站在真正的工人运动之外,他们把**任何**形式的真正的运动,从而把同盟和罢工,都看成一种歧途,它引导群众离开唯一可以得救的真正信仰的道路。您可以看出,这个注释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绝顶荒谬的。但是,对我们的人,至少是其中某一些人来说,似乎

不可能在他们的文章里只限于写自己真正了解的东西。Kz、辛马霍斯[①]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人所写的以社会主义理论为内容的长得像绦虫一样的文章就是证明，这些人的经济学上的错误、各种荒谬观点以及对社会主义文献的一无所知，都是彻底摧毁到现在为止德国运动在理论方面的优越地位的有效手段。马克思几乎要为这个注释发表一篇声明。

恩格斯：《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75年10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3—154页。

在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时代以前，空想主义本身包含着这种社会主义的萌芽，可是现在，在这个时代以后它又出现，就只能是愚蠢的——愚蠢的、无聊的和根本反动的……

工人本身如果像莫斯特先生那帮人一样放弃劳动而成为职业文人，就会不断制造“理论上的”灾难，并且随时准备加入所谓“有学问的”阶层中的糊涂虫行列。几十年来我们做了许多工作和花了许多精力才把空想社会主义，把对未来社会结构的一整套幻想从德国工人的头脑中清除出去，从而使他们在理论上（因而也在实践上）比法国人和英国人优越，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又流行起来，而且其形式之空虚，不仅更甚于伟大的法国和英国空想主义者，也更甚于魏特林。当然，在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时代以前，空想主义本身包含着这种社会主义的萌芽，可是现在，在这个时代以后它又出现，

① 卡·考茨基的笔名。——编者注

就只能是愚蠢的——愚蠢的、无聊的和根本反动的……

马克思:《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1877年10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7—628页。

但是空想社会主义没有能够指出真正的出路。它既不会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隶制的本质,又不会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也不会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社会力量。

当农奴制被推翻,"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时候,一下子就暴露出这种自由意味着压迫和剥削劳动者的一种新制度。于是反映这种压迫和反对这种压迫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就立刻产生了。但是最初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谴责它,咒骂它,幻想消灭它,臆想较好的制度,劝富人相信剥削是不道德的。

但是空想社会主义没有能够指出真正的出路。它既不会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隶制的本质,又不会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也不会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社会力量。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3月),《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3页。

在拉萨尔的鼓动著作中,从马克思那里抄来的正确的东西和他自己的并且通常是错误的议论混在一起,二者几乎不可能区分开来。

拉萨尔属于历史已有26年了。如果他在非常法时期没有受到历史的批判,那么现在终于到了必须进行这种批判并弄清拉萨尔对马克思的态度的时候了。掩饰拉萨尔的真实面目并把他捧上天的那种神话,绝不能成为党的信条。无论把拉萨尔对运动的功绩评价多么高,他在运动中的历史作用仍然具有两重性。同社会主义者拉萨尔形影不离的是蛊惑家拉萨尔。透过鼓动者和组织者的拉萨尔,到处显露出一个办理过哈茨费尔特诉讼案的律师面孔:在手法上还是那样无耻,还是那样喜欢把一些声名狼藉和卖身求荣的人拉在自己周围,并把他们当作单纯的工具加以使用,然后一脚踢开。1862年以前,他实际上还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波拿巴主义倾向的、典型普鲁士式的庸俗民主主义者(我刚才看了他写给马克思的那些信),由于纯粹个人的原因,他突然来了个转变,开始了他的鼓动工作。过了不到两年,他就开始要求工人站到王权方面来反对资产阶级,并且同品质和他相近的俾斯麦勾结在一起,如果他不是侥幸恰好在那时被打死,那就一定会在实际上背叛运动。在拉萨尔的鼓动著作中,从马克思那里抄来的正确的东西和他自己的并且通常是错误的议论混在一起,二者几乎不可能区分开来。由于马克思的批判而感到自己受了伤害的那一部分工人,只了解拉萨尔两年的鼓动工作,而且还是戴着玫瑰色眼镜来看他的鼓动工作的。但是在这种偏见面前,历史的批判是不能永远保持毕恭毕敬的姿态的。我的责任就是最终揭示马克思和拉萨尔之间的真正关系。这已经做了,我暂时可以因此而感到满足。况且我自己现在还有别的事情要做。而已经发表的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无情批判,本身

就会产生应有的影响并给别人以勇气。但是，假如情况迫使我非讲话不可，我就没有选择的余地：我只有一劳永逸地肃清有关拉萨尔的神话了。

恩格斯：《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91年2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7—708页。

费边派是一伙野心家，他们有相当清醒的头脑，懂得社会变革必不可免，但是他们决不肯把这个艰巨的事业交给粗鲁的无产阶级单独去做，所以他们惯于自己出来领导。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

……在伦敦这里，费边派是一伙野心家，他们有相当清醒的头脑，懂得社会变革必不可免，但是他们决不肯把这个艰巨的事业交给粗鲁的无产阶级单独去做，所以他们惯于自己出来领导。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他们多半是“有教养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是市政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应当归公社所有，而不应当归国家所有，至少在开头应该这样。此外，他们把自己的社会主义描述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一种极端的、然而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就产生了他们的策略：不是把自由党人当作敌人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而是推动他们作出社会主义的结论，也就是哄骗他们，“用社会主义**渗透**自由主义”，不是拿社会主义候选人去同自由党人相抗衡，而是把他们塞给自由党人，强加给自由党人，也就是用欺骗手段使自由党人接受他们。他们这样做不是自己被欺骗，被愚弄，就是欺骗社会主义，这当然是他们所不了解的。

费边派除了出版各种各样的恶劣作品外，还尽力出版了一些好的宣传品，这是英国人在这方面所出版的最好的东西。但是他们一谈到他们的特殊策略——抹杀阶级斗争，那就糟糕了。他们之所以疯狂地仇视马克思和我们大家，就是因为阶级斗争问题。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893年1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8页。

绝大多数的布朗基主义者不过凭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本能才是社会主义者。

如果我们今天在过了20年之后来回顾一下1871年巴黎公社的活动和历史意义，我们就会发觉，对《法兰西内战》中的叙述还必须做一些补充。

公社委员分为多数和少数两派：多数派是布朗基主义者，他们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中也占统治地位；少数派是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他们多半是蒲鲁东社会主义学派的信徒。那时，绝大多数的布朗基主义者不过凭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本能才是社会主义者；其中只有很少一些人通过熟悉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瓦扬，比较清楚地了解基本原理。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必须做到的事情。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对法兰西银行所表示的那种不敢触犯的敬畏心情。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还有更大的意义。这会迫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政府施加压

力，要它同公社议和。但是，更令人惊异的是，虽然公社是由布朗基主义者和普鲁东主义者组成的，但它的措施却往往是正确的。很明显，对于公社在经济方面的各种法令，无论是这些法令的优点或缺点，首先应当由蒲鲁东主义者负责；而对于公社在政治方面的行动和失策，则应当由布朗基主义者负责。正如政权落到空谈家手中常有的情形那样，无论是蒲鲁东主义者或布朗基主义者，都按照历史的讽刺，做出了恰恰与他们学派的信条相反的事情。

……

但是，在1871年，大工业甚至在手工艺品生产中心的巴黎，也已经不是什么特殊现象了，所以公社最重要的法令规定要组织大工业以至工场手工业，这种组织不但应该在每一个工厂内以工人的联合为基础，而且应该把这一切联合体结成一个大的联盟；简言之，这种组织，正如马克思在“内战”中完全正确地指出的，归根到底必然要导致共产主义，即导致与蒲鲁东学说正相反的方面。正因为如此，公社同是蒲鲁东社会主义学派的坟墓。现在这个学派在法国工人中间已经绝迹了；目前这里在“可能派”中间也像在“马克思主义派”中间一样，完全是由马克思的理论统治着。只有在“激进的”资产阶级中间还可以遇到蒲鲁东主义者。

布朗基主义者的遭遇也并不好些。他们是按密谋学派的精神培养出来的，是由这个学派所要求的严格纪律团结在一起的，他们认为少数坚决和组织严密的分子在顺利的条件下不仅能够夺得政权，而且能够用极果断坚决的措施来保持政权，直到把人民群众吸引到革命方面，并使他们聚集在少数领

袖的周围。这首先要求把全部权力最严格地专制地集中在新的革命政府手中。大多数正是由这些布朗基主义者构成的公社，在实际上做了些什么呢？它在向法国各省人民发表的一切宣言中，号召他们把法国的所有公社同巴黎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自由的联邦，一个第一次真正由国民自己建立的全国性组织。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1891年3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25—226页。

民粹派的民主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而在历史上却是正确的；这种民主主义作为社会主义乌托邦是错误的，但是，作为农民群众的特殊的、有历史局限性的民主主义斗争的表现，却是正确的……

应该记住恩格斯的名言：

“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可以是正确的。”①

恩格斯的这个深刻论断是针对空想社会主义说的：这种社会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这种社会主义所以是“错误的”，因为它认为从交换规律的观点来看，有剩余价值是不公平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家反对这种社会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则是正确的，因为由交换规律产生剩余价值是完全“自然的”，完全“公平的”。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09页。——编者注

但是，空想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上却是**正确的**，因为它是由资本主义产生的那个阶级的征兆、表现和先声；现在，在20世纪初，这个阶级已成长为能够消灭资本主义并且正在为此坚决奋斗的巨大力量。

在评价俄国的（也许不仅是俄国一国的，而且是在20世纪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许多亚洲国家的）现代民粹派或劳动派的乌托邦的时候，必须记住恩格斯的这个深刻论断。

民粹派的**民主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而在**历史**上却是正确的；**这种**民主主义作为社会主义乌托邦是错误的；但是，作为农民群众的特殊的、有历史局限性的民主主义斗争的表现，却是**正确的**，因为这种斗争是资产阶级改革不可或缺的因素，同时是这一改革获得全胜的条件。

列宁：《两种乌托邦》（1912年10月5日〔18日〕以前），《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0页。

民粹派关于“社会主义”、关于“土地社会化”、关于平均制等等的议论，都不过是掩盖农民追求政治上的完全平等以及彻底消灭农奴主土地占有制这一事实的空话。

民粹主义由来已久。人们公认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民粹主义的创始人。70年代革命者提出“到民间去”（到农民中去），那时候颇有影响的民粹主义盛极一时。19世纪80年代，瓦·沃·（沃龙佐夫）和尼古拉·—逊最完整地制定了民粹派的经济理论。20世纪初，社会革命党人最周全地表述左派民粹派的观点。

1905年的革命通过各阶级的群众性的公开行动展示了俄国的各种社会力量，也对民粹主义进行了一次总的检验，确定了它的地位。农民民主主义——这就是民粹主义的唯一的实际内容和社会意义。

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而不得不追求的，不是消灭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特权，而是要在农奴主和资本家之间瓜分这些特权。与此相反，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即农民不得不追求的，是消灭所有这些特权。

民粹派关于“社会主义”、关于“土地社会化”、关于平均制等等的议论，都不过是掩盖农民追求政治上的完全平等以及彻底消灭农奴主土地占有制这一事实的空话。

1905年的革命彻底揭示了民粹主义的这种社会实质和它的这种阶级本质。群众运动，不论是以1905年的农民协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还是以1905年和1906年各个地方的农民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或者是通过头两届杜马的选举形式（成立“劳动”团）表现出来的，都是向我们表明千百万农民行动起来了这一伟大的社会事实。这些事实像打扫尘土似地把貌似社会主义的民粹主义空话一扫而光，揭示出民粹主义的核心，即拥有巨大的尚未耗尽的后备力量的农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谁要是没有从新的现代俄国的伟大时代的经验中学会识别什么是民粹主义的实际内容和什么是它的辞藻的外壳，谁就是不可救药的人，就是不该受到重视的人，谁就只可能是玩弄辞藻的撰稿人（像《俄国财富》杂志的阿·瓦·彼·那样），而不可能是政治家。

列宁:《论民粹主义》(1913 年 1 月 20 日和 22 日〔2 月 2 日和 4 日〕),《列宁全集》第 22 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26—327 页。

孙中山的民粹主义的实质,他的进步的、战斗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土地改革纲领以及他的所谓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质就在这里。

但是在这位中国民粹主义者那里,这种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结合在一起的。后面这两种思想政治倾向正是构成具有独特含义的(即不同于民主主义的、超出民主主义的)**民粹主义**的因素。

这两种倾向是怎样产生的?它们的意义如何?

如果没有群众的革命情绪的蓬勃高涨,中国民主派不可能推翻中国的旧制度,不可能争得共和制度。这种高涨以对劳动群众生活状况的最真挚的同情和对他们的压迫者及剥削者的最强烈憎恨为前提,同时又反过来产生这种同情和憎恨。先进的中国人,**所有**经历过这种高涨的中国人,从欧美吸收了解放思想,但在欧美,提到日程上的问题已经是**摆脱**资产阶级而求得解放,即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由此必然产生中国民主派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产生他们的**主观**社会主义。

他们在主观上是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反对对群众的压迫和剥削。但是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的、半封建国家的**客观**条件,在将近 5 亿人民的生活日程上,只提出了这种压迫和这

种剥削的一定的历史独特形式——封建制度。农业生活方式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封建制度的基础;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把中国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这是他们受封建剥削的根源;这种剥削的政治代表就是封建主,以皇帝为整个制度首脑的封建主整体和单个的封建主。

因此,这位中国民主主义者的主观社会主义思想和纲领,事实上仅仅是"改变不动产的全部法权根据"的纲领,仅仅是消灭封建剥削的纲领。

孙中山的民粹主义的实质,他的进步的、战斗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土地改革纲领以及他的所谓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质就在这里。

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1912年7月15日〔28日〕),《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2—293页。

知识分子民粹派是最糟糕的社会主义者和最差劲的民主主义者。农民劳动派决不玩弄他们十分陌生的社会主义,但他们是"本能的"、真诚的、热情有力的民主主义者。

知识分子民粹派爱讲调和的或"全人类的"词句。这些词句总令人感觉到他们是自由主义者。阶级斗争的观点,他们是根本不能接受的。他们是空谈家。他们拖民主派农民倒退,使农民不再向阶级敌人作生气勃勃的面对面的斗争,而去附和含糊不清、牵强附会、软弱无力的准社会主义的词句。

在头两届杜马中,农民民粹派是一团火,热情奔放。他们满心渴望采取直接的坚决的行动。他们愚昧、没有知识、幼

稚，但是当他们奋起反对自己的阶级敌人的时候，却表现得那么直截了当、毫不调和、切齿痛恨，使您感到这是一支极其重要的社会力量。

换句话说，知识分子民粹派是最糟糕的社会主义者和最差劲的民主主义者。农民劳动派决不玩弄他们十分陌生的社会主义，但他们是“本能的”、真诚的、热情有力的民主主义者。俄国农民民主派会不会取得胜利，这一点谁也不能预言，因为这要受非常复杂的客观条件所制约。但是毫无疑问，劳动派农民只有**抛弃**民粹派知识分子带进他们运动中来的那些倾向，才**可能**取得胜利。在有利的历史条件下，生气勃勃的新生的真诚的民主派是**可能**取得胜利的，而“社会主义的”**词句**，民粹主义的空谈，则永远不可能取得胜利。

列宁：《民粹派内部的情况怎样？农村中的情况又怎样？》（1913年2月），《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18—419页。

（四）各种类型的机会主义

第二国际的破产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的破产。机会主义是作为以往工人运动“和平”发展时代的产物生长起来的。

第二国际的破产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的破产。机会主义是作为以往工人运动“和平”发展时代的产物生长起来的。这个时代教会了工人阶级利用这样一些重要的斗争手段，如利用议会制度和一切合法的机会，建立群众性的经济

组织和政治组织,创办有广泛影响的工人报刊,等等。另一方面,这个时代也产生了一种倾向,即否定阶级斗争和宣扬社会和平,否定社会主义革命,从根本上否定秘密组织,承认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等等。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工人运动中的官僚和工人贵族。他们从依靠剥削殖民地和自己"祖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特权地位得来的收入中分得一点油水)以及社会主义政党内部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就是这种倾向的主要社会支柱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

机会主义的有害影响,在第二国际大多数正式社会民主党的战时政策上表现得特别明显。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参加内阁,实行"国内和平"政策,在合法地位被取缔的时候不去建立秘密组织,这就是撕毁第二国际的各项最重要的决议,就是公然背叛社会主义。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1915年3月16日〔29日〕),《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6—167页。

所有这些形式的机会主义不仅有思想的联系,而且还有人员的联系,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

"经济主义"和取消主义是存在了20年的同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的不同形式。所有这些形式的机会主义不仅有思想的联系,而且还有人员的联系,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只要指出亚·马尔丁诺夫就够了,他最初是"经济派"的首领,后来成了孟什维克,现在则是取消派分子。只要举出像格·瓦·普列汉诺夫这样的见证人就够了,他本

人虽然在很多地方接近孟什维克但是他还是直率地承认:孟什维克吸收了知识分子机会主义分子取消派是"经济主义"错误的继承者和工人政党的破坏者。

那些回避或歪曲工人运动这20年的思想斗争历史的人(诸如取消派和托洛茨基之类),给工人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谁要是像健忘的伊万那样来对待工人自己的运动的历史,他就不可能是有觉悟的工人。俄国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最落后小资产阶级最多的国家之一。因此工人的群众运动中产生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一翼,就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列宁:《工人运动中的思想斗争》(1914年5月4日〔17日〕),《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1页。

机会主义如果能够作出明白的直截了当的回答,也就不成其为机会主义了。

俄国的机会主义,也同其他国家的机会主义一样暧昧不明,类若游蛇,无法肯定而明确地说出自己的观点,无法正式地说工人阶级不应当不顾自由派的反对而建设新俄国,而应当做什么做什么。机会主义如果能够作出明白的直截了当的回答,也就不成其为机会主义了。但是为了表明自己不满工人的政策,表明自己倾向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说:"新俄国谁也不能建设,它是在各种利益互相斗争过程中建设的。"

然而,从正在建设的东西里面,最明显、最引人注意的,最能获得暂时胜利和"人群"尊敬的,是经过自由派修改的贵族

和资产阶级的“建设”。“由什么阶级建设、怎样建设，这还有什么可以分析的呢，这是空想；应当接受的是正在建设的东西”，——这就是尼科林的议论的真正用意，这就是真正的“机会主义的逻辑”。

这也就是忘记阶级斗争。这也就是自由派工人政策的原则基础。正是这种“逻辑”把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即真正的、彻底的、无私的民主派的领导者的作用，贬为自由派的粗工的作用。

由此可以看出我们俄国人十分清楚的一个事实，就是：机会主义者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的政党和“独立”路线，尼科林当然也承认要有“独立”路线。而他在行动上所捍卫的恰恰不是独立路线，而是自由派工人政策的路线。

列宁：《论政治路线》（1912年9月16日〔29日〕），《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3—114页。

……（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一切文明国家里，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和各种不同的色彩表现出来的。

欧美现代工人运动中的基本的策略分歧，归结起来就是同背离实际上已经成为这个运动中的主导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两大流派作斗争。这两个流派就是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在半个多世纪的大规模工人运动的历史上，这两种背离工人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策

略的倾向，在一切文明国家里，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和各种不同的色彩表现出来的。

单从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两种倾向不是偶然出现的，也不是由某些个别人或集团的错误造成的，甚至也不是由民族特点或民族传统的影响等等造成的。应该有一些由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和发展性质所决定的、经常产生这两种倾向的根本原因。

列宁：《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1910 年 12 月 16 日〔29 日〕），《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73 页。

机会主义可以用随便哪一种学说的术语，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表达。

在党内占优势的机会主义者立刻攻击乔伊特。而且——也算一个特点！——他们攻击时正像机会主义者那样躲躲闪闪，支吾搪塞。他们不愿意**直截了当地**说他们**支持**自由党。他们用**泛泛的言词**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且必然地提到工人阶级的“独立性”。瞧，跟我国的取消派一模一样，每当他们**在实际上**准备用自由派工人政策来代替工人阶级独立性的时候，总是要格外响亮地叫嚷工人阶级的“独立性”。

……

机会主义可以用**随便哪一种**学说的术语，**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表达。“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遭遇”的全部特点正在于，不仅工人政党的机会主义，而且自由派政党的机会主义（如伊兹哥耶夫之流）都爱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把自

已打扮起来！但这些术语是打了引号的。我们还是回过来谈谈梅瑟的第二十届年会吧。

列宁：《英国关于自由派工人政策的争论》（1912年10月5日〔18日〕以前），《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138页。

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

人们把一般的抽象的政治问题提到首要地位，从而把那些在重大事件一旦发生，政治危机一旦来临就会自行提到日程上来的需要立即解决的具体问题掩盖起来。其结果就是使党突然在决定性的时刻不知所措，使党在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由于从未进行过讨论而认识模糊和意见不一。难道要重演当年的保护关税事件吗？当时有人宣称保护关税这个问题只与资产阶级有关而与工人毫不相干，因此谁想怎么投票都行，而现在有许多人陷入了另一个极端，为了同转而热中于保护关税主义的资产者相对立，又端出了科布顿和布莱特的经济诡辩，并且把最纯粹的曼彻斯特主义作为最纯粹的社会主义来鼓吹。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

更危险。

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1891年6月18日—29日之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1—412页。

……他们(机会主义者)把必须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变成盲目崇拜这种合法性,而忘记了在危机时代必须有秘密的组织形式和鼓动形式。

第二国际(1889—1914年)大多数领袖背叛社会主义,意味着这个国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破产。这种破产的主要原因是,在第二国际中事实上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对于它的资产阶级性和危险性,世界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早就指出过了。机会主义者早就在为第二国际的破产准备条件了:他们否定社会主义革命而代之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他们否定阶级斗争及其在一定时机转变为国内战争的必然性,而鼓吹阶级合作;他们在爱国主义和保卫祖国的幌子下鼓吹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而忽视或否定《共产党宣言》中早已阐明的一条社会主义的基本真理,即工人没有祖国①;他们在同军国主义的斗争中局限于感伤主义的小市民观点,而不承认所有国家的无产者必须以革命战争来反对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他们把必须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变成盲目崇拜这种合法性,而忘记了在危机时代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页。——编者注

必须有秘密的组织形式和鼓动形式。

列宁:《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1914年8月23—24日〔9月5—6日〕),《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页。

考茨基主义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第二国际各种矛盾的社会产物,是既要在口头上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又要在实际上屈服于机会主义的社会产物。

工人阶级不进行无情的战斗,来反对这种叛徒行径、这种没有气节、向机会主义献媚、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空前庸俗化的行为,便不能实现它的世界革命的使命。考茨基主义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第二国际各种矛盾的社会产物,是既要在口头上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又要在实际上屈服于机会主义的社会产物。

"考茨基主义"的这种根本的虚伪性,在不同的国家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荷兰,罗兰-霍尔斯特虽然拒绝保卫祖国的思想,却坚持同机会主义者的政党的统一。在俄国,托洛茨基虽然也拒绝这种思想,却同样坚持同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我们的曙光》集团的统一。在罗马尼亚,拉柯夫斯基虽然把机会主义看作国际破产的祸首而向它宣战,同时却又欣然承认保卫祖国的思想是合理的。所有这一切,都是荷兰马克思主义者(哥尔特、潘涅库克)曾经称之为"消极的激进主义"的祸害的表现,这种祸害的实质就是在理论上用折中主义代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对机会主义俯首帖耳或者说

软弱无能。

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1915 年 7—8 月),《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23—524 页。

机会主义和社会民族主义在思想政治上相近、相连甚至相同,这是毫无疑问的。

机会主义的基本阶级意义——或者,也可以说它的社会经济内容——就在于,现代民主派的一些分子在一系列问题上已经投到资产阶级方面(实际上如此,也就是说,即使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机会主义就是自由派的工人政策。谁要是害怕这些话的表面上的"派别性",我们劝他不妨花点功夫去研究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和考茨基(后者对反对"派别性"的人是一位特别适宜的"权威",不是吗?)的思想,至少是对英国机会主义的评论。毫无疑问,经过一番研究以后,他就会承认机会主义的和自由派的工人政策在根本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今天的社会民族主义的基本阶级意义也完全一样。机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资产阶级和它的对立面彼此联合或接近(有时是达成协议、结成联盟,等等)。社会民族主义的基本思想也完全一样。机会主义和社会民族主义在思想政治上相近、相连甚至相同,这是毫无疑问的。自然,我们拿来作为根据的,不应当是某些个人或团体,而只能是对各社会**流派**的**阶级**内容的分析,是从思想政治上对它们主要的根本的原则进行的研究。

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1915 年 1 月以

后),《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152页。

社会沙文主义是登峰造极的机会主义。

如果把事情归结为个人的问题,举考茨基、盖得、普列汉诺夫("甚至"这样的人物!)为例,那是荒谬的,不科学的,可笑的。这是一种可鄙的手法。要认真说明原因,就必须研究某一项政策的**经济**意义,然后分析它的基本**思想**,最后还要研究社会主义运动中**各个派别**的历史。

在1914—1915年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的**经济**实质是什么呢?巴塞尔宣言已经作了答复。**所有**大国进行战争都是为了进行掠夺,瓜分世界,为了争夺市场,为了奴役其他民族。资产阶级会因此而增加利润。工人官僚和工人贵族以及"参加"工人运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这个人数不多的阶层可望从这些利润中分得**一点油水**。"社会沙文主义"(这个术语要比社会爱国主义确切,因为后者把坏事美化了)和机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一样的,都是工人运动中的"上层"这个人数极少的阶层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群众。资产阶级的**奴仆**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受资产阶级剥削的**阶级**。社会沙文主义是登峰造极的机会主义。

社会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政治内容是一样的,都主张阶级合作,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拒绝革命行动,崇拜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不相信无产阶级而相信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是一样的。策略的政治内容是一样的。社会沙文主义是米勒兰主义、伯恩施坦主义、英国自由派工人政策的直接继续和

完成，是它们的总和，它们的总结，它们的结果。

列宁：《机会主义与第二国际的破产》（不早于1915年11月13日〔26日〕），《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5—106页。

社会沙文主义的基本思想政治内容同机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完全一致的。它们属于同一种思潮。

社会沙文主义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是以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为基础的；我的国家的胜利会加速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也就会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我的国家的失败会阻碍国内经济的发展，因而也就会阻碍社会主义的到来。发挥这种司徒卢威主义理论的，在我国有普列汉诺夫，在德国有伦施等人。考茨基反对这种拙劣的理论，反对公开维护这种理论的伦施，也反对暗中坚持这种理论的库诺，可是他反对的目的，仅仅是要在更精致更狡猾的沙文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把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调和起来。

……

所谓社会沙文主义，我们是指肯定在当前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的思想，为社会党人在这场战争中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政府实行联合作辩护，拒绝宣传和支持无产阶级反对“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等等。十分明显，社会沙文主义的基本思想政治内容同机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完全一致的。它们属于同一种思潮。社会沙文主义是机会主义在1914—1915年的战争环境中的产物。机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阶级合作的思想。战争使这种思想发展到了

顶点，并且把在促成这种思想的一般的因素和起因中又加进了一系列特殊的因素和起因，用特殊的威胁和暴力迫使普通的分散的群众同资产阶级实行合作。这种情况自然使拥护机会主义的人增多，这种情况也充分说明为什么许多昨天的激进派倒向这个阵营。

……

不愿意正视社会沙文主义同机会主义的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的人，抓住个别情况和“特殊案例”，说什么某某机会主义者成了国际主义者，而某某激进派分子倒成了沙文主义者。但是，这一点在**各种思潮**的发展的问题上根本不是什么郑重的论据。第一，工人运动中的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相同的，即无产阶级和小市民中从“自己”国家的资本的特权中分享一点油水的少数上层分子联合起来反对无产者群众，反对全体被压迫的劳动群众。第二，两种思潮的思想政治内容也相同。第三，第二国际时代（1889—1914 年）社会党人分为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的旧的划分，大体上是与现在分为沙文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新的划分**相一致**的。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 年 5—6 月），《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69、489、491 页。

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同一个，那就是人数很少的特权工人阶层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

社会沙文主义就是在当前这场战争中为“保卫祖国”的思想辩护。从这一思想进一步得出的结论就是，在战时放弃

阶级斗争，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等等。实际上社会沙文主义者所推行的是反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政策，因为他们实际上不是在反对异族压迫这个意义上主张“保卫祖国”，而是维护这些或那些“大”国掠夺殖民地和压迫其他民族的“权利”。社会沙文主义者重复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的鬼话，似乎这场战争是为了保卫各民族的自由和生存而进行的，这样他们就投到资产阶级方面而反对无产阶级了。在社会沙文主义者中间，有人为某一参战大国集团的政府和资产阶级辩护和粉饰，也有人像考茨基那样，认为所有交战大国的社会党人都有同样的权利“保卫祖国”。社会沙文主义既然实际上是在维护“自己的”（或任何国家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特权、优越地位、掠夺和暴力，也就完全背叛了一切社会主义信念和巴塞尔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决议。

……

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同一个，那就是人数很少的特权工人阶层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些人所捍卫的是自己的特权地位，是从“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靠掠夺其他民族、靠它的大国优越地位等等而攫取的利润中分得一点油水的“权利”。

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思想政治内容是同一个，那就是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放弃革命的斗争手段，帮助“自己的”政府摆脱困境，而不是利用它的困难推进革命。如果从总体上来观察一下欧洲国家，如果不是注重个别人物（哪怕是最有威望的人物），那么就可以发现，恰恰是机会主义派别成了社会沙文主义的主要支柱，而从革命者的阵营中

几乎到处都比较一贯地发出了对这个派别的抗议。如果以1907年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上的派别划分情况为例,那么就可以发现,国际马克思主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而国际机会主义当时就已经是拥护帝国主义的了。

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1915年7—8月),《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7—518、521—522页。

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政治内容是一样的……

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政治内容是一样的,都主张阶级合作,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放弃革命行动,无条件地承认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不相信无产阶级而相信资产阶级。**社会沙文主义是英国自由派工人政策、米勒兰主义和伯恩施坦主义的直接继续和完成。**

列宁:《机会主义与第二国际的破产》(不早于1915年11月17日〔30日〕),《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1—122页。

不分析这些被公正地称为"取消主义"的思想,不分析这些同背离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舆论巨流有密切联系的思想,要解决和要比较完满地、全面地、有条理地阐明哪怕是一个策略问题,都是不可能的。

在某一方面的问题上,纲领接近策略,并且变为策略。不言而喻,这些问题在选举运动时期具有更大的直接的实际的意义。在这些问题上,背弃和混乱的气息表现得无比强烈。有些人说,旧任务已经消失了,因为在俄国,政权实质上已经

是资产阶级的了。另一些人说,今后俄国的发展可能像1848年以后的德国或奥国那样,不经过任何"飞跃"。还有人说,工人阶级领导权思想已经过时了,马克思主义者应当争取的"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的政党",等等。

不用说,不分析这些被公正地称为"取消主义"的思想,不分析这些同背离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舆论巨流有密切联系的思想,要解决和要比较完满地、全面地、有条理地阐明哪怕是一个策略问题,都是不可能的。谁稍稍观察过实际生活,谁就知道,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混乱状态,比从书刊上看到的要严重百倍。当然,在1905年底和1906—1907年那些事件发生以后的几年中间,情况也只能是这样。但是,这种涣散"愈是自然"(在资产阶级环境下),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同这种涣散进行全面的顽强的斗争的任务也就愈是紧急和迫切。

列宁:《选举运动的几个原则问题》(1911年12月和1912年1月),《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8—99页。

重复那些背得烂熟、但并不理解、也没有经过思考的"口号",结果就使得空谈盛行,这种空谈实际上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潮……

在社会生活各方面"重新估计一切价值",结果就引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哲学基本原理的"修正"。带着各种唯心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哲学的影响,表现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马赫主义的流行病上。重复那些背得烂熟、但并不理解、也没有经过思考的"口号",结果就使得空谈盛

行，这种空谈实际上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潮：如露骨的或者羞羞答答的“召回主义”，又如把召回主义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合理的色彩”。

列宁：《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1910 年 12 月 23 日〔1911 年 1 月 5 日〕），《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81—282 页。

取消主义当然是与叛变行为，与背弃纲领和策略的行动，与机会主义有思想上的联系的。

所谓取消主义，这就是：“党内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试图**取消**〈即解散、毁坏、废除、停止〉现有的党组织，代之以一种绝对要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即“公开”存在的〉不定形的联盟，甚至不惜以**公然放弃**党的**纲领**、**策略**和传统〈即过去的经验〉为代价”。

这就是党在四年多以前通过的关于取消主义的**决定**。

从这个决定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取消主义的实质是什么，它为什么会受到谴责。取消主义的实质就是**背弃**“地下组织”，取消它用一种绝对要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不定形的联盟来**代替**它。可见党所谴责的并**不是**合法工作，并不是提出这种工作的必要性。党所谴责的（而且无条件谴责的）是用一种不定形的、“公开的”、已不能称之为党的东西去**代替**原有的党。

党如果不捍卫自己的生存，不坚决同那些要取消它、消灭它否认它、背弃它的人作斗争，它就不可能生存。这是不言而

喻的。

……

取消主义当然是与**叛变行为**，与**背弃纲领和策略的行动**，与**机会主义**有思想上的**联系**的。上述决定的结尾就指出了这一点。但取消主义不**仅仅**是机会主义。机会主义者把党引上错误的资产阶级的道路，引上自由派工人政策的道路，但是他们**并不背弃**党本身，并不取消党。取消主义则是达到**背弃**党的地步的**那种**机会主义。如果党把那些不承认党的生存的人**包括**在内，那它就不可能生存，这是不言而喻的。在目前情况下，背弃地下组织，那就是背弃原有的党，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列宁：《几个争论的问题》（1913 年 4—6 月），《列宁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67—68 页。

这个派别因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伯恩施坦而得名，因为伯恩施坦叫嚣得最厉害，最完整地表达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正，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改，即修正主义。

这个派别因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伯恩施坦而得名，因为伯恩施坦叫嚣得最厉害，最完整地表达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正，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改，即修正主义。甚至在俄国这样一个由于经济落后，由于被农奴制残余所蹂躏的农民占人口大多数而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自然会支持得最久的国家里，这个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也清清楚楚地在我们眼前转变成修正主义了。我们的社会民粹派无论在土地问题上（全部土地地方公有化的纲领），或者在纲领和策略的一般问

题上，都不断地用对马克思学说的种种“修正”来代替他们的自成系统而同马克思主义根本敌对的旧体系的那些日益消亡、日趋没落的残余。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08年4月3日〔16日〕以前），《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伯恩斯坦的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

修正主义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所抱的态度，是它的经济倾向和政治倾向的自然补充。“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伯恩施坦的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进的基本特点，为了实际的或假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从这一政策的实质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一政策可能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而每一个稍微“新颖的”问题、每一次稍微出人意料和没有预见到的局势变动（即使这种变动只是在极小的程度上和最短的时期内改变了发展的基本路线），都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某种形式的修正主义。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08年4月3日〔16日〕以前），《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

十分自然，情况只能如此，而且一直到无产阶级革命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还会如此，因为，那种认为必须在大多数人口“完全”无产阶级化以后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想法，是极其错误的。

为什么修正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避免的呢？为什么它的根源比民族特点的差别和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差别还要深呢？因为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里，在无产阶级身旁总有广泛的小资产者阶层，即小业主阶层。资本主义过去是从小生产中产生的，现在也还在不断地从小生产中产生出来。资本主义必然要重新产生许多“中间阶层”（工厂附属物，如家庭劳动以及适应大工业如自行车工业和汽车工业的需要而散布在全国的小作坊等等。）这些新的小生产者同样必然要被重新抛入无产阶级队伍。十分自然，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也就会不断深入广大工人政党的队伍。十分自然，情况只能如此，而且一直到无产阶级革命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还会如此，因为，那种认为必须在大多数人口“完全”无产阶级化以后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想法，是极其错误的。目前我们往往只是在思想领域经历的事情，即同理论上修正马克思学说的人进行的争论，目前在实践上只是在工人运动某些局部问题上暴露出来的事情，即同修正主义者的策略分歧，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分裂，在将来无产阶级革命发生时工人阶级还一定会在大得无可比拟的规模上再次经历到，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将使一切争论问题尖锐化，将把一切分歧都集中到对决定群众的行动有最直接意义的几点上，将迫使人们在斗争高潮中分清敌友，抛开坏的同盟者，以便给敌人以决定性的打击。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08 年 4 月 3 日〔16 日〕以前),《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9 页。

(五)无政府主义及其他意识形态

巴枯宁有他自己的理论,这种理论是由共产主义和普鲁东主义的某种混合物构成的;他想把这两种理论合而为一,这说明他对政治经济学完全无知。

巴枯宁有他自己的理论,这种理论是由共产主义和普鲁东主义的某种混合物构成的;他想把这两种理论合而为一,这说明他对政治经济学完全无知。另外,他从蒲鲁东那里借用了关于无政府主义是社会最终状态的词句,同时他反对工人阶级的任何政治行动,因为这种行动似乎就是承认现存的政治状况,此外还因为一切政治行动,按照他的意见,都是"权威的"。至于他希望怎样消灭现存的政治压迫和资本的暴虐,他打算如何不用"权威的行动"来实现自己最喜爱的关于废除继承权的思想,他没有说明。

恩格斯:《恩格斯致卡·卡菲埃罗》(1871 年 7 月 1—3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241 页。

……他(巴枯宁)认为应当消除的主要祸害不是资本,就是说,不是由于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阶级对立,而是国家。

巴枯宁有一种独特的理论——蒲鲁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

混合物，其中最主要的东西就是：他认为应当消除的主要祸害不是资本，就是说，不是由于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阶级对立，而是**国家**。广大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群众都和我们抱有同样的观点，认为国家权力不过是统治阶级——地主和资本家——为维护其社会特权而为自己建立的组织，而巴枯宁却硬说**国家**创造了资本，资本家只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拥有自己的资本。因此，既然国家是主要祸害，那就必须首先废除国家，那时资本就会自行完蛋。而我们的说法恰巧相反：废除了资本，即废除了少数人对全部生产资料的占有，国家就会自行垮台。差别是本质性的：要废除国家而不预先实现社会变革，这是荒谬的；废除资本**正是**社会变革，其中包括对全部生产方式的改造。但是，既然在巴枯宁看来国家是主要祸害，就不应当做出任何事情来维持国家的生命，即任何一种国家——不管是共和国，君主国等等——的生命。因此就应当**完全放弃一切政治**。进行政治活动，尤其是参加选举，那是对原则的背叛。应当进行宣传，咒骂国家，组织起来，而当**一切**工人即大多数人都站到自己方面来了的时候，就撤销一切政权机关，废除国家，而代之以国际的组织。千年王国由以开始的这一伟大行动，就叫作**社会清算**。

恩格斯：《恩格斯致泰·库诺》（1872 年 1 月 24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07 页。

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把我们挖苦得很够了，虽然马克思驳斥蒲鲁东的著作和后来的《共产党宣

言》都已经直接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

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巴黎公社以后，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把我们挖苦得很够了，虽然马克思驳斥蒲鲁东的著作和后来的《共产党宣言》都已经直接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Gemeinwesen》〔“公团”〕，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字，相当于法文中的“公社”。

恩格斯：《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75 年 3 月 18—28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23 页。

无政府主义者把事情颠倒过来了。他们宣称，无产阶级革命应当从废除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开始。

马克思和我从 1845 年起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结果之一，将是称为国家的政治组织逐步解体直到最后消失。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从来就是依靠武装力

量保证富有的少数人对劳动者多数的经济压迫。随着富有的少数人的消失,武装压迫力量或国家权力的必要性也就消失。同时我们始终认为,为了达到未来社会革命的这一目的以及其他更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阶级应当首先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这一点在1847年写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章末尾已经阐明。

无政府主义者把事情颠倒过来了。他们宣称,无产阶级革命应当从废除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开始。但是,无产阶级在取得胜利以后遇到的唯一现成的组织正是国家。这个国家或许需要作一些改变,才能完成自己的新职能。但是在这种时刻破坏它,就是破坏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用来行使自己刚刚夺取的政权、镇压自己的资本家敌人和实行社会经济革命的唯一机构,而不进行这种革命,整个胜利最后就一定归于失败,工人就会大批遭到屠杀,巴黎公社以后的情形就是这样。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的逝世》(1883年4月23—28日和5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09—610页。

工团主义者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沉溺于革命空谈,破坏工人斗争的纪律,放弃社会党人利用议会讲坛的机会或为这种行为进行辩护。

近几年来,意大利社会党内部的斗争具有特别尖锐的形式。最初有两个主要派别:革命派和改良派。革命派坚持运

动的无产阶级性质,反对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表现,像温和精神、同资产阶级勾结、否认工人运动最终的(社会主义的)目的,等等。阶级斗争是这一派的基本原则和思想基础。

改良派在争取改良即争取局部改善政治状况和经济状况时常常忘记运动的社会主义性质,坚持同资产阶级结成集团和联盟以至社会党人加入资产阶级内阁,抛弃彻底的共和主义信念(在君主制的意大利,宣传共和主义并不违法),为"殖民政策",即侵占殖民地、压迫、掠夺和屠杀土著居民的政策辩护,等等。

这两个主要派别,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于**各国**社会党内,但在意大利还分化出了两个极端派,它们完全离开了社会主义,因而走上了脱离工人社会党的道路。非社会主义的极端派之一就是**工团主义**,这种思潮曾一度在意大利成为"时髦"。工团主义者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沉溺于革命空谈,破坏工人斗争的纪律,放弃社会党人利用议会讲坛的机会或为这种行为进行辩护。

列宁:《意大利社会党人代表大会》(1912 年 7 月 15 日〔28 日〕),《列宁全集》第 21 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33 页。

无产阶级需要国家只是暂时的。在废除国家是目的这个问题上,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完全没有分歧。

马克思故意着重指出无产阶级所必需的国家具有"革命的暂时的形式",以免人们歪曲他同无政府主义斗争的真正意思。无产阶级需要国家只是暂时的。在废除国家是目的这

个问题上，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完全没有分歧。我们所断言的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暂时利用国家权力的工具、手段、方法去**反对**剥削者，正如为了消灭阶级，就必须实行被压迫阶级的暂时专政一样。马克思在驳斥无政府主义者时，把问题提得非常尖锐，非常明确：工人在推翻资本家的压迫时，应当"放下武器"呢，还是应当利用它来反对资本家以粉碎他们的反抗？一个阶级有系统地利用武器反对另一个阶级，这不是国家的"暂时的形式"又是什么呢？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 年 8—9 月)，《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64 页。

我们需要革命的政权，我们需要（在一定的过渡时期内）国家。这是我们区别于无政府主义者的地方。

我们需要革命的**政权**，我们需要（在一定的过渡时期内）**国家**。这是我们区别于无政府主义者的地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的区别不仅在于我们主张集中的、共产主义的大生产他们主张分散的小生产。不，区别恰恰表现在政权问题，国家问题上，我们**主张**革命地利用革命的国家形式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无政府主义者则加以**反对**。

我们需要国家。但我们需要的**不是**资产阶级到处建立的**那种**国家，从立宪君主国直到最民主的共和国。这也是我们同开始腐烂的老社会党的机会主义分子和考茨基分子之间的区别，这些党歪曲了或者忘记了巴黎公社的教训和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教训的分析。

我们需要国家，但不是资产阶级所需要的那种国家，因为它的政权机关如警察、军队、官僚（官吏）是脱离人民并且是同人民对立的。一切资产阶级革命只不过完善了这个国家机器，只不过把它从这个党的手中交到另一个党的手中。

列宁：《远方来信——第三封信　论无产阶级民兵》（1917 年 3 月 11 日〔24 日〕），《列宁全集》第 29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8 页。

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装饰，它给资产阶级的种种无理要求罩上一件民族的外衣。

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装饰，它给资产阶级的种种无理要求罩上一件民族的外衣。沙文主义是借助常备军来延续国际斗争的手段，是用挑拨本国的生产者反对另一国生产者弟兄的办法以压服本国生产者的手段，是防止工人阶级的国际合作的手段，而这种合作是工人阶级解放的首要条件。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1871 年 4 月—5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605 页。

用自由主义词句掩盖、粉饰和装潢起来的立宪民主党人的沙文主义，则比黑帮报纸上粗野的沙文主义更为丑恶、更为有害。

是什么历史原因使巴尔干的这些迫切问题要通过由资产阶级和王朝的利益左右的战争来解决呢？主要原因是巴尔干的无产阶级力量薄弱，其次是强大的欧洲资产阶级的反动影

响和压力。欧洲资产阶级既害怕本国也害怕巴尔干获得真正自由，它所追求的只是靠牺牲别人来使自己发财致富，它煽起沙文主义情绪和民族仇恨，以便推行掠夺政策，阻挠巴尔干各被压迫阶级的自由发展。

巴尔干事件反映出的俄国沙文主义的丑恶程度并不亚于欧洲的沙文主义。而用自由主义词句掩盖、粉饰和装潢起来的立宪民主党人的沙文主义，则比黑帮报纸上粗野的沙文主义更为丑恶、更为有害。这些报纸明目张胆地嗾使人们攻击奥地利，——顺便提一句，在这个最落后的欧洲国家里，人民享有比俄国多得多的自由。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在谈到攻克阿德里安堡时写道："新的形势使俄国的外交完全有可能具有更大的坚定性……"

好一个"民主派"！他们假装不懂他们所说的只能是追求沙文主义目的的坚定性。无怪乎在罗将柯3月14日举行的宴会上，米留可夫和叶弗列莫夫、古契柯夫、本尼格森、克鲁平斯基和巴拉绍夫亲密地聚集在一起了。民族党人、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只不过是丑恶的、对自由深恶痛绝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各种不同的流派罢了！

列宁：《巴尔干战争和资产阶级沙文主义》（1913年3月29日〔4月11日〕），《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9—40页。

蒲鲁东主义者为了学理主义者所理解的那种社会革命，忽视波兰的国际作用，鄙弃民族运动。

蒲鲁东主义者为了学理主义者所理解的那种社会革命，

忽视波兰的国际作用,鄙弃民族运动。现在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做法也完全是学理主义的,他们**破坏**反社会帝国主义者的国际阵线,由于自己在兼并问题上的动摇而(在客观上)帮助社会帝国主义者。因为国际无产阶级斗争阵线在各小民族的具体立场方面恰恰已经改变了:那时(1848—1871 年间)小民族的作用是既可能成为"西欧民主派"和革命民族的同盟者,又可能成为沙皇政府的同盟者;而现在(1898—1914 年间)小民族已失去了这样的作用;它们今天的作用是"大国民族"寄生性的一个滋生地,因而也是这些民族的社会帝国主义的一个滋生地。现在重要的,不是 1/50 或 1/100 的小民族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前能不能获得解放,而是在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分成两个国际阵营,其中之一已被大国资产阶级的残羹剩饭(其中也包括从对小民族的双重或三重剥削中得来的东西)所腐蚀,而另一阵营如果不解放小民族,不用反沙文主义,即反兼并主义,即"自决主义的"精神教育群众,就不能获得解放。

事情的这个最主要的方面被波兰同志忽视了,他们**不是**从帝国主义时代的基本立场出发,不是用国际无产阶级有两个阵营的观点来看问题。

列宁:《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1916 年 7 月),《列宁全集》第 28 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9—40 页。

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

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特别巨大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困难，就是它不得不经过一个同爱国主义断然决裂的时期，即布列斯特和约时期。这个和约引起的痛苦、怨恨和愤怒是可以理解的。自然，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只能期望自觉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懂得下面这个真理：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利益，我们承担而且应当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以及不像无产阶级那样在长期的罢工斗争和革命斗争中经受过严格锻炼的广大劳动群众，既不可能坚信这一革命就要到来，也不可能为这一革命无条件献身。在他们看来，我们的策略至多不过是幻想、狂热和冒险，是沉醉于指望其他国家也发生革命这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式的、毫无根据的想法，为此而牺牲亿万人民显而易见的现实的利益。小资产阶级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比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更加爱国。

列宁：《皮梯利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1918年11月20日），《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9—580页。

只是在这些爱国主义的华丽词藻里面包含着物质利益的地方，只是在一部分打着正式的爱国主义的招牌来图谋私利的大资产阶级那里，这种正式的爱国主义还会有自己的市场。

光明终于真正开始出现。旧政府机关所大肆散布的关于波兰和意大利的谣言和歪曲，人为地激起仇恨的种种企图，什么事关德国荣誉和德国威力等等言过其词的滥调，——所有

这一切魔术手法已失去了效力。只是在这些爱国主义的华丽词藻里面包含着物质利益的地方，只是在一部分打着正式的爱国主义的招牌来图谋私利的大资产阶级那里，这种正式的爱国主义还会有自己的市场。反动的政党懂得并利用了这一点。但是，德国中间阶层和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了解或者至少感觉到，毗邻民族的自由是他们本身自由的保障。

恩格斯：《德国的对外政策》（1848年7月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78页。

如今他（马志尼）做出了一件英勇过人的、具有爱国主义自我牺牲精神的非凡壮举。他一个人冒着牺牲自己声誉的危险，大声疾呼地反对自我欺骗、盲目狂热和自私谎言这种巴比伦的混乱语言。

在目前情况下，马志尼的任何声明都是一个比互相角逐着的各个内阁的外交或来自战场的五光十色的公报更值得注意的事件。尽管人们对罗马三执政之一的品格看法多么不同，但谁也不会否认30年来意大利革命是同他的名字连在一起的，而且在这同一时期欧洲承认他是他的同胞的民族愿望的出色表达者。如今他做出了一件英勇过人的、具有爱国主义自我牺牲精神的非凡壮举。他一个人冒着牺牲自己声誉的危险，大声疾呼地反对自我欺骗、盲目狂热和自私谎言这种巴比伦的混乱语言。

马克思：《马志尼宣言》（1859年5月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06页。

没有这种爱国主义，我们就保不住苏维埃共和国，消灭不了私有制，我们现在就收集不到3亿普特的余粮。这是最好的革命的爱国主义。

宁愿挨饿三年也不愿把俄国交给外国人，这种爱国主义是真正的爱国主义。没有这种爱国主义，我们就支持不了三年。没有这种爱国主义，我们就保不住苏维埃共和国，消灭不了私有制，我们现在就收集不到3亿普特的余粮。这是最好的革命的爱国主义。有人说，富农赞成挨饿三年，但不愿让外国资本家进来，尽管富农能从他们那里捞到某些好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这里谈的不是富农，而是非党的普通农民。

列宁：《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1920年12月），《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5页。

军服是他们的大礼服，战争是他们的诗篇，在想象中扩大和完整起来的小块土地是他们的祖国，而爱国主义是财产观念的理想形态。

军队是小农的光荣，军队把小农造就成为英雄，他们保护新得的财产免受外敌侵犯，颂扬他们刚获得的民族性，掠夺世界并使之革命化。军服是他们的大礼服，战争是他们的诗篇，在想象中扩大和完整起来的小块土地是他们的祖国，而爱国主义是财产观念的理想形态。可是，现在法国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所要对付的敌人，已不是哥萨克，而是法警和税吏了。小块土地已不是躺在所谓的祖国中，而是存放在抵押账簿中了。军队本身已不再是农民青年的精华，而是农民流氓

无产阶级的败类了。军队大部分都是招募来的新兵,都是些替手,正如第二个波拿巴本人只是一个招募来的人物,只是拿破仑的替手一样。现在军队是在执行宪兵职务围捕农民时树立英雄业绩的;所以,如果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在其制度内在矛盾驱使下到法国境外去用兵,那么军队在干了几桩强盗勾当后就不是获得光荣,而是遭到痛打了。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中—1852年3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3页。

工人党对"爱国主义"采取的新立场就其本身而言是很有道理的。国际联合只能存在于国家之间,因而这些国家的存在、它们在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也就包括在国际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之中。

工人党对"爱国主义"采取的新立场就其本身而言是很有道理的。国际联合只能存在于国家之间,因而这些国家的存在、它们在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也就包括在国际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之中。假爱国主义者施加的压力,迟早定会招致这样一类的声明,即使不同米勒兰和饶勒斯联合也是一样,这两个人无疑也极力主张必须采取这种行动。盖得在《费加罗报》上的谈话好极了,对于这个谈话,一句反对的意见也没有。员会的声明——写到这里我被打断了。我得上火车站去。龚佩尔特夫人(你知道龚佩尔特医生不久以前去世了)前往德国,途中想在我们这里停留几天,我得去接她。所以我

得向你告别一两天。我对声明的意见不是十分重要的，完全不必着忙。祝永久的旅行家顺利。可怜的克列孟梭变成了什么样子，一个戴鲁累德就把他弄得束手无策！世之荣光如斯逝去。看来反犹太主义—爱国主义的恶棍们不论在法国还是在德国，只要牵涉到资产者，他们都是按他们自己那一套行事！

恩格斯：《恩格斯致保·拉法格》（1893年6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4—85页。

爱国主义思想早在18世纪的大革命时期就已经产生；这种思想完全支配了公社的社会主义者……

当时资产阶级组成了“国防政府”，而无产阶级争取全民族独立的斗争只得在它的领导下进行。事实上这是一个“背叛人民”的政府，它的使命是镇压巴黎无产阶级。但无产阶级为爱国主义的幻想所迷惑，竟然没有看出这一点。爱国主义思想早在18世纪的大革命时期就已经产生；这种思想完全支配了公社的社会主义者，例如布朗基这位公认的革命家和社会主义的热烈拥护者，竟找不出比资产阶级高喊的口号“**祖国在危急中！**”更合适的名称来为自己的报纸命名。

把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互相矛盾的任务结合在一起，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致命错误。早在1870年9月，马克思在国际的宣言中就告诫过法国无产阶级不要迷恋于虚伪的民族思想，因为自大革命以来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矛盾已经变得尖锐了。如果说，从前同全欧洲反动势力的斗争

团结了整个革命的民族，那么现在，无产阶级已经不能再把本阶级的利益同其他敌对阶级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了。让资产阶级去对民族蒙受的屈辱承担责任吧，无产阶级的任务是争取社会主义的解放，使劳动挣脱资产阶级的桎梏。

列宁：《公社的教训》（1908年3月10日〔23日〕），《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35—436页。

编 后 语

意识形态建设是当代中国必须认真面对的一个极其重大问题。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党和国家怎样往前走，党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作出了明确的回答，这就是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伟大旗帜，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全民。

我国正面对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的国际环境，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国际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国际安全领域的斗争、围绕国际秩序的斗争等依然深刻复杂，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依然存在，西方反华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依然没有改变，我们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不断增强包括文化“软实力”在内的国家综合实力。

我国正在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奋斗，在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具有阶段性特征的新矛盾、新挑战，必须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关键在于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自觉追求。

我们党能够在新时期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

理论基础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继承，其时代背景是对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的科学把握，其历史根据是国内外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科学总结，其现实依据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生动实践、对最广大人民共同愿望的科学认识。

旗帜就是方向、就是道路、就是形象，同时也就是主义和意识形态。这里首先关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意识形态理论，可以说，这是当代中国遭遇的全部意识形态挑战的理论源头。为满足广大读者的学习需要，尽管国内外尚无类似的样本可供参考，我们还是在历经近三年的艰苦努力后，尝试着完成了这一专题摘编，敬请大家批评指正。本书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年立项的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史”和2007年立项的国家重大招标课题“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研究”的基础性成果之一。

本书由侯惠勤主编，姜迎春、张志丹协助主编做了相关编务工作。参加本书选辑工作的还有：苗泉竹、王金玉、王秋梅、刘祥林、程广安、张甲秀、董德、宣云凤、夏瑜杰、吴爱武、牛菲、赵文荟；参加本书核校工作的有：吴爱武、牛菲、赵文荟、张志丹、程广安、张甲秀、钟君。本书承蒙陈奎元、冷溶、王伟光、李慎明等同志拨冗审阅，中央编译局领导和有关专家认真审读，人民出版社领导大力支持，一并表示感谢。

编 者

2009年1月